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女士及众生相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高年生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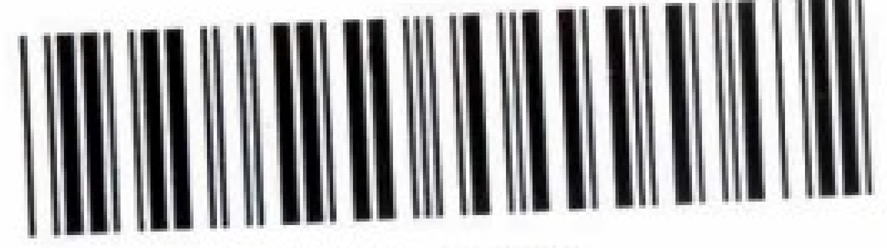
女士及众生相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高年生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女士及众生相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高年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3 字数 365,000

印 数：1—11,310 册（包括精装）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692-9/I·491

定价：平 7.00 元 精 9.50 元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满腔激情写苍生

高年生

1972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德著名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以表彰他在创作中“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消息传到联邦德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仿佛获奖的不是伯尔个人，而是整个民族。自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被摧毁之后，曾经产生过像歌德、席勒、海涅这样伟大作家的德国文学似乎也一起被埋葬了。战后，以伯尔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作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托马斯·曼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十三年之后重新夺得这顶桂冠，难怪德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呢！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证书中写道：“确确实实，伯尔是现代德国文学出色的主角。”

（一）

伯尔的祖先来自英国，原是造船木工，16世纪迁居欧洲大陆。父亲维克托·伯尔是个雕刻匠，专门从事宗教用品的雕

刻。母亲玛利亚的先辈是农民，也酿造啤酒。关于他的童年生活，伯尔在《关于我自己》一文中有过如下的记载："1917年12月21日，我出生在科隆，正当我父亲当战时后备军守卫大桥的时候，他的第八个孩子出世了；在此之前，他已有两个孩子夭折；我出生在父亲诅咒战争和笨蛋皇帝的时候。"关于他的故乡科隆，他写道："我出生在科隆……那里的人们一反德国各州通例，既不那么十分认真地看待世俗权力，也不把教会权力放在眼里；在那里，曾经有人向希特勒扔花盆，公开嘲笑戈林……"伯尔出生在兵荒马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童年时代经历了战后的动荡岁月，原先小康的家庭一落千丈，他还记得小时候用一万亿马克钞票买一根棒棒糖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伯尔自小痛恨战争与军国主义。希特勒上台后，伯尔在中学念书，他是全校顶住压力拒不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极少数学生中的一个。

1937年伯尔中学毕业，他到波恩一家旧书店当学徒。九个月后，他中辍学徒生涯。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他参加了半年劳动服役，为的是取得上大学的资格。之后，他在科隆大学注册入学，但只是挂个名，很少去听课。三个月后，即1939年夏，他被征入伍。数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战时他随军到过波兰、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但经常以装病的方法呆在战斗不很激烈的地方，尽管如此仍多次负伤。1945年4月9日，伯尔被美军俘获，随后数月他是在设于比利时的美英战俘营里度过的。同年9月，他被遣送回德国。伯尔自己写道："我是在1945年9月15日被德国人释放的。"

1945年12月，伯尔回到大战之后疮痍满目的故乡科隆，在亲友的帮助下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住在两间临时拾掇好的房子

里。妻子安妮玛丽·捷希是中学教师，挑起了赡养全家生活的重担。伯尔重新在科隆大学注册入学，目的是以大学生身份领取食品配给卡，但从来没有去上过课。他在哥哥的木匠铺做工，后来又有一年之久在科隆市统计局当人口普查员。但这个工作只是一个过渡。“我从十七岁起就确定了职业和工作：作家。”他说。

伯尔在中学学习和书店学徒期间就写过小说和诗歌。他阅读过克莱斯特、黑贝尔、切斯特顿、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特别是法国作家布洛瓦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洛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穷人、被侮辱者和被蹂躏者——是伯尔在自己的周围环境中非常熟悉的，因此他在初期作品中对社会持批判态度。

战争期间他没有从事创作活动。返回科隆后不久，他又开始写作。他说：“我相信，从1945年至1947年，我曾在十家报纸上发表了大约六十篇小说。”他最早出版的三部作品是《列车正点》、《浪游者，你若来斯巴……》和《亚当，你在哪里？》。这些作品主要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这就产生了给这种年轻的文学所起的三个流行语：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这些作品揭露和批判军国主义和战争，清算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人们认识战争的灾难，但基调灰暗，把战争说成是“无聊的”，是人与命运的抽象的搏斗，结果总是人的毁灭。

他的作品使他在1951年得到邀请，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一年一度的会议。他在会上朗读了他的讽刺小说《败家子》，获得了“四七社”奖金。从1951年夏开始，伯尔成为专业

作家。

进入50年代之后，伯尔的创作视野不断开阔。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小人物”在战后西德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痛苦挣扎与悲惨遭遇，表现他们的苦闷彷徨，揭露和鞭挞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现象，批判复辟军国主义的逆流。

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声不吭》以西德“经济奇迹”为背景，表现普通劳动人民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痛苦与不幸。小说的主人公弗烈德·鲍格纳是个小职员。尽管他终日劳碌，业余还去当家庭教师，微薄的收入却仍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弗烈德不堪忍受这种生活而离家出走，只在每个周末同妻子在旷野或下等旅馆聚会。社会对他们是冷漠的、充满敌意的，他们的处境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招来讽刺与嘲笑。《一声不吭》在艺术手法上也颇有特色，用双主角的第一人称写成，故事情节在两人穿插、交替的内心独白中展开，这样就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使伯尔从此在国际上闻名。在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中，作者用多层次结构，把五个人物的内心独白交织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被战争夺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的生活。

《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是引起人们广泛注目的作品。它以建筑师费默尔一家在1958年9月6日这一天的经历，通过大量内心独白和倒叙手法，揭露了五十年来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要求人们警惕它的复活。

60年代初，伯尔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中篇小说《离队》(1964)、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1971)、

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1974)、长篇小说《保护网下》(1979)和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1985)。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西德社会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对小人物的迫害与践踏，以及在“文明”面纱掩盖下的腐败和罪恶，前期作品中的低沉、压抑的基调已不复存在，表现出来的是对小人物命运的愤愤不平和对社会的强烈愤慨。与前期作品相比较，主人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逆来顺受、消极被动、不再向恶势力屈服，而是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抗，甚至使用暴力。这和伯尔的政治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战后初期，他曾希望通过清算过去，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使社会得到改善。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种种积弊越来越明显，使他深感失望。他曾对阿登纳的政策大加抨击。从60年代初开始，伯尔对西德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越来越失望。他支持议会外反对派，同情学生运动。1972年1月10日，伯尔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西德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对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分子团伙的煽动性报道，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围攻、谩骂和诽谤。他的住宅还受到警方的搜查。这一切使伯尔深感愤懑。他曾气愤地说：“我是一个自由作家。我说：不，我不再在国外为德国官方机构朗读作品——事情到此为止。”

伯尔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笃信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他强烈反对已堕落为统治阶级工具与帮凶的教会。对于伯尔来说，至迟从60年代初起，“德国天主教向战后机会主义投降”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小丑之见》对此作了有力的揭露。从此以后，天主教的主题在

他的作品中便不再占有显要地位了。1976年，伯尔终于与妻子一起公开宣布退出天主教教会。

伯尔于1970年至1972年担任西德笔会主席，1971年至1974年担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多次获得文学奖和各种荣誉称号。他是个多产作家，除小说外，他还创作了广播剧、诗歌、散文、政论、文学评论等大量作品。他还是个著名的翻译家。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已超过三千万册。伯尔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当代外国作家之一。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友好感情，本来打算来中国访问，后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详见附录《伯尔印象记》)。

1985年7月16日，伯尔在朗根布洛伊希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对于伯尔逝世，联邦德国朝野都表示哀痛。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给伯尔夫人的唁电中说："随着海因里希·伯尔的去世，我们失掉了一位德国文坛巨擘。无论思想自由在哪儿受到威胁，他总是奋起维护它。他好争吵，令人不快，他既叫人反感，又赢得别人尊敬。我们将因为再也听不见他那充满无畏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警觉性的时时告诫我们的声音而惆怅。他的作品永垂不朽。"联邦德国笔会主席马丁·格里高尔-德林说："伯尔去世后我们不仅丧失了一位为战后德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和道德家，他也是一位永远不知疲倦的人权捍卫者，国际笔会代表众多受迫害和受监禁的作家永远感谢他。"中国作家协会的唁电说，伯尔是"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好朋友。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联邦德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冈特·瓦尔拉夫对伯尔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述："海因里希·伯尔为联邦德国在国外赢得了它不能得到的信誉。他所代表的是在本国不值一文的处世态度

……在具有鲜明倾向的西德作家中，伯尔名列第一。他的举止极为平凡，不强求于人，孜孜以求其说服力。他总是平易近人，全力以赴。他就是这样的人，如此鲜明，所以他成了具有象征性的人物。”

（二）

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西德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女士及众生相》是伯尔“最为五彩缤纷、包罗万象的作品”，它“汲取了他过去许多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行为方式、个性发展和精神面貌”①。这部作品在许多国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1971年“欧洲之书”。作品问世的次年，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伯尔在1966年发表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结束》以后沉默了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只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和政论。在1966年以后，西德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中。这一阶段是伯尔在政治上进一步激化、在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女士及众生相》的发表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标志。

《女士及众生相》是一部人物众多、内容丰富的小说，它以构思独特的结构、缜密而生动的故事情节、恣肆老辣的文笔，描述女主人公莱尼的人生坎坷，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动荡对于人生的波及，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

① 阿诺尔德：《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西德《文与评》第33期，第64页。

这部小说以“女士”莱尼的经历为主线，但莱尼几乎始终隐在幕后，没有出场。作者把一个记者推到台前，让他来进行介绍。莱尼的整个身世并不是直接向她本人打听得来的，而是出自那些与莱尼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形形色色人物之口。这些知情人是“笔者”即记者经常采访的对象，他们在谈话中往往联系自己的经历，表明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因此这些采访记录自然反映他们的个性，清楚地勾勒出他们的轮廓，形成一幅以莱尼为中心的群像图。

《女士及众生相》从莱尼少女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起一直写到她四十八岁的1970年。其中包括纳粹统治时期、战后时期直至70年代初期。小说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女人的身世，可是在她背后还有更深广的东西。小说从一个人物身上反映整个时代，展示一幅斑驳陆离的历史画卷。伯尔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时说：“我试图描写或撰写一个承受了1922年至1970年这一段历史的全部重担的年近半百的德国妇女的命运。”纳粹的极权统治、迫害犹太人、扩军备战、虐杀战俘、战后的所谓“非纳粹化”运动和“经济奇迹”、政治的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在小说中无不得到反映。作者通过这些描绘，从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莱尼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她有时纯朴到天真的程度。她不愿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世哲学生活。她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后来家庭破产，当了花圈场工人。她心地善良，一贯助人为乐，我行我素，不计较个人安危。在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年代里，她帮助犹太修女拉黑尔。在花圈场工作期间，她对俄国战俘波利斯产生了感情，波利斯成了她唯一的心

上人。战争结束没有几天，波利斯被抓走，在一次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除了几个朋友外，莱尼只还有一个与波利斯生下的儿子莱夫，这个莱夫由于蔑视这个社会的准则，不愿随波逐流，故意涂改汇票而被投入监狱三个月。莱尼的厄运接踵而来，继儿子被捕入狱后，她的亲戚又强迫她迁出她的住所。她不被周围环境所容，或斥之为“荡妇”，或贬之曰“破鞋”，甚至还“有人要求用毒气杀死她”！真是：人生坎坷，红颜薄命！

作者在表现人的命运、爱情等这类普遍而永恒的题旨时力图摆脱惯性的定势，突破固有的框架，深入发掘某种新的意蕴。在一个“堪笑世情薄，百般都弄巧”的社会里，世事人情，样样玩弄机巧，崇尚私利，人际关系到了危乎可怕的程度，可是在女主人公身上却迸发出一道人类世世代代始终未泯灭的人性之光，使我们这些在夜沉沉、路漫漫的人间世道上艰难跋涉的芸芸众生看到了现代人世的希望之光。小说将莱尼身上的人性升华为博爱性的崇高的人道精神，与现实人世的冷漠无情作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莱尼这一形象以力，以美，以熠熠的光辉！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文艺作品不论其规模多么宏大，在反映社会生活上也不可能做到情貌无遗、点滴不漏。所以作家都重视选择一些富于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来概括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女士及众生相》的描写繁简相间，各得其宜。有些场面铺陈描绘，不厌其繁，对表现人物起了很大作用。如作者对“咖啡风波”极尽描绘之能事，生动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心灵纯洁、临危不惧、我行我素的性格。伯尔笔下的这个莱尼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普通妇女。她天生丽质，但天资却很一般，学习成绩不

佳。她具有音乐才能，却不会识谱。她穿着陈旧，不善于打扮。她对生活要求不高，每天早晨能吃上两个新鲜的小面包就感到心满意足。她感情用事，我行我素，不计后果。总之，作者并未把她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伟大人物，但显而易见，作者是充分肯定莱尼身上的独特秉性的。正如西德评论家冈特·施洛茨所说，伯尔笔下的莱尼“是一个同我们这个大杂烩社会针锋相对的人物。我们的社会是由‘红衣主教与海军上将’、摆阔的人与软弱的人、色情文人与道学先生组成的大杂烩，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他们都有顽强的生命力，通权达变，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改变的。莱尼以及波利斯和莱夫都断然拒绝这个效率社会，在生动形象化的芸芸众生和标准化个人的群像中，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①

在《女士及众生相》中出现了一大批栩栩动人的人物，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毫无雷同之处。例如，具有强烈传奇性的犹太修女拉黑尔，对男人慈悲为怀、甘愿献身的玛格蕾特，心直口快的洛蒂等，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神态风采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令人久久难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塑造的纳粹分子佩尔策这个形象，突破了伯尔以往作品中好人与坏人黑白分明的格局，受到评论家们的一致称赞，被认为是美学技巧上的一大进步。

《女士及众生相》在艺术结构上是成功的，初读像是随意写来，穿插过多，显得臃肿，实则筋络相连，息息相关，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对照处见深意。全书共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十章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写莱尼的身世。第一章介绍莱尼的现况。

① 同第7页注。见西德《文与评》第33期，第63页。

从第二章开始，小说就回过头来写她成长的过程和重要经历。第九章后半部分和第十章与第一章衔接，写霍伊泽祖孙逼莱尼搬迁，清洁工人制造交通事故阻止强制搬迁的经过。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是结尾部分，仅是为了介绍莱夫的情况和交代一些有关人士的归宿，篇幅都比较短。西德评论家阿诺尔德认为，“报道莱尼身世的目的既已达到，看来笔者正在从故事中脱身，不去过问这个人物，让她按自己的愿望生活下去”。因此，小说就没有必要多写了。小说的结束非常突兀，给读者留下一个联想生发的广阔天地。

从审美角度来看，《女士及众生相》沿用现实主义手法，展开迂回曲折的情节，塑造个性鲜明的典型性格，事件和场景的选择也都别有一番情趣和韵味。作者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人叹为观止。在“咖啡风波”中，我们似乎身临其境，感到那种“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和“死一般的寂静”。当莱尼的同事克雷默尔讲述1945年3月2日大轰炸时，我们不禁为那种惨剧的场面所震惊，好像大地在脚下剧烈颤抖一样。德国法西斯屠杀苏联无辜的人民，就连五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使我们为之发指。这种绘声绘色的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女士及众生相》也颇具特色。为了表明叙述的真实性，“笔者”干脆把他采访的对象的谈话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这些谈话记录把讲述者的神态和气质刻画得活龙活现、维妙维肖，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洛蒂口口声声“乱弹琴”，波加科夫爱说“受用”。小说中用缩写字母代表一些富于感情色彩的字眼，如用W代表“哭”，用T代表“眼泪”，用L1代表“笑”，用L2代表“烦恼”，用G代表“幸

福"等等，可谓别开生面。作品语言既凝炼辛辣又含蓄幽默，穿插的不少议论十分精辟。

西德著名文艺评论家赖-拉尼茨基指出："《女士及众生相》有不少写得很高明的花絮和印象、近景、插曲和回忆。这些章节表明，伯尔始终善于观察细微差别和细节、气氛和熟语，并且加以记录下来。""绝望和调侃、严厉的控诉和粗俗的笑谈、辛酸和欢乐混合在一起，使全书生色不少。"①

伯尔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但他也像任何善于广纳百川汇于一身的文学艺术家一样，敢于突破传统的创作方法，创造了一些新的表现技巧，提出了一些新的美学原则（他自己称之为"人性的美学"），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审美意识。艺术贵在创新。伯尔早在50年代就说过："正如生老病死这一切不可能成为例行公事一样，艺术也不能是例行公事……有些艺术家，有些能工巧匠成了纯粹例行公事的老手，但他们——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承认这一点——已不是艺术家了。一个人不再是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创作了什么拙劣的作品，而是在他开始害怕一切风险的那一刹那。"（《写作的风险》，1956）《女士及众生相》正是体现了他这种不墨守成规、勇于在艺术上开拓的精神，可以说是一部融现代意识和超越能量于一炉的大家之作。

一部伟大的作品常常具有多种价值取向的审美功能，它含蕴万象，吐纳深情，是社会、人生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1854年，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

① 《海因里希·伯尔》，见《当代德国文学家生平和作品》，其译文刊于1986年第6期《外国文艺》，第177页。

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理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断言他的作品“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列·尼·托尔斯泰》)。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正是这样一部具有深刻底蕴、闪烁着时代思想光芒的鸿篇巨著，“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语）。

如同伯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女士及众生相》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伯尔素有“小人物的作家”之称。他深切同情社会上失意落魄、遭受凌辱和压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他总是把人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以此来暴露人生的痛苦，控诉违背人性的社会。但在批判黑暗现实的时候，他看不到出路而在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与早期作品相比较，《女士及众生相》中的人物在性格和精神面貌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忍辱退让、逆来顺受、彷徨不前，而是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抗，这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只是个人的被动的反抗方式，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带有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色彩。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出现了“手拉着手，成双成对”的皆大欢喜的场面，冲淡了它的批判精神。

从整体上来说，小说的结构是清晰完整的，但是有些章节，看来还不够严谨，穿插过多，不够精练。有些描写，如对书中人物的内分泌、消化等官能反复强调，甚至予人以庸俗无聊之感。个别插曲，如“笔者”和修女克莱曼蒂娜的艳遇，似乎游离于主线，迹近蛇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些败笔。但瑕不掩瑜，《女士及众生相》可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巨大艺术价值的宏篇巨著，值得一读。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吴裕康
封面设计　汤小胤

目　　录

·短篇小说·

·附　录·

女士及众生相

献给莱尼、莱夫和波利斯

主　要　人　物

女士

　　莱尼·普法伊弗　娘家姓格鲁伊滕

格鲁伊滕家

　　胡贝特　莱尼之父

　　海伦妮　莱尼之母

　　海因里希　莱尼之兄

　　莱夫　莱尼之子

普法伊弗家

　　威廉　莱尼的公公

　　玛丽安妮　莱尼的婆婆

　　阿洛伊斯　莱尼之夫

　　海因里希　莱尼的小叔

　　黑蒂　海因里希之妻

　　威廉、**卡尔**　他们的儿子

　　费尔南德　阿洛伊斯的姑姑

霍伊泽家

　　奥托·霍伊泽　胡贝特·格鲁伊滕的总会计师

　　霍伊泽太太　其妻

　　威廉　他们的儿子

　　洛蒂　威廉之妻

　　维尔纳、**库特**　威廉和洛蒂之子

施威格特家

　　施威格特太太　莱尼的姨妈

　　艾哈德　其子，莱尼的表兄、情人

佩尔策家

　　瓦尔特　莱尼的老板

　　夏娃　其妻

　　海因茨　瓦尔特之父

　　阿德尔海德　瓦尔特之母

修女

　　采齐莉娅

　　科伦巴努斯

　　克莱曼蒂娜　简称"克"

　　普鲁登齐娅

　　拉黑尔　又称"肠卜僧"

　　萨平蒂娅

耶稣会教士

　　J. 甲

　　J. 乙

莱尼的花圈场同事

　　格龙奇，阿尔贝特

　　霍埃特，赫尔加

　　赫特霍尼，莉安妮

　　克雷默尔，伊尔泽

　　克雷姆普，赫里贝特

　　谢尔夫

　　汪夫特，马尔加

策芬，弗莉达

其他提供情况者

玛格蕾特·施勒默

汉斯·赫尔岑

格蕾特·赫尔岑

一位匿名高层人士

咪咪 其妻

B.H.T 旧书商

波加科夫 苏联战俘

马尔娅·范·多尔恩 格鲁伊滕家女佣

绍肯斯 修道院看门人

席尔滕施坦博士 音乐评论家

朔尔斯多夫博士 斯拉夫语言学家

享格斯博士 斯拉夫语言学家

其他

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 莱尼的情人，莱夫的父亲，苏联战俘

梅赫梅特·沙欣 莱尼的情人，土耳其人

贝伦科 苏联战俘

基特金 苏联战俘

维克托·根利肖维奇 苏联战俘

博尔迪希 战俘营看守

科尔布 战俘营看守

第一章

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她长着一对有时像深蓝有时像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夹杂着几丝白发，蓬松地垂在脑后，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本来她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价值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可卖四十万马克，可是她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满不在乎地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由于她在1941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她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还没有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莱尼目前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

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她现在留的发式是年轻人

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莱尼可以穿超短裙，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但莱尼仍墨守1942年前后流行的裙长，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她觉得（有一定根据）穿套衫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年轻时家境富裕购置的，保存得很好。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如果她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1935年至1939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手头有足够的钱——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

眼下莱尼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1894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过一家理发馆，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尽管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莱尼就经常照这面镜子。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她并未觉察到这一点。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越来越对她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法院执行

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法院执行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此外，莱尼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些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因此人人都能料到，莱尼的名声很快就被败坏了。

笔者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收集有关莱尼的情况，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这里的报道可以十拿九稳地说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这里既然提到了两种非躯体的特点，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她所受的宗教教育肯定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也许这对莱尼有益无害吧。

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莱尼已对这个世界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为什么人们对她如此恼恨，对她这么坏；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她受到公开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莱尼不理睬这些辱骂。别人在她背后说她是"荡妇"，

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甚或麻木不仁；这两点其实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她有时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她的泪囊和泪腺管大肆活动。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包括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可以断定，莱尼一生中至今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以后几分钟，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失足的事情：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答应他，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住在乡下，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求爱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乳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甚至在她背后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杀死她，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他只能再补充一点：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

可而止。早餐是她的主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① 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调以热牛奶的浓咖啡。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晚上她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没有什么东西——至少是在吃的东西中——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容忍人们的辱骂、坏话和侮慢。

谈到吸烟，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通常每天八支，决不会超过，常常还要少一些；战时她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根据天气情况喝一杯烧酒，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莱尼从1939年起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从1943年起就没有汽车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

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然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受到命运的优待。不久前莱尼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

① 波维德，流行于奥地利，即李子酱。

人。莱尼带着激动的声音对她说：一天早上，她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处小小的不平，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和其他女孩子在那儿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1894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莱尼的脚立即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立即把一切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虽然它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把它简化为情欲高潮。

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少言寡语、守口如瓶，甚至可以说她是个不爱讲话的人。的确，她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甚至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这两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这样说可能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如果她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她生平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给了那个男人；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1940年)：“我抓到一个阔佬，这家伙非

要同我结婚不可。”

目前玛格蕾特正在住院，住在隔离病房，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与她谈话。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如果突然从我的眼睛里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的话。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

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他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

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这里必须先补充一点：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满足别人的要求。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

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她的的确确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隐居乡下，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马尔娅在十五年

或二十年前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①，她从来没有胆小怕事过。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她对莱尼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马尔娅·范·多尔恩从1920年到1960年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实现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过去她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②。

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音乐批评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坦博士占有特殊地位。他四十年来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住在底层，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但他始终不知道弹钢琴的是莱尼；他虽然认得莱尼的面孔，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甚至很有可能看过莱尼玩跳房子游戏，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对女性魅力并非无动于衷，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

① 德语成语“心掉进裤裆里”，有心惊胆战、魂不附体的意思。

② 这里指法西斯分子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等。

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坦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翻来覆去弹奏数十年却不曾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①那样的人见到他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也许会改变自己对莱尼的评价吧。席尔滕施坦后来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坦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生活则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

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个确切的证人；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不过她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

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不顾骨肉情分，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几乎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对自己都难以启齿。简

① 莫尼克·哈斯（1909～ ），法国女钢琴家，巴黎音乐戏剧学院教授。

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

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还有：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阴错阳差地与莱尼的一生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下文还会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成问题的，虽然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甚至还得意扬扬。他称自己“道德败坏”，正因为此话出自亨格斯本人之口，笔者不想采用。亨格斯不打自招，说他当年在苏联给一位不久前遭暗杀的伯爵出身的外交官当差，为德国军备工业“招募”劳工，“背叛了我的俄语，背叛了我那极好的俄语”。亨格斯住在波恩附近乡下，给几家研究东方政策①的杂志和办事处做笔译工作，“经济情况并不差”（亨格斯自述）。

如果现在就把所有提供情况的人都一一详细介绍，未免会

① 指西方国家对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扯得太远。他们将会在合适的场合亮相，同时刻画其氛围。这里需要提到的还有一位前古籍商人，他只同意用他的名字的起首字母B。H。T相称。此人提供的情况，并不是有关莱尼本人的，而只是涉及了一个对莱尼一生关系重大的天主教修女。

一个知之不多但毕竟还活在人世的知情人是莱尼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只有事关他本人时他的话才是片面的，不可相信。他现年四十四岁，妻子名叫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威廉，十八岁，小的叫卡尔，十四岁。

还有一些人将在适当场合，视其重要性不同，分别以相应的笔墨介绍给读者。他们是：三位男性要人，其中一位是地方行政长官，另一位属于大工业部门，第三位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高级官员；两个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女工；两三个苏联人；一个拥有多家分店的花店女店主；一个年迈的园艺师傅；一个年纪不是那么老的前花圃老板，此人(自述！)“正悉心经管自己的地产”；以及其他一些人。介绍重要的知情人时将具体说明其身高和体重。

莱尼家里的陈设经过多次抵押后，所剩下的都是1885年以及1920年至1925年这两个时期的大杂烩：她的双亲在1920年和1922年继承的遗产中，有几件青春艺术风格① 的家具——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柜和两把椅子——落到莱尼家中，法院的执法人员至今不曾发觉这些古董的价值，以为是不值得扣押的“破

① 一种根据1896年起在慕尼黑出版的《青春》杂志命名的艺术风格，产生于1900年前后。

烂”。充当抵押品被执法人员从家里抄走的有十八幅当代本地画家作于1918年至1935年的油画，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宗教题材，由于是真迹，其价值被执行员估计过高，莱尼对失去这些油画毫不心疼。

莱尼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是一幅幅精细的人体器官彩色图片，这些都是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为她搞来的。他在卫生局当办公室职员，分管教材和资料，“虽然我并不完全问心无愧”(海·普法伊弗语)，他仍把那些被淘汰的旧挂图带给莱尼；为了符合财会手续，普法伊弗付出少量费用买下这些被淘汰的挂图；由于他还“经管”购置新挂图，因此莱尼有时也能通过他直接向生产厂家购买张把新挂图，当然是她自己掏（不宽裕的）腰包。对旧挂图，她自己动手进行修补：用肥皂液或汽油细心擦去污垢，用黑色石墨笔描粗线条，再用她儿子小时候用剩的一盒廉价水彩颜料给画面上色。

她最心爱的是一只人眼的精确放大挂图，悬挂在她的钢琴上方(为了赎回这架已被抵押多次的钢琴，不让它被执法人员搬走，莱尼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向她父母生前的老相识乞哀告怜，向她的三房客预收房租，向她的小叔海因里希借钱，更多的则是去找老霍伊泽，尽管他表面上像一家人似的亲热态度使莱尼感到不是滋味。根据三个最可靠的证人玛格蕾特、马尔娅和洛蒂的说法，她甚至声称：为了这架钢琴，她愿意“去卖笑”——这对莱尼来说是极为大胆的表态)。莱尼房间的墙上也装饰着诸如人体内脏这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器官的挂图，甚至还有精确阐明其全部功能的人体生殖器官放大平面图，这些图片早在色情神学推广它们之前很久就已挂在莱尼的家里了。当年莱尼和马尔娅曾为这些挂图进行过激烈争论，马尔娅认为

它们有伤风化，但莱尼始终态度强硬，坚持己见。

考虑到迟早总要谈到莱尼同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里一开始应先说明：莱尼对形而上学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她同圣母玛利亚关系亲密，几乎天天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每次都感到意外，原来圣母玛利亚也是一个金发女人，已远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年龄了；这种会见都是默默进行的，一般都是在深夜，左邻右舍均已进入梦乡，其他电视节目（包括荷兰的）已发出了结束播放的信号。莱尼和圣母玛利亚只是彼此含笑对视，仅此而已。如果有那么一天，电视节目结束后在荧屏上把圣母玛利亚的儿子介绍给她，她也决不会感到奇怪甚或吃惊。她是否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当他获悉种种情况之后，如果莱尼果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莱尼熟悉两种祷告：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她有时喃喃背诵，此外还做一些断断续续的念珠祷告。她没有祈祷书，不上教堂，相信宇宙间有“生灵”（莱尼语）。

在多多少少不够完备地介绍莱尼的学历之前，先来看一看她的书橱。书橱内的书积满灰尘，其中大部分是她父亲一次购进的。这些藏书如同那些油画一样，但至少未被抄走。此外，还有一批连续几年完整无缺的（天主教）教会主办的插图月刊，莱尼有时翻翻这些杂志；这些杂志——珍贵的古籍——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完全是由于执行员无知，被它不起眼的外表蒙蔽了。可惜1916年至1940年的全套《高原》杂志①，以及莱尼母亲收

① 《高原》杂志，1903年创办的天主教文学艺术及学术性月刊。

藏的叶芝诗集未能逃过执行员的注意。细心一些的观察者，如长年给藏书拂尘掸灰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或是战时长期作为莱尼第二号知心好友的洛蒂·霍伊泽，却在这个青春艺术风格的书橱里发现了七八本惊人的作品：布莱希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集，卡夫卡和克莱斯特的两本散文集，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七八部作品都被人以最尊敬、最讨作者喜欢的方式翻得破旧不堪了，以至于一再用种种粘合剂和透明胶带不大在行地拼凑在一起，有的干脆用橡皮筋套在一起。有人提出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新版本送给她(圣诞节、生日、命名日等)，莱尼总是断然拒绝，几乎使人下不了台。笔者在这里超越自己的权限插一句：他深信不疑，如果贝克特①的小说集在莱尼的文学顾问对她还有影响时就已出版，或者为这位顾问所了解的话，莱尼同样也会把它放进书橱的。

莱尼的癖好不仅是每天抽八支烟、旺盛而有节制的食欲、弹奏舒伯特的两支钢琴乐曲、观赏人体器官(包括内脏)挂图，也不仅是一往情深地思念目前身陷囹圄的儿子莱夫。她还喜欢跳舞，一直是个舞迷(这曾经成为她的灾难，因为她从此摆脱不掉普法伊弗这个她所不中意的姓了)。如今，一个要被周围的人们用毒气置于死地的四十八岁的单身女人，又能到哪里去跳舞呢？去年轻舞迷爱去的小酒馆吗？她在那儿肯定会被人家错当成风流老太太，可能会被糟踏。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教区的舞会，因为她从十四岁起就再也不上教堂了。假如除了大概至死

① 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作品多写人生在凄凉荒诞的世界里是多么短暂和无意义。

都和跳舞无缘的玛格蕾特以外，她还能找到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她很有可能冒失地去参加某种脱衣舞会或交换伴侣舞会(尽管她自己没有伴侣)，并且会在她一生中第四次脸红；莱尼一生中迄今已红过三次脸。那么，莱尼怎么办呢？她就一个人跳，有时穿得很少，在卧室兼起居室里跳，有时甚至脱光衣服，在浴室里对着那面讨人喜欢的镜子跳。她跳舞的时候偶尔被别人看见，甚或有不速之客来访，这对她的名声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处。有一次，她同她的房客、过早秃顶的法院推事埃里希·克普勒跳起舞来；因为这位老兄过于鲁莽，动手动脚起来，莱尼险些脸红。反正她不得不请他搬家，因为他——并非不明智，更不是缺乏本能——发现莱尼极富有性感，自从那次“即兴跳舞”(莱尼语)以来，每天晚上都在她的房门口苦苦哀求。(那次他前来交房租，正遇上莱尼在听舞曲，便和她跳起舞来。)莱尼不答应他，因为她不喜欢他，从此以后，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的克普勒就心怀叵测，到处传播风言风语，常常跑到那家即将被淘汰的小铺子去找老板娘窃窃私语，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与莱尼胡搞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把那个老板娘———一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女人，丈夫白天不在家(他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挑逗得心荡神驰。她把这位后来当上司法顾问的秃顶推事拉进里屋尽情耍弄了一番。这个女人名叫克特·佩施特，二十八岁。她也是最起劲地议论莱尼、败坏她名声的人，虽然她自己通过她丈夫的介绍，趁博览会期间大批男宾拥进该市时在一家夜总会跳“博览会脱衣舞”挣大钱，并在演出前让一个嗲声嗲气的报幕员宣布：她愿意充分满足她的表演所引起的冲动。

近来莱尼偶尔有机会跳舞。根据某些经验，她现在把房子

只租给已婚夫妇和外籍工人，例如她以优惠价格把两间屋子租给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为简便起见，我们就叫他们汉斯和格蕾特——这是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正是这个汉斯和这个格蕾特，在与莱尼一起聆听舞曲时正确地解释了莱尼外表和内心的有节奏的抽搐，这样莱尼有时就和他们跳一次“规矩的舞”。汉斯和格蕾特甚至有时谨慎地试图给莱尼分析她的情况，劝她把衣着现代化，改变一下发式，还劝她找个情人。“莱尼，你只要稍许打起精神，穿上一件时髦的粉色连衣裙，给你漂亮的腿套上一双时髦的丝袜，你马上就会发现你还是多么富有吸引力。”莱尼听了只是摇摇头，她遭受的伤害太重了，她再也不去那家食品店了，请格蕾特帮她买东西，汉斯则替她每天清早跑面包铺，赶在上班前（他是道路工程局技术员；格蕾特是美容师，愿为莱尼免费服务，但至今莱尼没有答应）给她买来必不可少的两个新鲜小面包。对于莱尼来说，这两个面包比别人的什么圣餐都重要。

莱尼的壁挂当然不全是生物挂图。她在墙上也挂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死者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1943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母亲生前照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病容的妇人，头发斑白稀疏，一双大眼睛，身上裹着一条毛毯，坐在莱茵河畔赫泽尔一个码头附近的长凳上，码头上标着那个地名，背景是修道院的围墙。看得出来，莱尼的母亲冷得发抖，目光呆滞得异乎寻常，在不很精神的脸上，嘴唇却又意外地显得坚实；从她的神情来看，她是不想再活了。要猜她有多大年龄，那可真为难，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一个身患隐疾、未老先衰的三十岁上下的少妇呢，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纤弱的六旬老妪？莱尼的母亲在这张

照片上面带笑容，虽不勉强，却有点费劲。

另一张照片是莱尼的父亲，是在他于1949年死去（终年四十九岁）前不久，用一架简易照相机拍摄的。他也面带笑容，丝毫不显得费劲，身上穿着一件细心地补过多次的瓦工服，站在一幢已倒塌的房屋前面，左手拿着一根行家称为“卡爪”的撬杠，右手握着一把行家称为“手锤”的锄头，在他的前后左右，满地都是各种尺寸的钢梁，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些钢梁发出微笑的，犹如一个钓鱼的人冲着自己一天的收获发出微笑一样。这些钢梁确实——下面将详细交代——是他一天的收获，当时他替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位前花圃老板收购废钢，此人早就料到“废钢行情看涨”（洛蒂·霍伊泽语）。从照片上看，莱尼的父亲没有戴帽子，一头浓密的头发只有些微花白。这个又高又瘦的男子，手握工具显得十分自然，很难给他加上某个贴切的阶级属性。他像无产阶级呢？还是像一位绅士呢？像一个正在干自己所不熟悉的活儿的人呢，还是他熟悉这种显然艰苦的活儿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不错，各有各的道理。洛蒂·霍伊泽把这张照片上的他说成是“无产者绅士”，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的看法。莱尼的父亲丝毫没有流露出厌世的情绪。与实际年龄相比，他长得既不老也不年轻，地地道道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近半百的男子”，可以在征婚启事中保证“使一位年纪最好不超过四十岁的快乐的生活伴侣得到幸福”。

另外四张照片是四个男青年，都在二十岁上下，三人已死，一人（莱尼之子）还活着。这四个年轻人中有两人在照片上有些与他们的衣着有关的缺陷：虽然拍的是头像，但两人的胸部拍得多了一些，以致人们能清楚地看出他们穿的是德国国防军制服，制服上带有行家们称为“兀鹫”的那种象征组合——国徽

之鹰和卐字。这两人中，一个是莱尼的哥哥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一个是她的表哥艾哈德·施威格特，他们——像第三个死者一样——都得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海因里希和艾哈德两人都“有点德意志风度”（笔者），他们俩都“有些”（笔者语）像所有能搞到的有文化的德国青年的照片。这里引用洛蒂·霍伊泽的话也许更清楚一些，她把他们两个说成是“班贝格骑士”。后来证明，这决不只是恭维话。实事求是地说，艾哈德是黄头发，海因里希是褐色头发，两人都面带笑容。艾哈德的笑“发自内心，完全是自发的”（笔者），也很可爱，讨人喜欢。海因里希的笑就不完全发自内心，他的嘴角上已流露出一丝虚无主义的神情，这种虚无主义通常被误解为玩世不恭，这在拍摄这两张照片的1939年未免为时过早，甚至可以说是进步的。

第三张遗照是一个苏联人，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他面无笑容。这张照片是1941年在莫斯科时拍的一张护照相片的放大，几乎像一幅版画。照片上的波利斯神情严肃、脸色苍白，高高的头型轮廓十分显眼，乍一看会叫人产生过早秃顶的错觉，其实那只是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因为他长着一头浓密鬈曲的金发。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戴着一副红军镍镜，这就有可能被误解为版画式的雕琢。虽然他表情严肃、面容消瘦，前额高得出奇，但人们立即就看得出来，此人在拍这张照片时还是很年轻的。他身穿便服，领口敞开，衣领能翻到外衣上的大翻领衬衫，没有穿西服上衣，想必是在天气热时拍的照片。

第六张照片上的人还在世，他是莱尼的儿子。虽然他在拍照时与艾哈德、海因里希和波利斯拍照时的年龄相同，但看上

去比他们全都年轻，也许这是因为他拍照时照相器材质量优于1939年和1941年的缘故。无可否认：年轻的莱夫不仅仅是微笑，他在这张摄于1965年的照片上笑得可欢啦，谁也不会反对称他为“快乐的小伙子”。他长得像莱尼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波利斯，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有“格鲁伊滕家的头发”，又有“巴尔克尔家的眼睛”（莱尼母亲的娘家姓巴尔克尔——笔者），因而就更像艾哈德。他的笑容，他的那双眼睛，使人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肯定不具备他母亲的两种特性：他既不少言寡语，也不守口如瓶。

这里还得提到莱尼心爱的一件衣服。她不能离开这件衣服，犹如她不能离开那些照片、人体器官挂图、钢琴和新鲜的小面包一样：她的浴衣。她硬要错误地把它叫作晨服。衣服料子是“具有和平时期质量的毛巾布”（洛蒂·霍伊泽语），从背部和口袋边可以看出，原先的颜色是紫红的，如今——三十年后！——已经褪色，变成了淡淡的覆盆子酱色，不少地方用橙色棉布补过，说句实在话，补得还很在行哩。莱尼难得有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很少脱下它。据说她还说过，她想“到时候穿着它入土”呢（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语，这一对夫妻是了解莱尼起居情况的知情人）。

关于莱尼目前使用房子的情况，也许还应当提一笔：两个房间转租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另外两间租给了葡萄牙的平托夫妇，丈夫叫儒瓦金，妻子叫安娜—玛丽雅，他们有三个孩子：埃特尔维纳、马努埃拉和若泽；还有一间租给了三个土耳其工人，他们叫卡亚·顿奇、阿里·基利奇和梅赫梅特·沙欣，三人都不年轻了。

第二章

莱尼当然并非总是四十八岁，有必要回首往事。

看莱尼年轻时的照片，完全可以说她是一个俊俏活泼的少女；甚至在穿上纳粹少女组织制服即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莱尼的模样也是讨人喜欢的。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她会对她的优美身段作出低于以下的评价："嘿，长得真不赖！"人的交配要求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进而产生与一位异性或同性交欢的自发愿望而并不打算永久结合；这种要求会发展成火烧火燎的、不可抑制的炽热情感，使心灵和肉体不得安宁，种种表现形式既无规律又不合法，每一种表现形式——从最表面的一直到最深沉的——都有可能由莱尼引起，而且也确实已被她引起。她十七岁那一年完成了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黑眼睛的金发女郎比浅色眼睛的金发女郎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这一时期，没有一个男人对她的评价会低于"赏心悦目"。

关于莱尼的学历，还得再谈几句。她十六岁进入父亲的办事处。父亲大概注意到女儿正处于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中，尤其是鉴于她对男人们的作用（那年是1938年），便带她参加重要的业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莱尼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在自己的

膝上记录大意。她不会速记，也永远学不会。她虽然并不完全厌恶抽象事物和抽象化，但不愿学她称为“碎字”的速记。她上学也是活受罪，但更受罪的是老师而不是她。经过两次并非留级的“自愿重读”，她念完了小学四年级，拿到一张成绩还凑合、经过很多改动的文凭。这所小学的教师中今天仍在世的见证人之一、已退休的六十五岁校长施洛克斯——笔者是在他乡下度晚年的住处找到他的——透露，学校本来有一段时间想让莱尼转到辅助小学①去，但有两个因素使她没有被转走：一是她父亲有钱，不过施洛克斯强调，这一点从未直接起作用，只是间接起作用；二是莱尼十一岁和十二岁时连续两年获得“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这是由一个在各校巡视的人种学委员会授予她的。莱尼甚至一度被提名为“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候选人，但她名列第二，第一名被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夺得，此人的眼睛颜色比莱尼浅，那时莱尼的眼睛已经不再完全是浅蓝色了。难道能把“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送到辅助小学去吗？十二岁那年，莱尼升入一所由修女主办的女子中学，到了十四岁，就不得不因跟不上而退学；两年内，她简直不堪造就，留级一次，升级一次，那也是因为她父母郑重保证决不再请求让她升级②。这个诺言得到了遵守。

为了避免产生误会，这里得介绍一些具体情况，说明莱尼所遇到的或被迫接受的糟糕的学习环境。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无论是在小学或莱尼上的女子中学，都没有发生过令人生气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存在一些误解。莱尼是完全可以

① 辅助小学是专为智力差的儿童开设的特种学校。

② 学生成绩达不到升级标准时，家长有权要求让孩子再跟班试读一年。

造就的，甚至她如饥似渴地求知，而且所有当事人都尽力使她止饥解渴，只不过向她提供的饮食都不适合她的智力，不适合她的天赋，不适合她的理解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可以说无一例外，提供的材料都缺少那种感性内容，而没有这些，莱尼对什么都不会理解。例如对书法，她从来就不感到丝毫困难，虽然人们以为她对于这种高度抽象的事情会感到困难。对莱尼来说，书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是闻得到气味的（只要想一想种种墨水、铅笔、纸张的气味），因此她甚至掌握了复杂的书法练习和细微的语法差异；她的字——可惜她写得不多——过去和现在都遒劲有力，让人喜欢，而且——正如退休校长施洛克斯（有关莱尼教育的一切重要细节的提供者）令人信服地断言的那样——简直能“引起情爱或性冲动”。

莱尼特别不走运的是两门有密切关系的课程：宗教和算术或数学。如果教师中有一位想到让六岁的小莱尼明白，她所喜爱的星空能使人爱上数学和物理，她就不会像别人讨厌蜘蛛那样讨厌九九表了。对于把核桃、苹果、母牛、豌豆等画在纸上，用简单的方法进行直观数学教学，莱尼感到格格不入；她没有算术家的才能，但她学理科① 却有天赋，如果除了教科书和挂图上一再出现的红色、白色和粉红色的孟德尔② 豌豆花之外，她还能学到复杂一些的遗传作用的话，她一定会——像人们说得那么好听一样——以火一般的热情“钻进”这种材料。由于生物课枯燥无味，她失去许多乐趣，只是人到中年之后，当她用一盒廉价的水彩颜料勾描复杂的人体器官时才感到这种乐趣。范·多尔恩令人可信地断言，在莱尼的学龄前生活中有一

① 在德国学校，数学不包括在理科之内。

② 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奠基人。

件琐事使她永远难忘，至今仍使她感到不太“舒服”，就像莱尼墙上的生殖器挂图一样。莱尼小时候就对自己的排泄过程很感兴趣，而且还——可惜没有收获！——打破沙锅问到底：“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妈妈和范·多尔恩都没有给她解答！

只有迄今和莱尼同过房的两个男人中的后一个才发现莱尼才智过人、异常敏感。此人偏偏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苏联人。莱尼还告诉过他，自己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存在之实现”的经过，后来她又把此事——1943年底至1945年中期她还远不如今天这样沉默寡言——讲给玛格蕾特听过：十六岁那年，她刚从寄宿学校退学不久，六月的一天黄昏，她骑自行车外出，仰卧在一片石楠丛中，“伸开四肢，情不自禁”（莱尼对玛格蕾特语），两眼注视着仍然掩映着夕阳余晖的刚刚开始闪烁的星空，达到了今天人们过多地追求的那种快乐的顶点；莱尼——据她对玛格蕾特说，她对波利斯是这样讲的——在1938年的这个夏日黄昏，伸开四肢，躺在温暖的石楠丛中，“敞开怀抱”，完全沉醉在“受”与“施”的感觉之中。后来她这样对玛格蕾特讲：如果她怀上孕的话，她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的。因此，对莱尼来说，童贞女怀胎生子也决非不可思议之事。

莱尼离开女子中学时拿到一张令人难堪的成绩单，宗教和数学两门课不及格。后来她到一所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半，所学课程有家政、德语、宗教、一点历史（至宗教改革）以及音乐（钢琴）。

有一个已故的修女就像下文还要详细介绍的那个苏联人一

样，对莱尼所受的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为她树碑立传之前，这里先得提到三名还健在的修女证人。虽然她们与莱尼相遇是在三十四年和三十二年之前，但她们对莱尼仍记忆犹新；当笔者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分别进行采访时，一提到莱尼，她们就全都脱口而出："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一不约而同的感叹，笔者认为意味深长，因为这证明莱尼给她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不仅是"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句感叹句，还有一些身体特征也是这三个修女共有的，因此，为节省篇幅起见，一些细节可以同时说明。三人都是所谓羊皮纸皮肤，柔嫩地绷紧在瘦小的颧骨上，淡黄色，有一些浅细的皱纹；三人都向笔者敬上（或叫人敬上）一杯香茗，笔者不得不说，三家的茶都不很浓，这样说并非不知好歹，而是实事求是；三位都端上（或叫人端上）不带奶油的蛋糕；笔者开始吸烟时，三位都咳了起来（笔者不客气地拿出烟就抽，未征求主人许可，因为他不想冒遭到拒绝的风险）；三位都是在大同小异的客厅里接待他，客厅里装饰着宗教印刷品、一尊耶稣受难像、一幅现任教皇肖像和一幅地区红衣主教肖像；三间客厅中的三张桌子都铺有丝绒台布，所有的椅子都不舒适；三位修女年纪都在七十岁到七十二岁之间。

第一位是科伦巴努斯修女，是莱尼上过两年学但成绩不佳的那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是一个超凡绝俗的人，有一对失神而十分清秀的眼睛，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从头至尾都在自怨自艾地摇头，因为她没有发掘出莱尼身上的潜能。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她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可我们没有发掘。"科伦巴努斯修女——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如今仍（借助放大

镜！）阅读专业书刊——是早期妇女教育解放运动的典型人物，可惜由于身穿修女服而不为人们所知，更未受到人们赏识。当笔者彬彬有礼地询问她的生平的详细情况时，她说，她早在1918年就身穿粗麻布袍子出门了，当时所受到的嘲笑、蔑视、奚落，甚于今天的许多嬉皮士。在听笔者讲述莱尼生平情况时，她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变得明亮了一些，叹息而略带兴奋地说："太过分了，真太过分了——她命该如此！"这句评语使笔者莫名其妙。临别时他羞答答地瞅了一眼桌上那个葡萄叶形状的陶瓷烟灰缸。这个烟灰缸平时也许很少用得上，可能只是偶尔有一支高级教士抽过的雪茄烟熄灭在里面，可是这一次竟有四个烟蒂很不像话地躺在烟灰里。

第二位修女普鲁登齐娅当过莱尼的德语教师，她稍稍不如科伦巴努斯那样高雅，脸颊稍许红润一些，但也说不上红光满面，只是早年的红润还依稀可见，而科伦巴努斯修女脸上的皮肤一清二楚地表明她年轻时就老是这么苍白。普鲁登齐娅修女（她听到莱尼的名字时发出的感叹见上文！）提供了一些意外的细节。她说："为了不让她退学，我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但无济于事，尽管我给她的德语课分数是个二分①，而且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她写了一篇很出色的作文，是评论《O侯爵夫人》②的，您知道，这是一本禁书，甚至很不受欢迎，因为书的内容叫人难以启齿，可以说——不过我始终认为，十四岁的姑娘家尽可放心地去读这本书并开动脑筋想一想——格鲁伊滕家姑娘写的东西很了不起，她热烈地为F伯爵③辩护，能体谅——不妨这

① 德国学校实行六分制。一分为"优"，二分为"良"，三分为"中"，四分为"及格"，五分为"不及格"，六分为"差"。
② 《O侯爵夫人》是德国作家克莱斯特(1777～1811)的著名中篇小说。
③ 《O侯爵夫人》中的男主人公。

么说吧——男人的性爱，这使我吃惊。真了不起，差点得了个一分。但也有不及格的，即宗教课，其实本该是六分，因为老师不忍心给这个姑娘的宗教课一个六分，所以就改为五分。此外，数学也不及格，毫无疑问，科伦巴努斯挥泪给她这个分数是完全有理由的，她不得不照章办事——于是格鲁伊滕家的姑娘就走了……退学了，不得不退学了。”

莱尼从十四岁到将近十七岁在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她的学业。这所学校的修女和教师中只有一人还能找到，即这里介绍的三名修女中的最后一位采齐莉娅。就是她曾有两年半之久担任莱尼的私人钢琴教师；她一开始就发觉莱尼具有音乐才能，但又感到吃惊乃至绝望，因为莱尼不会读谱，更不用说通过读谱辨音了。头六个月，她放唱片给莱尼听，让她跟着唱片弹琴，这种方法——据采齐莉娅修女说——值得商榷，但还是成功的，甚至——用采齐莉娅的话来说——证明“莱尼不仅能辨认曲调和节奏，甚至能辨认各种结构”。可是怎样——采齐莉娅修女发出数不尽的叹息！——才能教会莱尼必不可少的识谱呢？她想出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办法，即转弯抹角，借助地理课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地理课颇为枯燥乏味——主要是背诵、指明和反复背诵莱茵河的所有支流，同时背诵以这些河流分界的中等高度的山脉或地区——可是莱尼却学会了看地图：地图上洪斯吕克山和艾费尔高原之间那根蜿蜒的黑线即摩泽尔河，莱尼并不认为只是一根弯弯曲曲的黑线，而是一条确实存在的河流的标志，于是，试验成功了，莱尼学会了识谱，虽然很费劲、很勉强，常常伤心落泪，但她还是学会了。采齐莉娅修女从莱尼父亲那里得到一笔优厚的专门酬金，上缴给修道会，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让莱尼“也学到一点东西”。她做到

了这一点，而且，“我佩服她的就是她立即认识到舒伯特是她的极限——超越这一极限的种种尝试全都遭到惨败，以致连我也劝她到此为止，尽管她父亲定要她学会弹奏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

关于采齐莉娅修女的皮肤，还要说明一点：有些地方她的皮肤还保持白净细嫩，并不十分枯槁；笔者坦率承认，自己内心有一种或许是轻佻的愿望，想多看几眼这位极其和蔼的独身老妪的皮肤，即使这种愿望会使他蒙受研究老年学的嫌疑。遗憾的是，当笔者向她打听一位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修女同事时，采齐莉娅修女顿时变得十分冷淡，险些叫人下不了台。

这里只能约略提一下可能在以后的叙述中得到证明的事实：莱尼是个被埋没的感性天才。遗憾的是，她长期属于被人们随便乱叫的那种蠢婆娘。老霍伊泽甚至承认，他至今仍把莱尼算做这一类人。

人们也许会认为，一生讲究美食的莱尼当年学习烹饪课时成绩优良，家政课一定是她最喜爱的课程。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烹饪课是在炉灶和厨桌旁上课，用的是闻得到、摸得到、尝得到、看得见的材料，但莱尼觉得（如果笔者对采齐莉娅修女的一些议论理解正确的话）这门课程比数学更抽象，像宗教课那样不可感知。很难断言，莱尼是否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厨师，更不能肯定，修女们对香料的简直玄而又玄的畏惧是否使莱尼觉得烹饪课上做出的饭菜太“平淡无味”。可惜，无可否认，如今她不是一名优秀厨师。只是做汤菜她有时还行，还有饭后点心也可以。此外她还是——决非理所当然——煮咖啡的能手。从前她还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婴儿厨师（有马尔娅·范·多尔恩

为证)，然而她永远也开不出一份正规的菜单。犹如一种调味汁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某人添加某种调料时既无规律又无规定可言的手的快速动作一样，莱尼的宗教教育也彻底失败了(或者宁可说幸亏没有成功)。谈到面包或葡萄酒、拥抱或按手，只要涉及到人间的具体事物，她是毫无困难的。直到今天，她丝毫也不感到困难，相信涂口水就能治好病。可是，谁又会给别人涂口水呢？她不仅用口水治好了那个苏联人和她的儿子，光是按一下手就使那个苏联人无比幸福，使她的儿子定下心来(洛蒂和玛格蕾特语)。可是，谁又会去按别人的手呢？她初领圣餐(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教会活动)时领到的是什么面包呢？而且，天呀，葡萄酒又在哪里呢？为什么不把酒给她呢？堕落的女人，等等，圣母之子结交的那许许多多的女人，这一切都使莱尼十分满意，而且能像观察星空那样使她心醉神迷。

可想而知，一生中如此喜爱每天早晨的新鲜小面包，甚至为此甘心受到邻居嘲笑的莱尼，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盼望着这次初领圣餐礼。要知道，莱尼在上女子中学时被剥夺了参加初领圣餐仪式的权利，因为她在上准备课时多次迫不及待，确实曾向宗教课教师——此人当时就已有一把年纪，白发苍苍，是个严格的禁欲主义者，可惜已于二十年前去世——发起冲击，并在下课后像小孩子一样火烧火燎地连声追问："请——请把这块生命之饼给我！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这位以名字埃里希·布林斯和几部著作传诸后世的宗教课教师觉得，莱尼的自发的感性流露是"罪恶的"。对他来说，这种意志的表现属于"肉欲"之列，令他感到震惊。他当然断然地拒绝了莱尼的无理要求，以"表明不成熟和不能领悟圣餐"为由，将莱尼初领圣餐的时间推迟两年。这件事有两名证人：一名是老霍伊

泽，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并能讲出来。他说，“当时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次丑闻”，只是由于莱尼并不了解的修女内部的棘手的政治情况(1934年)，人们才决心“不把此事张扬出去”。另一名证人是那位老先生本人，他的业余爱好是钻研“圣饼碎块学”。这门学问就是用数月时间，必要时用数年时间，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研究与圣饼碎块有关的也许或者可能或者曾经可能、必然、应当发生的事情。这位作为圣饼碎块专家迄今仍有点名气的先生，后来在一家神学文学杂志上分期发表了《我的一生概略》一文，文中披露了莱尼的这件事。他不害臊地毫无想象力地把莱尼简称为“有个名叫L.G①的姑娘，当时十二岁”。他描写了莱尼的“热切的眼睛”和“肉感的嘴唇”，并以轻蔑的口吻谈到她说话有口音，说她家是“典型的暴发户，俗不可耐”。最后他写道：“这种用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词句表达出来的要求得到最崇高的圣物的欲望，我当然不得不拒绝满足。”莱尼的父母虽然并非非常笃信宗教，也不特别恪守教规，但受地方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把“莱尼还没有随大流”视为憾事，甚至是丢人的事，因此，等到莱尼十四岁半就读寄宿学校时，他们就让她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随大流”；由于那时的莱尼已经——据马尔娅·范·多尔恩提供的可信情况——像成年妇女那样，因此教会的仪式完全失败了。百年一次的大典也是如此。莱尼曾如此热切地渴望那块面包，她的全部感觉器官已准备好沉浸到狂喜之中——“而如今”(她这样向当时感到吃惊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描述)，“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白不呲咧、软绵绵、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我差点把

① L.G是莱尼·格鲁伊滕的简称。

它吐出来！”马尔娅连连在胸前画十字，并且深感意外，那些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可以感知的东西——蜡烛、香、管风琴乐曲和合唱乐曲——竟未能使莱尼消除这种失望心情。就连有芦笋、火腿、加了掼奶油的香草冰淇淋的例行宴会，也不能使莱尼消除这种失望心情。其实，莱尼本人就是一位“圣饼碎块学家”，她通过把盘子里的所有面包屑都拣起来塞进口中（汉斯和格蕾特语），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

本文理应尽量避免涉及伤风败俗之事，但为了完整起见，这里不得不提到寄宿学校的性知识课。在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中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一岁——毕业离校之前，由宗教课教师向她们讲授性知识。这位教师名叫霍恩，年纪不大，也是个禁欲主义者。仅因迫于女校长的压力，他才同意莱尼参加初领圣体仪式。他说话嗲声嗲气，避而不谈生物学方面的具体细节，哪怕是暗示一下也没有，只是利用饮食方面的象征，把性交——他称之为“必要的繁殖过程”——的结果比作“草莓掼奶油”，喜欢使用临时想出的一些比喻来描写合法的和非法的接吻，而女学生对“蜗牛”这个比喻则莫名其妙。必须指出，在他嗲声嗲气地使用难以形容的纯属饮食方面的象征讲授有关接吻和性交的难以形容的细节时，莱尼有生以来第一次脸红了（玛格蕾特语），由于她本人从不知后悔——这一事实使她心安理得地把忏悔当作纯粹的例行公事，信口胡说一气而已——这种讲解一定是触动了她身上迄今尚未被发现的某些感觉中枢。要想对莱尼直截了当的、无产阶级的、近乎天才的感应作出比较可信的介绍，就必须补充一点：她并不是不知羞耻的人，因此必须把她的第一次脸红当作引起轰动的事情记录在

案。不管怎样，莱尼对无法控制自己剧烈脸红这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十分苦恼，非常痛心。用不着在这里强调，莱尼内心潜藏着对情爱和性爱的美好憧憬，一位宗教课教师以这种方式向她讲解，并且像作为圣事的圣餐那样向她赞美这种事情，更加剧了她对自己迄今不曾有过的脸红的恼怒和惶惑。她气得讲话结巴起来，满脸通红，离开了课堂。这使她在毕业成绩册上又添了一个五分，这一次是宗教课。

此外，宗教课一再向她灌输但始终没能激发她的热情的，还有西方世界的三座名山：各各地①、雅典卫城、古罗马朱庇特神殿。不过她并非不喜欢各各地，她从圣经课上得知这座山只是一个小丘，并且根本就不在西方世界。尽管如此，莱尼仍然记得《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甚至还使用这些祈祷文。她还掌握了几段念珠祷告，觉得与圣母玛利亚交往是天经地义的。考虑到这些情况，这里也许可以说：莱尼的宗教才能如同她的感应才能一样没有被人们认识，从她这个人，从她身上，也许能发掘和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哩。

如今，终于得开始为一位女性树碑立传起草轮廓了。可惜此人已不能作为证人接受来访或传唤传讯了；她已于1942年底死去，死因至今不明。她并非死于直接暴力，而是死于直接暴力的威胁和周围世界对她的忽视。曾经受过这位女性疼爱的，大概只有那个B.H.T 和莱尼两人了。尽管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还是没有找到她的俗名、籍贯和家庭出身；只知道——这一点有足够的证人：莱尼、玛格蕾特、马尔娅以及那位只同意

① 各各地，又译髑髅地，《新约圣经》称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地方，传说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不远的一座小山上。

以姓名起首字母B.H.T相称的前古籍商学徒——她出家后的名字是拉黑尔修女，还有一个外号：肠卜僧①。

她开始接触莱尼和那位B.H.T时(1937年至1938年)，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她身材瘦小，但很结实(她对莱尼没有说过，只是对B.H.T谈起过，她曾经是女子八十米障碍赛跑的全德青年冠军!)。很有可能——1937年至1938年，她完全有理由不详谈自己的出身和学历——她是当时所谓"受过高等教育者"，这完全不排除她可能得过博士学位，甚至可能(当然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取得过在大学授课的资格。她的身高可惜只能根据证人们的记忆估计，有一米六〇左右；体重大约五十公斤；头发颜色花白；眼睛是浅蓝色；可能是凯尔特人，也可能是犹太人。B.H.T其人现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市立图书馆当馆员(未取得过学位)，研究古籍目录，对购书方针有一定的影响。他未老先衰，和蔼可亲，尽管不很主动热情。他一定爱上过这位修女，虽然他比她至少要小二十岁。1944年以前，他成功地逃避了服兵役，因而成为莱尼和拉黑尔修女之间的一种missing link②(战争第五年他就应征入伍，当时已年近二十六岁，据他自己说，身体很棒)，这表明他具有锲而不舍、有条不紊的才智。

向他谈起拉黑尔修女时，他就变得活泼起来，近乎兴高采烈。他不抽烟，是个单身汉，根据那套带浴室的两间半居室中的气味推断，他还是一个烹调好手。对于他来说，只有古籍才算书，新出版的书他不放在眼里："新书不算书"(B.H.T语)。他过早秃顶，营养可能不坏，但失之片面，身体有发胖的趋势；

① 肠卜僧，古罗马根据祭神牺牲的内脏占卜的僧人。

② 英语：一系列完整的事物中缺少的一个环节。

毛孔很大的鼻子以及笔者多次采访时看到的耳朵后边正在形成的小肉瘤，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生性不大爱说话，但一谈到拉黑尔一肠卜僧时就变得健谈起来，对于莱尼——他只听那位修女讲起过，说她是“百里挑一的金发美女，还会经历许多美好的和痛苦的事”——他爱慕得如醉如痴，像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以致笔者几乎想在三十四年以后的今天使他们俩结合，如果笔者喜欢管这种事情而自己又没有爱上莱尼的话。不管这位B.H.T 的脾气(隐蔽的和明显的)多么古怪，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他忠诚老实。对自己可能也是如此。

关于此人，有很多话好说，但无此必要，因为他与莱尼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能作为媒介反映某些情况而已。

如果以为莱尼在这所寄宿学校读书时的日子很难过，那就错了；不，她在那里过得挺美，犹如命运的宠儿：她遇上了合适的人。她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令人厌倦；她看重的是淑静和善的采齐莉娅修女对她的私人授课，并且卓有成效。对莱尼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至少同后来出现的那个苏联人不相上下的，就是拉黑尔修女了。她(在1936年！)被禁止授课，只干女孩子们称为“走廊修女”干的那种被看作非常下贱的活，社会地位大体上相当于一名普通的女清洁工。

她的职责是：按时叫醒女学生，督促她们进行晨洗，在她们突然发生女人所特有的那些事情时，向她们讲明是怎么一回事——教生物课的修女坚决拒绝承担这一任务。此外她还有一项任务，其他所有修女对此项任务都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肯干，而拉黑尔修女却热心和认真细心地从事这一工作：检查年轻人的粪便。未经拉黑尔检查，女孩子们不准将自己的排泄物冲掉。她给由她照管的十四岁姑娘们做这件事，沉着镇定，判

断准确，使姑娘们感到惊异。自不待言，对自已的消化过程的兴趣一直未得到满足的莱尼便成了拉黑尔的得意门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拉黑尔只要看一眼就能准确地说出有关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甚至能根据粪便预测学习成绩，因此每次课堂测验之前都要被学生们围住问个不停，她的外号肠卜僧就一年一年(从1933年起)传了下来。这个外号是她从前的一名想当记者的学生给她取的。她大概对检查结果都进行登记，记得十分详细(这一推测为后来与拉黑尔成为知己的莱尼所证实)。她接受肠卜僧这个外号，就像她应得的爱称一样。学校上课天数如按每年二百四十天计，再加上为十二名女学生做五年走廊工(相当于修道院的值勤军士)，那就不难算出，拉黑尔修女共记录消化道排泄约两万八千八百次并附有简要分析。这是一部惊人的教材大纲，作为粪便学文献很可能是无价之宝。估计它已被人们不屑一顾地销毁了！根据B.H.T 的直接介绍、莱尼的间接介绍(经过马尔娅筛选)和玛格蕾特的直接介绍，笔者分析拉黑尔的举止和谈吐，认为拉黑尔所受的教育来自三个学科领域：医学、生物学、哲学——全都带有来历完全不明的神学内容。

拉黑尔还插手不属于她管的事情：美容；头发、皮肤、眼睛、耳朵、发式、鞋袜、内衣。她劝黑发的玛格蕾特穿深绿色衣服，劝金发的莱尼穿淡火红色衣服。参加有天主教大学生宿舍成员在场的家庭舞会时，她劝莱尼穿朱红色的鞋子；她向莱尼推荐用杏仁皮作护肤剂，不一定要用冰凉的水洗脸，以能受得住为度。这一切使人可以对她的总倾向从反面简而言之：她不是那种不爱打扮的老古董。此外，她不但不反对搽口红，而且——当然，数量和爱好因人而异——还加以提倡。由此可见，

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完全可以肯定，她远远走在她周围的人前面。她极力主张保养头发，要求坚持用发刷使劲地梳头，特别是在晚上。

她在修道院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大多数修女把她看作是一名介乎厕所女工和清洁工之间的人物，即使她是前者，那也够卑贱的了。许多人尊敬她，有些人害怕她。她同女校长保持着一种"永远敬而远之"（B.H.T语）的关系。女校长是个严厉聪慧的金灰色头发的美女，她在莱尼离校一年后脱下法衣，自愿到一个纳粹妇女组织去服务。她甚至没有反对过拉黑尔在美容问题上违背修道院精神的主张。这位女校长外号"母老虎"，她教的主课是数学，副课是法语和地理，这就不难理解，她认为肠卜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种"粪便神秘教"，没有什么危险性，只是令人可笑而已。她认为，对一位淑女来说，对自己的粪便即使看一眼也有失身份（B.H.T语），认为那一套多少是"邪门歪道"，尽管（又是B.H.T的话）正是"邪门歪道"，才使她投入那个纳粹妇女组织的怀抱。说句公道话（完全按B.H.T的话），她在离开修道院之后也没有出卖拉黑尔。莱尼、玛格蕾特和B.H.T都说她是个"高傲的人"。根据所有能够搞到的介绍，她虽然很美丽，肯定是个"姿色动人的人"（玛格蕾特语），但她在退出修道院后也一直没有结婚，很可能是由于高傲，因为她不甘示弱，不愿暴露自己的任何弱点。战争结束时她年近半百，在伦贝格① 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某地失踪了，当时她正在该处以高级参议的头衔负责"文化政策"的领导工作。真遗憾。笔者多么想对她"就此案进行审讯"啊。

---

① 伦贝格，地名，1945年后归属苏联，现名利沃夫。

拉黑尔在寄宿学校并未正式担任教学工作或医务工作，但她两者兼而有之；她的任务只是在发生重大情况——严重腹泻并有传染危险——时作报告，也要报告消化方面的突出的不洁现象以及违犯常规的伤风败俗行为。这后一种工作她从来就没有做过。她很重视在姑娘们入学的第一天，就向她们谈一谈各种大便之后的净身方法。她首先强调保持肌肉尤其是小腹肌肉弹性和功能的重要性，建议为此目的从事田径运动和体操运动，然后立即谈到她最爱谈的题目：一个健康的——据她强调——聪明的人，即使不用纸头也能完成这件事。不过，由于这种理想境界根本无法达到，或者说实属罕见，因此她详细介绍用纸的种种注意事项。

她曾经——在这一方面，B.H.T 是独一无二的知情人——阅读过有关这种事情的大量材料，几乎都是些囚犯和监狱文学；她深入钻研过所有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回忆录。在作这个报告时，她对姑娘们大出洋相和吃吃痴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这里需要谈到一点，因为玛格蕾特和莱尼都证明确有此事：拉黑尔看到莱尼首次由她检查的大便时欣喜若狂。她对不习惯这种场面的莱尼说："姑娘，你是个命运的宠儿——像我一样。"

几天后，莱尼仅仅由于觉得这种"肌肉动作"好玩而达到"免纸"境界时(莱尼对马尔娅语，由玛格蕾特证实)，便产生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好感，这一点给莱尼事先吃了定心丸，使她对以后还会在学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并不耿耿于怀。

这里，如果产生拉黑尔修女仅仅是位粪便领域的天才这种印象，那就错了。经过漫长复杂的学习，她起初成了生物学家，

后来成为医生，再往后又成了哲学家，改信天主教，进了修道院，想用生物学、医学、哲学和神学的大杂烩去“教育青年”，可是她在授课的第一年就被罗马教廷吊销了教学许可证，因为人们怀疑她有纯生物学和神秘唯物主义的观点；罚她做走廊工，目的是使她厌倦修女团生活。人们已准备让她“光荣”还俗（拉黑尔亲口对B.H.T所说）。可她把这一贬谪当作高升，不但甘心接受，而且也是这样感觉和认为的。她认为做走廊工远比上课来得方便，能更好地运用她的学说。由于她与修女团的纠葛正好发生在1933年，因此她没有真正被开除，留下来当了五年“厕所女工”（拉黑尔向B.H.T谈拉黑尔）。

为了采购洗涤剂、手纸、杀菌剂以及床上用品，她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到附近的大学城去，在大学图书馆度过好几个钟点，后来又在那家拥有大批古籍的旧书店里度过好多天，在那儿同那位B.H.T结下了柏拉图式然而却是亲密的友情。他让她在老板的藏书中任意翻阅，甚至违犯店规向她提供一份仅供内部使用的简明索引，让她呆在店堂的角落里看书，还把自己的咖啡从暖瓶里倒给她喝，在她废寝忘食地埋头读书时经常塞给她一片黄油面包。她主要对药理学、神秘主义和生物学著作感兴趣，也对草药学感兴趣。她通过对古籍书店收藏的大量神秘主义著作所提供的粪便畸变现象潜心钻研，在两年时间内成了一个微妙的领域的专家。

笔者尽管竭力弄清拉黑尔修女的背景和出身，但获得的情况却未能比B.H.T、莱尼和玛格蕾特三人所提供的更多；对采齐莉娅修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均未弄到有关她这位昔日修女同事的任何材料；笔者穷追不舍，只不过引起她一阵脸红——老实说，一位皮肤白皙的七旬老妪脸红的样子还是挺好

看的。第四次拜访——由此可见，笔者多么固执——在修道院大门口就失败了：不再接待。至于他是否能从罗马教团档案和人事卷宗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取决于他是否有时间和旅费，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能否获准接触教团的秘密。现在应当回顾一下1937年至1938年的情况：一个身材矮小、勤奋好学的修女，迷上了神秘主义和生物学，有研究粪便学的嫌疑，被指控宣扬纯生物学和唯物神秘主义观点，坐在一家旧书店的阴暗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当时还毫无秃顶和发福迹象的小伙子在向她奉献咖啡和夹肉面包。这是一幅值得像弗美尔① 那样的一流荷兰大师创作的风俗画。为了正确反映国内外的政治气氛，这幅画需要猩红色的背景、血迹斑斑的云彩，因为法西斯冲锋队一直在什么地方行进，战争的危险在1938年比真正爆发战争的下一年更严重。不管人们对拉黑尔钻研消化问题的那种劲头感到多么不可思议，认为她研究内分泌(这种研究甚至发展到使她渴望知道那种叫做精液的物质的具体成分)多么希奇古怪，有一件事却得归功于她：根据她个人所做的(未经许可的)尿试验，她给那个年轻的古籍商出主意，使他得以逃避服兵役的义务。她一面喝着他的咖啡（有时甚至把咖啡溅在古籍珍品上——她对任何书籍的外观都不大在意），一面仔细地讲给他听：他该吃什么，喝什么，服用什么酊剂和片剂，就能在入伍体格检查化验小便时得到不仅是马马虎虎的而且是经久不变的“不合格”；她还依仗自己的知识和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为他的小便制订了一个“分阶段计划”（拉黑尔原话，由B.H.T证实），即使在军医院住上一天、两天、三天，对他的小便作种

① 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作品多描写小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有《看信的女人》、《倒牛奶的女人》等。

种化验，也能确保尿里始终含有足够的蛋白。这条信息，只能使所有觉得它并不带有政治性的人感到安慰。可惜 B.H.T 胆量太小，不敢把这个“分阶段计划”的全部细节转告有服兵役义务的年轻人。身为“公务员”，他怕与自己的上级机关发生麻烦。

如果准许拉黑尔到一所只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去，给男孩子们干同样的工作，察看他们的粪便，就像她对女孩子们习已为常的那样，哪怕只去干上一个星期，她大概就会欣喜若狂的（笔者假设）。由于有关男女消化差异的著作当时寥寥无几，她只能进行推测，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偏见：她认为差不多所有男人都是“大便干燥的人”。她的这种愿望如被罗马或其他什么地方获悉，她当然会被立即革出教门的。

每天早晨，她以观察马桶的同样热情观察受她管的女孩们的眼睛，规定她们洗眼，为此准备好几种洗眼杯和一罐矿泉水。她能立即发现任何炎症或沙眼的哪怕是最细小的症状；她向女孩们讲解，视网膜大致有卷烟纸那样厚薄，却由三层细胞组成，即感觉细胞、双极细胞、神经节细胞，单是第一层——约有卷烟纸三分之一那样厚薄——就有大约六百万个锥体和一亿个杆状体，而且它们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视网膜表层。每次这都会使她如醉如迷。她告诫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眼睛是不可再得的宝贵财富，视网膜仅仅是眼球大约十四层中的一层，它本身又有七或八层，每层都不相连。当她进而大讲绒毛、乳突、神经节和睫状肌时，人们就常常低声叫起她的另一个外号：绒毛修女或邋遢修女①。

---

① 德语“绒毛”一词和“邋遢的人”近似。

要知道，拉黑尔只是偶尔有很少时间给女孩子们讲解什么；女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规定得很死，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她确实不过是管管手纸而已。当然，她也谈论汗、脓、月经以及——相当详尽地谈论唾液；几乎用不着说，她强烈反对过分用力刷牙，对于起床后不久使劲刷牙，她只是违心地而且也只是在家长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后才加以容忍的。她不仅观察女孩子们的眼睛，也观察她们的皮肤，可惜不是胸脯和腹部，只是前臂和上臂，因为家长们有几次控告她无耻地触摸女孩子的身体。后来，她进而向女孩子们讲解，只要有了一些经验，看一看粪便其实只是肯定一下起床时已经有所感觉的东西：健康状况；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差不多就不必再去看它了，除非对自己的状况没有把握，才需要看一眼加以证实(玛格蕾特和B.H.T 语)。

莱尼装病时——后来她变本加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跑到拉黑尔修女的小屋去抽烟；拉黑尔告诉她，像她这种岁数的女人，每天抽烟不宜超过三至五支，长大后决不要超过七至八支，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十支。四十八岁的莱尼至今仍遵守这一规则。如今她已开始在一张一点五米见方的牛皮纸上(她目前的经济情况甚至买不起这样大的白纸)，实现一个以前她没有时间去实现的心愿：逼真地画出视网膜一层的横截面。她确实下定决心，要把六百万锥体和一亿杆状体都画出来——全都是用她儿子留下来的儿童颜料，有时再购买一些廉价的调色盘。考虑到她每天最多能画五百个杆状体或锥体，每年大约可画二十万个，那末，她还得再忙上五年，这样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她之所以辞掉扎花工作，就是为了去画杆状体和锥体。她称自己的这幅画为《化名拉黑尔的圣母玛利亚左眼视网膜局部图》。

知道莱尼喜欢边画边唱，有谁会感到奇怪呢？她毫不在乎地把一些词句套上舒伯特和民歌的调子，或套用她从“家里院里”(汉斯语)的唱片中听来的曲调，使得席尔滕施坦“不仅仅感动、洗耳恭听和钦佩”(席尔滕施坦语)。她会唱的歌显然比她会弹的钢琴曲要多一些；笔者有一盘录音带，是格蕾特·赫尔岑为他录制的，他听这盘录音没有一次不是泪流满面(笔者语)。莱尼唱得很轻，声音浑厚有力，只是由于羞怯才把嗓音放低。她就像是从一个地牢向着外面唱歌的人那样唱。她唱什么呢？

朦胧镜中影
云鬓白如银
朱颜无计驻
皓首怨明镜。

誓愿不贞又清贫
风流慰我无辜心
莫言世道多不平
青天白日无报应……

这是最崇高的大河、生而自由的莱茵河的心声——可是有谁能像莱茵河那样得天独厚，终生保持自由，如愿以偿呢？

当战争第一年没有带来和平的希望时，军人就得出了结论，英勇就义。

我对你知之甚深，

超过对其他所有人。
我理解静谧的苍穹，
人类的语言却永远不懂……
我在花间学会爱情……

她经常唱最后那一段，在录音带上可以听到有四种唱法，有一种甚至具有强烈的节奏，犹如披头士音乐。

可以看出，莱尼对通常被人们视为神圣的诗篇是满不在乎的，她随心所欲地把各种曲调和歌词拼凑在一起：

生而自由的莱茵的心声——上帝保佑！
我在花间学会爱情——上帝保佑！
砸烂暴君的枷锁——上帝保佑！
誓愿不贞又清贫——上帝保佑！

少女时代我与天空神交——上帝保佑！
它施于我男性的爱，美好热烈——上帝保佑！
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上帝保佑！
我才道出心中久藏的秘密——上帝保佑！

可见，莱尼不仅忙忙碌碌，而且忙得颇有成效。

莱尼每次来例假时都大吃一惊，而拉黑尔向她详尽讲解房事的过程，无需采取任何不合适的象征手法，无论是莱尼或拉黑尔都用不着有一丝脸红；只是这种讲解必须保密，因为拉黑尔这样做自然就超越了她的职权范围。也许这就是莱尼一年半

以后听到正式宣讲“草莓掼奶油”时气得满脸通红的原因。拉黑尔甚至不惜使用“古典建筑”这一概念来形容排便的形状(B.H.T 语)。

莱尼在寄宿学校的第一个月还结识了另一位终生好友玛格蕾特·蔡斯特。玛格蕾特当时就已背上了“荡妇”的名声。她是一对极其虔诚的夫妇的桀骜不驯的女儿；如同所有教过她的老师一样，父母对她也不知“怎么办”才好。玛格蕾特整天乐呵呵的，外号“乐天派”。她身材矮小，黑发，同莱尼相比显得嘴快话多。拉黑尔对玛格蕾特的皮肤(肩膀和上臂)观察了十四天后说她同男人有暧昧关系。这些事的唯一证人是玛格蕾特自己，因此这里也许应谨慎一些，但笔者本人的印象是，玛格蕾特的话绝对可信。玛格蕾特说，拉黑尔说这话不仅是依靠她那“十拿九稳的化学直觉”，而且是根据这种皮肤的物理特性。拉黑尔后来在同玛格蕾特谈心时声称，她的皮肤“显示出被人疼爱和疼爱别人的迹象”，玛格蕾特一听——为了玛格蕾特的名誉，这一点非说不可——脸就红了，这不是她一生中头一次脸红，更不是最后一次脸红。她还承认她在夜里用她不能透露的方法溜出修道院，与村里的男孩而不是与成年男子幽会。她讨厌成年的男人，说他们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接触过一个男人，就是那位声称对她无可奈何的教师。“嘿，”她用她那单调的莱茵语调补充了一句，“他对付我可有办法哩！”她说，她喜欢男孩子，同龄的男孩子，男人身上有股味道，而且——她坦率地补充说——男孩子那种快活劲头真是妙极了，有的快活得叫起来，于是她也跟着叫，而且，男孩们要是“单独干”那种事，那是不好的；给他们快乐，她，玛格蕾特，也感到快乐——这里必须提到，我们首次看到拉黑

尔突然痛哭流涕。"她哭得很厉害，我吓坏了，今天我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害了梅毒等一身病躺在这里，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玛格蕾特在医院谈）。拉黑尔的眼泪流干了以后——据玛格蕾特谈，这一定用了好长时间——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并非不和颜悦色地说："是啊，你真是个使人快乐的姑娘①。""当时我自然不懂这个暗示是什么意思"（玛格蕾特语）。她不得不——而且十分严肃地——答应不把莱尼引上同样的道路，也不向她透露溜出寄宿学校的办法；虽说莱尼天生要给人许多快乐，但她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姑娘。玛格蕾特对此起了誓，并且说到做到，"再说莱尼从来也不存在此种危险，她自己有主意"。此外，拉黑尔言之有理，玛格蕾特的皮肤，特别是她胸脯的皮肤受人疼爱，使人动情，至于那些男孩同她都干了哪些事情，则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拉黑尔问到她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几个人搞时，玛格蕾特在二十分钟之内第二次红了脸，并且——仍以她那单调无味的莱茵语调——说："一次总是只同一个人。"拉黑尔听了又哭起来，低声说："玛格蕾特这样做不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玛格蕾特在寄宿学校果然没有呆多久，她同村里男孩子们（大多是祭坛侍者）胡搞的事全都败露了，引起男孩们的家长、教士和女学生家长的不满。进行了调查，但玛格蕾特和所有男孩都拒不交代——玛格蕾特不得不在第一年年底就离开了寄宿学校。留给莱尼的是一位后来在困难时刻乃至生死关头仍经得起考验的终生好友。

---

① 德语"使人快乐的姑娘"即"妓女"。

一年后，莱尼参加了工作，心情一点也不难过，但好奇心仍未得到满足：她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当见习生（正式职业名称是办事员）。在父亲的敦促下，她参加了纳粹少女组织。她穿上这个组织的制服甚至（真可惜！）还挺俊哩。莱尼——这一点非提不可——参加小队活动一点也提不起劲儿，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此外还得补充说明：莱尼对纳粹主义的政治内容毫无认识；她不喜欢那种褐色制服，尤其讨厌冲锋队，谁要是能稍稍设身处地体会一下她对粪便学的兴趣和拉黑尔修女对她进行的粪便学训练，就会明白或至少有所觉察，她为什么对这种褐色如此反感了。她不热心参加小队活动，最后完全停止参加，因为她反正从1939年9月起就作为“战争需要”人员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此外还另有原因：她觉得那里的气氛过于像修女般虔诚；原来她所属的小队被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天主教徒“篡夺”了，此人企图破坏“这件事”，她确信由她领导的十二个少女靠得住——可惜并非都如此——就把整个晚会活动改为唱圣母赞歌、做念珠祷告等等；可想而知，莱尼并不反对唱圣母赞歌和做念珠祷告等等，只不过她——此时年近十七岁——在修女学校受了两年半虔诚的煎熬之后对此不大感兴趣，感到无聊；她并不感到惊奇，只是觉得无聊而已。当然，那位年轻女士——名叫格莱特·马雷克——的渗透活动被发觉了，一个少女——名叫保拉·施米茨——告发了她，莱尼甚至作为证人受到盘问，由于格莱特·马雷克的父亲事先打过招呼，她表现得很坚定，不动声色地否认唱过圣母赞歌（顺便提一下，十二名少女中有十人否认唱过），这使格莱特·马雷克免遭大难，但她还是被盖世太保关押审讯了两个月，这就叫她“够受”的了——再多她就坚决不肯说了（根据同范·多尔恩的多次谈话归纳）。

这时到了1939年夏天。莱尼进入了她一生中最爱说话的时期，这个时期将持续一年又三个季度。她被称为美女，经过特批领到了驾驶执照，喜欢驾驶汽车、打网球，陪父亲出席各种会议和出差。莱尼在等待一个男人，"一个她爱的男人，愿意无条件地委身于他"，为了这个男人，她已经"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玛格蕾特语）。莱尼不放过任何一次跳舞的机会。这一年夏天，一到晚上，她喜欢坐在平台上，喝着冰咖啡，摆出一些"上流妇女"的派头。有一些她在这个时期拍的惊人照片：她仍有可能争取"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甚至是全区的，也许是全省或那个以德意志国的名字而闻名于世的政治—历史—地理实体的冠军称号。她可以在奇迹剧①中扮演圣女（也能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②），为润肤膏做广告，甚至可能在电影中扮演角色；她的眼睛颜色现在变得很深了，几乎成黑色；她留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正像本书第一页所描写的那样。连盖世太保的短暂审讯和那个格莱特·马雷克被关押两个月，也没能大大动摇她的自信心。

她认为拉黑尔也对男女的生理差别讲得太少，于是便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材料。她翻阅百科词典，没有多少收获，翻遍父母的藏书，同样一无所获；她有时在星期日下午去看望拉黑尔，和她在修道院的大花园里长时间散步，恳求她作说明。经过一番犹豫，拉黑尔的心软下来了，便向她说明——她们俩谁也用不着有一点脸红——两年前不肯讲给她听的其他细节：男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和快乐。

① 奇迹剧：一种中世纪宗教剧，以圣经故事为内容。
② 抹大拉的马利亚，原为妓女，后改恶从善，事见《路加福音》。

莱尼很想得到有关的图片资料，但拉黑尔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她认为看这种图片不好。于是，莱尼便改变说话腔调（其实毫无必要），打电话给一家书店老板。根据这个书店老板的建议，她到了“市立卫生博物馆”，在性生活部份看到的主要是各种性病介绍：从普通淋病、软下疳到钳闭包茎和各期梅毒，全都维妙维肖地用相应颜色涂色的石膏模型显示。莱尼见识了这个腐败的世界——并且感到气愤；她倒不是假正经，使她生气的是这个博物馆把性和性病混为一谈；这种悲观的自然主义使她气愤，就像从前她的宗教课教师的象征主义使她气愤一样。在她看来，卫生博物馆就是“草莓掼奶油”的翻版（证人玛格蕾特语，她自己——又一次脸红——曾拒绝对莱尼的性教育作出贡献）。

这里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莱尼在追求一个完美健全的世界。非也；莱尼的唯物主义感性具体主义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她愈来愈难于拒绝许多求爱的表示，终于答应了父亲办事处的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年轻建筑师的苦苦哀求，同他进行了一次幽会。周末，夏天，莱茵河畔一家豪华饭店，晚上在平台上跳舞，她有一头金发，他也有一头金发，她十七岁，他二十三岁，两人都健康——这听起来会有幸福的结局，或者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夜晚——结果却一事无成；跳完第二个舞以后，莱尼就付清一间还未使用过的单人房间的租金，收拾起只是匆匆忙忙地从箱子里取出的晨服（即浴衣）和化妆品，离开旅馆，去找玛格蕾特，告诉她说：跳第一次舞时她就发现“那小子的手不温柔”。一次昙花一现的恋爱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显而易见，至今或多或少是耐着性子的读者会感到不耐烦

并问：天啊，这个莱尼难道是十全十美的吗？回答是：差不离。另一些读者——从不同的思想观点出发——会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天啊，这个莱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下流女人？回答是：非也。她只是在等待一个尚未出现的“合适对象”。她继续受到纠缠，男人们约她幽会和周末远足，她从来不觉得讨厌，只是感到不胜其烦，即使有时听到常常是用下流话悄悄向她提出同她睡觉这种最令人难堪的要求也不生气，只是摇摇头而已。她爱穿漂亮衣服，她游泳、划船、打网球，夜里睡得很香；还有，“她津津有味地吃早饭，看了真叫人开心，嘿，她吃她那两只新鲜小面包、两片黑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鸡蛋、少许蜂蜜，有时还有一片火腿——还有滚烫的咖啡，加热牛奶和糖——那真是一种乐趣，嘿，您真应当亲眼目睹，因为那是一种乐趣——这个姑娘吃得多么津津有味，这是每天的一种乐趣”（马尔娅·范·多尔恩语）。

此外，她还喜欢上电影院，“为的是能够在暗处安静地哭一会儿”（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她的原话）。例如，像《摆脱枷锁的手》这样一部影片就使她哭湿了两条手帕，以致马尔娅误以为莱尼在电影院里伤风了。像《恶魔情人拉斯普京》这样一部影片，她完全不感兴趣，《劳埃滕赞美诗》或《热血》也是如此。“看完这种影片”（马尔娅·范·多尔恩语），“她的手帕不但不湿，而且像刚刚熨过那样干”。不过，《法诺姑娘》也使她流泪，但不如《摆脱枷锁的手》。

莱尼对过去很少见到的哥哥开始有所了解。哥哥比她大两岁，八岁就上寄宿学校，在那里待了十一年。学校假期他大部分用于进一步充实自己：他去过意大利 法国、英国、奥地利、

西班牙等国，因为父母亲想要把他培养成现在他真的已经成为的这种人："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又据马尔娅·范·多尔恩介绍，年轻的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母亲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太俗气了"，由于她自己在法国受过修女的培养教育，一生都保持某种"有时过分的敏感"，因此可想而知，她也谋求让儿子受到同样的教育。就所能掌握的有关情况来看，她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要花点时间谈谈这个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他一生中有十二年之久，像一个精灵，几乎像一个神，集青年歌德和青年温克尔曼①为一体，有点诺瓦利斯②的气质，远离家庭，偶尔——十一年内约四次——回家一次。莱尼对他的了解至今只是他"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果然不错，这种说法不能说明什么，听上去有点神圣；由于马尔娅·范·多尔恩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并不比莱尼多多少（"很有教养，温文尔雅，但从不骄傲，从不骄傲"），由于莱尼守口如瓶，马尔娅·范·多尔恩知之不多，因此玛格蕾特就成了教士以外的唯一证人，虽然她在1939年应邀上格鲁伊滕家喝咖啡时只正式见过他两次，另一次非正式见面是在1940年4月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即海因里希作为装甲兵被派去为上面提到的德意志国征服丹麦的前夕。

笔者现在写到他向一位年近半百、身患性病的妇女了解这个海因里希的情况时感到很为难。玛格蕾特的所有原话都是根据录音记录的，未加修改。好吧，首先是：玛格蕾特变得极度兴奋，她那（已变得很丑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强烈感情，开门

---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

②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见山地说:“是的,我爱过他。我爱过他。”被问到他是否也爱她时,她摇摇头,不是否定,而是表示怀疑,反正决没有——千真万确——难过的模样。“黑头发,你要知道,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还有——唉,怎么说呢——文雅大方,不错,就是文雅大方。他没有料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了他,我甚至愿意上街去卖笑,确实如此,让他能念书,或者,不管他以前学过什么,除了念书和鉴别教堂外,还研究赞美诗,听听音乐——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有关建筑学的一切;是啊,他像莱尼——只有头发是黑的,我爱他。我有两次在他们家喝咖啡,曾见过他——那是1939年8月的事情。1940年4月7日,他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已同那个上钩的阔佬结婚——他打电话给我,于是我立即就到弗伦斯堡去找他,我到达那里时,他被禁止外出,外面很冷,我是8日到达那里的。他们驻扎在一所学校里,整装待发,夜里就要开拔。至于是乘飞机去还是乘船去的,我就不知道了。禁止外出。谁也不知道我去过他那里,而且后来也没有人知道,莱尼不知道,她的父母等人也不知道。尽管禁止外出,他还是出来了。是从校园内女厕所的墙上爬出来的。没有旅馆,也没有私人出租房间。只有一家酒吧开着门,我们进去了,一个女招待把她的房间借给我们。我花掉了我所有的两百马克和一只红宝石戒指,他花掉了他所有的一百二十马克和一只金烟盒。他爱我,我也爱他——尽管像在窑子里,也不在乎。不在乎,毫不在乎,不错(为了肯定玛格蕾特是否确实两次说不在乎、毫不在乎时用的都是现在时态,对录音仔细地听了两遍。客观的结论是:她是这样说的)。是啊,不久以后他就死了。多么荒谬、荒谬的浪费啊!”问她怎么会想到使用“浪费”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字眼,玛格蕾特是这样回答的:

（根据录音记录）：“是啊，你看，全部教育、漂亮的长相、男子汉的气概——而且才二十岁，我们还可以做爱多少次，还会做爱多少次啊，不仅是在那种像窑子一般的房间里，天气暖和后也可以在室外——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说是浪费。”

由于玛格蕾特、莱尼和马尔娅·范·多尔恩三人都对海因里希·格鲁伊滕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笔者也去寻找一些比较客观的材料，结果从两位有着羊皮纸皮肤的耶稣会神甫那里搞到了这些材料。这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两人都坐在被烟斗的烟雾弄得乌烟瘴气的编辑部里审稿，虽然是两家不同的杂志，但题材却一样（左倾或右倾？），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也可能是瑞士人），前者是变得灰白的黄头发，后者是变得花白的黑头发；两人都聪慧、仁慈、机灵、宽厚，问起他们时都脱口而出：“哦，那个格鲁伊滕家的海因里希啊！”（从用词到语法和句法结构乃至标点都完全一致，因为那个法国人也说德语。）两人放下烟斗，往后一靠，把稿子推开，摇了摇头，接着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点了点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讲了起来——这里结束了完全相同，开始了局部相同。由于一位先生住在罗马，另一位住在弗赖堡附近，笔者不得不登门拜访，事先还要打长途电话约定时间，因此开销颇为可观，老实说，不谈这种会见的“人性价值”（不过，不花这么多钱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点），这笔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两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增加对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盲目崇拜而已。这一位（法国人）说：“他是那么像德国人，那么像德国人，那么高尚。”另一位说：“他是那么高尚，那么高尚，那么像德国人。”为

简便计，以后还需要提到这两位时分别以J.（耶稣会会士）甲和J.乙称之。J.甲："像他那样有天赋的聪明学生，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J.乙："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聪明的有天赋的学生。"J.甲："他是又一个克莱斯特。"J.乙："他是又一个荷尔德林①。"J.甲："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劝他当教士。"J.乙："从来没有劝他参加修道会的打算。"J.甲："那样会是一种浪费。"J.乙："连最忠诚的修道会会友也反对那样做。"问起他的学习成绩时，J.甲说："哦！各科全都是一分，体操课也是如此，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一分；到了要选择职业的那一天，老师个个都会感到为难。"J.乙："嘿！成绩单上门门都是优，后来我们为他制订了一个评语：极优。可是，他干哪一行合适呢？我们大家都感到为难。"J.甲："当外交家、部长、建筑师或法学家，无论如何可以当个诗人。"J.乙："当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如何可以当个诗人。"J.甲："只有一行对他肯定不合适，对他来说太可惜了：参军。"J.乙："只是不能当兵，这不行。"J.甲："可是他当了兵。"J.乙："他们让他干了这一行。"

千真万确，这个海因里希在1939年4月至1939年8月底期间取得了所谓高中毕业的学历证明。至于他受过的教育，他没有能用上多少，也许是不想用吧。他同一位表兄一起参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朴直的名称："德国义务劳动军"。从1939年5月起，他有时从星期六13时至星期日24时休假，在他支配的这三十五小时内，火车上花去八小时，其余二十七小

① 荷尔德林（1770～1844），德国著名作家。

时同妹妹和表兄一起跳舞，打一会儿网球，和家里人吃几顿饭，睡四、五小时觉，同父亲吵两、三小时；父亲曾想尽全力并且也会尽全力帮助他躲过他所面临的德国人所说的服兵役这一关，但海因里希却不同意。得到证实的是，他们关起门来大吵，格鲁伊滕太太在一旁啜泣，莱尼被关在门外，唯一可证实的是马尔娅·范·多尔恩清清楚楚地听到海因里希说的一句话："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由于玛格蕾特肯定在仲夏八月两个星期日的下午和海因里希喝过咖啡，此外还（破例由莱尼）说过，他首次回家度假是在五月底，因此可以十拿九稳地算出：海因里希共计回家七次，总共待了约一百八十九小时——包括睡觉二十四小时左右——其中同父亲吵架约十四小时。海因里希是否算得上命运的宠儿，有待于读者自己去判断。总之，他同玛格蕾特喝过两次咖啡，几个月后还同她度过了一个风流的夜晚。可惜，除了"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之外，他的其他言谈没有可靠的证明。难道这位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和艺术史等都很出色的人没有写过信么？笔者花言巧语向马尔娅·范·多尔恩苦苦哀求，用无数杯咖啡和几包不带过滤嘴的美国弗吉尼亚香烟贿赂了她（她六十八岁开始吸烟，觉得"这玩意儿真不赖"），从莱尼难得打开的祖传五斗柜的抽屉中暂时偷出三封信，把它们快速地拍了下来。

第一封信的发信日期是1939年10月10日，即波兰战事结束后两天。信上既无抬头，也无问候语。信是用拉丁文写的，字迹清楚娟秀，令人赏心悦目，本应该用来写更美好的东西。信上写道：

除了为达到军事目的所要求的，对敌人不应打击过严，这是基本原则。

禁止：

一、使用毒气和有毒武器。

二、暗杀。

三、杀伤俘虏。

四、拒绝宽恕。

五、使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弹药，如达姆弹。

六、滥用停战旗(还有国旗)、军徽、敌军军服、红十字会标志(但要提防军事计谋!)。

七、任意破坏或夺走敌人财物。

八、胁迫敌国公民与其本国作战(如法国外籍军团中的德国人)。

第二封信的发信日期是1939年12月13日：

优秀的军人对上级也举止大方、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举止大方，表现为不做作，机敏，乐于履行职责。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位长官来到兵营寝室找人，如该人不在，不应只回答一声‘不在’了事，而是去把该人找来。长官东西掉在地上，下级要帮他拾起来(但出列需有命令)。看到上级想吸烟，下级应替他擦火柴。上级离开营房时，下级就把门打开，等他走后再把门轻轻关上。上级穿大衣，佩带武装带，上下车马时，殷勤有礼的军人会主动帮助。过分殷勤和过分热情不符合军人身份(当面

勤快而背地偷懒的作风)；军人不应使人产生这种印象也，不要有向上级请客送礼的错误想法。

第三封信的日期是1940年1月14日：

盥洗时脱掉上身衣服。士兵用冷水洗。肥皂的消耗量是衡量洁净的标准。每天应洗：手(多次!)、脸、颈、耳、胸部和腋窝。用指甲洗净器(不用小刀)去除指甲污垢。尽量留短发，梳分头。留长卷发不符合军人身份(参看附图)。(信里未见附图——笔者注。)如有必要，士兵应每天刮脸。站岗放哨、接受检阅、向上级报告、参加特殊活动等，一律必须刮脸。

每次洗毕都应立即擦干(擦至皮肤发红)，以免感冒和皮肤因冷皲裂。洗脸毛巾和擦手毛巾应分开。

莱尼难得谈她的哥哥；她对他了解得太少，从前和现在都只会说：她"怕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多得惊人"，"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马尔娅·范·多尔恩证实)。

马尔娅·范·多尔恩自己承认，她在他面前感到拘束，虽然他对她也"非常亲切"。他甚至帮她到地下室搬煤和土豆，不计较帮她刷盘子等，"可是——他有点，你知道——有点——嗯，就是有点，哦，也许——嘿，有点很高贵的地方——这一点他甚至像莱尼"。这个"甚至"本来是需要详尽说明的，不过笔者没有追问。

"高贵"，"德意志风度"，"非常、非常可爱"，"可爱得怕人"——这些能说明什么呢？回答是：不能说明什么。

留下的是一幅小画像，不是画像，如果没有与玛格蕾特在弗伦斯堡一家酒吧的小阁楼里度过的风流之夜，没有那句唯一得到证实的直接引语（粪土等），没有那几封信以及最后的下场：还不到二十一岁，与表兄一起，被认为犯有开小差和叛国（私通丹麦人）以及“企图盗卖军用作战物资”（一门反坦克炮）等罪行——如果没有这一切，那末，有关他的情况也就不会有多少，只不过是两位抽着烟斗、皮肤像羊皮纸、脸色几乎发黄的耶稣会教士的回忆，“一朵花，一朵一直仍在玛格蕾特心中盛开的鲜花”，以及1940—1941年那个可怕的服丧之年。因此，玛格蕾特有关他的一段话也许是举足轻重的（录音）：“我劝他逃走，干脆和我一起逃走——我们是能过得下去的，即使要我上街卖笑——但他不愿丢下他的表兄，没有他，他的表兄也就完了，而且我们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屋子里所有像妓院里用的东西，那些该死的红灯、丝绒、粉红色的玩意儿、乌七八糟的照片等等，真叫人恶心。他没有哭——那是怎么回事呢？啊，那朵鲜花一直还在我心中开放，即使他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我还会一直满怀深情地爱他，可他们喂了他什么呢？西方世界。他肚子里装了整个西方世界，死了——各各地、雅典卫城、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狂笑）——外加班贝格骑士。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而生活。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有人看到墙上的照片，向莱尼问起她的哥哥，她总是变得冷淡，几乎带点贵妇人的派头，只是出人意外地一带而过：“他在丹麦国土上长眠三十年了。”

玛格蕾特的秘密当然一直都没有告诉别人，无论是那两位

耶稣会教士，还是莱尼或马尔娅·范·多尔恩都不知晓；笔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劝说玛格蕾特有一天亲自把这个秘密告诉莱尼：如果莱尼知道哥哥死前曾和十八岁的玛格蕾特度过一个风流的夜晚，她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莱尼可能会露出微笑，而微笑对她是有益的。除了上面引用过的文字也许可以作为具体派诗歌[1]的早期例子，笔者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海因里希的诗人天赋。

① 具体派诗歌是60年代在联邦德国风行一时的一种新诗形式。

第　三　章

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现在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比莱尼还要多，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死于1949年，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找到了二十二个人，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过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其中一个是他的上级，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如今他们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1899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领班，1919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

专员）。结婚时她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后，1924年至1929年，他当了一名备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也承包比较大的工程(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1929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在1933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1933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1943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1945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去世，"日子过得不错"（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

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看来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即使他的公司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

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屈尊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休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我讨厌鸡")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他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仍然干劲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对付他们，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坐在写字台前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

最后，向老霍伊泽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后来他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干那事，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

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后来他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

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对人宽厚，冷静、宽厚”。

格鲁伊滕在1932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①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

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至少对他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格鲁伊滕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雇佣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

① 布吕宁(1885～1970)，1930年3月出任德国总理，1932年5月30日下台。

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奇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范·多尔恩的一些话甚至使人认为，她也许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1927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她却愿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当时我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她是否相信格鲁伊滕"在别处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像修道士一样，可他并不是修道士。"

看一看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孩提时期的照片在此不予考虑，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他在1913年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金黄色的头发，高鼻子，有那么一股"牛劲"，深色的眼睛，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他们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的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照的，那是1917年，他十八岁；在这张照片上，后来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找到心理依

据。格是个严肃的小伙子，这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在1949年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从来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1941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的那位著名肖像画家(一幅油画，真不赖，虽然色彩太淡——这幅画笔者在显然不太合适的环境中从一个私人手中瞅过一眼）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如果脱掉他身上的时髦服饰，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1]油画中的人物。

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作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

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2]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甚至马尔娅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

① 布什(约1450～1516)，尼德兰画家。他的写生画(农民、流浪汉、乞丐、残疾人等)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② 卢塞恩，瑞士州名，其首府同名，居民操德语。

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看来她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八年后她女儿莱尼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很有可能，左拉和粪便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末，她就不会有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末，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① 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② 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马策蒂③ 和艾伯纳—艾申巴赫④ 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那份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1914—1920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她对皮尔斯⑤、康纳利⑥ 以至拉金⑦ 和切斯特顿⑧ 等名字并不陌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
②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③ 汉德尔—马策蒂（1871～1955），奥地利女作家。
④ 艾伯纳—艾申巴赫（1830～1916），奥地利女作家。
⑤ 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诗人。
⑥ 康纳利（1903～ ），英国作家。
⑦ 拉金（1922～ ），英国诗人、小说家。
⑧ 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住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书是我送给她的——她读过1912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1927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1919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有一点就会毫无疑问：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看来她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可能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

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也许他的总帐簿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的时候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看看报，后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也就弄清楚了；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不耐烦的牺牲品。

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①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连一丝一毫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②，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罗曼蒂克的、部分甚至是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尽管莱尼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甚至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末，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不管这对夫妇之间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看上去一点也

① 德语的芬兰人与痤疮是同一个词。
② 指芬尼亚运动（19世纪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的成员。

不欣赏叶芝或切斯特顿。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问到莱尼的情况时，她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负有责任，他自己决不会干出那种事”，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她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①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尔克神话，考虑到1914年和1940年的区别，再考虑到无需在此一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末，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后来，他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在野战医院住了三年，“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1919年他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出来”（霍伊泽语）——在1923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

① 朗热马尔克，比利时西部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激战。

生。因此，有人也许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

从1933年起，格鲁伊滕的买卖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1935年起大幅度增长；1937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他靠修建齐格菲防线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1935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过了很久才“派上用场”。“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今天仍使我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政治家的“马其诺[1]情结”上；“即使马其诺神话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结，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尽管他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他自己就有要塞地堡情结，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

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1938年，规模已相当于1936年的六倍，而1936年则是1932年的六倍；1940年更增为1938年的两倍，“到了1943年，就根本无法再确定增长的比例了”（霍伊泽语）。

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专家们今天仍证实，格鲁伊滕无疑很早就招聘和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部国境上建立了一套防御体系，以陆军部长马其诺（1877～1932）的名字命名，世称“马其诺防线。”

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雇佣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格鲁伊滕肯出大价钱。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把别墅念成“别野”)。

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建筑师、技术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经常去看望他的孩子，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他想要孩子成为一名学者，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①语言学家，此人的藏书、见识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一定曾使格鲁伊滕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

① 罗马语(一译罗曼语)，由拉丁语发展而来，包括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

的那么好”感到焦急。

有一点他从来不干：把莱尼看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介绍，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

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有一样东西他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十三年后，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他出人意外地厌恶下流的笑话，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① 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

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他过着可说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靠战备和已经爆发的战争发财，营业额(据霍伊泽讲)由1935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1943年每月一百万，就在1939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肯定已达一百万时，他却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① 高加索北部地区名。

1939年和1940年间，在父亲和归来的儿子之间产生了紧张乃至怨恨情绪。海因里希那时已从西方世界三座名山上下来，在距离有四小时火车路程的某地参加沼泽排水工程，尽管此时他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为此父亲付给了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1939年6月至9月间，儿子回家探亲约七次，9月底至1940年4月初，回家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向他提出的“后门关系”；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均系老霍伊泽和洛蒂语）把他“调到合适的环境中去”，或让他退役充当重要的军工生产人员。用早餐时，父亲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和在部队的生活情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雷贝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军队服役教程，反坦克炮兵版》，朗读了其中一篇将近五页长的论文（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过它）：《敬礼》。该文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军人敬礼方式：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在马上的，坐在汽车上的，谁对谁该如何敬礼。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等候儿子探亲的父亲，而是一个此刻已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专机（莱尼非常喜欢乘飞机！），不仅十分忙碌，而且过分忙碌，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的父亲，有时不得不勉强抽出时间，取消重要的约会，常常用破绽百出的借口（看牙等等）取消与部长们（！）的约会，为的是不错过与心爱的儿子会面的机会——爱子却对他朗读由雷贝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条例，而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至少是考古研究所）当所长啊！

不言而喻，这种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的活动，“对所有参加者不仅不愉快，而且越来越恼人，越来越使人心烦，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蒂·霍伊泽语）。当时二十六岁的

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女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当过他的制图员。由于洛蒂在1939年关键的几个月里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参加“咖啡聚会”，回家度假的儿子也在场，因此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说他“十分迷人，不过当时毕竟是在犯法”——的看法，也许应当在这里捎带提一笔。老霍伊泽喜欢谈儿媳妇同格鲁伊滕的“恋情，不过当然是柏拉图式的”，“他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完全符合他的谈情说爱范畴”。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它出自莱尼之口，但没有得到直接证实，只由靠不住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间接证实）：洛蒂“对父亲大概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不管怎么说，洛蒂把全家团圆喝咖啡——老格鲁伊滕有时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参加——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马尔娅·范·多尔恩把一天三餐说成“可怕，十分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糟，糟，糟”。

确有其事，甚至像马尔娅·范·多尔恩这样成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使格鲁伊滕太太“简直是活受罪；她受不了这一切”。洛蒂·霍伊泽明确地说，这是“聪明人变相的杀父行为”，并且断言，引用上述雷贝特作品中的话，其目的是在政治上起破坏作用，“刺痛了格鲁伊滕，因为他参预政治，甚至掌握和事先了解高级政治机密，例如早在占领莱茵兰① 之前很久就在该地区建造兵营，计划修建大型地下防

① 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兰为非军事区。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遣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兰。

空工事，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

莱尼对这痛苦的九个月倒没有太深切的体会，可能她不完全像其他观察者那样留心吧。在这期间——大约1939年7月——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当说：假如他提出要求的话，她是会答应的；虽然她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自已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但她明白，只有在他提出要求之后，她才会知道这一点。此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威格特，朗热马尔克牺牲者和声称他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艾哈德“由于生性极端神经过敏”（其母语），在高中毕业考试这样一个严格的关口[①]前败下阵来，甚至连德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部门也暂时将他打发回家；为了得到一个他所“讨厌”（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他本人的话）的小学教师工作，他起初曾偷偷地准备参加拔尖生考试，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被征召入伍，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机构里与表弟海因里希相遇了。表弟庇护他，并在回家探亲期间相当明目张胆地帮他同妹妹牵线，他给他们买电影票，“把他们打发走”（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他同他们约好看完电影后碰头，“到时候却不去”（同上）。就这样，艾哈德在格鲁伊滕家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假期，不，是他的全部假期，对自己的母亲只是偶尔去探望片刻，因此母亲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她愤愤不平地驳斥这种说法：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可能存在“有结婚意图”的恋爱关系。“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1939年

① 德国高中毕业考试及格者均可直升大学，故曰。

5月前后——起就拜倒在莱尼的石榴裙下；这一点有完全可靠的证人，特别是洛蒂·霍伊泽，她直言不讳："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那样子好，无论如何要比1941年好。也许不比1943年好。"她自己承认曾多次设法把莱尼和艾哈德引到她家去，让他们单独待在那里，"以便——真该死——终于成就好事。天哪，小伙子二十二岁，身体健康，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刚十七岁出头，已经——坦率地对你讲吧——可以谈情说爱了，她是一个女人，当时就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那个艾哈德的羞怯劲儿就没法提了。"

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产生了误解，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洛蒂·霍伊泽。她生于1913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一头褐发已经斑白，枯瘦焦黄的脸，尽管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言善辩，可说是个爽快人，比玛格蕾特还要爽快。由于她在艾哈德时期同格鲁伊滕关系相当密切，看来她这个证人要比范·多尔恩可靠得多；范·多尔恩在涉及莱尼的所有事情上都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问到她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洛蒂也坦率地说："嗯，当时我们两个本来是能有所作为的，我承认，他是可以做到后来在1945年做到的那一步的；他的所作所为我几乎都不赞成，但是我能理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的妻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被那些军备玩意儿吓怕了，简直是吓破了胆；如果她是个积极坚定的女人，不那么沉湎于幻想，她就会把她儿子藏到西班牙的什么地方去，或是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是送到芬尼亚国家①去，她自己也可以去那里

① 指爱尔兰，参见第72页注②。

游览观光，同样，当然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的这段历史。请别误解：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善良，不过她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跟不上，无论是对政治、生意还是对那孩子骇人听闻的自我毁灭，都是如此。别人告诉你的情况确实不错（没有透露玛格蕾特的名字——笔者）。他吞下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他究竟掌握了什么呢？一小堆臭屎，要是你问我的话，他面临的是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尽是些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农民战争。1927年我十四岁那年在夜校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课，并且作了大量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果剪掉他的鬈发，剃掉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还会剩下什么呢？一个相当蹩脚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换句话说：儿子受班贝格骑士影响太深，母亲受《秘密的玫瑰》①影响太深——她曾把这本书给我看过，确实好极了，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也许她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儿子海因里希呢，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远近的女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发出奇怪的微笑；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者和女人才能闻出诗人的味道。当然，他所干的完全是自杀，一清二楚，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也许是艾哈德自己愿意被拉进去。人们不得而知，两位班贝格骑士愿意一起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枪毙了，你知道，海因里希在被枪决前喊了句什么？“去他妈的德国！”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不过，既然他已参加那个该死的国防军，这也许倒是件好事：在1940年4月到1943年5月之间，

① 爱尔兰作家叶芝（1865～1939）的一部作品。

死亡的可能性还多着呢。他老子门路很多，把档案弄到了手，是某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己从未翻阅过，只是请我把要点讲给他听：这两个年轻人竟想把一门完整的高射炮卖给丹麦人，不过，他们只想要假定的废铁价钱，收它四五个马克。你知道，这个文静腼腆的艾哈德在审讯中说了什么？“我们是为一项高尚的职业，为贩卖军火而死的。”

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拜访维尔纳·封·霍夫高先生，此人五十五岁，“在联邦国防军[①]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凭着建筑行家的经验为之效劳”，如今在他祖传的湖中堡垒侧翼开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只为和平目的即建造住房服务”。要知道，封·霍夫高（他没有主动说自己死气沉沉，不过有可能这样做）是个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老光棍，据笔者浅见，他开办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只是好有一个借口，可以一连数小时观赏城堡池塘里的天鹅，观看佃户们地里地外的活动，在田间（确切地说：在甜菜田里）散步，每逢有一架星式战斗机飞过时，他才抬头朝天空恶狠狠地瞪上一眼。他避而不与住在府中的弟弟交往，“因为他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封·霍夫高稍微发胖而敏感的脸上显出愤懑的表情，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笔者至少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柜”里尚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多得令人不安。有必要去乡村酒店几次，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

① 西德军队的名称。

“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

下面是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阿诺德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起码也有三千万”，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

霍夫高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犹豫了一会儿：“我对格鲁伊滕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这个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我至少可以帮他一把，作为回报。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这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

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是自杀，荒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认识几乎所有的将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

想到放弃自己在市中心的那套有屋顶花园的漂亮的小公寓住宅只是难过地叹一口气的洛蒂·霍伊泽，谈起"这件事"来却连声叹息，一支接一支抽烟，动不动就摸一下她那光滑的、剪短的花白头发，频频地从杯中抿一口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毫无疑问，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还是因为企图盗卖那门大炮也好——他们死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始终有一种印象，这件事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色彩，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墙根下听到'瞄准！'的口令时一定又惊又怕。毕竟艾哈德有了莱尼；海因里希呢，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姑娘。这两个小伙子干的事，我觉得颇有德国人的风度，而且恰恰是在当时我们正开始承建大型工程的丹麦。好吧。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手法，请注意，有三个1①。数日后在亚眠阵亡的我的丈夫就不是这样，他宁愿活着，不仅是象征性地活

① "象征手法"原文只有一个1，作者故意用了三个1，以示强调。

着，也不愿象征性地死去，他害怕，仅此而已，他有许多长处，但他们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把这些都毁了，他在那个学校一直待到十六岁，本想当教士，直到他终于认识到这一切统统是乱弹琴时，已经太晚了。他从此背上没有高中毕业的思想负担——这是他们灌输的结果。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①里相识，我们那时唱的歌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最后一段也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人们当然没有教导我们，1927年和1928年之交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1927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我的威廉，可不是会拿起枪的人，决不会，后来他为了这些白痴不得不拿起了枪，他们让他为这种乱弹琴送了命——公司里甚至有人说，他的亲老子在格鲁伊滕同意下把威廉从因公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甚至还有人嘀咕什么乌利亚的妻子②，可我哪能干那种事呢？我可不会那样干——像威廉这样忠诚的人，你怎么能背叛他呢？即使在他死后，我也没有马上能做到。至于老格鲁伊滕，不错，他和我当时就能有所作为；我感到他的迷人之处就是这个又高又瘦、长相像无产者的农民儿子，如何成了一个身材颀长、瘦骨嶙峋的大人，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既不是建筑商，也不是建筑师——如果你问我，是个战略家。这就是除了又高又瘦的身材以外他使我着迷的地方：这种战略天才。即使对钱财毫不"理解"，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

① 自由青年联盟，德国的青年组织，创建于1913年，1933年被取缔。

② 典出《圣经·旧约全书》。乌利亚是以色列大卫王手下的一名大将。大卫王为了霸占他的妻子，故意派他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打仗，致使他被敌人用箭射死。

幅欧洲地图，插着大头针，有些地方插上小旗，只要看上一眼就够了——他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当然，他有一着非常灵，这完全是从拿破仑那儿看来的——我相信，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就是一部相当乏味的《拿破仑传》——这一着其实很简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着数，甚至还有一点感情用事。1929年他开始经营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名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仍然同舟共济，拉扯着大家，没有裁减一个人；他不惜对银行耍花招，交换和倒卖汇票，甚至借高利贷——就这样，1933年他手下约有四十人，他们绝对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连其中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而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包括政治上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在以后这几年中，他们全都飞黄腾达起来，就像拿破仑的军曹一样；他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们，他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也知道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名字，见到他们就问长问短——例如，他知道谁家的孩子留级，等等。他来到工地，看到哪里人手紧张，他就会抄起铁锹或锄头，急需时也开卡车——什么地方真正需要人手，他总是帮一把。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个秘密：他从不见钱眼开。他当然需要钱支撑门面：衣服，汽车，交际应酬，时而举行一次酒会，但到手的大笔钱又用于投资，除此之外，甚至还借债。他曾对我说：'洛蒂，借债，多借债，是唯一的办法。'至于他的妻子，不错，她是觉察到'他有两下子'——不错，可是他究竟有哪两下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把她吓坏了；她本想使他飞黄腾达，帮他掌管家政，等等，但她并不想同一位总参谋长结为伉俪。如果你允许我用个奇怪的字眼，也许你甚至会理解：他是个抽象派，她是个务实派，尽管看起来也许正相反。

天啊，我觉得他干的事是犯罪：为那些人修建地堡、机场和总部，如今我去荷兰或丹麦，就会在海滨看见我们修建的地堡，我会感到恶心——不过那是个强权时代，恃强凌弱的时代，而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对权势本身并不看重，正如他并不看重金钱一样。他喜欢的是赌博，不错，他是个赌徒——不过他太脆弱了：他们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愿被拉出泥坑。”

笔者想要让洛蒂回到采访的第二个题目，即莱尼与艾哈德的关系上来，起初没有成功。她又点燃一支香烟，不耐烦地挥一下手：“这还会谈到的，先让我把话讲完。只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们俩，我们当时就合得来，甚至有一些亲昵的动作，或者不管你怎么说，这些对于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待在一起的四十岁男人来说是动人的。当然送过鲜花，还吻过两次小臂，而真正令人激动的是：有一次，在汉堡一家旅馆里，他甚至陪我跳了半宿舞；这根本不像是他干的事情。你是否发觉，‘大人物’总是蹩脚的舞伴？是啊，除了同我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以外，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我是个相当冷漠的女人，我有一种糟糕的性格，长期摆脱不了：我至死不变心。这可真要命。不是什么美德，不如说是一种耻辱——他们让我的威廉、我的丈夫为了那种乱弹琴在亚眠阵亡以后，夜里孩子们睡觉去了，我独守空床，你想过那种滋味吗？1945年以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碰我——其实这完全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根本不把守节放在心上，到了1945年，已经五年了，我们俩，他和我，才搬到一起住。好吧，现在就谈莱尼和艾哈德吧：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艾哈德腼腆得没法提——再说，莱尼也是如此，这你要知道。他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他来说，她就是一个神秘复活的佛罗伦萨金发美女或类似的

美人，连莱尼那一口极端单调乏味的莱茵地方话，连她那索然无味的表达方式，也都不能使他头脑清醒。在他看来，她十足是个没有知识的人；她脑子里从前和现在有的那一点玄而又玄的分泌知识，即使她讲出来，我想也不会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他对此毫不介意。是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我是指海因里希、玛格蕾特和我三个人——尽最大努力成全他们俩的好事。要知道，那时候时间并不多：1939年5月至1940年4月，也许他总共回来过八次。当然，海因里希和我之间并没有明确谈过此事，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俩多么相爱。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真叫人喜欢，不错，我再说一遍，真叫人喜欢。他们没有在一起睡过觉，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买了电影票，如《海上战友》这种破片子，或是像《谨防敌人偷听》这种蹩脚货，我甚至让他们去看《俾斯麦》这部电影，因为我想：真见鬼，电影要放三个小时，电影院里又黑又暖和，像是在娘肚子里一样，他们一定会手拉手，或许还会想到(一声苦笑！——笔者)亲亲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就会继续发展。可是一事无成，显而易见一事无成。他带她去参观博物馆，向她说明如何区分布什油画的真伪。他试图让她放弃乱弹舒伯特的作品，改弹莫扎特的作品。他给她看诗，可能是里尔克① 的诗，我记不清了，后来他做了一件起了作用的事：他写诗赞颂她并把诗寄给她。是啊，莱尼是个迷人的姑娘——如果你问我，她今天仍然是这样——连我也有点爱上她了：比方说，我们有时一起外出，我丈夫、我、海因里希、玛格蕾特和他们俩，要是你能看到她和这个艾哈德跳舞的样子，大家真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希望能为这两个人准备好一张有天盖的大床，使他们能在床上春风一度——后来他写诗给她，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她把这些诗拿给我看，我不得不说，诗写得相当大胆。他相当露骨地歌颂她的胸脯，称之为‘沉默的大白花’，说他要‘一片一片剥去花瓣’。他还写了一首确实不错的妒忌诗，也许甚至可以发表哩：‘我妒忌你喝的咖啡，妒忌你抹在面包上的黄油，妒忌你的牙刷和你睡觉的床。’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事已相当清楚，好了，不过纸啊，纸啊……”

当问起莱尼和艾哈德是否可能背着她、海因里希和其他人发生了关系时，洛蒂出人意外地脸红起来(笔者承认，在进行常常很吃力的采访时，脸红的洛蒂使他心花怒放)，并说：“不，这我很清楚，因为她在一年多以后和那个阿洛伊斯·普法伊弗私奔，接着又愚蠢地与他结婚，阿洛伊斯后来对弟弟海因里希夸口说——海因里希又傻乎乎地向我转述——他‘发现莱尼是个黄花闺女’。”洛蒂仍然脸红不止。问她这个阿洛伊斯·普法伊弗是否可能向弟弟海因里希吹牛，就像显摆一件绝非他取得的战利品那样，洛蒂第一次变得不那么肯定，并说：“他爱吹牛，这倒是差不离——你倒启发了我。不，”她摇了摇头说，“不，我认为这绝不可能，尽管他们俩有的是机会——不，不。”她说着脸又红了，这使笔者感到惊异。“他死后，莱尼的表现不像寡妇，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她的表现，说得具体点，像个精神恋爱的寡妇。”笔者觉得话已说得够清楚了，笔者很欣赏她的坦率，不过仍然不完全相信，尽管他感到惋惜，这么晚才发现证人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的作证能力。他感到惊讶的是，莱尼在她一生的这个时期变得爱说话，几乎可以说很健谈。对此，洛蒂·霍伊泽——现在变得更加沉思、更加平

静，不再那样滔滔不绝，有时几乎是在冥思苦想地看着笔者——作出说明：“显而易见，她爱上了艾哈德，她充满期望地爱着他，你可以想到其中的含义吧，有时我觉得她正想采取主动。嗯，我想告诉你或透露给你一件事：有一次，我看到莱尼如何疏通堵塞的抽水马桶，这姑娘真叫我吃惊。那是1940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在玛格蕾特的家里玩，喝啊跳啊——我丈夫威廉也在场——突然发现马桶堵了；这事真叫人恶心，实话对你说。有人把什么东西扔进里面——后来发现是一个相当大的烂苹果，把排水管堵住了，于是男人们都来排除这个不尴不尬的故障：先是海因里希，他用一根通条捅了半天，毫无结果。接着是艾哈德，他采用的方法一点也不笨：他从洗衣间拿来一根水管，把一头塞进令人作呕的污水中，满不在乎，然后从另一头拚命往管子里吹气，试图用物理方法产生压力冲掉堵塞物——我的丈夫威廉当过管道安装工，后来又先后当过技术员和绘图员，由于他非常怕脏，由于我和玛格蕾特恶心得难受——你知道是谁解决问题的？是莱尼。她干脆用手去掏，用的是右手，我还清楚记得她那好看白净的手臂一直到肘部以上都沾满黄色污物，她掏出苹果丢进垃圾桶——全部可怕的污水立即都流走了，莱尼去洗了手——当然洗得很仔细，而且洗了又洗，使劲用科隆香水搓手臂，还说了——现在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使我目瞪口呆：‘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现在我认为，关键时刻她是会挺身而出的，我的意思是说，她会一把抓住这个艾哈德，他肯定不会反对。再者我还想起：我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玛格蕾特的丈夫。”

由于洛蒂·霍伊泽的说法伺玛格蕾特不尽一致，所以还得

再找后者核实一下：她是否在自己家里曾几次同洛蒂所说的那些人跳舞？是否有可能在所谓“弗伦斯堡事件”的那次经历之前很久，就已同海因里希发生过更亲密的关系？玛格雷特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变得温柔愉快，带着一点忧郁的神色说：“后一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否定，这事我应当知道而且没有理由不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的丈夫介绍给了海因里希。施勒默很少在家，我从来没有弄清楚他究竟是个军火商还是个密探，反正他有的是钱。他要求我的不过是要我接到他的电报后‘为他准备好’。他岁数比我大，当时三十五岁上下，人并不坏，穿着讲究等等，可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俩很投机。海因里希嘛，他是个情场老手，但不一定是奸夫——当时他还不是这种人；我一直是个淫妇，但他还不是——由于他遇见我丈夫之后就缩手缩脚，因此当时没有得手。不过另外那件事——这只能是洛蒂告诉您的，我见过他不止两次，也和他跳过舞，在我家里和其他人跳过舞——这确有其事，不过我们见面次数总共肯定不超过四次。”

问到艾哈德和莱尼的情况时，玛格雷特笑了笑说：“这事我根本不想刨根问底，当时也不想刨根问底。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些细节肯定与我无关。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都不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接过吻，有没有至少亲亲热热地动手动脚，有没有上床睡过觉，我是说，就在我家里，或是在洛蒂家里，或是在格鲁伊滕家里——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真是珠联璧合，还有他写她并寄给她的那些诗，莱尼忍不住拿给别人看，在那几个月里，她第一次打破了沉默寡言的状况，之后又变得不爱开口了。究竟是艾哈德还是那个愚蠢的阿洛伊斯第一个，这难道就那么重要吗？那有什么区别？您还是算了吧。她爱他，脉

脉含情，如火如荼，如果说到那时还没有成事的话，那末到下一次休假时就会成功，这我可以打保票，您知道事情的结局，在丹麦一个墓地的墙下。一命呜呼了。您去问问莱尼吧！”

去问问莱尼吧！这事说起来容易。莱尼不让人提问，如果问她，她也拒不回答。老霍伊泽把艾哈德事件说成是“动人的、完完全全具有浪漫色彩的事件，虽然结局很悲惨。仅此而已”。拉黑尔已死，那个B.H.T 对艾哈德之事当然一无所知。由于莱尼经常去修道院，拉黑尔定然知道一些情况。普法伊弗一家是后来才闯入她的生活的，她肯定不会把自己认为“宝贵的”大事告诉他们。笔者叹息着去向马尔娅·范·多尔恩请教，原来“宝贵的”是指艾哈德事件。

笔者需要纠正自己根据她对格鲁伊滕夫人的言论而对她产生的一些过于仓促的看法。只要不涉及格鲁伊滕夫人及其丈夫，范·多尔恩表明，她是能提供完全精确乃至细致入微的情况的。笔者在她的乡下退休处找到了她，周围是一片紫菀、天竺葵和秋海棠，她一边给鸽子喂食，一边抚摸着她的狗———一条相当老的杂种长鬈毛狗——说：“嘿，您可别提莱尼一生中这件宝贵的事，这就像一个童话故事，那两个人，简直像童话故事。他们显然已相爱，彼此非常知己，我曾有好几次看见他们坐在起居室里，就是莱尼现在租给葡萄牙人住的那间屋子，从橱柜里取出最好的瓷器和茶叶，喝茶——莱尼从来不爱喝茶，但和他在一起就喝；他没有具体抱怨当兵的事，但显而易见流露出厌倦和反感，以致莱尼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安慰他，可以看出，单是这种接触就使他心绪不宁，或者也可以说使他心荡神移。他有的是机会，可以完完全全占有她，她已准备好，她

站着——既然要我说，请原谅我说句粗话——她已躺在那里等他，只是莱尼有点性急，是啊，是啊，性急——生理上也按捺不住；没有恼火，不，没有生他的气——如果他能有接连两三天呆在那里，那末，情况就会不同。我是个老姑娘，没有和男人在一起的直接体会，但我对男人的观察相当仔细，我来问您，一个男人回家休假，口袋里装着回程车票，心里老是惦记着列车时刻表，惦记着按时返回营房，或是惦念前线指挥部，那会是什么样子呀！我这个老姑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少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目光敏锐的女人有所体会，我告诉你吧：休假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活受罪。人人都知道，男人回来休假，夫妻俩要干什么——每次都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度过新婚之夜——而人们是不大懂得体谅别人的，旁敲侧击，飞短流长，反正我们村子是这样，城里也一样，比如洛蒂的丈夫威廉总是被弄得满脸通红，他可是个懂得体谅别人的人。您也许以为我不知道，我父亲在战时休假回家要干什么吗？——至于艾哈德嘛，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征服莱尼——他该怎么办？匆匆忙忙、冒冒失失地行事，他可不会干。他写的诗已经够明白了，几乎太露骨了。“你是大地，我未来的归宿”——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不，他就是没有时间，他没有时间。想想看，他和莱尼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也许只有二十小时——而且他又不是个冒失鬼。莱尼并不怪他，只是感到伤心，她可是已经作好准备啦。甚至她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我告诉您吧，这是她所希望的。我曾看见她怎样关心莱尼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那件桔黄色大开领连衣裙，配上合适的首饰：她给她戴上一对珊瑚耳环，看上去就像刚摘下来的樱桃，她还给了她时髦的轻便皮鞋和香水，把她打扮得像个新娘子；连她也知道并且

希望他们俩能成——但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时间——只要再有一天，莱尼就会成为他的妻子，而不是——咳！莱尼真倒霉。”

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去拜访施威格特太太；门房打电话去问，说“她有请”，不是很不乐意，尽管显然不太耐烦，喝着茶，却不向客人敬一杯，同意“再回答几个问题”；是的，她儿子曾引着这个“嗯啊”姑娘来见她；她强调介绍和引见这两个词的不同；也没有必要进行介绍，她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对她所受过的教育情况和经历也有所了解；当然，他们是“在谈情说爱”，但要说曾打算永结同心即所谓结婚，她再次认为决无可能，不会像她妹妹和这个姑娘的父亲永久结合那样。她主动提到，有一次这个姑娘也单独来看过她，并且——说句公道话——在喝茶时落落大方，唯一的话题是——不错，听起来奇怪，但确实如此——石楠；姑娘问她石楠何时何地开花——是不是现在开花？“那是三月末，您要知道，我觉得好像是在和一个低能儿谈话”；居然会问三月底——那是在1940年的战争时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① 的石楠是否开花；这姑娘对大西洋石楠和岩石楠的区别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们不同的土壤要求；最后，施威格特老太太说，万事大吉——显然她认为，儿子死于德国国防军行刑队之手要比他有可能与莱尼结婚好一点。

必须承认，施威格特老太太以极其简要的方式揭示了某些内幕；她澄清了那个暧昧费解的“芬兰人”之谜，或者至少有

①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是联邦德国北部的一个州。

助于弄清这个问题——考虑到莱尼在1940年3月底竟登门拜访艾哈德的母亲，和她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石楠，再者，据范·多尔恩说她已作好准备，洛蒂·霍伊泽认为她甚至打算采取主动，再一次回忆她于仲夏夜躺在石楠丛中仰望星空的那段经历，那末，甚至可以客观地得出结论：她曾打算去北方找艾哈德，与他在石楠丛中成就好事；我们根据植物生长和气象条件客观地断定，这种打算注定要受挫于潮湿和寒冷，但也无可否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某些石楠丛生的荒野，至少就笔者所知，三月间有时确实是温暖干燥的，即使时间很短。

经过反复追问，玛格蕾特终于透露，莱尼曾请教过她，如果想和一个男人相会，该怎么办才好。玛格蕾特提到她父母宽敞的、有时十分安静的七居室住宅，说这话时脸红的倒不是莱尼，而是玛格蕾特。莱尼听了摇摇头；后来又提到在这套住宅里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可以锁上门不让人进来，莱尼听了又摇摇头。最后，玛格蕾特变得不耐烦了，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她讲明，毕竟还有旅馆可租。莱尼提到她同年轻建筑师的那次失败的冒险（刚过去不久），说出了一种想法。玛格蕾特认为这是“莱尼迄今最秘密的心里话”，勉勉强强才告诉笔者。她的想法是“那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而是在室外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我才不希罕这一套呢。”莱尼承认，对于夫妻生活来说，床有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和艾哈德，她可不愿头一回就上床。她本想到弗伦斯堡去，后来又决定推迟到五月才去——因此，她与艾哈德的幽会由于战争风云而成了画饼。是否如此？无人确切知晓。

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这一年多，据所有亲属和非亲属证人反映，可以一言以蔽之：阴郁。莱尼的好心情不但已消失，而且又变得不爱讲话，甚至食欲也减退了。开汽车的兴致暂时消失了，乘飞机的乐趣——她曾同父亲和洛蒂·霍伊泽三次飞往柏林——也消失了。只是每周驾驶汽车一次，开上几公里去找拉黑尔修女，有时一坐就是半天；她和拉黑尔谈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B.H.T也不知道。从1941年5月起，拉黑尔再也不曾进过他的旧书店，而他——显然由于懒惰或不动脑筋——也没有想到去看她。一位年轻姑娘，十八岁半，只穿黑色衣服，她那外分泌的唯一产品就是一样复杂的东西：眼泪。1940年的夏、秋、冬三季，她出入修道院的大果园。数周后，又传来了洛蒂的丈夫威廉·霍伊泽的噩耗，因此，哀悼者中间又增加了老霍伊泽、他的妻子(当时还健在)、洛蒂及其五岁幼子维尔纳；当时还在娘肚子里的小儿子库特是否也哭过，那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无能为力而且也认为自己不适宜对眼泪进行探索，因此最好翻一翻手头现有的参考书，查阅眼泪产生的原因及其化学和物理成分。一家有争议的出版公司出的1966年版七卷本百科词典对眼泪作了如下的解释：

> 眼泪，拉丁语为 lacrimae，泪腺分泌的液体，能润泽眼结膜囊，防止眼球干燥，不断清洗眼球表面的微量异物。它(大概指液体——笔者注)经眼眶内下角的泪道流入鼻腔。受刺激(发炎、异物)或情绪激动时，泪液的分泌量增多(哭)

在同一本参考书中可以看到“哭”的释义：

哭，与---->笑均为危象即悲伤、感动、愤怒或快乐的表现形式，心理学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讲是一种精神解放企图。伴有分泌眼泪、啜泣或剧烈震动，与植物性神经系统和脑干有关。分强制性哭和不能控制的啼泣痉挛两种，后者发生在心情抑郁、躁狂抑郁症、多发性硬化症时。

这一小段简明资料也许会使可能感兴趣的人哑然失笑，他们或许也想看到这种反射（“笑”）的解释，因此，这里也将有关条目抄录于后，以免除购买百科词典之烦，必要时也免除查阅之劳。

笑，人类学上（所有着重点均非笔者所加，下同）指危机情况下精神状况的身体反应的表达方式（——→哭）。哲学上分智者的笑、如来佛的微笑、蒙娜丽莎充满对存在的自信的微笑。心理学上表示愉快、欢乐、喜悦的面部表情，分为天真的笑、自命不凡的笑、冷笑、感情冲动的笑、开怀大笑、苦笑、狞笑、媚笑等，反映不同的心境和性格。病理学上有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引起的不由自主的笑，即阵笑、冷笑（伴有脸部变形）和歇斯底里的笑（作为痉挛性狂笑）。社会上，笑有传染性（通过想象产生的观念运动）。

由于我们这里不得不进入或多或少是感情冲动的、不可避免是悲剧性的阶段，因此，最好是把概念条目安排得更完整并指出：这本词典没有收“幸福”这一词条，在“幸臣”和“幸田露伴”①之间只有“幸福升起”这个矿工用语；词典中倒有

① 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小说家。

"至福"，其释义为：

完美持久的个人完成的典范，人人都出于本性追求实现这种境界；到何处去寻求这种最终完成，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决定他的整个生活内容；按照基督教教义，真正的至福唯有在永恒的——>真福中才能实现。

真福，毫无烦恼和罪过的、永恒的、完美的幸福完成状态，一切宗教均以真福为世界历史的理想目标。天主教教义指的首先是上帝永恒自我存在的真福，其次是世人(和天使)被恩准与上帝共享其赐福于人的生活，这种真福始于世俗生活中与基督亲近(虔诚)，终于永恒的真福(包括——>复活和末世论对整个现实的改造)。新教认为在于与上帝的意旨完全一致、人类的真正命运、人类的拯救和超度。

由于对T、W、L和G① 已作了详尽的解释，这些解释作为资料随时可供查阅，因此本文无需再描写种种心境，只是偶尔指出词典中这方面的定义，并且采用相应的缩写就可以了。T、L和W仅仅在危机情况下出现，因此这里也许应当向所有在一生中没有遇到过危机、不受危机影响或者能抵抗危机的人，向从来不曾流过一滴T，与W无缘，从来没有为什么人哭过以及按照规定忍住任何L的人表示祝贺。结膜囊从未发挥作用，历尽艰险从不掉泪，从来不曾动用过泪管的人是有福的。能牢牢控制自己的脑干，对存在始终充满自信，除发出智慧之笑外从不忍俊不禁的人也是有福的！对自己的存在充满自信的如来佛和

① T，眼泪；W，哭；L，笑；G，幸福。这里均以德文的词首字母作为缩写。

蒙娜丽莎万岁！

由于痛苦必然会发生，这里也得提到，不过无需摘引词典的整个词条，只引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可以了：

> 感受S① 的程度因人而异，尤其是因为继肉体的S之后还会出现精神上的S，二者一起产生主观的S。

由于莱尼和所有当事人不仅有S，还有烦恼，因此这里再迅速摘引词典中有关烦恼的主要释义，以充实我们的资料：

> 人们的烦恼程度是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受到触动的程度和天生的敏感程度成正比的。

笑和烦恼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今后就以缩略语L1(笑)和L2(烦恼)来说明人们的心境。

有一点确凿无疑：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家的所有有关人员，包括与两家关系同样密切的马尔娅·范·多尔恩在内，他们生活中一些十分美好的事物一定受到了触动。莱尼的情况令人担忧：她日见消瘦，不了解内情的人称她为爱哭的姑娘；她那一头美丽的头发虽未脱落，却逐渐失去光泽，连马尔娅的高超的烹汤手艺——尽管她总是含着T施展这种手艺，天天给莱尼变换花样，烹煮名目繁多的汤菜，并买来刚出炉的新鲜小面包——也未能消除莱尼的食欲不振。从莱尼父亲手下的一名职员当年偷拍的、后来由马尔娅收藏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莱尼显得憔悴，由于S和L2而脸色苍白，W和T使她变得虚弱不堪，毫无L1的意思。洛蒂·霍伊泽否认莱尼是个失去丈夫的妻子，难道这不完全属实？莫非莱尼在向洛蒂隐瞒的更深一层上确实

① S为德语“痛苦”的词首字母。

是寡妇，而不仅仅是精神恋爱？不管怎样，莱尼主观上的S一定很厉害。其他人也不稍好一些。她父亲这时不再只是冥思苦索，他变得忧郁起来，（据所有接近他的人介绍）他“变得精神恍惚”。由于老霍伊泽同样意志消沉，洛蒂（据她自己介绍）也“早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格鲁伊滕太太反正整天呆在卧室里，“有时喝几口汤，吃半片烤面包”（马·范·多尔恩语），昏昏沉沉地等待死神光临，而这个时期公司的业务不仅继续欣欣向荣，而且还在扩展，因此，老霍伊泽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公司根底很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雇用的审计师、设计师和建筑师都忠心耿耿，因此业务得以照常开展，至少在胡贝特完全不工作（我也一样）的那一年是如此。不过，主要是有公司的元老们充当顶梁柱——他们此时已有好几百人，公司由他们掌管！”

如果偏要由洛蒂·霍伊泽来为老格鲁伊滕一生中没有澄清的一段时间提供材料，那就未免太尴尬了。因此只好割爱，放弃她那出色的不加渲染的简练的陈述。

用个比较时髦的字眼说，她在随后这一年的时间里（得从1940年4月算起，大概到1941年6月止）成了他的“长期伴侣”。可能他也是她的长期伴侣，因为他们两人都需要寻找安慰，不过到头来显然都没有找到安慰。

他们周游各地：一个是怀孕的寡妇，一个是郁郁寡欢的男人。他不看有关儿子和外甥的不幸事件的档案材料，只是叫洛蒂和霍夫高向他作简要介绍；他有时自言自语咕哝几声“去他妈的德国”，名义上是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从一家旅馆跑到另一家旅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过一眼图纸、

帐册、档案或工地。他坐火车或汽车，有时也乘飞机，对五岁的维尔纳·霍伊泽宠得要命。今天，维尔纳已经三十五岁了，住一套漂亮的私有房，陈设入时，崇拜沃霍尔①，对自己没有及时购买他的画“后悔得要死”；他是个流行艺术迷和色情迷，又是一家赛马赌券经营所的老板；当年他们在斯赫费宁根②、梅尔莱班、布洛涅③海滩上长时间散步的情景，他至今还记忆犹新，还记得“格鲁伊滕爷爷”同别人握手，记得洛蒂哭泣的情景，记得建筑工地、T形钢梁、穿着“奇装异服”的工人（很可能是囚犯——笔者）。不再让洛蒂离开自己身边的格鲁伊滕，有时在自己家里待上几个星期，坐在妻子的床边，换下莱尼，拚命想做莱尼也想做的事情：给妻子读一些爱尔兰作品，童话、传说、诗歌——但也像莱尼一样枉费心机；格鲁伊滕太太厌烦地摇摇头，莞尔而笑。老霍伊泽看来已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S，到九月已不再流T，又“上班”了，时不时听到这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公司还没有倒闭么？”没有，甚至还在继续发展：元老们在顶着，他们抱成一团。

这个格鲁伊滕年方四十一岁就已未老先衰了吗？周围其他的人并未因为自己的子弟大量死亡而意志消沉，难道他对自己儿子的死就耿耿于怀，想不开吗？他是否开始读书了？是的。读一本书。他翻出一本1913年出版的祈祷书——这是他初领圣体时得到的礼物——并且“从宗教中寻求安慰”（“他从来就不

① 安迪·沃霍尔(1927～)，美国美术家，流行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

② 斯赫费宁根，荷兰海牙的海滨浴场。

③ 梅尔莱班和布洛涅都是法国北部的海滨浴场。

信教”——老霍伊泽语)。阅读此书的唯一结果是，他把钱送给别人，据霍伊泽及其儿媳洛蒂一致证实，是“大把大把地”送，范·多尔恩也证实这一点，不过她没有说“大把大把地”，而是说“成包地”送(“他也成包地送给我，当时我赎回了我父母的小田庄和一些地。”)——他上教堂,但最多“在里面待一两分钟”(洛蒂语)。他“看上去像七十岁了，而他的妻子刚刚三十九岁，看上去像有六十岁”(范·多尔恩语)。他吻妻子，有时吻莱尼，从不吻洛蒂。

是否未老先衰呢？八十高龄的温德伦大夫——他当年的家庭医生——在自己还保留着从前诊所的一些白橱白椅的老式住宅里，正热中于揭露眼下时兴的对药物的迷信，早已不再相信医生保密的神话。他说，格鲁伊滕“当时很健康，肝、心、肾、血、尿全都正常——而且，这家伙不怎么抽烟，也许每天抽一支雪茄，也许一星期才喝一瓶葡萄酒。他有病吗？不，绝不可能——听我说，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说他有时看上去像七十岁，那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当然罗，他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但器官未受影响。他记得的《圣经》中的唯一一句话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使情绪很受影响。”

莱尼是否仍然在钻研自己的消化器官排泄物？大概不钻研了。她更加频繁地去找拉黑尔，甚至谈论这些事。“真奇怪，”玛格蕾特证实说，“我什么也不信，有一天就同她一起去看看是否属实。肠卜僧已不担任任何职务，连‘厕所管理员’也不当了，并且只有不举行正式合唱和礼拜仪式时才能进教堂。她原来住的那个小房间也不给她用了，搬到过去堆放扫帚、地板

刷、清洁剂和抹布的一个小阁楼里去住。您知道她向我们两人要什么吗？香烟！我那时不抽烟，可莱尼给了她几支。她马上就点了一支烟大口地抽起来，然后把烟头掐掉——我见过不少人掐烟头，可她简直绝了！分毫不差，熟练准确，就像坐牢的犯人或住院的病人躲在厕所里一样，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将点燃的烟头剪下，在掉下的烟头中拨来拨去，看看还有没有一根烟丝——然后统统装进一只空火柴盒里。同时她嘴里一直喃喃有词：'主降临了，主降临了，他来了。'不是精神错乱，也不是讽刺，而是一本正经说的——她并没有发疯，只是有点邋遢，好像舍不得用肥皂似的。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过，实话实说，我怕——我的神经本来已经快垮了，因为小伙子死了，他表兄也死了；每当施勒默不在时，我就到军人酒吧去鬼混，随便找一个伴；我完了，那时才十九岁——那个修女的事我简直看不下去，就像一只被判处死刑的老鼠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真是这样；她变得更干瘪了，大口咬着莱尼带给她的面包，一再对我说：'玛格蕾特，别这样，别这样。'我问道：'你说什么呀？''你干的那些事情。'我已鼓不起勇气了，我受不了，神经快垮了——莱尼仍一直去看她，有数年之久。她说的话很可笑，比如：'他们干吗不干脆弄死我，倒把我藏起来？'她对莱尼总是说：'天哪，你应当活，你应当活，听见了吗？'——莱尼哭了。莱尼很喜欢她。嘿，后来才知道（"知道什么？"），她是犹太人，修道会根本就没有把她申报，干脆装作她在调动中失踪了，把她藏起来，却又不让她吃饱。他们说，因为她没有食品配给证，其实他们有果园，还养肥猪。不，我真受不了。她像一只瘦小干瘪的老鼠蹲在那里——而莱尼之所以被放进去看她，只是因为她态度十分强硬，而且因为他们知道她非常幼稚。

她以为那个修女只是在受处分。直到最后，莱尼也没有明白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她明白并且知道有多么危险，她也会说：‘是啊，那又怎么样？’并且会继续去，这我可以肯定。莱尼有胆量——今天仍然如此。真可怕，那修女说：‘主降临了，主降临了’，眼睛看着门口，好像主正在进门，这可把我吓坏了，但莱尼没有，她马上朝门口看去，充满期望，好像如果主进来，她也不会感到奇怪似的。不过这已是1941年初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在野战医院工作，后来她注视着我说：‘不仅仅你干的事情不好——你服用的东西更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用的？’我说：‘两周前。’她说：‘那还来得及。’我说：‘不，我再也戒不掉了。’当然，是吗啡——您知不知道？至少已猜到了吧？”

唯一看来从不需要慰藉的人是施威格特太太。这段时间，她经常出入格鲁伊滕的家，看望卧床不起的妹妹，试图使她明白：“命运不会使人消沉，只会使人坚强起来”；她的丈夫格鲁伊滕“如此萎靡不振”，说明他是孬种。她竟然教训久病不起的妹妹：“想想自豪的芬尼亚勇士吧。”她谈到朗热马尔克，问莱尼为何显得闷闷不乐，听到范·多尔恩说——她是所有这些言论的提供者——莱尼恐怕是在哀悼她的儿子艾哈德，她感到不快，十分不快。这个“石楠姑娘”(至少是“嗯啊姑娘”的另一种说法——笔者)“居然”胆敢哀悼她的儿子，而她自己却不为儿子伤心，这事真叫她生气。听了这个“令人生气的消息”，她停止探视，离开屋子，临走时说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石楠！”

不用说，这一年也放映电影，莱尼有时去电影院。她看了《海上战友》、《通宵舞会》，又看了一遍《俾斯麦》。

笔者怀疑，这些影片中是否会有一部给了她什么安慰，哪怕只是使她分心也好。

当年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勇敢娇小的军人之妻》、《我们向英国进军》，是否曾使她感到安慰？这始终搞不清楚。

有时格鲁伊滕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女儿——躺在窗户被遮蔽的房间里，有空袭警报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整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只是盯着天花板出神”（范·多尔恩语）。

这期间，霍伊泽全家老小——奥托、他的妻子、洛蒂、洛蒂之子维尔纳——都搬到格鲁伊滕家去住。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可以料到，甚至可以准确地预计，却仍被视为奇迹，甚至有助于治好病人：1940年12月21日夜里，在一次空袭中，洛蒂的孩子呱呱坠地了；是个男孩，重六磅半，由于他出世略早于预产期，产婆没有准备，正在“别处忙活”(后来知道，在接生一个女孩)，而精明强干的洛蒂又出人意外地显得软弱无能，就像范·多尔恩那样，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格鲁伊滕太太下床来，以精确、果断而又亲切的语气向莱尼布置工作；在洛蒂临产时烧好热水，将剪刀消毒，把尿布和被子预先加热，磨好咖啡，准备好法国白兰地；那是一个冰冷漆黑的夜晚，是一年中最黑的一夜，瘦弱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范·多尔恩语)的格鲁伊滕太太大显身手，她穿着她那件天蓝色浴衣，反复检查放在五斗柜上的必要器械，用科隆香水轻擦洛蒂前额，按住她的双手，毫不为难地掰开她的两腿，扶着她采取所要求的半蹲姿势，毫不畏惧地给婴儿接生，用醋水擦洗产妇，剪断脐带，让孩子“暖暖和和”地躺到莱尼铺上褥子的

洗衣筐里。她一点也没有因为炸弹在不远处落下而受影响；一个名叫霍斯特的民间防空员再三要求熄灯，叫大家进地下室，被她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这件事的目击者(洛蒂、马尔娅·范·多尔恩、老霍伊泽)都不约而同地说，她当时的神气“真像个宪兵”哩。

很可惜她没有成为医生。不管怎么说，她“清洗了产妇的下身”(老霍伊泽引用格鲁伊滕太太的话)，检查了胞衣排出，同莱尼和洛蒂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出人意料的是，精力旺盛的范·多尔恩却是个“银样镴枪头”(洛蒂语)，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老是呆在厨房里，用咖啡款待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位男士，嘴上老是说“我们”(“我们会干的，我们会干好的，我们不会气馁的，嗯，我们怎么怎么样——带着一点对格鲁伊滕太太的批评：“但愿她能顶住，天啊，就怕她受不了哩。”)，她远离现场——洛蒂的卧室，等到最紧急的时刻过去之后才露面。当格鲁伊滕太太东张西望，似乎不相信自己能干这种事时，她领着小维尔纳走进卧室，小声对他说：“我们来看看小弟弟好吗？”好像有人不相信似的，老格鲁伊滕对老霍伊泽说：“我早就知道并且早就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几天后，当洛蒂硬要格鲁伊滕太太做孩子的教母，却又不肯让孩子(她想给他取名库特：“这是威廉的意思，男孩叫这个名字，女孩就叫海伦妮。”)受洗时，气氛有些紧张。她对教会出言不逊，“特别是对那些人”(此话始终未能完全搞清楚，十有八九指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其他教会她并不熟悉——笔者)。格鲁伊滕太太对此并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非常悲伤”，同意当孩子的教母，并且十分重视送一份正经八百的、看得见的、经久耐用的见面礼。她把父母死后她继承的位于市

郊的一块空地赠给孩子，一切照章办理，办好公证手续，而且老格鲁伊滕还许愿说："我给他在那儿盖一幢房子。"他肯定会做到的，可是后来却未能如愿。

忧愁悲伤的阶段看来已经过去。迄今消极冷淡、忧郁悲伤的老格鲁伊滕已变得活跃起来。1941年2月16日清晨，他的办公楼中了两枚炸弹。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得意洋洋，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老霍伊泽语）。由于投下的不是燃烧弹，爆炸时未引起火灾，"把烂摊子烧个精光"的希望未能实现。经过一周清理——莱尼不太带劲地参加了这一工作——发现档案材料几乎完好无损，又过了四星期，办公楼就完全修复了。

格鲁伊滕再也没有进过办公楼，出乎周围所有人的意料，他一反常态，"变得爱交际了——即使他年轻时也从来不曾这样过"（洛蒂·霍伊泽语）。洛蒂·霍伊泽还说："他变得十分和蔼，真叫人想不到。他每天都一定要大家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到他家去喝咖啡，莱尼一定在场，我的婆婆、孩子们，全都参加。五点以后，他和我公公单独留下来，让他汇报'铺子'的详细情况，帐面情况、来往帐目、计划、建筑工地——他要求做资金平衡表，并找律师以及官方法律专家长谈，打听如何将只是以他一个人名义经营的营业所改成一家公司。提出了一份'元老名单'。他够机灵的，明白自己四十二岁——并且身体还非常健康——仍有服兵役的义务，想给自己弄一个经理级顾问职位。根据他的客户——都是达官贵人，其中也有几位将军，看来全都为他着想——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头衔改为'规划处长'。我成了人事处长，我公公成了财务处长。莱尼刚满十八岁半，他没法让她当处长，她不愿意。他面面俱到，

唯独忘了一件事：在经济上为莱尼提供保障。后来出了事情以后，我们当然全都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不过这就苦了他的妻子和莱尼。嗯，他很和蔼——还有一件事更出人意外：他谈起自己的儿子。将近有一年之久，他不曾提到自己的儿子，也不让别人提，现在他提起儿子来了；他并不傻，没有讲什么命中注定之类的废话，而是说，海因里希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去死，他认为是好事。当时我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事过一年多以后再谈丹麦那桩公案我已难于启齿，觉得有点傻——或者说，如果这两个人不是为此而死，我会觉得他们傻。今天我认为，就是'为此而死'也谈不上什么好不好、妙不妙或傻不傻；我实在感到难以启齿，再多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后来，格鲁伊滕终于完成了营业所的'改组'，六月举行了开业十二周年庆祝会，他打算在会上宣布这一切。那天是十五日，正好在两次空袭之间——好像他已料到似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料到。一无所知。”

莱尼又开始练习弹钢琴了，专心致志，“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十分固执”（老霍伊泽语），而上文已提到过的那位席尔滕施坦站在窗前沉思时，（均系本人语）“并非完全不感兴趣，但多少感到乏味地”听莱尼弹奏，“突然侧耳细听起来，之后，在六月的一个黄昏听到了我所听过的最惊人的演奏。突然，琴声铮铮，凛若冰霜，我过去闻所未闻。请允许我这个不讲情面地狠狠批评过不少人的老头子说句可能会使您感到意外的话：我听到的舒伯特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好像是第一次听，弹琴的人——我说不上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会弹，而且心领神会——非专业人员能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那不是人在弹钢琴，

那——那是音乐本身在显示其魅力，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站在窗前等待，经常在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不久以后，我就应征入伍了，离家多年——回来时房子已被人占用，那是1952年——是啊，我离家十一载，被俘——在俄国人那里，我胡乱弹奏，水平远远不如从前——过得还不错——舞曲、流行歌曲——下里巴人。一个'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每天大约弹奏六次《莉莉·玛莲》①，您想这是什么滋味？——回国四年以后，想必是1956年吧，我终于又得到了我的故居——我就是喜欢院子里的这些树木和高高的天花板——过了十五年，我又听到和听出了什么——a小调奏鸣曲中板和G大调奏鸣曲小快板，那么清脆，那么严谨，那么深沉，我还从未听到过，1941年我突然开始注意的时候也没有听到过。那真是世界水平。"

① 《莉莉·玛莲》是德国的一首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一直流行的歌曲。据说，当时只要听到这首歌，交战双方都会停战三分钟。

第 四 章

现在紧接着发生的事，可以加上这样的标题：莱尼干蠢事，莱尼行为不检——或是莱尼究竟出了什么事？

1941年6月中旬举行的公司庆祝会，格鲁伊滕也邀请了“所有正在国内休假的职工”参加。谁也没有料到，“再说从请帖上也看不出来”（老霍伊泽语），“谁也没想到，从前的职工也有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邀请，而且从前的职工这个说法用在此人身上也有点夸张，1936年他在我们这里见习了六个星期，不，他不愿当学徒，觉得这种称呼太‘低级’，要求马上就当‘见习生’，可又不肯学习，只想教我们怎样造房子——我们把他撵走了，不久他就参军去了。这个小伙子人倒不坏，就是喜欢胡思乱想，不像艾哈德那样善于动脑筋——想入非非，妄自尊大，完全不合我们的胃口；他提出不用水泥，‘重新发现’石头的‘威力’——好吧，也许这有些道理，但我们根本用不上他，尤其是因为他既不愿而且也不会拿石块。活见鬼，我在建筑业干了将近六十年，当时我也干了快四十年，对‘石头的威力’略知一二；我见过几百个泥瓦工和泥瓦工学徒怎样同石头打交道——您应该看看一个真正的泥瓦工怎样摆弄石头！好了——可那个家伙既不会摆弄石头，对石头又没有什么感

情——他是个空谈家。他倒没有恶意，不——只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甚至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这次庆祝会还有一个意外的不幸情况：莱尼死也不肯参加。她对跳舞已不感兴趣，她“这时是个非常端庄娴静的少女，同母亲相处得很融洽，跟她学法语，还学点英语，对钢琴入了迷”（范·多尔恩语）。此外，她对“在当地工作的公司职工了如指掌，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能重新引起她的舞兴”（洛蒂·霍伊泽语）。后来莱尼只是由于父母的请求，为尽义务而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这里不得不对那位被霍伊泽说得一无是处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及其家族和背景略谈几句，尽管他只扮演一个配角。阿洛伊斯的父亲威廉·普法伊弗是老格鲁伊滕的“同学和战友”，他们是同村人，在格鲁伊滕婚前一直保持不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威廉·普法伊弗开始让格鲁伊滕“讨厌得再也无法忍受”（霍伊泽语），这种关系就终止了。他们两人曾一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战役（已查明为利斯河① 战役），从前线回来后，当时二十岁的普法伊弗“干脆开始”（霍伊泽语，下同）“拐着右腿走路，似乎成了个瘸子。好吧，有人想骗取一笔补助金，那我并不反对，可这个人也太过分了，老说他的‘要害’被一块‘大头针头大的榴弹碎片’击中了；这家伙真有毅力，有三年之久他一拐一拐地找大夫，跑救济处，最后终于拿到了补助金，还被送进师范学院学习。好了，好了。谁也不想冤枉一个人，说不定他那时——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确实是个瘸子，不

① 利斯河，即莱厄河，为斯海尔德河支流，在比利时西部。

过从来也没有人找到过那块弹片——这不一定在于弹片，也不是否定弹片的存在，好了——他领到了补助金，当上了教师，等等。可是有一点很奇怪：普法伊弗瘸着腿一出现，胡贝特就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事情越来越严重，他有时甚至谈到要截肢，后来他的腿确实变僵硬了——可是，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看见或证实过这块‘大头钉头大的弹片’，即使是最精密的X光荧屏也没有照出，从来没有。由于从未有人见过它，于是有一天胡贝特对普法伊弗说：‘既然至今无人见过那块弹片，你怎么会知道它有大头钉头那么大呢？’我不能不说，这个论点真叫人大吃一惊——从此以后，普法伊弗就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但他后来形成了一种大头针头世界观，故乡吕塞米希小学的孩子们三番五次听到关于这块弹片和‘利斯河’的故事，这样过了十年、二十年，胡贝特又说了很中肯的话——我们经常听到村里人谈起他，我们是同村人，村里有许多亲戚——胡贝特说：‘即使他腿上真有一块弹片，那也是我所知道的最虚假的腿——现在他拐着这条腿跑来跑去，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战役，当时我也在场——我们是第三或第四梯队，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当然罗，榴弹之类是有的，不过——是啊，我们知道战争是毫无道理的，可是也不像他所形容的那样严重，我们一共才打了一天半仗——总不能靠这个吃一辈子吧。’好啦（霍伊泽叹了一口气），当时威廉的儿子阿洛伊斯在舞会上出现了。”

为了收集一些有关阿洛伊斯的具体材料，笔者不得不到吕塞米希村去走访几个人。访问了两位年纪与阿洛伊斯差不多的客栈老板和他们的妻子，他们都还记得他；走访教士住宅一无

所获：神父只是查阅教区记事录后才知道，普法伊弗家"自1756年起住在吕塞米希"，不过威廉·普法伊弗最后——虽然一直拖到1940年——还是"迁走了，主要还不是因为他那令人难堪的政治活动，而是因为我们对他已经受不了啦"(吕塞米希客栈老板齐默曼语，此人五十四岁，为人诚实可信)，因而普法伊弗家的踪迹在该村已消失殆尽；仅有的几位证人范·多尔恩、霍伊泽全家、莱尼(玛格蕾特对普法伊弗家一无所知)，可惜全都怀有某种成见；各怀偏见的两派在事实上毫无矛盾，只是对事实的解释大相径庭。反阿洛伊斯派的所有证人都说，阿洛伊斯——在这一点上他的经历与莱尼相似——十四岁时不得不放弃上高中的念头，普法伊弗家声称他是"某种阴谋诡计的受害者"。毫无争议的是，他是个"美男子"，尽管人们在提到这一特征时使用种种嘲讽的口吻。莱尼没有在墙上挂他的照片，普法伊弗家大约有十张；必须指出，如果说美男子的称号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对阿洛伊斯来说倒是名副其实的。他有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和一头几乎是乌黑的深色头发；受最庸俗的种族理论影响，人们对阿洛伊斯的乌黑头发大发议论；他的父母、所有的祖先(下述材料全系阿洛伊斯的父母提供)，就人们所知道的或流传下来的头发颜色而言，都是金发。由于普法伊弗和托尔策姆(普法伊弗太太的娘家)两家所有有案可查的祖先都出生在吕塞米希—韦尔彭—托尔策姆这块三角地带(这一地区方圆二十七公里)，因此用不着长途跋涉。阿洛伊斯两个夭折的姐妹贝塔和克特——像他还活着的弟弟海因里希一样——头发若不是金黄色，也都是淡黄色的。关于普法伊弗一家人黑发金发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议论，一定是当时人们早餐桌上的头号话题；人们甚至愿意采取怀疑祖宗的讨厌办法来弄清阿洛伊斯的头发；在

上述三角地带(由于这个地方不大，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翻遍了教区记事录和户籍簿(户籍簿存放在韦尔彭县城)，想要从母系祖先中找出有可能——通过乱搞男女关系——带来黑发的人；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在谈到自己家时毫无讽刺意味地说：“记得1936年有人终于在托尔策姆教区记事录上查到了一名妇女，我哥哥那奇怪的黑头发有可能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她叫玛丽亚，有名无姓，不过据记载，她的父母是‘流浪者’。”

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同妻子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住在教会修建的职工新村一幢独门独院的楼房里。他有两个儿子威廉和卡尔，即将购买一辆小型汽车。他有一条小腿已截肢，态度并非不亲切，只是有点烦躁，据他说是因为存在“购物的烦恼”。

今天在这个三角地带，黑发绝非凤毛麟角，据笔者亲眼目睹，在能够目测到的情况下，大体上是黑发占优势。但该地区流传着一种所谓“有名的普法伊弗美发”的家族神话，合族俱引以为荣；凡是长着“普法伊弗美发”的女人，都被认为标致、有福，无论怎么说都是美丽的。按照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介绍，在托尔策姆—韦尔彭—吕塞米希三角地带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同格鲁伊滕家及其祖先的横向联系(不是同巴尔克尔家，他们在几代人之前已迁居城市)，因此笔者认为，莱尼通过某种横向联系获得这种普法伊弗美发并非没有可能。现在平心而论：阿洛伊斯的头发客观上——可以说从理发师的观点来看——非常漂亮：浓密、乌黑、自然鬈曲。他的鬈发又引起种种猜测，因为普法伊弗家的头发——像莱尼那样！——是光滑平整的，等等，等等。

可以认为已客观地证实，这个阿洛伊斯从出世的第一天起

就受到过多的关照。普家迅速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于是他就被视为“我们的吉普赛人”，不过只是到1933年为止，从那以后他就被视为“标准的西部种”①；笔者认为，阿洛伊斯绝非凯尔特人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容易作出这种错误的解释，因为凯尔特人常有浅色眼睛和深色头发。阿洛伊斯完全缺乏——下面将会看到——凯尔特人的敏感性和想象力；如果想在种族上给他分类，他只算得上是个不标准的日耳曼人。还在他能比较清楚地咬字吐音之前，他就被到处抱给别人看，被举得高高的，有好几个月，也许有好几年被夸为“可爱”，人们为他想出异想天开的前途，尤其是在艺术方面，他被寄予厚望：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写作只是后来才被列入家庭的设想范围——笔者）。不论他干什么，他的功劳都要被夸大几分。由于他当然也是一个“可爱的祭坛侍者”（他的名字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属于哪个教派），因此他的伯母婶娘、表姐妹等都把他看成是“画家修道士”，也许甚至是“会画画的修道院院长”。有据可查（证人是吕塞米希客店老板科默尔的现年六十二岁的妻子和她的婆婆、现年八十一岁的科默尔老奶奶，后者记忆力之好受到全村称赞），阿洛伊斯在吕塞米希充当祭坛侍者期间，即1926年至1933年那几年，上教堂的人数不断增加。“您信吗？我们有时在平日和星期日也去吉利克（所谓吉利克究竟是什么宗教活动，至今仍未弄清——笔者），能见到这个可爱的孩子，真是太美啦”（科默尔老奶奶语）。

对普法伊弗先生和他妻子玛丽安妮（娘家姓托尔策姆）进行了多次采访。只要说普氏夫妇的家境比他们的儿子海因里希

① 欧洲一人种，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一带。

"高一档"就够了：一幢略为宽敞的行列式住房，小汽车也已具备。老普法伊弗现已退休，仍然瘸着腿走路。夫妇俩很乐意提供情况，因此毫不费劲地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阿洛伊斯的一些情况。阿洛伊斯的作品全都像圣人遗物似的保存在一个玻璃柜里：现存的十四幅画中，大约有两三幅真不赖，都是吕塞米希村周围地区的着色铅笔画。这个地区地势平坦——甚至在平原上也难免有高低不平的差别，由于溪流而造成的凹地，水平差为六至八米的已难得见到——看来曾再三促使阿洛伊斯提笔作画；由于这里天地总是连成一片、沃野千里，阿洛伊斯曾——当然无法断定是有意还是无意——探索荷兰绘画艺术表现明暗对比的诀窍，有两三幅画把这种手法掌握得惟妙惟肖：他独出心裁，用托尔策姆一家糖厂作为光源，把它移至吕塞米希附近，并把太阳隐藏在糖厂冒出的白色烟雾里。普法伊弗声称，这样的画有好几百幅。这一点无法核实，只好存疑。有几个阿洛伊斯制作的小手工艺品：一只仙人掌的底座、一只首饰盒、一个为他父亲做的烟斗架和一盏特大的灯（浮雕细工），说得委婉一些，给人留下一种难受的感觉。此外，还有大约六张引人注目的体育奖状：田径、游泳——还有一张吕塞米希足球俱乐部的奖状。阿洛伊斯在韦尔彭曾学过泥瓦工手艺，六个星期后就中断了，普法伊弗太太称之为"实习"，"这次实习没有成功，是因为师傅不理解他的创造性，态度粗鲁，令人不堪忍受"。简而言之：显而易见，人们和阿洛伊斯自己都认为他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他的人。

普家玻璃柜里还陈列着几十首阿洛伊斯写的诗，笔者宁可略而不提；其中没有一首、没有一行能勉强赶上已知的艾哈德·施威格特的诗的表现力。实习中断后，"阿洛伊斯劲头十足地

投身”（老普法伊弗语）一种很可能给他那本来就脆弱的性格造成灾难的职业：他想当演员。他在业余舞台上的几次成功的演出（他在《佛兰德的狮子》①中扮演主角），在普家玻璃柜里留下了三张剪报，他在这几篇评论中“备受赞赏”。不过普氏夫妇至今还不曾发觉，给三家地方报纸写文章、署名不同的评论家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评论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一次用“完美的”代替“十足的”，另一次用“无可争议的”）。三个笔名是B.H.B、B.B.H 和H.B.B。不用说，演戏也由于周围的人们不理解他的“直觉”，同时也由于人们嫉妒他的“漂亮”（普法伊弗太太语），而失败了。

普家最引以为荣的遗物是几本铅印散文集，镶金边已有点褪色，被陈列在玻璃柜最上面的一格。普法伊弗太太把它们指给笔者看时说：“您瞧，是铅印的，这是真正的才能，这能挣大钱啊。”（这种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同露骨的实利主义的混合是普氏夫妇所特有的——笔者）。

I 开　拔

开战以来已有八个月，而我们还没有打过一枪。漫长的严冬被用于进行艰苦的训练。现在春回大地，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都在等待领袖的命令。

在波兰打了一仗，而我们却只能守卫在莱茵河畔；不让我们参加就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有人已经在说，我们将只会在国内度过整个战争。

① 根据比利时作家孔西延斯（1812～1883）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戏剧，描写14世纪初布吕赫市民反抗法国骑士的斗争。

我们驻扎在艾费尔山的一个小村庄里。5月9日16时30分传来了向西进军的命令。紧急待命！传令兵跑来跑去，套马，到处都在整装待发，向驻地居民道谢告别，小姑娘们哭红了眼睛——德国迎着落日向西进军，法国，你要当心！

全营在傍晚开拔。我们的前面是部队，紧随我们之后的是别的部队；在公路左侧，摩托化部队从我们身边驶过，没完没了。我们彻夜行军。

天刚破晓，空气在德国飞机的轰鸣声中颤动。它们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给西邻送去早晨的问候。摩托化部队仍未过完。——“拂晓德军越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边界，正继续向西推进。”——一个人从我们身边驶过时向行军的队伍报告了这条号外。顿时欢声雷动，我们向不断从我们上空飞过去的英勇的空军战友挥手致意。

Ⅱ 1940年的马斯河

马斯河不是河。它是一条火龙。两岸的制高点是喷吐烈焰的山。

在这个理想的防御地带，每一个天然屏障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大自然的不足之处由技术来弥补。悬岩前、岩石缝里、山崖下，到处都是机枪阵地。在岩石中挖凿出很小的洞穴，用混凝土封顶加固，顶上高耸着五十米厚的千年巨石。

Ⅲ 1940年的埃纳河

一百二十架俯冲轰炸机的马达隆隆，演奏着它们的钢铁之

歌！一百二十架俯冲轰炸机雷鸣电闪地越过埃纳河！

但没有一架飞机找到目标。

老天保佑，魏刚①的防线笼罩在靠近地面的浓雾之中。

起来，无名的步兵，今天你得自个儿证明你那严格训练的优越了。你对胜利的渴望必将摧毁最顽强的抵抗。

当你从贵妇大道②高地下来的时候，想一想从前在这里流过的鲜血！

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人曾在你之前走过这条路！

你——1940年的士兵——应当走完这条路。

你可曾看到纪念碑上的铭文："这里是被野蛮人摧毁的埃勒特谷地的遗址。"你的敌人被罪恶的思想所蒙蔽，今天又把你——一名为自己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战士——看作是野蛮人。

6月9日凌晨，我师待命出击。一个兄弟团的战友承担我们这个地段的攻击任务。我们被分派担任师的后备队。

紧急待命！——出发！

凌晨4时。士兵们一个接一个爬出帐篷，睡眼惺忪。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开始了。

Ⅳ 英 雄

这位英雄的故事是德国军官英勇无畏、忘我献身的范例。有人说过，一个军官要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勇气。其实每个军人从走上战场与敌人厮杀的时刻起，就和死神结下了不解之

① 魏刚(1867～1965年)，法国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长。

② 贵妇大道，法国埃纳省内的一条高地通道，长三十公里，位于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之间，1917年4月至1918年10月曾在这里激战。

缘。他从心里抛开畏惧，鼓足全身力量，犹如绷紧弓弦，他的知觉突然变得非常敏锐，他投入喜怒无常的命运女神的怀抱，他认识不到却感觉得到，幸运和上苍只施恩于勇敢的人。胆小的人被勇敢的人的榜样所推动，一个人树立英勇无畏的榜样，就能点燃他周围人们心中勇敢的火炬。根特上校就是这样的人！

V

敌人打得顽强狡猾，即使被围困也顽抗到底，几乎从不投降。我们遇到的是塞内加尔黑人，丛林战的行家，在这里得心应手。他们巧妙地隐藏在树根、天然或人造的青纱帐之后，总是在能吸引进攻者的小径或林中空地挖壕沟，就在咫尺之间开枪射击，几乎百发百中，而且几乎都是致命的。藏在树后打枪的人，往往也是无影无踪的。他们常常让进攻者从身旁走过去，以便从背后结果他。这些人难以根除，使后备队员、通讯兵、指挥部、炮兵不胜其烦。即使早就被断了后路，饿得半死，他们仍然在几天中击毙一些散兵游勇。他们俯卧在地，或倚在树后，或缩成一团贴在树干上，往往还蒙上伪装网，暗中守候着猎物。等到你真正发现了一个，这个野蛮人往往早已觉察，就像一个口袋似的从上面落下来，一眨眼就在灌木丛中消失了。

VI

继续前进，我们不得停留，尤其不得在此停留。我军行进在山谷中，没有任何掩护。谁知道敌人是否就埋伏在两侧高地上？——只有前进！真像是奇迹，没有人阻挡我们前进。这里

的村庄已被像潮水一样往后退的法国人抢劫一空、坚壁清野了。

“那边就是贵妇大道了，”走在我旁边的一位战友低声说——他的父亲是在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这里该是埃勒特谷地了，他就是在这里挂彩的，当时他是伙夫。”

一条宽阔的公路穿过埃勒特谷地，通往贵妇大道高地的宽阔山脊。公路两侧的土地几乎没有一块在世界大战中不曾多次受到炮火的轰击。哪儿也见不到一株长着像样树干的较大的树。1917年，这里连一棵树也没有了，全都被打得稀烂。这些年来，树根重又长出新芽，一棵棵残株长成一簇簇灌木。

VII

我们时时刻刻看着表。再一次检查和测量。最后一次提醒——这时，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出击！德国大炮从树林边缘和灌木丛后面开火了。殷红的炮火在埃纳河对岸的斜坡上慢慢地向上翻滚。整个埃纳河谷硝烟弥漫，有时只能看见很少一点。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工兵运来橡皮筏子，把步兵运过河。抢渡埃纳河和运河的激烈战斗开始了。尽管敌人拚死抵抗，我军在十二时左右登上了对岸的高地。此时已无法再从我们的观察哨继续进行观察了。先遣部队的观察员和两个报务员已在上午随同步兵向前推进。下午，观察哨和炮兵阵地也奉命转移。烈日灼人。不久我们便抵达了埃纳河。新的观察哨设在163号高地。

笔者对如何写散文看法过于片面，不能对此说三道四。

如果把有关阿洛伊斯的所有客观的材料放在一起，再把所

有不客观的介绍压缩成一个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要点，那就可以得出结论：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还可以兼图画课。他在几次中断的事业之后的真正归宿，读者早已知道：他参了军。

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不努力，在军队中也不会有所成就，不得已充当军士，就更是如此。而当军士就是“完全中学三年级退学，不得不回到国民学校[①]去”（老霍伊泽语）的阿洛伊斯的唯一出路。这里得讲句公道话：阿洛伊斯十七岁那一年先是自愿服义务劳役，后来又去当兵，开始明白事理。他在给父母亲的信（全都放在玻璃柜里，人人都可翻阅）中这样写道：“如今我要坚持到底，不管一切艰难险阻，即使其他人反对我，我也不想总是归咎于他们。爸爸妈妈，我恳求你们，不要一看到我开始干什么，就指望我一步登天。”这些话说得不错，是针对普法伊弗太太的说法而言的；当阿洛伊斯首次身穿军装回家度假时，她就把他看作是“驻意大利武官之类的人物”了。

最后，如果像总是理应追求的那样稍示同情，做到最起码的公正，并且考虑到阿洛伊斯所受的教育多么恶劣，那末，说到底他并不是那么差劲，而且他离家越远，也就变得越好，因为在外地没有人再把他看成是未来的红衣主教或海军上将了。不管怎么说，他参军一年半就当上了下士，即使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有利于晋职提升，做到这一点也仍然令人钦佩；进军法国时，他被晋升为中士，而他就以这一身份，“风华正茂”，在1941年6月出席了格鲁伊滕公司的庆祝大会。

---

① 德国国民学校包括小学四年和中学四年，学生毕业后只能当工人。小学（一般四年）成绩优良者可上完全中学，学制九年，毕业后直升大学。

关于莱尼在这个晚会上重又舞兴大发一事，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只有一些传闻和耳语。二者性质不同：有善意，有恶意，有嫉妒，也有老处女式的。假定从晚上八时至凌晨四时奏了大约二十四支至三十支舞曲，莱尼和阿洛伊斯在午夜过后离开舞厅，那末——如果把传闻和耳语压缩到适当的平均值——莱尼很可能跳了十二次；不过，在这假定的十二次中，莱尼并非大部或几乎全部，而是通通和阿洛伊斯一个人跳。连她父亲，连老霍伊泽，她都不肯赏光跳一次——不，她只同他一人跳。

在普家的玻璃柜里，除了一枚勋章和一条武装带外，还有一些照片。照片上的阿洛伊斯那时是个英俊小伙子，战时这种小伙子不仅可以登上画报的封面，而且也能在画报发表上面引用过的那种散文，甚至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按照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所知道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既有直接提供的，也有经过莱尼简要转述的），再加上霍伊泽的证词，阿洛伊斯显然是这样一个小伙子：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他依然神采奕奕，胸前挂着一支子弹已上膛、打开保险的自动步枪，钮扣解开的军服上衣挂着第一枚勋章，走在他率领的队伍前面，进入一个法国村庄，确信已将其占领；他带领部队经过仔细搜查，确信村里既无放冷枪的人又无妖婆女巫之后，就彻底洗了个澡，换了内衣和袜子，然后再自愿摸黑步行十二公里（不够聪明，应事先在村里仔细寻找一辆可能被丢弃的自行车——也许只是被那块假惺惺的标语牌"抢劫者格杀勿论"吓怕了）；他独自一人，劲头十足地出发了，就因为他听说在十二公里外的那个小镇上有女人；进一步观察，原来是几名年纪大的妓女，她们是1940年德国首次色情浪潮的牺牲品；她们喝得醉醺醺的，做了大量本职工作，累得精疲力竭。当值勤卫生员向我们这位配角透露了一些

具体统计数字，并叫他向那些可怜的未老先衰的女人“看一眼而不承担义务”之后，他就往回走了十二公里，一事无成(这时他才想到花费力气去寻找一辆隐藏的自行车是值得的)，深感辜负了自己那好听的名字①，在走了共计五十四公里的路程之后立即躺下，死死地睡上一小觉，可能在天刚破晓时就起来“创作”，继续行军，占领其他的法国村庄。

莱尼同他跳了大约十二次（“你只得让他去，他跳得棒极了！”——洛蒂·霍伊泽语)。到了夜里一点钟左右，她在他的诱惑下跟他钻进了附近一条已改为公园的要塞壕沟。

不用说，这件事引起了种种猜测、推理、争论和分析。被认为“难以接近”的莱尼偏偏“跟他”溜之大吉(洛蒂·霍伊泽语)，真是丢人现眼，几乎引起轰动。对于这件事，如果也像测算跳舞次数那样对人们的意见和感受作个平均估计，就可得出如下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情人、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把阿洛伊斯勾引莱尼说成是出于物质动机。大多数人甚至认为这与阿洛伊斯想当军官有一定关联；他们说，他想高攀，通过莱尼获得经济保障(洛蒂语)。普法伊弗家族(包括几个姑姑阿姨，不包括海因里希)都认为是莱尼勾引了阿洛伊斯。两种猜测大概都不对头。不论阿洛伊斯平时为人如何，他可不是那种利欲熏心、工于心计的人，这一点他不同于他家里的人，令人欣慰。可以认为，他迷上了艳丽夺目、重又活泼起来的莱尼；他对法国妓院里那乏人的、并不令人快活的寻花问柳感到厌倦，莱尼的“鲜艳”（笔者语)使他简直心醉神迷。

---

① 阿洛伊斯的原意为“无所不知者”。

至于莱尼么，她完全“忘乎所以”了(笔者语)，这是情有可原的；她接受邀请到从前的要塞壕沟里去散步，那毕竟是一个夏夜；再假定阿洛伊斯变得十分温柔多情，甚至可能一味强求，那末，至多只能说这是莱尼一次人性的失误，而不是品德方面的失足。

那条要塞壕沟至今犹在，仍然是个公园，到现场去看看并不太费事，因此笔者前去看了看：那里已经过改造，像是植物园，有一块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种上了(大西洋)石楠。不过，公园管理处“找不到1941年的花草树木平面图”。

此后三天的情况，据传莱尼只讲过一句话：“简直叫人受不了。”她对玛格蕾特、洛蒂和马尔娅三人都是这样说的。其他可以获得的材料使人得出结论：阿洛伊斯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情人，更谈不上点子多。第二天大清早，他把莱尼带去见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姑姑费尔南德·普法伊弗①，这个名字是她那有亲法思想和分离主义倾向②——她家当然矢口否认——的父亲给取的。她居住在一幢建于1895年的老式楼房里的一套一居室住宅里，不但没有浴室，也没有自来水——至少房间里没有，在过道里才有自来水。这位费尔南德·普法伊弗仍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现在又——因为她一度生活得不错——住在一幢老式房子的一个房间里(这幢房屋建于1902年)。她“当然记得清楚他们俩来找我的事，而且——确实如此——他们那副样子根本不

① 费尔南德是法国人名。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茵地区曾出现一派政治势力，主张脱离德国，成立莱茵共和国。

像一对热恋的情侣，倒不如说像是丧家犬。既然他们像大自然爱好者那样行事之后，他至少应该带她去一家好的旅馆，这样就可以洗个澡，换换衣服，收拾打扮一番。可是这个傻小子却一点也不懂事”。

费尔南德·普法伊弗太太(或小姐)自己给笔者的印象倒是很“懂事”。她有着一头被大肆宣扬的普家美发，尽管已不年轻，约有五十五岁左右，并且家境不大宽裕，但她却拿出一瓶最贵重的雪利酒待客。普氏家人，包括海因里希，都不理睬费尔南德，“因为她多次想开酒馆而未能得逞”，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对她的信任。她的最后几句话是:“请问，呆在我的一居室住宅里——这叫那个可爱的姑娘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要我出去，让他们俩——就这么说吧——继续寻欢作乐或继续作孽吗？或者叫我仍然呆在屋里？对她来说，这比最便宜的客店还要糟，那儿至少还有个洗脸盆和毛巾，而且可以关起门来。”

最后，天快黑时，阿洛伊斯表示决心“不顾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手拉手，坚定不移地去见父母”(费·普法伊弗语)。莱尼没有吭声，只是根据其“鄙夷的神色”来看，她对这种说法并不以为然。很难客观地断定，阿洛伊斯究竟是有点装腔作势，搬出他当年主演《佛兰德的狮子》时的台词呢，还是由于“事情纯洁清白”(他当着莱尼的面令人难堪地对他的姑姑这样谈整个事情)，他内心产生了一种显然是理想主义的色彩？显而易见，他完全是在说空话或吹大牛，不难想象，倾向于尘世唯物主义、具有菩萨心肠的莱尼听到这种言论会皱眉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可疑的姑姑，反正她是这样说的，当时她觉得莱尼不太愿意同阿在床上或石楠丛中再过一夜了，当阿出去上亭子间厕所时，莱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休假证，对假期之长失望地

耸了一下小鼻子。这次介绍的情况有一点肯定不对：莱尼的鼻子并不小，长得很端正，线条优美。

由于阿洛伊斯毫无拐走莱尼或采取类似行动的意思，他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我的全部咖啡都喝光了”，这时已经很晚了，只好去见自己的家人。叫人难堪的是，他们先去普法伊弗家。自从老普法伊弗“奉调进城”以后，普家就住在很远的郊区。老普法伊弗好不容易才掩饰住自己的胜利喜悦，费力地挤出一句责备的话：“你怎么能对我老朋友的女儿这样干呀！”普夫人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这可不像话”。当年十五岁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一夜未睡，一面喝咖啡和白兰地(普太太的评论：“我们可花了不少钱呐。”)，一面仔细筹划婚事。莱尼对此不置一词，尤其是因为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最后她竟睡着了，而别人还在商订计划，甚至连住宅的大小和陈设都详细讨论了(“少于五个房间，他是决不会打发走女儿的——他应当为她这样做嘛”，“至少也得是桃花心木的”，“也许他最后会给自己或至少给女儿盖一幢房子”)。

后来，天快亮时(全都根据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介绍)，莱尼“显然存心让人恼火，装出一副妓女的样子，一连抽了两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再从鼻孔里喷出烟来，嘴唇涂得红红的”。在邻居家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这次是普法伊弗先生说：“我们可花了不少钱呐。”多少？——笔者)，大家乘车去格鲁伊滕家，到那里——由于莱尼仍然拒不开口，从这时起就依据女证人范·多尔恩的介绍了——“还早得很，不到七点半”。格鲁伊滕太太夜里没有睡好(空袭警报和她的教子库特初次得

感冒），这时还躺在床上用早餐（“咖啡、烤面包和橙酱，您可知道，1941年要搞到橙酱有多难哪——可他为她尽到了心”）。

“她回来了，莱尼——‘在第三天又复活了’，这是我对她的印象——马上跑到她母亲面前拥抱她，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请我给她送去早餐，而且——您信不信——她坐在钢琴前弹起来了。格鲁伊滕太太，我只好随她，‘也起来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从容不迫地梳妆打扮起来，围上她的披肩——一件非常漂亮的老式披肩，巴尔克尔家总是把它传给小女儿——走进普法伊弗夫妇正在等候的起居室，客客气气地问：‘请问，您有何见教？’接着，首先发生了一场由于用‘您’称呼而引起的争论：‘哎呀，海伦妮，你怎么突然用您称呼我们呢？’格鲁伊滕太太说：‘我记不得对您称呼过你啊！’普法伊弗太太接着说：‘我们来为我们的儿子向令嫒求婚。’格鲁伊滕太太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就去给公司打电话，请人去找她丈夫，找到后立即叫他回家。”

接着显然有一个半小时之久，演出了小资产阶级谈判婚事时常见的令人难堪的悲喜剧。“名誉”这个词说了有六十次左右（范·多尔恩声称她能证明，因为她当时在门板上每一次都划一道）。“唔，要不是事关莱尼，我会觉得滑稽可笑，因为当他们看到格鲁伊滕太太不大愿意用同这个阿结婚来挽回自己女儿的名誉后，就提出他们儿子的名誉问题——他们把他说成好像是被人诱奸的黄花闺女，硬说他们的当候补军官的儿子——其实根本不是，后来也没有当成——的名誉也只有通过联姻才能挽回。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还开始称赞起阿的身体来：他的漂亮头发，一米八五的身材，他的肌肉。”

幸亏为时不久，人们提心吊胆等候的老格鲁伊滕回来了。

他(“虽然他以脾气暴燥、爱暴跳如雷而闻名”)“表现得无比温和、平静，近乎和蔼可亲，使得不用说都很怕他的普法伊弗夫妇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斩钉截铁地打断诸如“名誉”之类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名誉，我们也一样”，老普法伊弗夫妇异口同声地说)，心事重重地望着阿洛伊斯，笑眯眯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向阿洛伊斯打听他所在的师和团的情况，“心事越来越重”，后来把莱尼从她的房间里叫出来，“丝毫没有责备她”，不动感情地问她：“你说呢，姑娘，结婚还是不结婚？”于是“莱尼很可能是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阿洛伊斯，若有所思，还带点怜悯，似乎又有了一种预感(莱尼过去有过一次预感吗？——笔者)，不管怎么说，她已经跟他走了，而且是自愿的，于是她说：‘结婚。’”

接着，格鲁伊滕“声音中流露出一些同情”(范·多尔恩语)，看着阿洛伊斯说：“那就这么办吧！”还说了一句，“你们那个师不在亚眠了，如今在施奈德米尔①。”

他甚至表示愿意帮阿洛伊斯搞到结婚许可，因为“时不待人”。事后弄清下面这一点当然很容易：老格鲁伊滕从1940年年底起就知道大批部队调动的情况，并且在决定女儿婚事的前一天夜里，他从老朋友的谈话中获悉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出任“规划处长”这一新职后“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霍伊泽语)。后来在白天，洛蒂和奥托·霍伊泽曾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这门亲事，他都用一句话顶了回去：“唉！算了……算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阿洛伊斯在收到批准他结婚的电报同时

① 施奈德米尔，现名皮瓦，属波兰，在奥得河以东。

又接到通知，要他“立即中止休假，于1941年6月19日到施奈德米尔向他所在的师报到”。

在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在教堂举行婚礼，这些还需要描述吗？也许值得一提，莱尼拒绝穿白礼服，阿洛伊斯极其紧张不安地吃完喜酒，莱尼显而易见并没有因为取消正式的洞房花烛夜而感到悲伤，至少还送他上火车，在月台上让他亲吻。正如莱尼后来——在1944年一次特别严重的空袭中——在玛格蕾特的地下防空室向她透露的，阿洛伊斯在动身前一个小时还在格家从前的熨衣间向莱尼明确指出她应尽的妇道，强迫她“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同他睡了一觉，从此以后，阿“在未死之前就已经在我心目中死掉了”(玛格蕾特转引莱尼原话)。

1941年6月24日傍晚就收到了阿在攻打格罗德诺① 时“光荣牺牲”的消息。

关于这件事，只有一点值得一提：莱尼不肯带孝表示哀悼；她尽义务地把阿的一张照片挂在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的照片旁边，不过，到1942年底，就把阿的照片又从墙上取了下来。

接着是两年半平静的时光。莱尼满十九岁、二十岁，终于到了二十一岁。她再也没有跳过舞，虽然玛格蕾特和洛蒂有时给她提供机会。她有时上电影院去看(据一直还给她买电影票的洛蒂·霍伊泽所说)《小伙子们》、《为德国骑马疾驰》和《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她看《克律格舅舅》和《天狗》——这些影片中没有

① 苏联一城市名，靠近苏波边界。

哪一部引得她掉一滴眼泪。她弹钢琴，对旧病复发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开车出去兜风。她到拉黑尔那里去得更勤了，每一次都用一个暖瓶带去咖啡，用一个早餐盒带去夹心面包，还有香烟。由于战时经济管制越来越严，莱尼在公司里的工作越来越有名无实，1942年初公司受到严格审查后，她的汽车有被取消的危险，知情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莱尼开口求人；她求父亲把“那东西(指她的鹰牌汽车)留给”她，父亲说这事已不能完全由他作主了，莱尼听了以后求得更加迫切，直到他最后“动用一切手段,给她设法再宽限了半年”(洛蒂·霍伊泽语)。

这里,笔者不揣冒昧唠叨几句,对人物的命运作一番假设：莱尼可能、必然、应当变成什么样子，假如……

第一,迄今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三个年轻人中,唯有阿洛伊斯在战争之后仍活在人世。

由于当兵显然是他的合适职业，阿很有可能不仅打到莫斯科城下，而且马不停蹄，勇往直前，当上少尉、上尉,或许——假定他未被苏联人俘虏——到战争结束时已是少校，胸前挂满勋章，在一座俘虏营中幸免于死，不知什么时候，迫不得已或受到强制,失去了他那带几分天真的性格,回国以后当两年——回国晚则干一年——小工，很可能与宁愿见到一个低声下气而不是趾高气扬的女婿的老格鲁伊滕一道，然后肯定很早就会重返部队，现在叫联邦国防军，如今已有五十二岁，肯定会当上将军。他是否能再次与莱尼凤凰于飞，甚或像一对打得火热的鸳鸯？笔者断言：不可能。莱尼此人很难进行假设，当然给推断增加了困难。莱尼是不会再经历一次尚有待叙述的热恋的，如

果……笔者断言：她会经历的，即使……

毫无疑问，阿洛伊斯即使到五十二岁也仍然是个美男子，普家美发使他无秃顶之虞，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自我推荐，到波恩大教堂或科隆大教堂充当祭坛侍者；那些能熟练地挥动弥撒书、谦恭地奉上洗手水壶和小酒壶的英俊将军还会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假定莱尼对他不忠贞，但“仍留在他身边”，时不时履行做妻子的义务，那末，她会不会领着三四个“可爱的”孩子，参加1956年10月10日在科隆格雷恩教堂举行的、由弗林斯①红衣主教主持并由阿洛伊斯充当祭坛侍者的联邦国防军首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礼拜仪式呢？笔者断言：不会。笔者在那里没有见到莱尼，他看见阿，甚至还看见那些“可爱的”孩子，但没有见到莱尼。此外，他还见到阿——在画报封面上，或是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先生②一起在东方集团国家的某个招待会上。他——笔者——看见阿出任驻华盛顿甚至驻马德里武官——但从未见莱尼，更未见她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两位先生在一起。笔者到处都见到阿，但见不到莱尼——甚至见到她的孩子，却见不到她自己，也许是他的视力不佳。笔者的视力确实不好，但为什么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阿，却一次也看不见莱尼呢？在宇宙中某处肯定有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陌生飞行器，上面载有一台可能有巴伐利亚州那么大的巨型电子计算机，不断抛出假设的履历，因此我们必须等到这个东西终于被人发现为止。毫无疑问，如果莱尼为自己或他人所迫继续与阿一起生活，她会闷闷不乐，身体发胖，今天

① 弗林斯(1887～　　)，1946年起任红衣主教，曾任科隆大主教。

② 楠宁(1913～　　)，联邦德国著名新闻出版家，1948年创办《明星》周刊，一直任该刊主编。魏德曼也是联邦德国的新闻界人物。

就不会轻于标准体重三百克，而是超过标准体重十公斤，这样就又需要一台像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那么大的、专门测定分泌的巨型电子计算机，以便找出使莱尼这样一个人发胖的内因和外因。我们会不会看到莱尼作为武官夫人在西贡、华盛顿或马德里跳舞、打网球呢？也许是个胖莱尼，决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莱尼。

真可惜，这些能把每一滴不曾哭出来的T、所有S、所有G、每一次W、G、L1和L2折算成超重或体重过轻的数据的天上工具尚未被发现。要把任何虚拟的东西加在莱尼身上，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既然已经有这种电子计算机，为什么科学还丢下我们不管呢(百科词典就没有这样做)？

如此说来，笔者对阿的假设前程看得几乎一清二楚，哪儿都看不到莱尼，甚至——坦率地说——从未见到她履行任何做妻子的义务。

可惜呀可惜，天上的工具还难以得到，它能回答好像《圣经》上的问题：告诉我你超过或少于标准体重多少，我就能告诉你，你的胃、肠、脑干、肝、肾、胰腺里的T、W、L1、G、S和L2是过多还是过少，使你行为和感觉反常，造成体重过重或过轻。有谁能回答，莱尼会有多重？如果

第二，艾哈德一人在战争中活下来。

第三，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活下来。

第四，艾哈德、海因里希和阿三人都活下来。

第五，艾哈德和阿活下来。

第六，海因里希和阿活下来。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艾哈德活下来，那个尚未被发现的天上工具会为莱尼的体重欢呼(电子计算机也会欢呼)，为莱

尼分泌的极佳平衡欢呼。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莱尼在上述一至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是否会来到佩尔策的花圃？如果发生冲突，她又会如何解决呢？

不管怎样，有理由怀疑莱尼能和阿共同生活，而莱尼显然已计划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作石楠丛中相会，肯定会取得圆满的结果。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莱尼成了有夫之妇，这对她丝毫不会有所妨碍，如果再出现某个“意中人”的话。就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艾哈德的情况来看，莱尼完全可以成为一位高级中学教师(主课德语)的夫人，一位电台晚间节目编辑的夫人(或终身伴侣)，一家先锋派杂志发行人的太太(这里必须指出，她通过艾哈德也会熟悉她后来通过另一个人才熟悉的那位德语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①)。毫无疑问，艾哈德会永远爱她，至于她是否也永远爱他——二十年以后就不能打保票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艾哈德决不会坚持要求任何权利，因此他肯定会终生得到莱尼的好感，虽然她不一定会与他白头偕老。笔者(这出乎他意外)也未见到海因里希，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假设的职业情况下都不见他的踪影——就像所有耶稣会教士都不曾见过他一样。

这里——联系到百科词典上的某些解释——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谁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谁是美好的，什么东西对谁是不美好的？这些都是百科词典甚至享有盛誉的词典中令人难堪的缺陷。有事实为证，有人把二点五马克看得比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生命远为宝贵；甚至有

①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1887～1914)，奥地利诗人。

人为了一片血肠的得失，竟冷酷无情地拿自己妻子儿女的美好事物，例如同享天伦之乐和看到父亲终于面露笑容等去冒险。向我们吹捧为G①的那种东西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活见鬼，有的人捡到三四个烟蒂，够卷一支新的香烟，或者从一只被扔掉的瓶子中能够咂咂地喝一口剩下的苦艾酒，就以为G近在眼前了；有的人为了——至少是按照西方快速做爱的做法——十来分钟的幸福，确切地说，为了同自己正在渴望得到的人匆匆睡上一觉，竟需要一架私人喷气式飞机，在教规和法律规定向他合法提供G的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利用早餐和下午咖啡之间的几个钟头，匆匆飞往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或（这就需要到下一次早餐的时间）阿卡普尔科②——以便同自己所思念的人来一次男男、女女或简单的男女交欢。

这里必须完全肯定，还有许多带着许多电子计算机的飞碟尚未被人发现。

例如，什么地方记录心灵上受到的S？什么地方记录肉体上受到的S？什么地方就像心电图那样记载我们结膜囊的活动？当我们在夜里偷偷地W的时候，谁来计算我们的T呢？谁又来关心我们的L 1和L 2呢？该死的，难道要笔者来解答所有这些难题吗？他们将那些贵重的玩意儿送去收集月球的尘土，或取来光秃秃的石头，却无人能测定那个能说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相对性的飞碟的方位；那末，我们要科学有什么用呢？打个比方，为什么有的女人同别人睡一小觉，就可以得到两座别墅、六辆汽车和一百五十万现金，而——有统计数字证明——在一个青楼花院蔚然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中，当我们的莱尼七、八

① G是德语"幸福"的起首字母。
② 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西海岸城市，有著名的海滨浴场。

岁大的时候，为了一杯价值十八芬尼(包括小费在内二十芬尼，确切地说是十九点八芬尼——可是有哪家造币厂又会想到铸造每十个或五个才值一芬尼的硬币呢？)的咖啡和一支价值二点五芬尼的香烟，也就是为了总共二十二点五芬尼，少女们就委身于人，甚至还满足额外的亲热要求呢？

可想而知，人间事物计算机的指示器总是极其不稳定的，因为它要记录的差距太大了——完全同样的服务，有的代价是二十二点五芬尼，有的是大约二百万马克。

如以生活中所需要的火柴为例：一个囚犯晚上抽烟不是用一整根，不是用半根，而是用四分之一根火柴，而别的人——并且是不抽烟的人！——却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摆着有两个握紧的拳头那么大的丁烷打火机。毫无意义，毫无用处。这又怎么去计算其感光度呢？

这是什么世道？公道何在？

唔，这里只是想提一下，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

关于莱尼探望拉黑尔的情况，人们知之不多，因为住在这座修道院里的修女们不太愿意让莱尼同拉黑尔的亲密关系过于曝光，其原因在于玛格蕾特已经提到但尚需进一步揭露的计划。这里也得考虑到一个证人，此人对笔者相当坦率，并为此吃了苦头。他是花匠阿尔弗雷德·绍肯斯。他是个残疾人(一条胳膊、一条腿)，1941年被分配到修道院当花匠兼门房助理，那一年他还不满二十五岁，对莱尼的来访情况一定知之颇多。但是，只找他谈过两次，第二次谈话后他就被调到下莱茵一座修道院去了，当笔者想要去那儿找他时，他又被调走了，而一位年约四十五岁、态度十分强硬的名叫萨平蒂娅的修女相当明确

地向笔者表示，对于教团的人事政策，她没有提供情况的义务。由于绍肯斯的失踪在时间上与采齐莉娅修女拒不接待笔者进行第四次谈话——这一次专门谈拉黑尔——相距甚近，因此笔者猜测有人从中弄手脚、搞诡计，后来他才知道了底细：教团企图制造对拉黑尔的崇拜，甚至准备行宣福礼① 或祝圣礼② ——在这种情况下，“密探”（这是对笔者的称呼）就不受欢迎了，莱尼当然更不在话下。在绍肯斯还被允许讲话——因为人们没料到他会讲什么——的时候，他至少还证实，1942年年中以前，他曾偷偷放莱尼进院去找拉黑尔，每周两次，有时三次，穿过他住的门房，“到了院内，她就相当熟悉了”。洛蒂对这个“神秘玄妙的修女”从来不以为然，对此无可奉告，而玛格蕾特看来只听莱尼说过拉黑尔之死。“她瘦成皮包骨，”莱尼曾对她说，“她是饿死的，虽然最后我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当时我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小姐，没有用了——难道您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去哪儿了，这时院长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玛格蕾特继续说道：“喏，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再去过，并且还成功地劝阻了莱尼去告发，这有可能造成恶果——对莱尼、修道院和所有人。‘主降临了’，这话我已听够了——当我想象他果真从门口走进来——”（这时甚至连玛格蕾特都画起十字来）。

---

① 基督教的一种仪式，宣布死者已升天堂。

② 基督教的一种仪式，宣布死者已成为圣徒。

“当然，我琢磨（这是最后一次访问绍肯斯时他的叙述，当时他还肯谈），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啊？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我想她一定是某位党魁的太太或女友——那时谁能有自己的汽车呀——不是党，就是产业界。

“当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把她偷偷带进园子，经过我这间小屋，出来时也让她走这里；但结果还是叫人发现了，因为他们在上面那个修女的房间里发现了烟头，而且闻到了香烟气味。有一次，我们还同防空员大吵了一架，他硬说看见一个窗口有亮光——这只能是她们在楼上一起抽烟时划火柴——如果四下里漆黑一片，这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事情闹得不愉快，小个子被关进了地下室。（小个子么？）对，就是那个小个子老修女，我就是在她搬到地下室去时见过她一次——她有一张祷告椅和一张床，耶稣受难像她不肯要；她说：‘这不是他，这不是他。’这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可是，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还是老来，她很固执，我可以告诉您，她企图说服我帮她把那个小个子修女拐走。她想干脆把她带走。嘿，我干了一件蠢事，接受了她的贿赂——香烟、黄油、咖啡——总是放她进院子，也让她进地下室。她们在那儿抽烟，至少不会被发现，因为地下室的窗子低于小教堂的基准面。后来，有一天她死了，我们把她埋在园中小坟场里。（有棺材、十字架、教士吗？）有棺材，没有教士，没有十字架。我只听到修道院长说：‘现在，她至少不会再为她那讨厌的香烟配给证叫我们为难了。”

绍肯斯的介绍到此为止。这人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不过他的快嘴倒让人抱有希望，但最终希望并未实现；碎嘴子的情况介绍只是从总体上说有一些价值，而且要能发现他们在什么地方“泄

露天机”，而绍肯斯刚刚开始泄露天机，就被强行与笔者分离了，就连笔者感到彼此都持有好感的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也闭口不谈了。

的确，莱尼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达到了少言寡语、守口如瓶的高峰。她公然对普法伊弗家表示蔑视，只要他们一露面，她就马上走出屋去。他们的访问，他们对莱尼的虚情假意，甚至使范·多尔恩这样精细的人也是在六个星期之后才发觉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仅是监视莱尼守节——他们一心想抱孙子。阿洛伊斯死去六周以后，老普法伊弗的“得意扬扬的悲哀竟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连他的另一条腿——究竟是左腿还是右腿没毛病，我也不清楚——也由于得意和悲哀开始弄虚作假地瘸着走路了，可他终究得有一条好腿，才能拖着另一条腿走路，是吗？嗯，他们老来，带着自己做的令人恶心的未烤透的蛋糕，由于没有人理睬他们，格鲁伊滕太太、莱尼或老头子，洛蒂就更不用提了，都看不惯这一家子，他们只好到厨房里来找我。不瞒您说，他们问起莱尼有什么‘变化’时，我总以为他们是在问莱尼是否守寡，是否另结新欢等等。我没有理解，最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想看一看莱尼的换洗衣服。原来他们是想知道这个，当我知道他们的用心时便戏弄了他们一顿；我说，莱尼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他们像鸭子似的张大着嘴向我冲击，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我从容不迫地说：她心灵深处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又缩了回去。过了八星期，那个托尔策姆婆娘——您要知道，我们都以‘你’相称，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老乡——竟差一点冒冒失失去掀莱尼的衣服。我看不下去，便说：‘别这样，我可以向你们打保票，她根本没有怀孕。’他们是多么想偷偷弄一个小普法伊弗到自己家里来啊——奇怪的是，胡贝

特也显示了类似的好奇心，不那么露骨，而是有一点悲伤。他很想抱个外孙，即使是那个人的种也无妨——嗯，最后他果然抱了个外孙，而且甚至还姓他的姓呢。”

笔者这时十分为难，因为他想翻翻词典，看看是否有通常所谓的“无辜”这一条，而他认为莱尼具备这一品质，但一无所获。词典中收了“罪过”这一词条，从“认罪”到“债务约定”等词条也收得不少①，其中“教育剧”易被误解为别的什么②，只有“教学村”一词无歧义。“学校”这一条写得很详细，对舒伦堡却略而不提③。“教育权利”这一条简直长得要命，等于T、W、L1、G、S和L2诸条总和的三倍。有关“无辜”却无片言只语，根本就不提。哎呀，这是什么世道？难道德国人把教育权利看得比笑、哭、痛苦、烦恼和幸福等全部加在一起还重要么？不收“无辜”一词真叫人生气，没有词典就很难弄清这个词的含义。难道学术界就忍心置我们于不顾？说莱尼所作所为全都是无辜的，根本用不着加引号，难道就够了吗？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受到笔者爱慕的莱尼。再者，她并非没有觉悟的可能，这在不久之后——约一年后——到她刚好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很清楚了。

这位年轻的妇女究竟是何许人也？在战争年代里，她这个“金发女郎”开着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兜风，买通一些快嘴的花匠（他们很可能在阴暗的修道院花园里对她动手动脚），为的是把咖啡、面包和香烟送给一个显然注定被困死、被人看不起的

① “认罪”和“债务约定”都是按德文字母顺序排列的词典词条。

② “教育剧”也可以被理解为“有罪的拉玛”。

③ “学校”和“舒伦堡”（人名）是紧挨着的两个词条。

修女；当这个修女盯着门说“主降临了，主降临了”——以及看到耶稣受难像时说“这不是他”的时候，她毫无惧色。别人都在英勇捐躯，她却翩翩起舞，敌机在轰炸，她却去看电影，接受一个——说得婉转些——并不特别迷人的小伙子的勾引，结了婚，去办公室上班，弹钢琴，拒绝被提升为经理。当越来越多的人阵亡时，她却继续上电影院看《大王》和《天狗》之类的影片。人们引用的她的一两句原话，都是在这两个战争年头说的。从其他人那里当然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这些是否可靠呢？据悉，她有时在自己的房间里瞅着她的身份证摇头；身份证上贴有照片，证明她是海伦妮·玛丽亚·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生于1922年8月17日。马尔娅也提到，莱尼的头发重又现出往日的光彩，莱尼憎恨战争（当然还有别的东西），战前则憎恨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吃不到新鲜的小面包。

她是否注意到，她父亲很奇怪，变得高高兴兴，如今“神气十足”（洛蒂·霍伊泽语），白天绝大部分时间呆在市内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谈”，俨然是个“规划处长”，不再是业主，甚至也不再是股东了，只依靠一笔相当高的“固定工资加公务费”为生？

莱尼听到她公公凭着自己参加过二十三年前的一次战役，就想得到一枚前线战士荣誉奖章，而且还想得到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老是“纠缠”他的朋友格鲁伊滕——他在市内他的办事处当然有时也与将军们洽谈——求他帮他搞到他所渴望的这种荣誉时，只是报以蔑视，只是用撇嘴和皱眉来表示。至今还没有一个医生找到导致那条“伤腿”老是一瘸一拐的那块“大头针头大的”弹片。莱尼是否注意到，普法伊弗家想欺骗她，他们去替莱尼申请寡妇抚恤金？——她是否注意到，她已在申请

书上签了字，从1941年7月1日起——当然补发不足部分——她的银行帐户每月收入六十六马克？普家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将近三十年之后对她进行报复，让他们那个平时还不错的儿子海因里希——他没有瘸腿，而是确实失去了一条腿——有朝一日找莱尼算帐，说她凭借普法伊弗这个姓起码赚了四万马克，也许有五万马克，因为近三十年她一直“捞到”这笔曾多次提高的、根据她的职业调整的寡妇抚恤金——并且对自己竟走得这么远而恼火，另外很可能（笔者的看法，无人证明）由于吃醋，因为他从见到莱尼的第一天起就偷偷地爱上了她，他当着证人（汉斯和格蕾特夫妇）的面就对莱尼喊道：“你凭什么挣那五万马克？就因为同他在灌木丛中睡了一觉，而第二次——这事谁都知道——他就得向你苦苦哀求，这个可怜虫，一星期后就死了，给你留下了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字，而你——而你——而、而你——”莱尼瞪了他一眼，使他闭上了嘴。

莱尼被人“恶狠狠地”说成是同人睡了两次就捞到约五万马克，而她——而她——……她是否觉得自己像个婊子？

莱尼不仅回避办公室，她也几乎不再去公司了。她向洛蒂·霍伊泽坦白说，“看到那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她保住了自己的汽车，防止了再次被没收的危险；她只是用汽车“在近处兜风”，不过这时已日益频繁地带母亲出去，“她们在尽可能靠近莱茵河的漂亮咖啡馆和饭馆里一坐就是几小时，彼此含笑相视，观看往来的船只，抽烟”。那个时期格鲁伊滕一家全都这样“高高兴兴，使人莫名其妙，时间长了真会使人发疯”（洛蒂·霍伊泽语）。格鲁伊滕太太的病已确诊没有什么希望痊愈：多发性硬化症，如今已越来越快地进入后期。

她上下车都是莱尼背着；她不再看书，连叶芝的作品也不读了，有时“她用手数念珠”（范·多尔恩语），但并不寻求“教会的安慰”。

所有当事人都明确地说，格鲁伊滕家这个时期——1942年初至1943年初——的生活是“最奢侈的”。“不负责任，真是不负责任，我这样说，也许您会更好地理解如今我为什么对莱尼虽不苛刻，但也不过分迁就。当时欧洲黑市上能买到的东西，他们全都有——后来出了那件可怕的事情，至今我仍不明白胡贝特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根本用不着那么做嘛。他确实用不着那么做嘛”（马尔娅·范·多尔恩语）。

“那件事”纯粹是由于一桩荒唐的纯文学偶然事件而被揭露的。格鲁伊滕后来称之为“完全是一桩笔记本交易”，这就是说，他把全部材料都装在他的皮夹子和笔记本里，经常随身带着；在这件事情上，他的通讯地址是他的市内办事处，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牵连任何人，连他的朋友和总会计师霍伊泽也不知情。这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是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事实说明，格鲁伊滕感兴趣的是赌博而不是赌注，时至今日，也许只有莱尼“理解”他，就像他的妻子“理解”他一样，还有——当然有所限制——洛蒂·霍伊泽，她对绝大部分是理解的，只是“不明白其中的自杀性部分，那是自杀，纯粹是自杀——他拿钱干什么啊？他成包、成堆、成捆地送人！真是荒唐，虚无主义——莫名其妙，神经失常”。

为了这件“事情”，格鲁伊滕在大约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施莱姆父子公司”。他弄来了假证件，带有伪造签字的伪造订货单（“他随时都能搞到

那些表格，他也从来不把签字当一回事，1929年至1933年的危机年代里，他甚至经常在汇票上冒充他妻子签字，并说：‘她将来会理解的——为什么现在要叫她着急呢？’”老霍伊泽说）。

那场赌博、那件事情持续了八九个月，在整个建筑业以“死魂灵丑闻”而著名。这件特大丑闻是一次“抽象的笔记本游戏”（洛蒂·霍伊泽语），其中有大量已付款甚至已交付但又通过黑市倒卖的水泥，还有整整一个连队虽支付工资却并不存在的“外籍工人，有建筑师、工程负责人、领班，甚至食堂的女厨师等等，全都只存在于格鲁伊滕的笔记本上；连验收记录也不缺，验收记录上的签字全都符合手续；银行户头、银行结单一应俱全，“一桩完全规规矩矩，或者更恰当地说，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事情”（朔尔斯多夫博士后来在法庭上语）。

这位朔尔斯多夫当时虽年仅三十一岁，却被所有的——包括最严格的——新兵体格检查部门一致认为不合格。他并没有弄虚作假（“虽然我也不怕弄虚作假，但我用不着那样做”）。他没有什么器官病，只因为他异常柔弱、敏感、神经质，人们不想拿他来担风险——联想到1965年还有新兵体格检查部门的德国大夫，很想给不很瘦的年轻德国人开“斯大林格勒疗法”，就可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保险起见”，朔尔斯多夫有一位“身居”高位的大学同学把他征调到那个小城市的财政局工作。令人惊讶的是，朔很快就熟悉了他素昧平生的工作，过了一年就“不仅脱不了身，而且委实是谁也代替不了他”（朔的上司、已退休的财政局长克莱普夫博士语，笔者在一个前列腺疗养地找到了他）。克莱普夫还说：“他虽然是个语言学家，但不仅会算帐，甚至能弄清复杂的财会业务，看出某些交易中的问

题——而这是与他原有的才能背道而驰的。"这"原有的才能"指的是斯拉夫语言文学，直至今日朔仍醉心于此，他擅长19世纪俄罗斯文学。"虽然我受到当翻译的优越聘请，但我还是愿意在财政局干这个工作——要我把军士们或者将军们说的德语译成俄语吗？难道要我贬低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事业，把它变成有用的审问词汇么？决不！"

朔尔斯多夫在一次毫无恶意的例行检查中看到"施莱姆父子公司"的材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挑不出任何毛病。纯属偶然，他开始阅读工资表，看后"起了疑心，不，我生了气，我看到的名字不但熟悉，而且一直和我做伴"。这里必须公平地补充一句：朔尔斯多夫可能怀有一些报复心理，不是对格鲁伊滕，而是对建筑业；原先他在一位颇有势力的朋友推荐下，曾到一家建筑公司去当工资会计员，可是人们后来发现了他有计数天才，对他备加赞赏，但请他另谋高就，因为没有一家建筑公司真正乐意让别人仔细检查自己的帐目，他们没有想到一位语言学家会这么做。朔尔斯多夫天真得几乎难以形容，以为这些公司真的想要他做他们其实忌讳的事情：仔细了解掌握他们的种种手法。他们雇佣一个不通世故、神神道道的语言学家，原是"出于同情，让他有碗饭吃，不至于去当兵"（弗拉克斯建筑公司老板语，该公司今天仍生意兴隆），而"这小子竟比任何一个审计员还要认真。这我们可受不了"。

能够具体说出拉斯科尔尼科夫① 的大学生宿舍有多少平方米，拉斯科尔尼科夫下楼到院子要走多少级楼梯的朔尔斯多夫，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名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工人，此人在丹

①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麦某地给施莱姆父子公司搅拌水泥，在公司食堂吃饭。接着，他虽然尚未产生怀疑，却已“义愤填膺”，看到一个斯维德里盖洛夫、一个拉祖米欣，最后还发现有乞乞科夫和索巴克维奇①——之后，大约在第二十三名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他勃然变色；再往下看去，更使他气得直哆嗦：还有普希金、果戈理，连莱蒙托夫也成了工资低廉的战争奴隶。甚至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未能幸免。这里我们想说清楚：这位朔尔斯多夫博士毫不关心诸如“德国战争经济的纯洁性”之类的玩意儿，这种东西“他并不在乎”；他在财务工作上的一丝不苟精神只是(这是笔者的解释。笔者曾多次与朔长谈，不久前还找过他，可能还会经常去找他)他熟悉、热爱、解释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人物的那种一丝不苟精神的变种。“例如，我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契诃夫和他的全部人物，也没有屠格涅夫，当时我就可以告诉您这份名单是谁开的：只能是我的大学同学亨格斯博士。此君吊儿郎当、落魄潦倒，却是个屠格涅夫迷，并且对契诃夫崇拜得简直五体投地，尽管在我看来这两个作家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老实说，我在上大学时曾低估了契诃夫，大大地低估了他。”事实也证明，朔从未告发过任何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这样做未免过分，虽然我讨厌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我却从未告发过任何人，我把那些人找来，教训他们一顿，要求他们重做报表，补交欠款——由于我们单位中我收到的补交款最多，克莱普夫对我很赏识。仅此而已。可告发——我很清楚那些人会吃官司，即使是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我也不想那么干。您想想，偷了几件毛衣就被判处死刑，不——可这一次

① 乞乞科夫和索巴克维奇都是果戈理(1809～1852)《死魂灵》中的人物。

我忍无可忍，气炸了肺：莱蒙托夫在丹麦给德国建筑公司干苦工！普希金、托尔斯泰、拉祖米欣和乞乞科夫——在搅拌水泥，喝大麦粥。冈察洛夫和他的奥勃洛莫夫① 一起抡铁锹！”

朔不久将以高级参议的身份退休，仍醉心于俄罗斯文学，甚至当代俄苏文学。他甚至还有机会向老格鲁伊滕道歉，并通过教会他的外孙、莱尼的儿子莱夫掌握极好的俄语来慷慨地补偿；而且，莱尼的房间里如今有时会有一束鲜花（虽然她与花打交道有将近二十七年之久，就像别人与豌豆打交道一样，但她一直仍喜欢花），那都是朔尔斯多夫博士送的！朔尔斯多夫目前正在潜心研究阿赫马杜林娜② 的诗。“我当然没有去告发。我先是写信去，大意如下：‘请速来面谈，有急事相商。’”他催促了一次、两次，设法寻找亨格斯，但没有找到——“由于我也受到例行检查，我经手的这件事情被发现了，于是便立即立案对‘施莱姆父子公司’进行侦查。这样一来——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这件案子的主要证人是朔尔斯多夫。由于老格鲁伊滕供认不讳，审判一共只用了两天；他在法庭上很冷静，只是在叫他说出“名字供应人”（“您想想，‘名字供应人’——朔尔斯多夫语）时他才不知所措。朔尔斯多夫虽然心中完全有数，但也没有说出来。第二天开庭时，用了大约三小时，由一个从柏林召来的斯拉夫语专家对格鲁伊滕的文化水平进行鉴定，因为格鲁伊滕声称这些名字都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看过任何一本俄国作品“或一本德国书，连《我的奋斗》都没

① 奥勃洛莫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1812～1891)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主人公。

② 阿赫马杜林娜(1937～)，苏联女诗人。

有看过（朔语）"，这样一来，事情就"追到亨格斯头上"。格鲁伊滕并没有供出他，而是朔尔斯多夫此时已找到了他。"他以特种兵军官的头衔为国防军工作，设法从俄国俘虏口中掏出军事机密。一个本来有机会作为契诃夫专家闻名世界的人。"

亨格斯的确是自愿出庭的，他穿着特种兵军官制服，"看上去不太合身，他穿上身才四个星期"（朔语）。是的，他承认，格鲁伊滕找过他，他向他提供了一份俄国人的名单。但他闭口不谈为他提供的每一个名字获得了十马克的酬金。他事前曾同格鲁伊滕的辩护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向他交底说："这一点我现在绝对担当不起——您明白吗？"于是，格鲁伊滕和他的律师都不提这一令人为难的细节，但亨格斯在法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同朔尔斯多夫继续争吵时向他承认了这一点。原来，朔尔斯多夫和亨格斯在法庭上发生了争论，朔尔斯多夫愤愤不平地向亨格斯大声嚷道："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你出卖了，只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诃夫例外。"这场"俄罗斯闹剧"被检察官打断了。

这一插曲的教训不言自明：伪造工资表的建筑公司老板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具有文学修养的审计员证明是有用的，于国家有好处。

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人有罪：格鲁伊滕。他全都招认，但不承认作案动机是牟利，这使他处境更加困难；问到他作案动机时，他拒不交代，问到他是否蓄意进行破坏时，他又矢口否认。后来，人们曾多次向莱尼问起他的作案动机，她咕哝什么"报复"（报复什么呢？——笔者）。只是在"非常非常有权势的朋友提出，他对德国军用建筑工业有过无可争议的功劳这一理由"

（老霍伊泽语），大力干预后，格鲁伊滕才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全部财产予以没收。莱尼两次出庭，但被证明无罪；霍伊泽、洛蒂以及所有朋友、同事也都被宣告无罪。唯有莱尼出生的那幢公寓房子没有充公，这要归功于那位“一向很苛刻的检察官”，他提出她“作为阵亡将士遗孀的不幸命运，经查明无辜”这一理由，并且令人尴尬地大谈特谈，再次“搬出”（洛蒂·霍伊泽语）阿的英雄事迹；甚至莱尼参加过一个纳粹少女组织的活动，也被当作她思想可靠的证明。“法官先生，剥夺这个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亲（指格鲁伊滕太太）和这个循规蹈矩的英勇的德国年轻妇女的一份财产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这份财产不是被告挣来的，而是他妻子带来的。”

格鲁伊滕太太没有能经受住这场丑闻。由于她不能动弹，她躺在床上接受了几次审问，“这就够她受的了”（范·多尔恩语）。“她对离开这个世界并不很伤心——她毕竟是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很想再和胡贝特见上一面，但已不行了。我们悄悄地把她安葬了。当然举行了教会仪式。”

莱尼这时已二十一岁了；她当然不再有汽车，她认为自己应当辞去公司的职务，她的父亲暂时去向不明。所有这些对她有没有触动，抑或触动很深？这个有一辆时髦的汽车，在战争第三年似乎无事可干，只是弹弹钢琴，给生病的母亲朗诵爱尔兰童话，探视一个奄奄一息的修女的漂亮金发女郎，可以说是第二次守寡，毫无悲痛之感，如今失去母亲，父亲又身入囹圄，她将如何是好呢？这个时期她讲过的原话，人们知之不多。所有与她关系密切的人都对她的表现感到意外。洛蒂说，莱尼“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范·多尔恩说，“她显得宽心

了”；而老霍伊泽则这么说——“她不知怎么竟如释重负”。两种说法中都说“不知怎么”，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为人们想象莱尼为什么沉默寡言提供了一丝线索。玛格蕾特是这样说的：“她显得并不消沉，相反，我倒觉得她依然振作或者说重新振作起来了。对她来说，修女拉黑尔的神秘消失要比父亲的丑闻和母亲的去世严重得多。”实际情况是，莱尼从此得听候调遣参加工作，由于一位“有一些门路”、不愿披露姓名但笔者知道的恩人在幕后活动的结果，她到一家花圈场去工作。

第五章

后代人或许会问：1942年至1943年，花圈怎么会成为重要的军事物资？答案是：为了使葬礼也像从前那样办得尽量体面一些。这个时期花圈并不像香烟那样吃香，但它们是紧俏货，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很吃香，对进行心理战具有重要作用。光是官方对花圈的需求就非常大：献给被炸死的人、死在军医院里的军人，此外由于"自然常有个人的死亡"（前花圈老板、莱尼当时的头头瓦尔特·佩尔策语，他已退休，现在靠地产为生）以及"经常有党、经济界和国防军的要人获得不同等级的国葬"，因此各种花圈，"从最简单的普通品种到用玫瑰花扎成的特大花圈"（瓦尔特·佩尔策语），都属于重要的军用物资。这里不是对国家举办丧礼的资格进行充分评价的合适场合；无可争辩的是，在历史上和统计学上都已得到证明，当时办丧事多如牛毛，公家和私人需要大量花圈，佩尔策得以确保他的花圈场获得一家重要军工企业的地位。战事愈进展，也就是说战争拖得愈长（这里特别指出进展和持久之间的关系），花圈自然也越来越供不应求。

倘若"什么地方"存在偏见，认为扎花圈的手艺微不足道，这里就得——单是为了莱尼——坚决加以驳斥。要知道，

一个花圈乃是最终的基本形式，无论如何要保持整体形式的统一；扎花圈框架有不同的形式和技巧，在选择绿色枝叶方面，要紧的是为选用何种花圈形式挑选何种枝叶，单是作衬底用的重要绿色枝叶品种就有九种，用作最终形式的有二十四种，用于束把和套插（总类为插束）的有四十二种，用于罗马式的有二十九种，因此，花圈上用的绿色枝叶共有一百一十二种，即使它们的各种用途有时重复，但仍可分为五种不同用途和一套复杂的编扎方法，尽管这种或那种枝叶既可用于结扎和最终形式，也可用于插束（这又分为束把和套插两种）和罗马式，但这里也适用这条基本规则：要掌握窍门，懂得把材料用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使用。那些瞧不起扎花圈而视之为下等工作的人是否知道，什么时候用赤杉树叶打底或作最终形式，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要用侧柏、冰岛衣、假叶树、十大功劳和铁杉？有谁知道，要使绿色枝叶扎得永远紧贴完美，就需要高超的扎圈手艺？这样人们就会理解，过去只是做一些轻松随便的办公室工作的莱尼改行搞扎花圈决非易事，掌握这门手艺并不容易，她像是进了一家艺术品工厂。

也许用不着指出，正当十分强调日耳曼魂的时候，“罗马式花圈”曾一度名声不佳，但等到轴心①成立，墨索里尼不大客气地反对诋毁罗马式花圈，有关的争论就中断了；此后，“罗马化”这个动词一直自由使用到1943年7月中旬，后由于意大利背叛②才终于被根除（一位地位相当高的纳粹头目的评论：“在我们这里不再有罗马化，连扎花圈和扎花也不再罗马化

① 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宣布成立柏林—罗马轴心。

② 1943年7月24日，墨索里尼被推翻。9月3日，意大利与盟国达成停战协议。

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能立即心领神会，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就连扎花圈也不是太平无事的职业。再者，由于罗马式花圈原本是仿造罗马建筑门面的石雕装饰花环而产生的，因此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也有理由予以严格取缔：这种花圈被说成是“死的”，所有其他的花圈形式被说成是“活的”。瓦尔特·佩尔策是莱尼那个时期生活情况的重要证人，尽管他名声不佳，但能比较可信地证明，他在1943年底1944年初“被妒忌者和竞争者”向手工业协会告发，他的档案中添上了有“生命危险”(佩尔策语)的一条：“仍在罗马化”。“天啊，当时这有可能要我的命”(佩语)。1945年以后，当人们议论佩尔策的不光彩历史时，他自然设法“凭这一点”证明自己“在政治上受过迫害”，而且——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依靠莱尼的帮助——他居然得逞了。“因为那些花圈确实是她——莱尼，我是说普法伊弗太太——自己发明的：用石楠扎花圈，平整牢靠，确实像涂了一层瓷漆，而且——我可以告诉您——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与罗马化之类风马牛不相及——那是普法伊弗太太的发明。可这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有人说它是罗马式的变种。”

佩尔策如今年已古稀，退休在家，靠不动产为生，在二十六年之后谈起此事仍心有余悸，并且不得不暂时放下他手中的雪茄，因为看起来咳嗽要发作。“总之——我为她干的事，我掩盖的那些事——真是性命交关，比罗马化的嫌疑还严重。”

从这时起与莱尼长期亲密共事、每天在一起干活的那十个人中还能找到五个，包括佩尔策本人和他的园艺师傅格龙奇。如果把佩尔策和格龙奇两人恰如其分地称为莱尼的上司，那末，曾与她或多或少平等地共事过的其余八人中还有三人健在。

佩尔策住的房子，虽然他自己说是平房，但人们尽可称之为华丽的别墅（他没有把“别墅”念成“别野”），那是一栋黄色瓷砖建筑，只是外表像栋平房（经过扩建的地下室有一个豪华的酒吧、一间被佩尔策布置成类似花圈博物馆的活动室、一间客房和一个应有尽有的酒窖）；除了黄色（瓷砖）外，主要的颜色是黑色：栅栏、房门、汽车间的门和窗框——全都是黑色。怪不得看上去像一座陵墓。佩尔策同一个女人住在那栋房子里，她叫夏娃，娘家姓普鲁姆特尔，大约有六十五岁，神情相当忧郁，她那漂亮的脸孔由于悲痛而变了模样。

阿尔贝特·格龙奇，现年八十，一直还“蛰居在他的壳中，实际上是在坟场里”（格自述）。那是一幢两间半房间大小的（砖）石棚屋，从那儿到他的两间温室去十分方便。陵园扩建时，格龙奇没有像佩尔策那样捞一票（必须补充一句，他也不想捞一票），只是抓住“我当年愚蠢地送给他的温室土地”（佩尔策语）死也不放。“几乎可以说，等到他一命……等到他两腿——嘿，就这么说吧，等到他去世，园林和陵园局就会松一口气。”

陵园不仅早就并吞了佩尔策苗圃的那儿公顷土地，而且也并吞了其他苗圃和石匠作坊。在它的中心，格龙奇过着一种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反正他享受伤残保险金（“我继续给他付人寿保险费。”——佩尔策语），住房不要房租，自种烟叶和蔬菜，而且由于他是个素食主义者，食品供应问题不大；穿衣几乎不存在问题——他一直还穿着老格鲁伊滕1939年给自己做的一条裤子，后来莱尼在1944年把这条裤子送给了格龙奇。他完全改做（他自己的话）“季节性盆花买卖”（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卖

绣球花，母亲节①卖仙客来和勿忘草，圣诞节卖小盆圣诞树，树上饰有缎带和蜡烛，供扫墓用——“他们在扫墓时都用些什么东西——真不可思议”）。

笔者觉得，如果园林部门确实指望靠格氏去世来从中取利，那就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因为他根本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成天呆在家里和温室里足不出户”（市园林工人语），而是“在响铃闭园之后”，把现已规模庞大的陵园“当作私人花园，而陵园闭园的时间往往很早；我尽情溜达，有时坐在长凳上抽一袋烟，兴头上有时也到一座无人祭扫或被人遗忘的坟墓去整理墓地，弄些苔藓或枞树枝，有时添上一枝鲜花；信不信由您，除了几个偷盗有色金属的贼以外，我还没碰到过什么人；当然有时会有几个疯子，他们不信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他们翻墙头进来，夜间到墓前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祈求等待——不过这种情况我在五十年中只遇见过两三次——这时我自然悄悄走开，再就是，每十年左右，也许会出现一对无所畏惧、毫无偏见的情侣，他们明白，世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僻静的去处——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也悄悄走开。现在我当然已不清楚在陵园外围地区发生的事情了——可我告诉您，冬天下雪时这里也很美，夜里我穿得暖暖和和的，脚上穿着毡靴，抽着烟斗，出去溜达——万籁俱寂，他们全都十分安静，十分安静。当然，要想把女友带到我家就很困难；您知道，毫无办法——她们越是浪荡，就越是没有办法，即使给钱也没用。”

谈到莱尼，他几乎感到为难。“当然罗，普法伊弗太太——我记得她！我怎么会忘记她呢！莱尼。当然罗，所有的男人都

① 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

追求她，可以说是所有的男人，包括小滑头瓦尔特（指现年七十的佩尔策——笔者），可是又没有一个有此胆量。她难以接近，倒不是说她假正经，我年纪最大——当时我已五十五岁了——根本想也不用想，其他人当中大概只有克雷姆普——我们叫他'下流坯赫里贝特'——尝试过，她以冷淡简慢的方式叫他碰了一鼻子灰，终于死了这条心。小瓦尔特对她试探到何种程度，我就不知道了——但他肯定在她那里一无所获；至于其他人嘛，全都是妇女，当然这是战争造成的，她们分成两派，实力几乎不相上下，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不是针对她，而是对那个俄国人。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她的心上人。您想想，这件事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一年半——没有人发现，我们当中谁也没有看出什么苗头：他们做得很巧妙，小心谨慎。嘿，那当然得冒很大的风险：两条人命，肯定是一条半人命。妈的，一想到这个姑娘所冒的风险，我还心有余悸，从后背一直凉到屁股。业务水平？您问她的业务水平怎样？是啊，也许我有先入之见，因为我喜欢她，真喜欢她，有时就像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有女儿的人有了一个女儿一样喜欢，或者——我毕竟比她大三十三岁——像喜欢一个永远得不到手的恋人一样。喏，她简直是有天赋——这就能说明一切了。我们只有两个科班出身的园艺师傅，把瓦尔特也算上才有三个，可他整天只惦记他的帐簿和他的钱柜。这两人，一个是赫特霍尼，年轻时参加过青年运动①，可说是知识分子型的园艺师，女子中学毕业后上了大学，后来搞园艺，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信仰土地和手工劳动——诸如此类——不过她有两下子；一个就是我。其他人都没有学过

① 1900年前后在德国兴起的青年运动，主张摆脱成年人的管束，创造一种符合青年特点的生活方式。

这一行，霍埃特、克雷姆普、谢尔夫、克雷默尔、汪夫特和策芬——大多是娘儿们，已经不是那么年轻漂亮，反正没有一个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想同她在泥炭末①和插花料之间躺下。是啊，才过两天我就明白了，普法伊弗决不适合于干一件事，即做花圈架子，那是粗活，相当艰苦；花圈架子组有霍埃特、谢尔夫和克雷姆普三人，他们仅仅拿到一张清单，上面写明他们所得到的大批枝叶原料——根据货源情况而定，后来几乎只剩下橡树、山毛榉和松树叶子了——以及花圈大小，通常为标准尺寸，不过也有用于隆重葬礼的，我们规定用缩写B1、B2和B3代表一等要人、二等要人、三等要人；后来知道，我们内部记帐时也用H1、H2、H3表示一级英雄、二级英雄、三级英雄，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大发雷霆，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感到自己也受了侮辱，因为他是一名二级英雄：高位截肢，一条腿，有几枚勋章和奖章。因此，莱尼进架子组不合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便将她分到修饰组，让她和克雷默尔、汪夫特一起干活——我对您说吧，她是个修饰天才，或者，要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个插花能手。您真该瞧瞧她是怎样摆弄桂樱叶和杜鹃花叶的，最贵重的材料可以交给她，万无一失，什么也不会折断——许多人从来搞不清楚的东西，她一看就明白：修饰工作的窍门、要领在于花圈架子左上方的部位，这样花圈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几乎可以说是乐观的上升印象；如果着重修饰右边，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下滑印象。她也决不会把几何图形和草木图形混在一起——我对您说吧，她决不会的。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在修饰花圈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我不得

① 农业上可做有机肥料，用于改良土壤。

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纠正她一点：她偏爱纯几何图形——菱形、三角形，而且有一次在做一个一等要人花圈时用雏菊搞出一个六角星①，完全是出于闹着玩儿弄几何图形，肯定不是有意的，就这样经她的手出现了，而且她也许至今还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神经过敏，竟对她十分恼火。想想看，假如那只花圈未经检查就上了灵车——总而言之，人们更喜欢笼统的草木图形，而莱尼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编个小花篮呀，甚至还有小鸟——尽管已不全是花草树木，但也自成一体嘛——再者，如果扎一个一等要人花圈时需要用玫瑰花，小瓦尔特也舍得拿出玫瑰花，甚至是含苞欲放的名贵品种，这时莱尼就成了艺术家：她能扎出整幅风俗画来。其实，这太可惜了，因为这些画很快就消逝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有一个池塘，池塘里还有天鹅；嗯，我对您说吧：如果评奖的话，所有的奖都会被她夺得，而——至少对小瓦尔特来说——最要紧的是：她用一点修饰材料比许多人用好多材料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此外，她还精打细算。然后，做好的花圈经过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组成的验收组——最后，没有一个花圈在送走之前不经过我的手。赫特霍尼检查花圈架子和饰物，必要时进行修补；策芬呢，我们管她叫缎带大娘，负责装缎带，这些缎带是市里供应的——干这活当然必须十分经心，以免搞错。如果有人订购一个花圈，上写‘汉斯千古——亨丽黛敬挽’，可拿到手的花圈缎带上写的却是‘献给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奥托——埃米莉’，或者反过来——花圈那么多，有可能闹这种笑话。最后用送货车，一辆破三轮摩托车，把花圈送往教堂、军医院、国防军机

① 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必须佩带黄色六角星标志。

关、党部或殡仪馆——这份差事，小瓦尔特是不肯让别人去干的，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外出逛一逛，挣点小费，歇一会儿。”

由于莱尼从未向洛蒂，也没有向范·多尔恩或玛格蕾特、老霍伊泽、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等人抱怨过她的工作，可以认为她确实很喜欢这个工作。看来唯一使她发愁的事是她的双手和手指头吃足了苦头：她把她母亲和父亲的手套存货全部用光后就向所有亲戚讨“旧手套”。

也许她暗自思念已去世的母亲，思念父亲，时常想念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甚至可能想念已去世的阿洛伊斯。就这一年而言，人们说她“和蔼可亲、非常安静”。

就连佩尔策也说她：“沉默寡言，天哪，真是金口难开！不过她讨人喜欢、和蔼可亲，是这个时期我最得力的助手，如果不算格龙奇和赫特霍尼的话；格龙奇是个识途老马，赫特霍尼却太死板，像个老学究，常常去纠正好的主意。普法伊弗不仅具有设计才能，而且善于利用植物，她本能地知道，使用仙客来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不同于长柄玫瑰或芍药。不瞒您说，每当要我提供红玫瑰做花圈，就等于使我在经济上遭受一笔损失——因为红玫瑰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把玫瑰花看作是唯一能送给自己意中人的礼物——尤其是在年轻军官同女朋友下榻的旅馆里很好脱手。我经常接到旅馆门房打来的电话，他们有时不仅给钱，而且用好货交换一束长柄玫瑰。用咖啡、香烟、黄油甚至衣料——我是说有一次用精纺毛料——同我换，而且多多少少叫人惭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用在死人身上，给活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

就在佩尔策为玫瑰花操心的同时，莱尼差一点成了住房管

制的受害者：当局认为，一套七居室带厨房、浴室的住宅共住七人（老霍伊泽夫妇、洛蒂带着维尔纳和库特两个孩子、莱尼、范·多尔恩）未免太少。到那时为止，这座城市毕竟已经历过五百五十多次空袭警报和一百三十次空袭，霍伊泽全家获准居住三间——当然是大的——莱尼和马尔娅·范·多尔恩“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才得以每人保留一间”（马·范·多尔恩语）。可以认为，那位不希望披露名字的地方政府高级人士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尽管此人谦虚地否认“曾帮过忙”。不管怎样，还有两间屋子要拿出来“分配”，“而此时已被一枚爆破炸弹赶出自己的兔窝（洛蒂·霍伊泽语）的普法伊弗一家想尽办法，令人讨厌地要‘同我们亲爱的儿媳妇一起住’。老普法伊弗就像利用他那条跛腿一样，在受到轰炸这一点上大做文章，竟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现在我把自己正大光明地挣来的一小份家业也献给祖国了’（洛蒂·霍伊泽引述）。我们当然全都吓了一跳，可后来玛格蕾特就从她的大亨（？？——笔者）那儿了解到，老普法伊弗即将同他教的那班学生一起被疏散到农村去，于是我们就让步了——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这儿赖了三个星期，后来尽管他的腿一瘸一拐，还是被疏散下乡去了，带走了他的婆娘，只有讨人喜欢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留在我们家，他已自愿报名入伍，只等入伍通知下来就走，而当时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洛蒂·霍伊泽语）。

在打听谁是莱尼在花圃工作期间的主要对头的确切情况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笔者在仔细翻阅户口簿和团队花名册等资料而一无所获之后，想到去阵亡将士陵墓管理处请求帮助。向该处查问后了解到如下情况：赫里贝特·克雷姆普，二十五岁，

三月中旬在莱茵河附近阵亡，埋在法兰克福至科隆的高速公路附近；了解到克雷姆普坟墓所在地，再去查找其父母的地址，就不难了，尽管同他们的谈话非常不愉快；他们证实，他曾在佩尔策的花圃工作过，在那里“就像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一样循规蹈矩、纯洁清白——后来祖国情况危急时就再也拦不住他了，他不顾一条大腿已截肢，于三月初自愿参加人民冲锋队①，光荣牺牲，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看来克雷姆普的父母觉得自己儿子的死完全正常，期望从笔者口中听到几句赞扬的话，但他实在说不出口，而且在看到向他出示的遗像时也不太热心，因此他觉得最好赶快告别，就像访问施威格特太太那次一样；照片上的是一个（对笔者来说）不大讨人喜欢的人，大嘴巴，低额头，浓密鬈曲的黄头发和圆溜溜的眼睛。

为了搞到三名尚健在的、了解莱尼战时在花圃工作情况的女证人的住址，需要直截了当到户籍管理处去查问。付一小笔手续费，这个要求就得到了满足。第一位是当年领导花圈验收组的莉安妮·赫特霍尼太太，现年七十，是一家拥有四爿花店的联号商店的老板。她住的房子是一栋坐落在几乎仍保留乡村风光的市郊的非常漂亮的小平房，有四个房间、厨房、门厅和两间浴室；屋子陈设美观大方，无懈可击，色调和造型彼此协调，并且由于她藏书可说汗牛充栋，在室内装潢上用不着操心。她很冷静，但并非不亲切，一头银发，打扮得很考究。在佩尔策曾经出示的那张摄于1944年的全厂职工联欢活动照片上，大概谁也认不出那个围着头巾、神情严肃、略显矮胖的小个子女人

① 纳粹德国在1944年9月成立“人民冲锋队”，吸收老人和儿童参加，协助国防军防守国土。

就是这位端庄稳重地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娇滴滴的徐娘；用细银丝编的耳环样子像小篮子，里面各有一颗圆珊瑚球在滚动，另外，她还不断地转动她那一对仍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使得她的脑袋成为一个有四处在颤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目标：耳环在颤动，耳环里的珊瑚球在颤动，她的脑袋在颤动，脑袋上的眼睛也在颤动；她的装扮得体，脖子和手腕上微皱的皮肤看来保养得不错，但这决不是赫太太想隐瞒自己的年龄。茶，花式小点心，盛放在一只银烟盒（勉强可放八支）里的香烟，一支点着的蜡烛，火柴放在一个手绘瓷盒里，瓷盒上画的是黄道十二宫图，但只有十一幅图，正中是以传统手法画的人马座，粉红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呈天蓝色的星座，使人猜想赫太太是人马座下凡；窗帘是略微带紫的玫瑰色，家具是浅褐色，核桃木，地毯是白色，墙上没有被书橱遮盖的地方挂着手工精制着色的莱茵河风景版画，有六七幅（笔者对此不敢担保绝对准确），大小最多为六乘四厘米，很精致，像宝石一样晶莹：从博伊尔看波恩，从德伊茨看科隆，从莱茵河右岸乌尔登巴赫和鲍姆贝格之间看从斯，奥伯温特，博帕德，雷斯；此外，笔者还想起曾看到过克桑滕，被艺术家移到更加靠近莱茵河的地方，与地理位置略有不同——由此可见，一定是七幅。“是呀，不错，”赫特霍尼太太说，并把银烟盒递给笔者，他觉得她的神情像是预期他不会取出烟来抽（他不得不使她失望，并且也看到她脸上掠过淡淡的一丝不悦）。“您看得没错，全都是莱茵河左岸风光（她的敏感迅速超过了笔者的理解、洞察和解释速度）。我从前是分离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分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在思想上；1923年11月15日，我曾在埃吉丁贝格受伤，不是站在光彩的一方，而是站在不光彩的一方，但我一直仍认为这是光彩的一方。谁

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这块土地不属于普鲁士，从来就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德意志国。我今天仍是分离主义者，不是主张成立一个法国莱茵兰，而是主张成立一个德意志莱茵兰。以莱茵河作为莱茵兰的边界，当然也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与一个非沙文主义的法国为邻，当然是共和制的法国。嗯，我于1923年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当时不得不改名换姓，后来，1924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1933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马克思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流亡，不想再度流亡。您知道为什么？我爱这个地方，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您尽管搬出黑格尔的话(笔者不想搬出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生不逢时。1933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干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管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①，既麻烦，又危险，可我在法国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于1924年死于巴黎一家妓院，他们干脆偷梁换柱，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我让巴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证明这件事，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虽然这件事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道，他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子'。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在巴黎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

① 纳粹统治期间说明一个人是否雅利安人的证明。

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要好一些。”

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浓三倍，还有可口的小点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那个并不比核桃壳大的烟灰缸几乎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蒂。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点，因此，尽管他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感并未减少。

“您可想而知我那时的惊惧心情，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露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进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① 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子上干活。佩尔策嗅觉一向很灵敏，准是觉察到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在鲜花和绿树上弄手脚时，我害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由于他遇到危险，就想辞职不干。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我肯定他什么也不知道，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出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着重念我的名字，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道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死于集中营。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我没有想到她会有此胆量。再者，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

① 全称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其成员为右翼保守派，1933 年与纳粹党组成联合政府。

1945年他就知道英语管花叫‘flowers’，不过花圈没说对，他把花圈叫‘circles’①，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体哩。”

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他在这期间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蒂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并且不无好感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美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②、斯丹达尔③、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皮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爱的衣服一样。

“是呀，我爱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在1929年就看过本亚明④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沉默寡言，固执倔强；我首先得到‘女士’的外号，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弄明白为什么莱尼那么古怪，几乎叫人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她对金钱、时势等等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的；她本来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进；倒不是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她甚至胸有成竹，嗯，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和波利斯·

① 德语花圈为Kranz，该词还有“圈、环”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circle，但circle另有“党派、圈子、集团”的意思。

②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著有《追忆逝水年华》等作品。

③ 斯丹达尔(1783～1842)，法国小说家，著有《红与黑》等作品。

④ 本亚明(1892～1940)，德国文学理论家。

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他们就要倒霉了。不只是开始时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名堂，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我们每周挣二十五至四十马克，视津贴和加班情况有所不同，后来佩尔策还发给我们所谓“清单奖”：每个花圈额外补发二十芬尼，分给大家，这样每周也能收入几个马克，可莱尼每周光喝咖啡这一项就至少花掉两周工资，这怎么能行呢，尽管她的房子还有房租收入。我常想而且今天还在想：这个姑娘真是少见。你真不知道她究竟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头脑简单——虽然听起来自相矛盾，我却认为她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大智若愚，又是头脑简单．只有一点她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她不是那种人，不是的。

“1945年我没有得到赔偿金，因为弄不清我是作为分离主义者还是犹太人转入地下的。转入地下的分离主义者当然得不到赔偿——而作为犹太人，那就请你证明你是蓄意破产以转移人们对你的注意吧。我只拿到一张经营园圃和花店的执照，而这也是靠法国军队里的一位朋友才弄到手的。1945年年底，我就把莱尼请到我的店里来工作，当时她带着孩子，生活相当困难，她在我的店里待了二十四年，到1970年。我曾经不止十次或二十次，不，是三十多次，提出请她主持一家分店，和她合作经营，她可以穿件漂亮衣裳坐在店堂里接待顾客，可她宁愿穿上长罩衫，站在冷冰冰的后屋编花圈、扎花束。没有上进

心，不想高升。有时我想，她是个幻想家。有点怪，但很可爱。而且，当然罗，我认为这有点像无产阶级。她还相当娇生惯养：您知道，即使当了工人，每周工资至多五十马克，战争期间她仍把她家的老佣人留在身边——您知道那个女佣人每天给她烘烤什么吗？几个新鲜小面包，喷香松脆，告诉您吧，有时我直流口水，简直不顾'女士'的身份，真想说：'孩子，让我咬一口，请你让我咬一口。'您可以放心，她是会让我咬的——啊，只要我求她，而且，既然她现在经济状况如此困难，她就尽管来找我借钱好了——可您知道，此外她还怎么样？骄傲。只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才会这样骄傲。至于她的扎花手艺，她被估计得过高了；当然，她心灵手巧，但我觉得她的修饰金银丝用得太多，过于精细，像刺绣，不像好看的粗针编织；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金银饰工，可干花活——也许您会感到意外——有时要大胆泼辣，她却从来也做不到，她的修饰颇有新意，但不大胆。不过，要知道她是半路出家，能学得这么快就已经了不起了，从主体上说很了不起。"

由于茶壶不再举起，银烟盒也不再打开呈上，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事实证明不错)。他觉得赫特霍尼太太对完善莱尼的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赫太太还让他看了看她的小小的工作室，近来她在那里又搞起了园林艺术。她正在为未来的城市设计"空中花园"，她称之为"塞密拉密斯"①——对于一名如此热心的普鲁斯特读者来说，笔者觉得这个字眼不太富有想象力。告别时，笔者感到这次访问终于结束了，但今后仍有可能前来访问，因为赫太太脸上仍然保留着十分亲切的

① 塞密拉密斯，相传为公元前900年亚述国女王，她采用立体手法，将花园置于高高的平台之上，被称为空中花园，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神色，尽管已露出倦容。

马尔加·汪夫特和伊尔泽·克雷默尔两位女士的情况可以同时说明：两人都享受伤残保险金，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两人都已白发苍苍，住的都是一套一间半居室的大众化廉价公寓住宅，用火炉取暖，家具是50年代初的产品，两人都给人以"不富裕"和苍老的印象，可是——这儿开始有所不同——一个(汪夫特)养了一只玫瑰鹦鹉，另一个(克雷默尔)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汪夫特——这方面差别变得明显——神态严肃，几乎很难接近，嘴闭得紧紧的，好像是在不停地吐樱桃核，由于嘴巴小而很费劲，不愿"多谈这个放荡的女人。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料到，但没有弄清此事，为此，今天我还该打自己耳光。我真希望看到她剃光头，在大庭广众中受众人耻笑，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子弟在前方打仗，她的丈夫也阵亡了，而她却同一个俄国佬搞上了，而且她的父亲是个大奸商——三个月后就让她领导修饰组而不让我干。不。不过是个荡妇罢了——不知廉耻，总是凭她的色相——把男人们弄得个个神魂颠倒，格龙奇像只公猫向她摇尾乞怜，佩尔策把她看作是二号性爱后备对象，就连一向勤勤恳恳地干活的好工人克雷姆普也被她弄得晕头转向，变得十分讨人嫌。她还摆出贵妇人的派头，其实不过是个潦倒的暴发户。别提它了。她没来之前，我们大家干得多和谐呀！打从她来了以后，总是有一种紧张气氛，从来也没有爆发过——如果打一架，倒能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嗯，那一套庸俗的外行的摆弄花的手法，他们全都上当了。不，打从她来了之后，我就孤立了，彻底孤立了，我才不吃她请喝咖啡那一套呢，我们称之为'甜言蜜语、奉承巴结'，只不过是个

臭婆娘、破鞋、十足的淫妇。”汪夫特并不是像写出来这样一口气说的：一点一滴，就好像是从她口中挤出来的，她本不想多谈，但还是谈了，说老格龙奇是“不走运的法翁①或潘②，随您便”，佩尔策是“我所见过的最坏的无赖和投机分子，我在党内为他出过力，保过他。我是党（盖世太保？——笔者）信任的人，因此人们总是听取我的意见。战后呢？取消了我的抚恤金，因为我丈夫不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而是死于1932年至1933年的街头武斗。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和我丈夫一样参加过冲锋队，却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靠小婊子和犹太女士的帮忙，他顺利过了关，而我却被关进去，蹲了班房。不，别提那些人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恩图报和公正可言，我已看破红尘了。”

就在同一天，笔者还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她提供的有关莱尼的情况寥寥无几，只说莱尼是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可怜的姑娘。而那个俄国佬啊，我得对您讲，当时我就十分怀疑，今天仍怀疑。我怀疑他是不是盖世太保的密探。他说的德语多棒，又彬彬有礼，为什么偏偏到花圃来，而不到敢死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他是个好小伙子，不错，但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至少不超过工作所需要的范围。”

克雷默尔太太当年一定是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如今已白发苍苍，眼睛几乎已没有色彩。面部柔和，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没有恶意，只是有些哀伤，愁眉不展，但说不上是苦恼，用咖

① 罗马神话中农牧之神，半人半羊，性淫荡。
② 希腊神话中主宰森林畜牧之神。

啡招待客人，自己却一口不喝。她说话慢慢腾腾，轻松自然，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自己动手卷烟，动作无比纯熟精细，不仅令人感到惊讶，简直叫人拍案叫绝：用有点润湿的黄澄澄的烟丝卷烟，准确无误，用不着用剪刀剪去碎絮。“是啊，我很早就学会了这一手，这也许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1916年给我被关在堡垒①里的父亲卷，后来给我坐牢的丈夫卷，然后我自己也坐了半年牢；失业时期就不用说了，后来又是战争时期——卷烟的手艺我从来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蓦然间，她口中叼着刚卷好的白色烟卷，不难想象她青春年少、绰约动人的样子；自然她也请客人抽一支，不声不响，只是把一支烟从桌子上推过来，用手指一指。

“不，不，我不想干了，不想干了。1929年我就不想干了；我本来就精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只有我的儿子埃里希才使我有勇气和力量，我始终希望战争能在他长大前就结束，但他还是赶上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这孩子文静老实，不声不响。他临走时，我平生最后一次冒着危险说了一句带政治性的话。‘跑过去，’我说，‘尽快。’‘跑过去？’他问，像平时那样皱着眉头，于是我向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神情奇怪地望着我，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会说出什么，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干，大概也来不及了。他们在1944年12月把他送到比利时边境去挖战壕，我直到1945年年底才得知他已经死了。十七岁。这孩子一向神态严肃、闷闷不乐。他是私生子，您要知道，父母都是共产党。在学校里和

① 从前德国监禁政治犯的地方。

街上，他听到别人这样说。他的父亲死于1942年，祖父母本身一无所有。好了。我在1923年就认识了佩尔策。您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您一定猜不到。是在共产党内。他看过一部法西斯的宣传影片，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叫人望而生畏，不料却对他产生了吸引力。瓦尔特把革命跟打砸抢混淆了，完全弄拧了，被战斗同盟①开除后，参加了自由团②，之后，1929年就参加了冲锋队。有一阵子他还当过皮条客。此人什么都会。他当然也懂园艺，当倒爷，随您怎么说都行。好色之徒。您想想，花圈场的职工有哪些人：三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两个中间派：弗莉达·策芬和赫尔加·霍埃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和犹太人；莱尼政治上不好定性，由于她父亲的丑闻而受牵连，但至少是阵亡军人的遗孀；再有就是那个俄国佬，佩尔策对他确实大献殷勤——战后他又能出什么事呢？太平无事。1933年以前，他对我以‘你’相称，我每次见到他，他都说：‘嗯，伊尔泽，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1933年至1945年，他对我改称‘您’。美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拿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又叫我伊尔泽，以为我现在一定会当市议员了。不，不，不——我已经等待太久了；孩子离家时我就该洗手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早就不想再干了。莱尼在1944年年底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坐在那里抽了一支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神色有点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我甚至知道她大概会说什么，但我不想知道。一个人决不要知道得太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由于她一声不吭、心神不安地笑眯眯坐在那里，最后我就对她说：

① 指德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战线战士同盟。
② 右翼军事组织。

‘嗯，看得出来你怀孕了。有个私生子，这意味着什么，我是知道的。’啊，后来战争结束后，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闹得乌烟瘴气，还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我知道那帮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您知道我叫他们什么吗？祭坛侍者。不，不——这个糊里糊涂的莱尼夹在中间，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他们居然说服她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的身份充当拉选票的金发女郎。她想给她的小男孩取名为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嗯，后来大概所有亲友都加以劝阻，她才放弃这个打算，但这样一来，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几年后还有人叫她‘金发苏联婊子’——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不，她从来没有过过轻松日子，至今仍然如此。”

第 六 章

为了防止没有根据的猜测，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此人，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1943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莱尼即使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不过有时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说出了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对他的命运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必要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了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他的姓名。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可惜这位大人物很晚很晚，一直到1952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他在这一年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

波利斯几乎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当然也有人说他是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有一点是确凿的：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他在1943年年底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身材瘦削，金发，体重至多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带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1941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一年半以后作为苏联战俘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

这里还得交代一下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笔者对此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男主角为什么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斯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无法忍受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甚至差一点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喝虚构的大麦粥，就

得险些送命吗？

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他毕竟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①，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尽管他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东西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如果承认他在年轻时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业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末，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恐怕也愿意承认，他并不比莱尼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

我们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波加科夫现年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悔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使他满腹狐疑，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虽然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

① "哀悼经"是《圣经》第一百三十诗篇，此处原文是拉丁文。

关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同住，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但并非什么精美的食品”：腌黄瓜。

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是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瘦骨嶙峋、沉默寡言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简直摆脱不了乡思”。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贝伦科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

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不消说是去买“香烟”的时机。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由于“几十年在夜里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他的双手确实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如今我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自己）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受用的抽烟架”；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套圈，用两只衣夹

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夹住一个烟嘴儿，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① 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笔者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而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从而使他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他的话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

“我们的处境自然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到我们营里来，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到后来才知道此人是谁；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谁要是敢往自己口袋里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一根铁钉对于一个囚犯来说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白天他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当我得悉此事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却使我们感到忌妒，而这

① GPU，1922～1934年间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其前身为契卡。

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①]上学，有一个同学每天早晨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后来，他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他的处境才略有改善，不过还谈不上受用，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最后他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就天晓得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1941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因为笔者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掌握许多条线和联络点。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以权谋私，里通外国，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您就别问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啦！也许他们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却始终不知道：他的父亲因此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他究竟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下场是非常不受用的，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那些顶好的衣服是否直接来自那位先生

① 苏联白俄罗斯东北部城市。

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坚强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同他们一一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是否与此人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虽然他们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根据他的情报，1944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为他的受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他确实有个相好的女人，后来甚至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因此他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卉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虽然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巧妙地折叠成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羊绒背心是灰色的，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因为这件背心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

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从此以后，波利斯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他从此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这种消息来鼓起我们的士气——由于他受到维克托的垂青，他自然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

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这么多情况，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把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打发走，笔者甚至还买了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好让他们去看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1]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2]的精彩表演。

这时，笔者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1900年至1970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即使在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如果它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决不说出这个名字，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

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今后也许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

① 《日瓦戈医生》是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一部长篇小说。

② 罗斯特罗波维奇（1927～　　），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1974年定居美国，1977年成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指挥。

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透露这些情况——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喝过几杯相当不错的茶（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拮据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之后就到了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这位先生相当粗鲁——确实如此——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于是，咪咪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

是否要描写一下这位先生？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坐在一间客厅里，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英国草坪、德国树木，最小的一棵树大约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①、沃霍尔、劳申贝格②、瓦尔德米勒③、佩希施泰因④、普尔曼⑤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这里也有T、W、L2和S1 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

"您是想了解这位波加科夫先生——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

① 夏加尔(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② 劳申贝格(1925～　)，美国流行画派画家。
③ 瓦尔德米勒(1793～1865)，奥地利画家。
④ 佩希施泰因(1881～1955)，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⑤ 普尔曼(1880～1966)，德国风景、人物和静物画家。

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吧。啃，我只能说大致差不离。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他可能从什么地方了解到呢？（耸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我是1933年至1941年期间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可不是什么没有危险的事，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亲密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苏联重视的是我们，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啃，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这也无关紧要，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我当时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我送给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向他介绍卡夫卡——大概可以说，我是《乡村医生》①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1920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这时我得知了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您是否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您是否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

① 卡夫卡的一组短篇小说，发表于1919年。

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我认为这一切全都对头吗？这时（声音由弱变为很弱）我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可这小子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他是否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倒不是在集中营里，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您知道什么叫采石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他觉得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尤其是根本不给他回答的机会。）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这种责备口气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也从未有过这种可能，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先把他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这样他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他在斯大林格勒

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最后，这个党内大人物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如果您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这一点——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搞到这张证明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7月20日①以后，风声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这时候谁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

① 1944年7月20日，德国军队内部一些军官企图刺杀希特勒未果。

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

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波加科夫这时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谈起来简直滔滔不绝，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也不在乎。

“嗯，”波加科夫说，“根本用不着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1943年至1944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后来，我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枪炮声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毫无这个意思——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不停的枪炮声使他神经过敏。”

这里必须回忆一下，1943年末1944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

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发表演说的市长、地方党组织头头、团指挥官、教师、战友、企业领导人——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遇难者的人数、死亡方式、级别、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下面引用格龙奇的原话：

“听上去往往如此，好像陵园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礼炮声当然应当像一声炮声——我自己在1917年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这种愿望往往不能实现，声音听上去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把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

如果此处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末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他们。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死者家属中几乎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这些恐怕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隆重的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陵园每天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有些人也许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波加科夫：“怀疑那姑娘的时间当然不长，一天或两天，在

她把手放在他手上，他碰到这种事(??)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当那姑娘直截了当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当时他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从来不曾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让这个姑娘知道(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如果爱上一个女人，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这一点他已经明白，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我喜欢这个小伙子，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我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奸她，为自己开脱，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

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她知道我冒多大风险，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但她不想听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我承认这个字眼是他向我学的。后来我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国内战争时期，他两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①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后来这个朋友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详细身世了。有一天，这位老大娘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干脆就给他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我差一点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他一点也没有犹太人的口音——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此人明白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这块缝上去的皮才禁不住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

① 加利西亚地区，原为奥匈帝国领土，现分属波兰和苏联。

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不是因为女人的事——我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他命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

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这可太过分了。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饶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我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我当然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他有几次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调查——原来他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 听 懂 歌 词内容——您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您认为这样做明智吗？——您想想，如果他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

红旗飘全球。’您看，我被扣上红帽子并非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平时我们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你怎么给了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战争已差不多打赢了。’这句话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

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高级）轿车，他妻子有一辆（中级）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以后还有多次），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

“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看不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我女儿甚至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她懂得什么是第一世界吗？懂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后来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

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早已不按时交付房租，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我就爱上她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这些我隐瞒了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1933年以后，我伤害过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吗？没有。不错，在那以前我有点粗暴，我承认。可1933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唯一一个也许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按照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从莱尼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 1943 年12 月底或 1944年 1 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形成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的话，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当时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如果她从

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甚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马上就知道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羡慕、不快、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1944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我们的莱尼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您要知道那是一比三的咖啡，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她用自己的杯子从自己的壶里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对莱尼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这种咖啡的香味本来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他平常坐在那里干活，他的假腿解开放着，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处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

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还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以此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除了讨厌的格龙奇，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表达了它，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你怎么能说清其重要的政治含义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这时莱尼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这么一个杯子很快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接着她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看也不看克雷姆普。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整个场面具有多大的政治意

义——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慧、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您听着，他可能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幸而这样一来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赫特霍尼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克雷姆普叽里咕噜地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格龙奇第二次笑了，我第二次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这时莱尼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她从自己的壶里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

1943年底1944年初莱尼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想进一步广泛收集材料，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附带提一笔，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

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我对这一幕记忆犹新，至今我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既然您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追击布尔什维克（1944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呆在暖和的屋子里，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

赫特霍尼：“嗯，当时我不寒而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那里面有一种——我说是冷静的——真诚和人性，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时间很长，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地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

格龙奇：“当时我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她认识这个小伙子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也不能说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莱尼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就给

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虽然对劣等民族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我觉得至少有五分钟。”

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可以进行测定：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自来水龙头离莱尼的桌子（这里放着咖啡壶）有两米——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莱尼很可能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洗擦杯子、倒咖啡就无需模拟了，他——笔者——试验了三次，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这里，笔者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会弹钢琴，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由于艾哈

德的遭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情欲不遂的寡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育——但这些成问题的特性及其总体都无法解释，她在我们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动，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到那时为止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她为什么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一个苏联战俘理所当然地、(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连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都闹不清楚，那末，她根本不明白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么？

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她提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人人都能得到一杯咖啡。不管是要饭的、吃闲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这是毫无问题的，人人都能喝上一杯咖啡。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她会给任何一个人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甚至最坏的纳粹分子她也会请他喝一杯。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她就是这种人，并且真诚热情、

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这里切不可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1943年底1944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有这种可能。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从个人角度却可以客观地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少数）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我们就一定会明白，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联系起来看。如果莱尼为人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她同样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词不达意地结结巴巴说出几句表示同情的话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好像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至今总是在事后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才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她后来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送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简言之，莱尼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

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唤醒这种潜能，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她可能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估计数)，并没有把她的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这种本领，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

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叙述了结果；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

佩尔策："从此以后，俄国人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这时他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虽然时间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当时我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话听上去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她居然动手了——好家伙，她动手了，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莱尼在男女关系上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

示主动。她当然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

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我们从玛格蕾特那里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

佩尔策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三天后他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她们俩实际上受他领导，不过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这一点。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感情用事。‘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112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卐字[1]和鹰徽[2]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后来他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有一次我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卐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既然您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卐字和鹰徽嘛，我完全清楚自己的历史处境。’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

① 纳粹党党徽。
② 德国国徽。

手，我想强调这一点．如果说我不仅没有为难过他，而且还給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个小伙子简直具有惊人的秩序观念和组织才能——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他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精通数学这一门，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跟不上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当然，这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优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结果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不让他出什么问题，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我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烟草、黄瓜和西红柿。”

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汪夫特在他第二次访问时对他更为冷淡，就把她一笔勾销了。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

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克雷默尔后一次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在赫特霍尼那里，她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直言不讳至今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流连忘返；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是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连续抽烟者的明显反感。

“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让他们不仅吞吃我们的税金，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种空气正是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①，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意思都一样——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北威州——笔者），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任何基督教社会联盟的痕迹——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我赞成过建立这个国家②吗？没有。

① 古代一种刑法：用柏油或蜂蜜涂在人的头上或身上，再粘上羽毛，使其受到屈辱。

② 此处指1871年实现统一的德国。

北方、南方、中部，这和我们究竟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是谁在1815年把我们出卖的[①]？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举行过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健康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我们和这些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分子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笔者答应这样做。）不，我从来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我不太清楚他们那里种些什么，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它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不过我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委屈、受怠慢，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②]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制造麻烦。莱尼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我还得告诉您，您一定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更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为难过什么人，也许克雷姆普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刁难他，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恰恰这种看法错了：鉴于多数人的情况，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克雷姆普实

① 1815年维也纳会议把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划给普鲁士。
② 指电台安排地方话节目的时间分配比例。

在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要设法给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个年轻人，1940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这其实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小伙子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我就这样向您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到了1944年初，一个高位截肢的人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然后，还有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找到，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白兰地、咖啡、香烟的生意哩——这些人差不离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还有衣料；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给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这种人从1944年初起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

眼，失去了一只手，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领袖、人民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这家伙满不在乎，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给他挑几朵花。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他也总想给克雷姆普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高呼当时流行的口号：‘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喜欢动手动脚。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花圈、缎带、鲜花、棺材，他自然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有谁愿意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呢？再者，由于军人和平民死得越来越多，最后一口棺材不仅反复多次使用，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后只是草草一卷；多多少少裸露在外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摆样子的棺材停放一段时期，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必不可少的送葬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把坟墓赶紧用土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犹太人埋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不难想到，对棺

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将一只花圈用上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当然需要有人组织、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有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最后一直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在顾客订货时就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常常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也有一定机会重用，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绸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就可以取出来使用。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1]。最后，波利斯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他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才有可能知道这些——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

克雷默尔对此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

① 意指：小有小的用处，积少成多。

外加班，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垃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去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都包了下来，甚至没有牵扯到格龙奇。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向一座疗养院捐献了一千马克；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①——他说：'先生们，同志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那儿有时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此后有一段时期，他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1944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

① 为涉及内部名誉事件而组成的制裁法庭。

第 七 章

由于老格龙奇的邀请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的好像天上一般的静谧。下面引用的格龙奇的原话，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的，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是坐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丛中，第四次坐在金链花丛中（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丛中备用）。宾主一边抽烟，一边喝啤酒，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这真滑稽。这种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战斗结束后他们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钢盔、步枪、机枪、弹药，甚至还有大炮，每个军用水壶、每一顶丢掉的帽子、皮带等等都拣——当然周围还躺着死人，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有时里面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

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这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这一切当然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并不把条令法律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年纪才十九岁，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的鼻子很尖，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那时候美元和英镑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他选择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在合法的招牌下可以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美国人讲究卫生，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在美元紧缺的时候，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我们这个人的腰包，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我十四岁那年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他的父母，他

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1904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①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他对买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用一种新的说法来说：他不仅探索蓝花②，而且探索新花。他从一开始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是谁开采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是谁为别人创造财富？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我在十四岁那年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他在温室里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1908年到1910年，我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③，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④；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休假时我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喏，那时小瓦尔特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完全不同于他的父亲：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法院执行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

① 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诗人。
② 蓝花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是渴望的象征。
③ 指普鲁士。
④ 布罗姆贝格，现名比得哥什，属波兰。1772年至1919年曾属普鲁士。

的麻烦事，有时我们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花圃从前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花狂潮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海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尽管他像一个发明家一样，对他的花盆和花坛神秘地摆弄了好多年，施肥、剪枝、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难看的杂种。嗯，小瓦尔特六岁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这是他对执行员的简称。‘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是害怕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1914年的事。如果您问我的话：1914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这一点，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我们俩由于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我讨厌那些新兵，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那些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我一批一批地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像小圣像一样带在身上，后来它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我没有参加士兵委员会，不，

对我来说，1914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后来他们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收集金牙、捞美金也许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甚至曾经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尖鼻子，红鼻头，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女人有这种表情我简直受不了：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因此阿德尔海德同教堂的关系对我们大有好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后来，海因茨也开始酗酒……嗯，我能理解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后来他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他从来没有干过园艺活计，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家里的早餐他觉得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这些东西以后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

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

茉莉花从谈话纪要：“他对父母一直不错，确实不错，我差不多相信他真爱他们。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1904年我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后来，瓦尔特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前跪拜，把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1932年他加入冲锋队，1933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他很快就有了一辆新汽车、新衣服，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后来他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1934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您知道，这个姑娘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她的嫁妆中也有几块地产，还有一包现钞。1934年后，他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也不参与伤天害理的事，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即使在水晶夜①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有了孩子，两个可爱的孩子，疼爱得不得了，

① 水晶夜，又译打砸抢之夜，砸玻璃窗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地捣毁犹太人商店，抢劫财物。

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1936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他终于接管了花圃——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的话或者小里小气。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

金雀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如果说瓦尔特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1944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都已没有把握能否挺过去——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长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产。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不收现款，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他收进离市区稍远的地皮，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十分讲究保养身体，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

势力的后台，他不知道是谁——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不过这里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突然开始接近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内心深处从来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他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1933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举报他，尤其是他后来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麻烦事还真不少，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犹太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现在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们俩还帮他发财，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1944年7月离战争结束究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改换门庭是不会错的，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表情况。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

邋遢的人，那就错了。他(过去和现在)非常整洁，衣着讲究，总是戴时髦的领带，这些领带甚至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虽然这里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他很少吐唾沫，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他确实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他什么时候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如果说，他有时脸上也露出笑容，那末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1944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第一次突然失去了他的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1944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1944年7月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笔者掌握着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也许可以说明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1945年3月1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

国人”。他在美国人入城前夕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挂号信的收据也在，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虽然数量已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这时他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他说这句话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甚至有点像念咒，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吗；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我记不得是谁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大家都学他的腔调讲话，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

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是啊，他这句话老挂在嘴上，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后来他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

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有时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也许是那些金牙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缎带、鲜花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战争时期也未停止。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可观的租金——"

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在瑞士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只还能找到该君的遗孀。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她对那件事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人们总是忽略这开恩的一面：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实际情况是，1933年2月，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您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停在后面花园门口，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

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您也别问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把我们送到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只要他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闲聊。有必要再次提请读者注意：佩尔策看上去并不暧昧、油滑、可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人们就会对他已经退休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我一辈子直到今天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解囊相助呀，慷慨馈赠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1919年他死在那儿的野

战医院里），在1923或1922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这样做目的何在？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项链，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我们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收集的钱包——您是否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一辆摩托车的价格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的。

“天哪，难道我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1944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其他人的确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落花有意，脉脉含情。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今天我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为了向您证明我多么诚实，我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把一人打翻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

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让她好好抚养孩子。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她当年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作风正派、精明强干的女实业家。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使我从1944年初就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令人信服地断言，佩尔策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那里堆放着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的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坐在办公室里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通向两间温室，而佩尔策自然对任何一点动静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

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糟透了”，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防空地下室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这间地下防空室，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那末，如果英国或美国炸弹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产生另一个问题：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由谁去看管这个苏联人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里，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我毕竟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即使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防空地下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甚至一枚燃烧弹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

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佩尔策留在办公室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①”(格龙奇语)。

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44年初，当佩尔策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波利斯和莱尼是否已进行“摔交”了？

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住在她家，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两人的说法在时间上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如果说他在1944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1944年2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莱尼在厕所门口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对于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应当原谅。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莱尼明白了意思，尽管“这时那该死的礼炮声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大约在二月中旬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3月18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才进行。那

① 《圣经·旧约全书》叙述上帝创造天地，地上全是水，水面上空虚混沌，一片黑暗。此处借用这一句话。

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投下一枚炸弹。

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茵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如今这两人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而且波利斯感觉到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布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

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原则上我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我同意这两人情况特殊，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今天我对这种事情要开通多了。”

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到处都看

到警告牌：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我决不会主动同男人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打听情况。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没有钉死，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以后他们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接一个吻，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出身、心境、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每送一次大约需要半分钟，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莱尼向他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先得对这些略语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例如波利斯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末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她当然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

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她也就可以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当然这些话无人能懂。有时候那个纳粹分子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有时两人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于是波利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这时他们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父母，谈自己的生平，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战争的历史：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1944年1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1]附近，3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2]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1944年4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此外她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3]。11月里，她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4]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

---

① 克罗沃罗格，苏联乌克兰城市。
② 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乌克兰西部地名。
③ 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均为法国西部地名。
④ 蒙绍，德国西部城市，靠近比利时边境。

程，’她说，‘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嗯，我们全都估计最晚十二月或一月就会得到解放，但战事却拖延下去，这一点她无法理解。接着是对阿登山攻势①和许特根森林②相持很久的战役感到极其忧伤。我向她作了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德国人现在拚命抵抗，因为美国人已踏上德国土地，而且严寒的冬天当然会妨碍进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论此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呀，您要明白，她已怀孕，我们得找个男人，这人要靠得住，可以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只有万不得已时她才肯写上：‘生父不明’。波利斯没事找事——我今天仍认为是没事找事，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节外生枝，有一天对她悄悄地说了一个名字：Georg Trakl③。我们两人目瞪口呆，毫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否建议让此人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那么，他是谁，家住何处？莱尼将Trakl听成了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以为是Truckel或Truckl呢。我至今不知道波利斯1944年9月讲这话时在想什么。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四处打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莱尼急得要命，想要在当天晚上就搞清楚。结果一无所获：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最后，虽然天已不早了，她仍赶回家去向霍伊泽一家刨根问底。一无所获。真叫人难堪，因为第二天她不得不牺牲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去问波利斯这人是谁。他说：‘诗人，德意志，奥地利，死了。’于是莱尼立刻跑到最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在索书单上写下：Trackel，

① 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集中兵力向阿登山脉推进，进攻于数日后未到马斯河即陷于停顿。

② 许特根森林位于艾费尔山北麓，1944～1945年曾在此发生激战。

③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原文。由于Trakl和Trackel以及英语Truckel、Truckl的译音均为特拉克尔，故此处以下均保留原文，以示区别。

Georg——这使一个年纪大的女图书管理员神态严肃地表示不赞成，但最后还是借到了一小本诗集。她满腔热情地接过这本书，在电车上就看起来。我还记得几首诗，因为她每天、每天晚上都把这些诗念给我听。《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很好。另外一首我觉得更好：'少女们伫立在门旁，胆怯地向花花世界张望，润湿的嘴唇在微微震颤，心中充满着希望。'我听了就会失声痛哭，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年纪愈大，感触愈深：我心中充满着希望，无忧无虑——充满希望，无忧无虑——而莱尼非常喜欢另一首诗，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每当暮色降临，常见斯人倩影，亭亭玉立井旁，每当暮色降临，她就前去汲水，水桶上下不停。'这些诗都是那本小册子里的，她把它们都背熟，在工场临时配上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使他高兴，他听了确实感到高兴，但这也引起了麻烦，跟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对她大声嚷嚷，责问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只是在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波利斯真傻，插嘴说他知道这个德国诗人，这个诗人是东部边境地区①——他确实说了东部边境地区！——的人，名叫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这又使那个纳粹分子火了，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熟悉德国诗——他找党的领导或到别的地方去打听这个特拉克尔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别人大概对他说，此人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人，一个共产党，竟如此熟悉这个特拉克尔是否有问题，别人大概对他讲，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不能让劣等人的嘴巴糟蹋。事实上还发生了更多的不愉快之事，莱尼此时

① 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把奥地利改名为东部边境地区。

一度变得放肆和自信，神采焕发，因为她有人爱，而我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连施勒默也没有这样爱过我，也许海因里希会这样爱我。因此她偏偏在那一天唱松娅的诗：‘黄昏返回故园，松娅的生活，蔚蓝的静谧。’——四次提到松娅。那个纳粹分子贼道：松娅是俄国人名字，这是背叛人民的行为等等。莱尼马上回敬一句：松娅·赫尼[①]也叫松娅，一年以前她还看过一部电影《邮政局长》，里面全是俄国人，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这场争吵后来由佩尔策出面才宣告结束，他说这通通是废话，还说莱尼当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只要不是唱反对国家的东西，就无可指摘。于是大家进行表决，由于莱尼有一个很好听的略带女低音的嗓子，由于大家本来都很消沉，谁也不会张口就唱，因此大家一致表决反对那个纳粹分子——莱尼可以继续唱她临时谱曲的特拉克尔歌曲了。”

赫特霍尼、克雷默尔和格龙奇都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虽然三人的说法不同。赫特霍尼说：“天啊，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叫人感到舒畅：这姑娘的女低音很优美，她唱歌——不用命令；嗯，看得出她对舒伯特的乐曲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巧妙地换用优美动人的歌词。”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真叫人心花怒放。连汪夫特和谢尔夫都没有反对她唱；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感觉到，她不仅有了心上人，而且彼此心心相印——可那人是谁——我们谁也猜不到，因为那个俄国人总是不言不语地站在一旁，漠然地干他的活。”

格龙奇说：“看到那个混帐王八蛋克雷姆普气急败坏的样

① 松娅·赫尼（1913～1969），挪威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又是电影明星。

子，我在内心里和外表上都笑得要死。那个松娅叫他多么生气！取名松娅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莱尼反应真够快的，马上举出了松娅·赫尼来。嘿，这个姑娘一开始唱歌，就好像在冬天的菜地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向日葵。真好听，我们个个都感觉得到，她正处在热恋之中——那时她是多么心花怒放啊。当然罗，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一个人猜到谁是她的心上人。”

佩尔策说：“她的歌声当然使我高兴，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个优美的女低音嗓子——不过我也很难向您哪怕是大概地说明，这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有人来问，是否真是俄国歌曲，那个俄国人是否有什么关系，等等。嗯，后来事情平息了，但麻烦还有的是，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告诉您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危险的。”

这里必须纠正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波利斯和莱尼终日闷闷不乐，或是波利斯过分热中于测试或提高莱尼对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那个时期他每天对波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总是快快活活，因为他——如果说，他还能对什么事确有把握的话——确有把握与莱尼重新见面，而且可以根据战争、轰炸和整个形势的情况，有希望“留宿”。他由于在电车上唱歌挨剋以后就学乖了，使劲克制突然想唱歌的一时冲动。他熟悉许多德国民歌和儿歌，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而这使他跟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和营里的一些难友产生了烦恼，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可以理解——笔者）听德国歌。最后达成协议：由于《莉莉·玛莲》得到批准甚至备受欢迎，由于波利斯的嗓子受到赞赏，允许他每唱一遍《莉莉·玛莲》（据波加科夫说，波利斯并不喜欢这首歌——笔者），就可以再唱另

外一支德国歌。据波加科夫说，他最喜欢的德国歌是：《门前井台旁》①、《野玫瑰》②和《绿草地》③。可想而知，波利斯清晨在电车上很想越过那些脸色阴沉的电车乘客高歌一曲《听，外面有什么来了》。不管怎么说，在那次独一无二的、遭到极大误解而被粗暴压制的唱歌以后，还能使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当时悄悄地安慰他的那个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都乘同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交换片言只语了，只是有时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只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估量，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对视意味着什么。"现在他即使在工场里唱歌"（波加科夫语），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防范措施。由于花圈场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免不了有时要同他讲话，甚至克雷姆普和汪夫特——即使只是叽里咕噜地说一声"那儿"或"就来"或"嗯"——由于佩尔策也必须同波利斯长谈——关于缎带、花圈帐目和花卉帐目、生产进度要求——于是，有一天波利斯便向佩尔策提出请求，是否允许他有时也"唱支歌"给大家听。

佩尔策："我大吃一惊。是的。这个小伙子居然还有这种雅兴。不过，在电车上唱歌丢丑以后，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一次幸好没人注意他唱的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唱，并且向他讲明：鉴于战争的形势，一个俄国战俘唱歌当然会被看成是挑衅——您得明白，那是1944年6月，罗马已经落到美国人手里，塞瓦斯托波尔已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

① 即《菩提树》，舒伯特作曲，摩勒作词。
② 歌德作词，魏尔纳作曲。
③ 即《在最美丽的绿草地》，德国山地民歌。

‘我非常乐意唱。’嗯，我得告诉您，我听了很感动，确实很感动：他乐意唱德国歌。嗯，我就对他说：‘听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就我来说——就我来说，你可以像夏里亚宾①那样引吭高歌，可你知道，普法伊弗太太（我从来不在他面前叫她莱尼）唱歌惹起了多大是非！现在又会怎样呢，要是你……最后我冒风险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我说：‘大家听我说，我们的波利斯在我们这里已经干了半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工作努力，为人稳重，他喜爱德国歌，爱唱德国歌，请求允许他在工作时偶尔唱个德国歌给大家听。我建议我们进行表决，同意的举手。’我立刻首先举起了手——你瞧，克雷姆普并没有举手，只是叽哩咕噜地说什么——我接着说：‘波利斯想唱的是德国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喜爱德国文化遗产，这不是什么坏事。’嗯，波利斯很聪明，没有马上开始唱。他又等了几天，后来，我告诉您吧，他唱了韦伯②的咏叹调，我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如他呢。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音乐上无懈可击，德语也毫无问题。嗯，在我看来，他唱情歌多了一点，后来他终于唱起了：‘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新鲜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他经常唱这歌，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布莱希特写的——我得说，今天回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我觉得这支歌不错，后来买了唱片，今天还经常听，喜欢听——但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有余悸：一个俄国战俘唱布莱希特的作品，而当时是1944年秋天，英国人已经挺进到阿纳姆③，俄国人已到达华沙郊区，美

①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②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创始人，创作了歌剧《魔弹射手》，《优兰蒂》、《奥伯龙》等。

③ 阿纳姆，荷兰东部城市。

国人快打到博洛尼亚[1]……想起这事，能把头发急白。不过，又有谁知道布莱希特呢？连伊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布莱希特——对此他可以放心，没有人知道布莱希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特拉克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和莱尼对唱情歌！真正的对唱！”

玛格蕾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莱尼此时每天都给他带点东西：香烟、面包、白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小方块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您可以计算，从1944年3月中旬起，她没有一天不给他带东西。她总是在最下面的泥炭包中掏个洞，然后再用泥炭把洞口堵上，当然，藏东西的地方对着墙，然后让他去取，她当然还要讨好看守，免得他们对他搜身——这必须小心谨慎，有那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爱说爱逗，但厚颜无耻，想带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用他的话来说——‘抱一抱’——一个厚颜无耻的小流氓，十有八九精通此道，只是嘴上不说。他硬要莱尼陪他出去，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去过几次有舞场的低级军人酒吧，这种地方我很熟悉而莱尼从未去过。这个无耻的家伙公开承认，我比莱尼更符合他的要求，他认为莱尼过于娇贵，我则更像个‘漂亮姑娘’——嗯，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莱尼非常担心这家伙——他叫博尔迪希——看出苗头，惹是生非。我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嗯，我也没有吃什么亏，我干脆把他接过来，也许应当说，我要了他——对我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牺牲，1944

[1] 博洛尼亚，又译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年底，多一个少一个已经无所谓了。他相当阔，这个无耻的阔少，每次想和我‘放唱片’——他也这样说——都住最好的旅馆，要香槟酒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此人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爱吹，几杯酒下肚，就什么都说。只要有可能，什么买卖都干：烟酒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进账最大的是买卖授勋证书、伤员证和士兵证——他在某一次撤退中偷到大批这种玩意儿，您可以想象，当我听说有士兵证时马上就警觉起来，为了波利斯和莱尼。嗯，我先让他大吹特吹，然后就嘲笑他，一直到他亮出那些玩意儿，果然如此：他有一个一本大词典那么大的硬纸匣，里面装满签字盖章的表格，还有休假证和车票。好啦。我让他去——不过如今我们已把他掌握在手心了，而他对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是可怜虫，有时他也送给他们几支香烟，反正他的烟蒂都是赏给他们的，而他也不想再为自己树敌。这个博尔迪希卖一张一级铁十字勋章证书收三千马克，还说这是‘白送’，一张士兵证卖五千马克，说这‘以后能救人一命’——他的伤员证在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时一销而光，那时逃兵们藏在废墟中互相开枪——距离当然要合适——打伤胳膊和腿，这样揣上一张伤员证就名正言顺了。我当时在野战医院工作已经两年，知道自我致残者的底细。”

佩尔策：“那个时候生意一度开始滑坡。幸亏一直觉得假腿没有装好的克雷姆普得到军医院去住院几个月。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雇两三个人——理由：死人并未减少，但城市疏散抓得更紧更严了。伤员已经不再全部送到我们这个城市，而是直接送过莱茵河。嗯，幸而谢尔夫和策芬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

最后，剩下来的人可以说几乎都是‘自己人’了；不过，要使剩下来的人都有活干，仍然够困难的。最后我安排他们到温室去干活——即使这样，企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入不敷出。1943年我们甚至加班，有时还加夜班；这时却出现不景气，后来业务突然又上升，这和英国人空袭活动增加有关——是啊，我们属于殡葬行业嘛——这座城市的死人又多起来，于是我就把大家从温室调回来，恢复两班倒，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创造发明，大大地推动了生意。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盆花盆已破的石楠，干脆就用它去扎无骨架花圈，扎出来的东西小巧紧凑，这当然又使人产生罗马式的嫌疑——不过从1944年年中开始，只有少数几个白痴还会去计较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了——莱尼干这真在行，这种花圈小巧玲珑，几乎像是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涂上一层清漆，莱尼还在花圈上扎出死者或送花圈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有时名字不长就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行，这可以产生一些漂亮的对比，例如绿配紫，而且，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破坏点缀花圈左上方三分之一的规律。我欣喜若狂，顾客欢欣鼓舞——由于我们还能自由地渡过莱茵河，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去拉大批石楠也不成问题。有时她扎进一些宗教象征、锚、鸡心、十字架，超过了自己以往的水平。”

玛格蕾特：“莱尼开始扎石楠花圈时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她自己就这样说过：她要用石楠做新床；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陵园之内，除了挑选一个大型家族墓室作幽会地点外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她就挑选了博尚普家的大型私人教堂。这座教堂当时已经相当破旧，里面有长凳、一个小祭坛，别人是看不

到祭坛后面的石楠的，而且不费什么事就能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储藏处，存放香烟、葡萄酒、面包和糖果。同时，莱尼变得狡猾多了，她早已不再是每天给波利斯一杯咖啡，而是隔四五天才请他喝一杯。有时在验收花圈时她也避开他，在场内很少同他接近，也不再两个人咬耳朵。藏东西的地方由泥炭包转移到博尚普家教堂的圣坛。5月28日是他们的好日子：有两次空袭警报，一次紧接着一次，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一点至四点半之间——投下的炸弹不多，但刚巧够得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家时满面春风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日——3月18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波利斯对我说什么吗？听英国人的，他们不会撒谎。'然后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两个多月白天没空袭，大多数空袭是在夜间，有几次是在午夜前不久，我们正躺在床上，莱尼自己嘀咕：'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什么时候他们白天再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一点也不远嘛。'那时她已怀孕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耶稣升天节① 那天终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有两个半小时之久——我相信——炸弹扔下不少，有几颗甚至落在陵园里，一些弹片穿过博尚普家教堂的玻璃窗，在他们俩头上呼啸飞过。接着就是莱尼所说的'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念珠月'——从10月2日到10月28日共发生九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莱尼对此的评论是：'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

① 据《新约圣经》载，耶稣于"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教会即规定该日为耶稣升天节。

这里应当概括地提供一些具体材料：莱尼此时二十二岁，按照市民的说法，尽可以把1943年圣诞节至1944年3月18日第一次“留宿”之间的这三个月称为订婚期；从1944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他们这一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其名的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之手，这段时期应当说是“新婚”了。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在这方面比佩尔策和玛格蕾特提供的情况对我们更有用处。从1944年9月12日至11月31日，共有十七次白天空袭，投下约一百五十枚空投水雷、一万四千多枚爆破炸弹、约三十五枚燃烧弹；要知道，不可避免的混乱局面对这一对是有利的：没有人再去认真注意，谁躲在什么地方，谁和谁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哪怕是从一个家族墓园的小教堂里钻出来。过分拘谨的情侣这时会畏缩不前，而——莱尼和波利斯显然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他们这时有充分的时间互相谈论父母、兄弟姐妹、出身、学历和战局。根据空袭的统计资料几乎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莱尼和波利斯在1944年8月至12月这段期间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度过，单是10月17日一天就连续三个小时。因此，如果有人觉得这两个人可怜，那就应迅速摆脱这种感情，只须想一想，仅有多少情侣，不论合法或非法，不论是不是被俘，能有这么多时间这样亲热地在一起度过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把这一对说成是命运的宠儿——他们竟大逆不道地希望英国空军进行白天空袭，以便能在博尚普家教堂再次相会。

有一点波利斯没有想到，大概也永远不知道：莱尼经济上非常困难。考虑到她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半磅咖啡，她的房租收入约为一百支香烟，而她一个月大约要消耗两磅咖啡，她消耗

的香烟——如果把她不得不“偷偷地塞给”张三李四的也计算在内——有三四百支，那末，人人都会明白，一条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这里以排山倒海之势显示其威力：收入少而支出增加。若准确地或者八九不离十地推算一下，莱尼每月需要将近四千马克，有时要五千马克，才能开销咖啡、白糖、葡萄酒、香烟和面包的费用——按1944年的黑市价格计算。她的工资和房租收入总共约有一千马克，结果是明摆着的：拉饥荒。另外，再考虑到，她从1944年4月起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有时也想通过复杂的转弯抹角的方法使他“得到”一些东西，那么，她每月开支大约从1944年6月起增加到近六千马克，而收入为一千马克，莱尼从来没有积蓄，早在波利斯和她父亲使她的额外开支增加之前，她自己的消耗就已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一言以蔽之：有据可查，1944年9月她已负债两万马克，债主们开始逼债了。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的大手大脚变本加历了：她渴望像刮脸刀片、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葡萄酒，老是要葡萄酒。

洛蒂·霍伊泽说：“她倒从未向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她有时还偷偷塞点东西给我，面包票和白糖，也有烟丝或几支烟。不，不。她这个人很规矩。从四月到十月，她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有了心上人，而且此人也爱她。我们当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全都以为她在玛格蕾特家里和情人幽会。当时我不在公司已有一年了，先是在劳动局，后来到了难民救济局，挣的钱刚刚够买定量供应的东西。公司经过改组，部里派来一个新人，在1943年6月以后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都管他叫‘新风’，因为

他——他叫基尔温德[1]——老是说什么要‘给旧的安乐窝通通风，把屋子里的臭气放出去！’我公公和我也属于被放出去的臭气。他很坦率地对我说：‘你们俩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了——我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不愉快，现在我们要在西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使用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女人和德国劳改士兵，情况很复杂。你们并不适合干这种事。你们最好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雷厉风行者，讲话带刺，但也不是那么叫人讨厌——这种人常常可以碰到。‘你们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我公公到铁路局当会计。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霍伊泽是当时就已暴露出他的本性，还是这种品性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他变得相当卑鄙，直到今天本性难移。我们家里的情况，说它像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共吃共住，也吸收还在待命入伍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参加。起初，马尔娅和我婆婆负责采购、照看孩子，马尔娅有时还下乡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去，至少带回一些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回一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一直到我公公开始把他中午在铁路局领到的不定量的汤带回家来，晚上在炉子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咂咂地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是额外的，集体伙食里还有他的一份。后来我婆婆也变得——用马尔娅的说法——‘斤斤计较’起来，开始对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过秤；此后一个时期，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锁在一个小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上，而且不消说，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东西被偷。我婆婆把她的人造黄油锁起来之前都先过秤，然后在取出来时再过

---

① 基尔温德中的温德在德语中有“风”的意思。

一次秤——每次她都说有人偷她的东西。我发现她——我的婆婆——甚至对我孩子吃的牛奶下手，往牛奶里搀水，为的是有时给自己或者我公公做个布丁。于是我就改同马尔娅合伙，由她采购和做饭，这样我过得很好，莱尼或马尔娅从来不小里小气——可这时，每当烧点什么吃的或是桌上放点什么，霍伊泽老两口就馋得慌，使劲用鼻子闻来闻去，这又引起一种新的有趣现象：羡慕。是啊，我真羡慕莱尼，她可以一走了事，同她的情人到玛格蕾特家去栖身——我想。可这时，自从老霍伊泽到铁路工作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到处拉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帐，1943年他们还跑遍欧洲差不多所有角落，从那儿捎回紧俏商品，从这儿捎去紧俏商品。他们用一袋盐可以从乌克兰换回一整口猪，用一袋粗粒面粉①可以从闹饥荒的荷兰或从比利时换回雪茄烟，从法国当然可以换到葡萄酒，大量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所处地位有利，由于他后来还负责协调货车的调拨和行车时刻，他变成了大企业家，他具体掌握欧洲何地何物紧缺，组织相应的换货交易：把荷兰的雪茄烟运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②之前——去换黄油，然后又将黄油运到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去换雪茄烟，换到的雪茄烟比运往诺曼底去的数量翻了一番。由于他还主管车辆的运行，司炉和机车司机都听他调配，他当然把最好的路线分给那些最积极的合作者，而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各种商品在不同地方的市场价格当然也不同。在大城市，什么东西都能卖个好价钱：食品和嗜好品——咖啡当然在乡下更吃香——而且通过以物易

---

① 做布丁等用。

② 指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德语“入侵”是中性词，无贬义。

物，比如用黄油换咖啡，按照他的说法可以把本钱翻一番。用不着说，他是借钱给莱尼最多的人；表面上他劝阻她，但每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借给她。最后，他已不仅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供货人，而他可以向她开花帐捞点外快，莱尼对此一无所知。她总是只知道开借条。最后还是他打听到老格鲁伊滕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当建筑工人，跟一个劳改队在水泥搅拌机旁干活，后来调到柏林清理轰炸后的瓦砾——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办法，经常给他捎去一包东西并得到他的消息，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捎口信给我们：'不必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方面也需要花钱。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到了1944年8月，莱尼向霍伊泽借的债已达两万马克，您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逼她还债！他说，孩子，不还给我这笔钱，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结果怎样？莱尼把她的房子抵押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一万。我曾劝阻过她，我对她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把实物抵押出去，这真是胡闹——可是她笑了，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孩子，还送给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由于海因里希恰好这时悄悄走进我们房间来找额外的东西吃，她也送给他一份，并且还同这个莫名其妙的小伙子跳起舞来。嗯，她那种神采奕奕、轻松愉快、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的心上人。此后不久，马尔娅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只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抵押到期了，这时，是的，这时——我真不好意思说——这时他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1944年底——当时情况已经十分困难，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

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1945年1月1日他就开始收房租，我那时才看出他的本性。每月一日到各家去收房租，这一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1945年1月收入不多，大多数房客已被疏散，顶上两层被烧毁，真叫人好笑，他把我也列入他的房客名单，普法伊弗家当然也在其中，不过他们1952年才回来——直到他向我第一次收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这些年来我们住莱尼的房子一直都是白住呀。从前我有时想，莱尼真糊涂，我曾经提醒过她——可今天我认为，她并不糊涂，她把一切同她的心上人一道花光，而和平时期她也并没有饿死呀。”

玛格蕾特："现在开始了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检阅部队。据她对我说，第一次检阅部队是她刚同波利斯开始相好时进行的——她对所有亲朋好友都仔细审查了一遍，甚至在家里有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去进行测试，她'检阅'了霍伊泽夫妻、马尔娅、海因里希和场里的所有同事。从她的检阅中留下的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副官又是谁呢？是我。可惜她没有当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我想到她如何对每一个人进行审查，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洛蒂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但由于'妒忌心重'而把她一笔勾销了；老霍伊泽夫妇'古板、反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太'拘谨'，也都不在话下。她确有把握知道，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她甚至登门拜访，和她进行了一次不会使人为难的谈话，但发现她'简直太胆小，太胆小，太疲劳了；她不想再干了，我很理解'。她也考虑过赫特霍尼太太，但也

‘由于她道德观念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把她排除了，‘此外，此外当然也要心中有数，谁足够坚强，知道这种事而坚持到底’。是啊，她决心打赢这一仗，对她来说，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打仗需要用钱和有据点，她在第一次检阅部队和审时度势时发现的唯一据点就是我——莫大的光荣，但也是沉重的担子。那就是说，我足够坚强。在地下防空室里，在家里，在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跟前，她系统地进行摸底，一反她沉默寡言的常态，编造种种故事。她首先讲一个德国少女和一个英国俘虏相爱的故事，结果令人十分沮丧——多数人主张把他们枪毙、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等——但她又搬出一个法国人来进行试探。法国人作为‘人’下场要好一些，作为‘值得考虑的情人，（也许是因为法国人精于床上功夫吧——笔者），博得会心的一笑，但随之却作为‘敌人’完全遭到拒绝。她最后不得不搬出，或者不如说抛出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而大家认为至少得‘砍头’。在家庭小圈子内，加上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意见当然更坦率真诚一些，不那么带政治色彩。马尔娅令人惊讶地偏爱波兰人，认为他们是‘英俊的军官’，法国人‘道德败坏’，英国人‘大概不能当情人——俄国人捉摸不透’。洛蒂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这些话全是费话，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废话。她的评论是：‘男人就是男人’。洛蒂指出，马尔娅和她的公婆虽然没有克服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但像寄生虫，波兰人富有魅力、非常热情，但不忠贞，俄国人忠贞不贰，爱情专一——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包括洛蒂在内，大家都认为，‘同一个西欧人搞什么名堂至少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搞什么名堂则有生命危险’。”

洛蒂·霍伊泽:“有一次，莱尼到我们家来和我公公谈钱的事。我打开浴室的门，发现她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已身体的优美线条。我从她背后给她披上一条浴巾，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脸红——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高兴吧,还能找到一个心上人,要是你从前曾经爱上过某人，那就把他忘掉吧。我是忘不了我的威利的——嫁给他吧，即使他是个英国人。’当1944年2月她吞吞吐吐地说出她那些可笑的假故事时，我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她正在和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和一个外国人搞什么名堂。老实说，我会极力劝阻她和一个俄国人或波兰人或犹太人搞上，这有掉脑袋的危险。今天我感到高兴，她当时没有告诉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真不是什么好事。”

玛格蕾特：“莱尼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甚至也把佩尔策当作可能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有可能入选，不过此人太喜欢饶舌。于是进行第二次检阅部队,考虑到莱尼已经怀孕及其后果,又只有我是唯一可靠的人。最后，我们考虑把佩尔策当作一种战略后备军，划掉了通常押送波利斯来场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看守，因为他老爱动手动脚、多嘴多舌。于是我们就考虑那个有魄力的博尔迪希，我还有时和他见面，他的生意兴隆——但已为时不长了。他太过分了,后来在1944年11月被抓住,抄走了全部表格和证件——并且在车站后面就地枪决了；他是在那儿做买卖时被抓获的。这样他就完了，可惜他那些士兵证也都完了。”

为了对莱尼和玛格蕾特公平起见，这里有必要作一些与社

会道德有关的重要说明。严格说来，莱尼算不上是寡妇，她是艾哈德的遗属，她有时甚至拿他和波利斯作比较。“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哥哥，失去了丈夫，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空袭，她不仅同她的男人在家族墓室教堂里鬼混，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穿得厚厚的迎着寒风搭乘电车，穿过阴暗的街道去上班——对于这个少妇来说，阿洛伊斯的胜利者喋喋絮语可能还在耳边余音未消，就像一首日益消逝的动人的流行歌曲，大约二十年前，人家也许曾跟着它的曲调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莱尼——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顾周围的情况——快快活活，惹人恼火。她周围的人都小心眼儿，闷闷不乐，愁眉苦脸，如果想到莱尼满可以把她父亲那些精致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好价钱，而她却把它们不仅送给他，而且还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忍饥受冻的人员（一名红军政委就穿着她父亲的羊绒背心跑来跑去！）——那末，即使最多疑的旁观者也肯定会同意给莱尼再加上一个豁达大度的形容词。

关于玛格蕾特，也再补充一两句话。说她是个婊子，那是错误的。她只有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自从1942年应征到一所巨大的后备军野战医院服役起，她的日日夜夜就比莱尼艰难得多。莱尼可以不受阻挠地制作她的花圈，经常与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受到佩尔策的好心保护。由此看来，莱尼决不是英雄，或者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首次对一个男人大发慈悲（敬爱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蕾特却从来没有干过不同的事，即使是在担任野战医院日班或夜班护士的工作中，她也对“任何一个可爱

的、面带愁容的人大发慈悲”——而她同一个像列兵博尔迪希这样的厚颜无耻、玩世不恭之徒鬼混，只是为了掩护莱尼在博尚普家族公墓教堂的石楠床上的爱情幸福，转移博尔迪希对莱尼的注意。这里我们为了比较公平起见，且看看玛格蕾特自己在充满慈悲为怀、忘我献身的漫长一生之后所说的话吧：“爱过我的人很多，我爱过的只有一个。我自己只体会过一次常常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狂喜。”不，玛格蕾特决不能说是命运的宠儿，她比莱尼苦命得多——正如愤愤不平的洛蒂一样，不过这两个女人中谁也没有对莱尼怀有妒忌心。

第 八 章

笔者如今已完全热中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其实他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滕—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言、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下了一番功夫向所有有关的人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

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如今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正在接近，因此他们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虽然他们不相信战争会结束。从1945年1月1日起，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相当"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同房、摔交——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

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

和规定——应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向东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如果想到，1945年1月还在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直接把他们送到红军跟前，那末这里有必要接受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① 在1945年3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南北也不比这长多少。往何处去的问题对形形色色的人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扮演救命恩人的角色。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这些人在此之前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甚至党卫队有些部门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把死人像烂土豆似的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① 德意志国是德国的正式国名，一直沿用到1945年。过去通译“德意志帝国”，其实不妥，因为德国在1918年11月即已推翻帝国，实行共和。

例如，笔者看到一份材料：

集中营司令官们抱怨，在决定处死的苏俄人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进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老营在以这种方式摆脱这种俘虏。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步行途中，例如从车站到营房，有不少战俘疲惫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

这种情况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

尽管押送战俘去集中营通常由国防军执行，但居民仍会把这种事情记在党卫队的帐上。

为尽量防止今后发生这种情况，兹发布命令如下并立即生效：最后确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苏俄人如已明显濒死(例如饥饿伤寒)，因而经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军的辛劳，今后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

代表　米勒(签字)

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的“不少”这个字眼，读者应自己进行思考。这在1941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是一个问题。四年后，德意志国的版图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相当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把一片废墟留给敌人。

当然，也产生了道德和卫生方面的问题，例如下述问题：

(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关在地下室里。由于

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鞋子、换洗衣服、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如果行动稍有迟缓，村警们就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特别严重，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有一次，一名妇女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把工人关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必须尽量远离车站解手。

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那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淋浴室里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

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这种待遇必然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据悉，上述弊病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

难道那个时候就已开始了性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无论干什么，都不能临时凑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如此看来，是不是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完全正确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如今已成为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甚至还把这些拍成照片，就用不着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了。

只是，身怀有孕的莱尼，过分敏感的的波利斯，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他们都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到哪里去避风呢？1945年3月，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

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又怎样呢？

起初，波利斯在1944年底1945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对此洛蒂和马尔娅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她现在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小便从鼻孔里流出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一支烟抽（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可是，到了1944年年底，圣诞节前后，或者是1945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①，但肯定不会更晚，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一次至少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因此我们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他在1944年年底（！）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莱尼总算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把莱尼的索书单撕碎，把莱尼拉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

① 又名主显节，在圣诞节后第十二天，即1月6日。

叫你来借这本书的？’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又一次固执己见。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大概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尽管时间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①——这本杂志图书馆当然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莱尼到我这儿来时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就是要看卡夫卡的作品，而她也居然搞到了！她真的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为什么不要海涅？’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他自己没有这本书，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那天她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教授也信得过他，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事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的啊，不幸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嫁的那位施勒默

① 《前锋》是纳粹头目施特莱歇尔主持的一家周刊，疯狂鼓吹反犹，创刊于1920年。

先生也出现了。我们就住在他的小别墅里。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了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我不知怎么会喜欢上他，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这时他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英国人、荷兰人、美国人、比利时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查出我是什么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救救我吧，玛格蕾特。’您得知道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喜气洋洋，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警犬，害怕美国人，害怕所有人。这时我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在野战医院里有许多人死去，他们的士兵证当然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反正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我可以任意挑选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

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捕他。他这样做了。临走时他哭了，如果您不认识1944年以前的施勒默，您就不会知道这说明什么。一位痛哭流涕、乞哀告怜、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①，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从1939年起就开始干，他其实学的是商业。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1949年流落街头，从此也多多少少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虽然莱尼和大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有一天他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他干吗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

① 布厄，鲁尔区盖尔森基兴市的一个区。

蕾特又脸红了——笔者）。

席尔滕施坦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上文已有交代：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当时我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吃，想活命。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

朗尔斯多夫博士战争结束时的表现几乎使他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小腿，一人截了手臂，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我们的武器是几根拐杖，主要是一截四的白床单；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截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把村庄完整地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我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1]的奥斯勒—米勒村——笔者）一直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是多亏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

① 贝尔格是位于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地方。

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

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汉斯是1945年6月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流露过狼人① 的感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1946年才出生的。

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在战争结束时二十一岁，（左）大腿刚做完截肢手术，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巴罗克式② 修道院里。他——据本人说——“刚从麻醉中醒过来，难受得很，美国佬就来了——幸好他们没有为难我”。

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拖着他那条瘫痪的腿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1943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

范·多尔恩：“我曾以为我最精了，我在1944年11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威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是谁的孩子。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幸好莱尼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后来

① 德国民间传说中变成狼的人，生性残暴，为非作歹。
② 欧洲17～18世纪中叶盛行的艺术风格。

我们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他们还能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于是我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1945年3月2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有许许多多人在这次空袭中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我这个人从1914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教堂，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赞成他们：因为我后来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当时我做起祷告来，别无其他。这些又都冒出来了：《万福玛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有时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也有点活动。几乎像一顶帐篷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铺天盖地，没完没了；躲在地下室里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我和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这是我生平

第一次看到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动作，不由自主，她本人也不知道——最后她把嘴唇都咬出了血。我们从地上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籦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快要疯了——其实声音并不太大，只是震动，天花板有时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困了，睡着了，在睡梦中微笑着。此外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他又尿了一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后来他们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那儿还剩下两个年轻人，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跑了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我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我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那个年轻妇女或许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兽性发作或死皮赖脸，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奸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乳房，脱掉我的裤子，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于是我们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

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感到太不像话，可是您无法想象那种情况，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躺在我们中间；我一直还能感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这些大概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还能感到我是多么快乐，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用手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我们不约而同地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那个年轻女人带了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我们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指的是不来飞机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没有说一句话；哎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啦？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最后终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

有。我出院的第二天，美国人就来了。”

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她吃了苦头，受了罪(由于她不说，笔者无法断定，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死在高速公路旁，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

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伙食照顾却像老爷一样；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我觉得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1951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1953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他在韦尔①坐了三个月的牢，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外交工作。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识。”

老霍伊泽：“我舍不得丢下我的房产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1945年1月和1945年2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②，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

① 韦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城市。
② 德国法西斯分子捏造“雅利安人”是“高贵人种”，制造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等谰言，而当时的排犹运动就是在“雅利安化”的名义下进行的。

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公证和支票，完全合法——这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我正巧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第二天我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原来他们不让自己以后想要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她们不愿要我这个老头子——毕竟我年已花甲了。十月我妻子过世以后，洛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住在一起，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而且她具体知道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①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鸡蛋、黄油、熏猪肉、香烟、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马当先！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不久以后她们不得不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得意忘

① 加尔默罗会，一称"圣衣会"，天主教托钵修道会之一。12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

形，忘乎所以，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战争期间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后来大概在3月5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所有一切都要分配，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她确实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她的确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洗衣服，养鲤鱼，在浴室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她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儿带女，虽然她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连她的性命也多亏我们呢。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只要提'乱弹琴'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

也许还有人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1944年9月底，他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

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不管怎么说，B.H.T在战争结束时待在兰斯① 附近的美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而我可以对您说，这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他原以为B.H.T在两性问题上要求并不强烈。）

向范·多尔恩打听格鲁伊滕的情况，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还是作了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他回家时我还没有回来，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虽然我比她大十三岁。可是我当时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呆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娇气十足、讲究吃喝、道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当时要到河西来有多困难，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待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等我回来时，生米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蒂：“有时我把1945年2月至3月和1945年3月至5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事情太多，头绪纷繁，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

① 兰斯，法国北部城市。

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我参加了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尽我的可能拿走不少东西，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我们有多少问题要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她还有几天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现在，她孩子的父亲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1944年9月或10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三月中旬以后我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公章和这种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把一切都办妥．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子，一定叫他们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站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德国逃兵，藏匿的俄国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而

美国人又怎能分清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呢？对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他们原来想得也许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通通得分类排队——等到胡贝特终于回来时，大约是五月初，事情已经稍有眉目，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公章和证明干什么用呢？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还有一些纳粹老巢，他们会把他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他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于是他就装成意大利人，这当然不能保险万无一失，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那当然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我的后半生，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我们干吗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

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玛格蕾特还从野战医院弄来不少药品；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他其实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他们也不愿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他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到1946年初倒也太平无事，那时美国人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然，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因为波利斯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而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

克拉特①——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庭②。他坚持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他们有半年像玛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子转！他们宠爱他，娇惯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1945年6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莱茵河上没有船只航行，到处都是船的残骸，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您知道吗，有时我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六月的一天晚上，他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糊里糊涂地身上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

① 辛齐希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一城市，维克拉特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门兴格拉德巴赫市的一个区。两地均为战俘营所在地。

② 指玛利亚、约瑟和耶稣。

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您真该看看莱尼那种样子：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跑遍了各区，甚至越过边境，到了法占区、萨尔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欧洲大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补充生活用品——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这些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坐在屋内，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我们真需要你。'——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①，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②，又去萨尔布吕肯③，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布尔霍斯特——随便挑哪个名字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

① 那慕尔，比利时中部城市。
② 梅斯，法国东北部城市。
③ 萨尔布吕肯，萨尔区首府，当时属法国管辖。

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二十 三 岁，严 格 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每当她晚上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内如焚：

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
我们今天围坐在碑旁，
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
雪花冰凉落在我们身上，
雪花定要从天降，
雪花，欢迎你下凡，
你在天上也没有地方……

“接着，声音突然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兜里钞票一大堆，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在我小的时候，神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你使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再过五十年我也背得出来，我们经常听到她唱，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平时她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每当莱尼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

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那孩子后来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到最后他们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于是胡贝特就在每月第一天把房租送到他在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直至老霍伊泽再也受不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在这种情况下，胡贝特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不能硬要他花费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胡贝特打赢了这场官司，于是霍伊泽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里，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听到这种笑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莱尼今天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把她撵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1948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我的孩子也被夺走了，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

乱搞，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住在我们家。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事前老是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按照她的说法，有两次“一清二楚是情况暧昧’，说得明白些，我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看望我们。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当时波加科夫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窗台上放着一个脸盆。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也许那样做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要离开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我的死活了；我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足足值三百万，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①——这当然比一个为了挣总共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

① 意指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

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心力交瘁，忧愁悲伤，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唱忧伤的歌，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后来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1946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咸黄油、熏猪肉、香烟、咖啡，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这些东西本来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抄了我们的家，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有一个家伙确实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因此他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他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1954年了，才

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告发了我们。”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那间地下室从前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我对那次抢劫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不过距离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躲在那里，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直到我听说美国人真的来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迎来了解放，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我又高兴得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不再造桥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获准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当时她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马上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请来店里工作。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对我来说是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瑞易的艾莉·

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好？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是马克思，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里真正不错的是花式小点心，这我会记住的。现在谈谈某些知情人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我们也曾被邀请进这个天堂，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这个天堂里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毕竟人们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我的证件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四五十年来他可说难得离开过陵园，这时，在1945年2月中旬，他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甚至在什么地方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抢劫，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统治着这座城市，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

一岁，我想活，不想在最后几天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甚至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晾在外面，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等到他1946年回来时，我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1945年8月回来了，虽然他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①。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他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

① 清白证明：二次大战后，由旁人写的说明某人没有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罪行的证明。

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我到今天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我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政治上的，种族上的，随您怎么说——我是有意选择佩尔策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腐化堕落、为非作歹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介绍他的情况，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1933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是否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一个人——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把我当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那一阵儿莱尼政治上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后来我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

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这样他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更不说也许后悔，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张纸、一支钢笔，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必须承认他这一点，他也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我竞争，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佩尔策说服了她，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克雷默尔这个婆娘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放在心上。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她更不想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

约。嗨，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怎样了？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然后我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扎花圈，修饰花圈，上缎带，扎花，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虽然她们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得不到好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来上班时，她们一如既往，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1966年，莱尼干到1969年，幸亏她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好让她如今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如果她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虽然她从未责怪过我，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走，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求他们，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大清楚——他究竟叫贝尔霍斯特、伯尔

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搞清楚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她们当然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

为了获得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尽管如此，它的存在时间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1945年2月20日至3月7日，莱尼、波利斯、洛蒂、玛格蕾特、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生活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设备”（佩尔策语）中。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佩尔策，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我们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他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他的忧郁使笔者感到吃惊。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学会了骑马，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再为她冒航

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却不肯和我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我究竟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如果他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美国人什么地方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孩子每天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挖坑道呀，支坑木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那里还有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把干草放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他在第一次大战中险遭活

堡，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住在地上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在1945年1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雷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住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里，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床垫、干草、电炉、面包干、水、奶粉、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那时我们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① 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那时俄国人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住在谷仓里，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正正经经，有大印和签字，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2月20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德军巡逻队也好，美军巡逻队也好，都不敢

① 埃尔夫特，河流名，从艾费尔高原向北，在诺伊斯附近流入莱茵河。

钻到墓室中去，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白天我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也一直需要办理殡葬业务，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好歹还需要几把枞树枝，有时献上一枝花——那简直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只有学习，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那时他们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①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他们在里面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总该有一定的分寸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她的孩子从来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唯利是图，积聚财富。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我觉得这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人人都能向您证实

① 独占产业，一种棋戏，可供二至八人玩耍。玩时努力吞并产业，保持雄厚财力而迫使对手陷于破产。

这一点：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我最讨厌他妈的拾烟屁股。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因此，面包干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时，这两个小崽子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他们在二日以后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那时大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这我完全能够理解——把孩子生在坟墓里，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既然他生于3月2日，那末，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6月2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

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也没有夜班，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个机会。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真应看看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天使和圣徒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我们豁出命从施尼勒巷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当天晚上孩子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正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他要是听我的话，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在七日下午就带老婆孩子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小伙子本来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搞到一张真的或伪造的释放证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娘儿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天天下午和黄昏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坐在莱茵河边上。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是设法搞到这么一张释放证，证上写我的名字，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我们这一行确实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

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合法证明，真是太轻率了，哪怕他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①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我不仅喜欢这个小伙子，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

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莱尼父亲之死难道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难道我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他根本就没有学过泥瓦工手艺，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我可以对您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他突然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穿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土豆、面包，有时是

① 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德国大工业家，1811年在埃森开办炼钢厂。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把工厂扩大为生产大炮的军工企业，靠战争发家。

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坐在莱茵河边上，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我现在有三四十万马克，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这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今天您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如果香烟到那时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要是他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我的钱最后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如果莱尼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会立下字据，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1944年12月——令人难以置信！嗨，我的钱却派不上用场——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蚀本生意。’我做什

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关键得有地方堆放，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油脂、面包、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笑我，因为当时钢梁有的是，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有条不紊地收集钢梁。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你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把坦克拉走；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1945年到1948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延米优质钢梁，码得整整齐齐，堆放在那里。我从一开始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延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有时钢筋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延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

尼父亲替我管这儿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每天晚上按向我上缴的数量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那时候，连已有的高炉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怎样，我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而且我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家具什物啦，书籍和家用器具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甚至有儿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确实有多少钱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1953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我想用那些地皮盖房子，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无赖、投机商、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那些旧坦克突然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的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莱尼的父亲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

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我曾警告过他。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摔到废墟中？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谁不知道，在成为废墟的城市里，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这个几乎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我为他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

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感情上是否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似乎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翘出来的钢筋上，身体被刺穿，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脖子、小腹、胸口、右上臂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挂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好歹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已经花光了。不用

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歇业了，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1946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事实上，此事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情况就是这样，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①，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因此我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她骂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还有更难听的话。可她这一条命还是我救的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她突然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待在坟墓里没有香烟抽的时候，我从这两个小滑头那里买下了用我自己的烟屁股卷的香烟——二日那天，我们有将近七个小时之久蹲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牙齿格格打颤，告诉您，连相信无神论的洛蒂也跟着波利斯小声念主祷文，连霍伊泽家的小流氓也不声不响、胆战心惊、老老实实，玛格蕾特呜呜地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好像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当时的情况真好像世界正在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当过纳粹或共产党，另一个人是个俄国兵，玛格蕾特是个心肠过于仁慈的护士，这一切，全都顾不上了，只有一点：生或死。尽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里总是还留恋它，它毕竟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它在一天之内化为灰烬，而灰尘在我们的牙缝

① 不是为一个固定部门工作的人员。

里、嗓子里牙碜了好几天——轰炸停止后，我们马上动手，共同——我说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并且就在当天擦黑时帮莱尼和波利斯的儿子出世。”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越来越低，“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喜欢我，我真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当作一家人，让他参加我的买卖和随便什么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还要亲——您知道此人是谁吗？波利斯·利沃维奇——我爱他，虽然他抢走了我今天还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也许他真的了解我、认识我，他坚持要我给小男孩行洗礼。我。用这双手，是的——说真的，我一听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有片刻想到，说穿了，这一双手有什么没摸过呀：活人死人，女人男人，支票现金，花圈缎带，等等——而他却要我，一定要我用这双手为他的儿子行洗礼。连洛蒂一听也不出声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头禅：‘乱弹琴。’波利斯对我说：‘瓦尔特，’——两天后我们全都以你相称，干脆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他说，‘现在我请你给我们的儿子施紧急洗礼①。’洛蒂听了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铁锈和污物流完，自来水变得干净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满水，按照我过去担任执事时常见的那种做法给他行了洗礼——由于我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这一点我还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维尔纳和洛蒂两人托着，我给他一边行洗礼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取名为莱夫。’——这时连库特这个小坏蛋也放声大哭，甚至连说话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玛格雷特反正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只有莱尼一个人没有哭，

① 教士不在时由世俗的人代教士施行的洗礼。

她躺在那里，睁开被灰尘弄红的眼睛，满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吧，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实在太激动了。”

笔者坦率承认，听到这一切，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愉快的情况下见到了他：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越过一大片园圃区，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天空中有几架星式战斗机，从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的噪音，孩子们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

“我把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丢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大概和您的岁数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1944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我对不起她。早在1945年2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次抓住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士兵、俘虏、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

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奸的事情吧——我们躺在干草和甜菜中间，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农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本来有人送他们上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将他们扔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森林'①——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②，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光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个美丽的童话。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女人的脸蛋，她的头发，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告诉她的丈夫，或向某个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摸一个人的脉搏很好。

① 美国兵的原话均为英语。

② 指美苏两国军队1945年4月25日在易北河会师。

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一部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1941年8月初我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反正当时这个城市还这么叫，谁知道它今天叫什么？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穿过村庄，越过田野，渴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却根本没法接近我们——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牛奶，一手拿着面包，他们是不会对她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牛奶、鲜血和面包洒了一地。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一戈拉，从伊凡一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接着，第六天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1]；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

---

[1] 这些都是乌克兰地名。

舔着吃——有时能捞到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1942年3月；有时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还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来，我在柯尼斯堡①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睡在厕所里，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虽然地方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要是你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这种医院实际上都是伪装成医院的灭绝营、死亡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代用面包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其中还有木质纤维——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是有计划地叫人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后来显然连草料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搀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有时一天要死百把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装配履带。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

① 现名加里宁格勒。

王位。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确实没有人知道——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我们虽然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不可避免的事情：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该得到的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准备鲜花，挑选缎带。有时，瓦砾堆里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要是被抓住，那就要倒霉了：就连德国人都不准把东西塞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的下场，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儿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根本用不着这样规定。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如果我们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有一次，我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我们的活儿是不是值得一提？如果这活儿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十八点五克油脂、三十二克

白糖；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提，就只有二百二十五克面包、十五克油脂和肉、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到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留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有三十个人溜了，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没有岗哨，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我们当时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么？自由了又往何处去？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战争的正式结束，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说不定他们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呢。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进行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那时我们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

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他准备好了地图和食品，还有通过他的喽啰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①。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五人有胆量享用这种自由，他们收拾好个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半小时后，那个姑娘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上等着。接着，波利斯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真诚地同他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尔夫特前线，那时美国人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二十分钟后，我们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

① 阿纳姆，荷兰东部城市，莱茵河下游河港。

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莱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套上德国军服，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我在夜里一个人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我曾有一年之久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挨过讥笑和辱骂，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塌，倾斜的天花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呆在这个藏身之处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白天我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①，1919年'字样。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笔钱哪，而且不仅仅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大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1878年初领圣体——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迷路羔羊，不配称为你的儿女。'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

① 卢塞恩，瑞士中部卢塞恩州首府。

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现在我要说我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尖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些女人；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取暖，那就只有离你睡得最近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的一段话：'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是否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你有过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

这里，仅仅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体情况作一点补充，笔者再摘引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谈话记录和报告，以作例证。

罗森贝格[1]：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到德国来的路和到西

[1] 罗森贝格（1893～1946），纳粹思想家，1941年至1945年任东占区部长，后被判处死刑。

伯利亚去的路大约差不多。

我知道，如果送来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用不着为此烦恼。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党区领袖绍克尔①已经谈到或将要谈到这个问题——把这些人从东方送到德国来干活，要达到尽量高的劳动效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达到高效率，自然就不能让他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冻死，让他们一连站上十小时；相反，应当给予他们足够吃的东西，使他们具有后劲……

任何企业领导人均有权惩罚波兰籍农业工人……遇有此种事件，任何部门均不得因此指责企业领导人。

波兰籍农业工人应尽量与其家庭分离，可以让他们住牛棚马厩等。在这方面不得有任何顾虑。

施佩尔②：现代化流水作业要求全月工作时间必须保持均衡。空袭使工厂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中断。企业开工时间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时之间。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周平均时间大约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时之间。

弗莱希斯纳博士：集中营来的劳动力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施佩尔：和企业中其他劳动力完全一样。因为集中营来的工人通常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职工的负担也不比企业

① 绍克尔(1894～1946)，纳粹党图林根党区领袖、图林根总理兼内政部长，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后被判处死刑。

② 施佩尔(1905～1981)，纳粹头目，曾任武装和军需部长，公路、水路和动力总监。后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其他工人重。

弗莱希斯纳博士：为什么这样？

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囚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劳动。由德国工长和领班监工。由于企业的生产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同整个企业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企业中众所周知只能采取统一的步调。

弗莱希斯纳博士：我将要分别上报的两份文件都说明，在陆军和海军军工厂以及空军军工厂劳动的集中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

施佩尔先生，为什么企业要设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

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的目的是免得走远路，从而使工人在企业中精神饱满、乐于劳动（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士兵已丧失作为正直军人根据日内瓦协定① 所享有的资格……奉命看守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必须随时向公众显示自己的自豪与优越感……因此，遇有最微小的反抗迹象，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者，必须采取果断无情的行动……单是出于纪律的原因，就应对苏联战俘十分严厉地动用武器。

国防军必须立即清除战俘中所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因此，东方战役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当局的影响，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执行之。

① 指1929年7月22日关于保护伤员、战俘与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枪决苏联战俘(命令)：

有关苏联战俘枪决及死亡事故，自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电话报告战俘长官。

全日出勤完成定额的战俘，每个劳动日基本报酬为：

非苏联战俘　0.7马克

苏联战俘　　0.35马克。

但每个劳动日最低报酬为：

非苏联战俘　0.2马克

苏联战俘　　0.1马克。

既然我们在旁征博引，这里不妨再提出一份文件，这是笔者有步骤地用骆驼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收买马尔娅·范·多尔恩而搞到的。孜孜不倦的范·多尔恩在笔者进一步调查她所盼望的莱尼搬到乡下去住一事时，在收拾莱尼乱七八糟的衣柜中发现了它。那是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至今未被发现的一封信，笔者不妨把它称为“具体派诗歌留下的例子”。

房屋分配应精确加以计算，以确定在严格节约地利用房间(见使用计划的‘规定利用能力’一栏)的情况下需要多少房屋，特别是现有住房用以安置部队宿营的人数。部队在使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如何具体安排，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所允许的单间外，其余房间应按面积大小计算在内，直至宿营人数达到为止。在大房间按规定即按照使用计划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房间不属分配范围。军官营房的勤务兵房间和军

官宿舍中规定军士与士兵居住的房屋，均由部队常年经费承担，故应计入长期使用之列。

如不能提供规定面积，即营房超员时，则须在计算全年消费资料经费及全年小器具消耗开支的情况下考虑现有的一切房屋。在这种情况下，宿营人数的住房分配不按使用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宿营人数重新计算时应对房屋分配进行调整。用于部队教区礼拜活动的国有建筑物和房屋（驻地教堂和练兵场教堂）以及驻地公墓的提供、维修和管理，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负责。大型军医院均设立祈祷堂。

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将个别房间改作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改变现有的此种设施，均需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征询随军主教的意见。驻地如无适合宗教活动用的国有房屋，应确保对民用教堂的使用或合用权。合用民用教堂现有的圣器，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功，则根据第二章第113条甲款规定由行政部门提供。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订立协议，需有军队（海军）驻地教士与军区（兵站）教士参加，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批准。参照陆军服役条例第29号第370条（甲、乙）。

应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为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上课提供合适的场所。必要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同意，可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租用，也可根据情况由教士自行提供场所，在此种情况下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应确定向其提供适当的报酬。

驻地教堂、第150条规定的专用场所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维持和补充计划内的家具什物（包括宗教活动用

品，参照第二章第113条甲）的费用，教堂和公墓礼拜堂的取暖、照明和清洁费用以及教堂衣物的保养清洗费用，均由预算中“安置”部分的有关项目支付。

凡部队自行经营厩肥者，应将每次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参照国家财政条例第69条乙款）半数上缴本部队会计室列入“杂项收入”，另一半留给该单位自己，按第244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专门一项“肥料收入”入帐。

自营部门应负责：

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408条丁款）；

2.维修和更换自己的饲料车；

3.在计划内设备器材之外改善厩栏、马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马术训练镜）、跑马场和跳马场的设施（第179条戊和第246条）；

4.补充饲料和其他养马开支。

其他支出不得由“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项支付。自营部门应同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协商，尽量搞好积肥销售工作，后者应查明最佳销售机会。如以厩肥换取饲料，则此种易货交易应分为购进和出售两项，它无需对方到场。金额应分别记入收支帐，厩肥金额半数作为售肥收入帐列入杂项收入，部队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均应作价，其金额半数列入杂项收入。

自营厩肥由各经营单位（骑兵团、营等）经营。也可由各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队独立经营。按第244条和261条入“马厩”帐。

自营厩肥单位调动或换防时，“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仍归其所有。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

额转交新单位。单位解散时，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需要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笔者再次打扰那位高贵人士，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他的语调这一次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毫无惧怕的心情开始了大约为时三十六分钟的火车旅行。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笔者没有料到这种厚待，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贵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笔者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①深感遗憾。他认为这一次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

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

① 西德税法规定，经营业务或公务开支均可相应少缴所得税。

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①，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花园已介绍过，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有凉亭，中间那一段向花园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

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长腿，小嘴巴，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找到了他；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②；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又穿过艾费尔高地，越过区界和国界。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真不清楚我就会怎样——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虽然她是个较难接近的人。1952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对男人的魅力，连我作为女人也能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虽然他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

① 即不甜的、酸涩的酒。
② 比利时一城市。

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我真不明白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是否合适，我也不明白，关于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是否会导致一种，嗨，导致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我真不知道是否早了一些——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可爱而自由自在——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失去了哥哥、父亲和母亲，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1955年我丈夫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还和她通过信呢。那一次，我丈夫在外交部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

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西方盟国的过错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我曾和埃里希·封·卡姆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把他放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

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了。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还有那些空袭！胡闹！我当时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多少情况，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能在纽伦堡①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了脸。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出证，他就能帮我。在审讯中，人们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这些言论是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下面的话？(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1941年9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俄国人早晨来上班时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我在1942年3月

① 指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审讯纳粹主要头目。

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把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至少我们的工厂都是这样做的——费用由我们的工厂自负。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①。我同绍克尔吵了一架，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把 OKH、OKW 和 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的所有指令都搬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把有意泄露的有关消息偷偷送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死了，有的更倒霉，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 什么损害？——笔者）。这些我们就别再提了，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我

① 指每周或每月有几天给战俘吃放有面粉的汤。

完全没有能对他儿子的教育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我在文学上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特拉克尔和卡夫卡，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不开窍的文化修养有欠缺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她儿子么？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难道这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这一衷心的提议的，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把她的名字忘了——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说此人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假如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毫无理由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我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来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我当然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观点。我自己就犯过罪，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

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我是罪犯，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不过他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这些家产现已落到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不可变更地把它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①。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当然我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赞美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

这里又发生了笔者认为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正在这个时候，主人家的狗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

---

①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这是存在被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又称“俄狄浦斯情结”。

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舔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现在所有的人突然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佩尔策、波加科夫、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

向咪咪和先生告别时气氛亲切友好，他们请求笔者如有可能居间调停，语气一直还很悲伤。他们说，他们始终愿意帮助波利斯的儿子——正因为他是波利斯的儿子，是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重整旗鼓”。

战争结束时格龙奇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政治情况和所在位置一直还没搞清楚，几乎毫不清楚。安排一次对他的访问毫不困难：一个电话，约好时间，格龙奇在陵园闭园后等候在生锈的铁门旁。这扇门只是在运送那些用塑料制造因而不能用于堆肥的花圈和花卉下脚料时才开启。格龙奇一如既往，热情好客，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拉着笔者的手，领着他安全无恙地经过一些“特别滑溜的地方”。他在陵园内部的处境在这期间已大有改善。他新近得到一把公共厕所的钥匙，还可以到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配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正心情舒畅地迎接(那是复活节前后——笔者)即将来临的白色星期日①的绣球花旺市。在三月里这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坐不住，但可以在陵园里安安静静地散步，这一次也是朝大路走去，格龙奇称之为大道。他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最

① 即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教会常在这一天举行初领圣体仪式。

好的住宅区，最值钱的地皮，如果您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给您看几样东西来证明他的说法。他倒从来不说假话，正如他从来不是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指给笔者看佩尔策1945年2月同他在那里架的电线的残余部分：一根劣质黑色电线断断续续从花圃拉到一株长满常青藤的栎树上，从那儿穿过一片接骨木树丛（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电线夹子，虽然已经生锈了）和一片水腊树篱，一直通向封·德·策克家的祖坟。在这座庄严墓地的外墙上也留有夹子和劣质黑色电线的残余——这时，笔者（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毛骨悚然）站在那扇威风凛凛的青铜墓门前面，它就是当年墓穴中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上了锁。“就是从这儿进去，”格龙奇说，“里面再通往黑里格尔家墓，从那儿再通往博尚普家墓。”封·德·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照管得很好，种上了苔藓、三色堇和玫瑰。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的常年服务工作让给了我，那些通道战后他又用砖堵死了，并且粉刷过，可惜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干的，后来出现裂缝和灰泥剥落，他都说是炸弹震坏的，这倒也不是说瞎话，因为二日那天这里一定炸得很厉害。那后面您还能看到一尊天使像，头上有一块炸弹弹片，就好像有人用大斧砍进去拔不出来似的。（虽然天色已开始黑了，笔者仍能看到这尊天使像，可以证明格龙奇所述不假。）您看，黑里格尔和封·德·策克两家都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拿撒勒画派① 作品被毁了。黑里格尔家修复了它们，封·德·策克家把它们现代化了，只有博尚普家的祖坟破败不堪。这孩子——嗨，他现在大约也有六十五岁了，可是20年代初，我曾

① 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画家的一个派别。

看到他穿着水兵服在这里哭爹叫妈做祷告，样子非常好笑，因为当时他穿水兵服已显得年龄太大，可又不肯脱掉——说不定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水兵服跑来跑去呢，在南边梅腊诺[1]附近的疗养院里。有时他的律师花点钱，雇人把最长的野草除掉，这位律师还坚持那位至今仍靠香烟纸厂为生、身穿水兵服的可笑的老爷的安葬权。不然的话，市政当局很可能把这东西统统铲平。现在，正在为一块坟地大打官司呢（窃笑——笔者），好像这老小子就不能葬在南边蒂罗尔似的。那里就是礼拜堂，门已经坏了，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莱尼和波利斯的石楠是否还留下一些。”

笔者果真走进这座已很破旧的小礼拜堂，忧心忡忡地观察了造型非常优美的半圆形后厅里正在一片片脱落的拿撒勒画派的壁画。礼拜堂里面又脏又凉又潮湿，笔者为了看清祭坛——祭坛上的有色金属已被偷走——的全貌，不惜破费几根火柴（还不清楚他是否能向财政局报销此项开支，因为他这个烟鬼消耗的火柴量是很大的，还得——由支取高薪的官方和非官方专家——审定，十三根至十六根火柴是否能作为业务开支予以报销）；笔者在祭坛后面发现一种奇怪地闪烁着紫红色的草木灰，完全有可能是石楠腐烂后留下的；还有一件通常是女人贴身穿在连衣裙或毛衣里面的衣服，当笔者茫无头绪地走出博尚普家礼拜堂时，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的格龙奇说明了它的来源。“是啊，很可能是他们，有几对情侣，有时迷路走到这儿，不知去哪儿好，既找不到背旮旯儿，又没有钱去住旅馆，不怕死人，就钻到这里面去。”

---

① 梅腊诺，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南蒂罗尔。

在这个阴冷的傍晚，宾主溜达了很长时间，兴尽而归，最后又恰到好处，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干了一瓶樱桃烧酒。

"是啊，"格龙奇说，"我听说我们老家那里仗打得很凶，真是火烧火燎，想回去看看母亲，也许能帮帮她。她那时快八十岁了，我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回去看过她，虽然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屁股后面转，但这不能怪她，只怪某些体制(窃笑)。荒唐透顶，但我还是去了，可已经太晚了。我仗着自己熟悉地形，因为小时候我在那儿放过牛，沿着林间道路，沿着森林边缘，有时一直走到白沙堆和红沙堆。只是我刚刚过了迪伦①不久，就被那帮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枪，给了我一个袖章，把我连同一群半大小子送进了森林。好吧，我们索性假装一支侦察队——这一套鬼把戏还是我在上一次战争中学来的——带上那几个小子——可是这时我的地形知识已经不管用了：那里已面目全非，只有弹坑、树墩、地雷，要不是很快就被美国佬抓住，我们就完了——他们当然知道哪些道路没有埋雷。幸而那帮孩子得救了，我也得救了，虽然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把我放出来，挨饿住帐篷四个月，又脏又冷，嘿，在美国人那里日子并不好过啊，从此我就永远落下了风湿病，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不知道是哪个德国畜生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升起了白旗——那个鬼地方有一阵子两军对峙，有时美国人打过来，有时德国人打过来，老太太又不肯离开那里。果不其然，德国人用冲锋枪给了快八十岁的老娘一枪，很可能就是今天在那里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帮王八蛋开的枪。那些教士对这种狗屁纪念碑竟不加阻止。我告诉您，当美国佬终于在六月把我跟

① 迪伦，城市名，位于科隆西南。

农业人员一起释放时，我都快没命了。尽管我确实属于这个范围，此事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营里柯尔平①组织的成员都对有关农业人员的这条消息加以保密，把它作为一个诀窍传给自己的伙伴。嗯，正好我学柯尔平老爹，学基督教工人，念几句虔诚的格言，这样我在六月就被放出来了。回来后我发现小花店整理得干干净净，经营井井有条，赫特霍尼规规矩矩地把它移交给了我，连同租金在内。这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今天我还是以成本价格向她供应鲜花。小瓦尔特并没有来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想让他至少吃几个月苦头，这家伙在所有困难时期都能太平无事。当然，只是让他受一点折腾，治病救人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咳，他对我也不错，把我的一份补贴给我，还给了我一笔贷款，使我终于能自己开店。我们把我们的主顾一分为二，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不过我还是认为，把他关上半年对他是有好处的。”

笔者在格龙奇那里还待了一会儿(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一点也没有想哭的苗头，讲完以后就心情舒畅地沉默不语。他的小屋相当舒适，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在格龙奇的小屋里笔者可以做格龙奇在陵园里因为怕人看见(“一支烟几公里路以外都能看见”)而不让他干的事情：抽烟。当格龙奇送笔者出门，又走过滑溜的垃圾堆时，他并非泣不成声但却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必须竭尽全力把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只是想私下替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一家索取某种补偿。他是个棒小伙子，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也像他爸爸，他就是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出生的，在我这儿工作了三年后去陵园管理

① 柯尔平(1813～1865)，德国天主教神学家，1849年在科隆创立天主教帮工协会，为后来的柯尔平组织奠定了基础。

所，后来当了街道清洁工。是个棒小伙子，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得帮他一把。他小时候，每当莱尼在大忙季节到佩尔策店里以及后来到我店里来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跟来在这里玩。如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藏在他父亲曾经隐藏过的这个陵园里。藏在这里谁也找不到他，况且他也不像我这样害怕墓穴和地窖。”

笔者亲切地向他告别并答应——他打算说到做到——再来看他；他还答应，一旦小格鲁伊滕逃出牢笼，就把格龙奇所说的这条“陵园妙计”告诉他。“还有，”格龙奇从后面向笔者喊道，“告诉他，在我这儿老有咖啡、菜汤喝，有香烟抽。老有。”

现将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归纳于下：

“去卖笑”（以免她的钢琴被扣押）。

“生灵”（宇宙间）。

“即兴跳舞”（同埃里希·克普勒）。

“到时候穿着它入土。”（穿浴衣）。

“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大便时说）。

“伸开四肢，情不自禁”；“敞开怀抱”；“接受”；“施与”（石楠丛经历）。

“请，请把这块生命之饼给我！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此话使她初领圣体遭到拒绝）。

“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白不呲咧、软绵绵、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我差点把它吐出来。”（指真正初领圣体）。

“肌肉动作”（指大便“免纸”）。

“一个我爱的男人，我愿无条件委身于他”；“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指她的“意中人”）。

“那小子”的“手不温柔”（首次幽会）。

“为的是能够在暗处安静地哭一会儿”（看电影）。

“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哥哥海因里希）。

“怕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多得惊人。”（哥哥海因里希）。

“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哥哥海因里希）。

“日子过得不错”；“包拆废屋者”（谈1945年后的父亲）。

“对父亲大概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谈洛蒂·霍伊泽）。

“糟，糟，糟。”（谈全家同哥哥海因里希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疏通玛格蕾特家堵塞的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

“这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我才不希罕这一套呢。”（当着玛格蕾特的面就人们平常所说的“同房”想入非非）。

“他在未死之前就已在我的心目中死掉了。”（在她丈夫阿·普逼她干上述那件事后说）。

“她瘦成皮包骨，她是饿死的，虽然最后我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当时我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

小姐，没有用了——难道您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这时院长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谈拉黑尔之死）。

“简直叫人受不了。”（谈与阿洛伊斯的艳遇）。

“看到这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谈战时她在父亲公司办事处的工作）。

“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的死魂灵花招的动机）。

“立即打得火热”（按波利斯的手）。

“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同上）。

“正在这个时候，那该死的礼炮声达到了顶点。”（波利斯表白爱情的时刻）。

“同房”（莱尼对玛格蕾特谈通常被人们描写得更粗俗的一种活动）。

“你知道吗，我到处都看到警告牌：小心，有生命危险！”（谈她与波首次同房后的处境）。

“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莱尼对玛格蕾特谈她与波利斯的一次谈话）。

（美国人）“止步不前”（同上）。

“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同上）。

“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可一点也不远嘛。”（谈美国飞机轰炸和对莱尼来说行动太慢的推进）。

“美好的念珠月”(指1944年10月，这一月白天空袭频繁，便莱尼能有机会与波利斯同房)。

“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念珠月)。

“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谈波利斯和艾哈德)。

“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再次谈美军进军)。

(同房)“已无从谈起”(腹中已有身孕的莱尼)。

第九章

笔者很想跳过有几个情况提供者已隐约提到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1945年后短暂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他并不缺乏洞察力，他只是难以相信。可是，他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东西呢？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喜欢谈的这个使作者左右为难的问题，在这里严酷无情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莱尼对政治并非不关心，这已为经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夫妇所证实，他们的态度足以使公证人或记者都不会拒绝认证。莱尼（这一点得到赫尔岑夫妇的明确证明，他们有将近两年之久一起看莱尼的黑白电视机的节目）“最爱看到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面孔”（寥寥可数的莱尼直接引语之一！）。她对巴泽尔①、基辛格②和施特劳斯③的评价在这里无法介绍。这样做，对笔者未免代价太大。他不能这样做，谈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类似那位政界要人。他——笔者——本

---

① 巴泽尔(1924～)，曾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71～1973)，联邦议院议长(1983～1984)等职。

② 基辛格(1904～)，曾任西德总理（1966～1969)、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67～1971)。

③ 施特劳斯(1915～1988)，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1961～1988)，曾多次出任西德政府部长，巴伐利亚州州长。

来可以根据他的记者职责引用莱尼的话，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把她推上法庭，而且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使他和赫尔岑夫妇失望的，但他还是宁可在这里仅只略提一笔而不引用原话。原因很简单：他不愿看到莱尼站在法庭被告席上。他觉得莱尼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心爱的独生子身陷囹圄，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扣押的危险；她害怕或担心——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从那个土耳其人那里“受孕”(据汉斯和格蕾特夫妇引用莱尼的话)；由此可以断定一个生理上的细节：她一直还有妇女的生理特征；有人威胁要用毒气杀死她，无人知晓这能否做到——进行威胁的是一个已退休的公务员邻居，此人曾几次试图亲近莱尼未遂(在昏暗的楼道里明目张胆地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裸露自己的下身，也是在昏暗的楼道里)；财物被扣押和被扣押的威胁，犹如“甚至无法用砍刀砍出一条路的莽莽丛林”(洛蒂·霍伊泽语)。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她站在法庭上重复她那些有关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毁灭性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简洁得令人叹赏的评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不，不。

好了，别再转弯抹角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蒂、玛格蕾特、老霍伊泽、马·范·多尔恩和该党从前的一名干部异口同声！)。我们都知道那些写着“有……参加”的海报；这通常说的是知名人士，他们实际上从不露面，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答应过参加，人们只是认为他们有吸引力。人们是否认为莱尼有吸引力呢？显然是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那位前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有利的地段暂时经营一个报摊，生意兴隆。他自称“六八人”。此人——

至少在笔者看来——讨人喜欢，年约五十五岁，看上去意志消沉，如果不说是愤愤不平的话。笔者请他解释一下“六八人”这个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字眼，他只是说：“哎，从1968年起我就不干了。嗯，我不干了。”他像那位政界要人一样不愿披露自己的姓名，下面综合在一起的情况都是他断断续续提供的，因为他的叙述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这样一来，笔者也了解了这位“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在不到半小时之内，当顾客问有没有色情书刊时，他至少有十四五次粗暴地——如果不是气呼呼地——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觉得，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刊——如通俗小报、严肃的和消遣性的日报，还有半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也都是勉勉强强拿出来的。笔者谨慎地预言，这种销售政策会使报亭的收入受到影响。他的担心遭到这位情况提供者的断然否定。“反正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报亭。至今我只能领取一小笔补偿金；在批准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巴不得我没有活下来。那样他们就可以省一笔钱了。不，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即使有人想方设法逼我这样做，说什么‘设在如此重要地段的报亭应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一位基民盟市议员的呈文）。不，我不干。还是请他们把这种臭狗屎拿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吧：在教堂门口，夹在他们的教会报纸和谈论贞操的假正经玩意儿中。不，我不干。管他是楠宁还是金德勒①，张三还是李四——好吧，让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抵制，继续对我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进行甄别。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

① 金德勒（1912～ ），联邦德国出版界著名人士。楠宁见第132页注。

我是死也不肯卖的。”也许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这位情况提供者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脸色和眼睛像肝病患者，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戴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两手发颤，脸上强烈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就连笔者也无法竭力幻想自己不在这种蔑视的范围之内。“他们——维希法西斯分子①——把伊尔泽·克雷默尔的男人维尔纳从法国集中营里弄出来，据我后来获知，把他交给了纳粹。当时我本可以看出苗头的。谁也无法想象，我们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②的那一年半里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呀！哎，他们把维尔纳枪毙了，他们向我们吹风，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而为了除掉法西斯叛徒，尽可以借法西斯分子的手。我一直到1968年还相信这种鬼话。‘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是向法西斯分子告密，说他们是密探。’嘿，这样一来，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的手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赖。我可不干了。不，1945年我就应当听伊尔泽的话。我没有听，我又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告发我、逮捕我、监视我、嘲笑我。如今，等我关掉这个报亭，我就到意大利去，那里也许还有几个人，几个不像我们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哎，那个普法伊弗家或格鲁伊滕家的姑娘的事啊，那时我还像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教条，这事甚至连我都觉得难办。我们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谈情说爱，偷偷送给他食品、地图、报纸、形势报道，甚至还同他生了一个孩子，取了个俄国名字。我们想把她改造成一名抵抗战士，您知道，这个红军士兵教会了她什么？祈祷！

① 二次大战中德国占领法国后在维希建立的伪政府，通称“维希政权”。
② 即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经济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附有秘密附加议定书，划分了德苏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真是胡闹！嗯，她富有魅力，一个大美人，这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会有好处，因为我们当时不得不声讨一支所谓社会主义军队在东普鲁士等地搞的荒谬勾当。我要是听伊尔泽的话就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要承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是我们在1928年所想要的，那时候也许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①。你得承认，兴登堡胜利了，1945年也是如此。别去纠缠那个好姑娘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是啊，不过她确实是个工人，真正的工人，虽然出身于破落资产阶级，而且，是呀，我们有几次曾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上街游行，虽然我们不得不把她几乎灌醉，因为她胆小得要命。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台上。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难堪。"（弗里茨本来就黑的皮肤明显地变得更黑了，这是否是一种脸红？这不妨问一问。顺便提一下，弗里茨这个名字是虚构的；"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她确实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了——不过伊尔泽说得对：我们害了她，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有这么一两次，她真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她被问到她的波利斯的情况和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什么时，她答道：'祈祷。'这是她说出口的惟一的一个词，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②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马。'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

① 即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德共领袖，曾在1932年春的总统选举中与兴登堡等人竞选总统。

② 德拉克卢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

忘了退党，后来我们遭取缔时，马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牛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她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子里一切全都乱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为什么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听说她境况不佳，我很难过。她肯定不愿想起我，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头。"

也许还得补充一点：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种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出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人感到是一种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种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色，如果您读它，甚至还能听出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如渴地阅读色情和吸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色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超短裙和特长衣服，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出个好点子：投巴泽尔或克普勒①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乱语。我嘛，我正在学人话，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口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弄清了莱尼一

① 克普勒，法院推事，详见第一章第21页。

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的劈头第一句话就问："您赞成还是反对1968年？"由于笔者抱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种种不同的感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为什么要他表态支持或反对20世纪的整整一年，因此他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1946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莱尼在这张照片上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肉吧。笔者真想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她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出来，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出是她。但愿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这张照片的底片。那篇文章也许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是：

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向赤色分子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我不知道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姐还是普太太——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性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种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入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祈祷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也许，沉思的读者应当偶尔为格小姐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有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庭、误入歧途、可能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说服力一些。

笔者强烈希望，当年莱尼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种文笔所糟蹋。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得到了核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替阿洛伊斯向莱尼求婚时，马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蕾特·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当时果真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点：一是马·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

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那个古怪的“吉利克”一词也核实了，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虽然在他看来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机构，他们（毫无道理！）觉得受了嘲弄，勉勉强强、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又对弄清其字义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电话一挂了事，结果只是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于是他就去问马·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种礼拜仪式，“本来是为孩子们安排的一种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重温我们的知识；不过这种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举行”（马·范·多尔恩语）。这很有可能是和新教徒的“主日学”① 类似的天主教活动。

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② 的拳击比赛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马一趟，到教团总部档案库去查找肠卜僧的下落？在弗赖堡和罗马分别

① 主日学，亦称“星期日学校”，基督教新教仿照学校方式在星期日开设的一种儿童宗教班。

② 两人均为美国拳击家。克莱为1967年重量级世界冠军，弗雷泽为1970年重量级世界冠军。

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从人性上来说固然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倒是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蕾特提供了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出人意料的重要细节。走访玛格蕾特，有时他送几束花、一小瓶杜松子酒，偶尔送几支香烟，连出租汽车都不坐，因为他出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不仅要考虑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得考虑人道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蒂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欢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处分？

为了能够静下心来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乡①，此后不久又经过罗恩格林②惊慌失措的城市，从那儿改乘出租汽车再走大约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斯③的故乡，来到一个村庄，那儿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风光。经过近三小时不舒适的旅行，笔者感到疲劳，几乎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快餐店去吃点东西。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十分殷勤地给他端上油煎饼、蛋黄酱和煎牛饼(热的)，随后他又被打发到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去喝咖啡。这一天浓雾弥漫，迷迷茫茫，显而易见，当年西格弗里德策马

① 西格弗里德，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尼德兰王子。尼德兰即今天的下莱茵地区，首都克桑腾。西格弗里德的故乡指克桑腾。

② 罗恩格林，传说中的天鹅骑士。他帮助布拉班特女侯爵埃尔莎摆脱困境，后与她结婚，约定不得问他的姓名和出身。由于埃尔莎违约，罗恩格林乘天鹅车返回故乡。

③ 约瑟夫·博伊斯(1921～)，美术家，生于克莱费。

前往沃尔姆斯的时候，不仅途经云遮雾障的尼费尔海姆①，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饮食店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给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送上烧酒，也推给笔者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可以驱赶寒气，况且，吃过蛋黄酱煎饼得喝这个。"接着他又不慌不忙地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他说的是一种当地方言，还带有喉音，显然是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方言，虽然这个地方距离笔者出发的地方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相形之下，他觉得自己像是南方人了。使他感到舒畅的是，那两个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把第二杯烧酒给他端上柜台的店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谈话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教堂"②，既是具体的、建筑学的和组织上的意思，也是抽象的、近乎形而上的意思；经常摇头，有时悄悄嘀咕几句，接着又议论起"神父"③来，这决不可能是指那位使人受不了的德国总理；很可能是他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这三个男人虽然是德国人聚在小酒馆里，却一反常态地闭口不谈战争，他们当中是否有人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大概三个人都认识，他们有可能或十拿九稳曾和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洗过澡，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忏悔，星期日一起去望弥撒，星期日下午一起去参加在稍南一点的地方叫做吉利克的课程，穿着木屐在滑冰场上溜冰，有时去克费拉尔朝圣，从荷兰走私香烟。从年龄来看，他们很可能认识他。1944年底，他在玛格蕾特的野战医院里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后死去，他的士兵证被用来移花接木，使一名苏联士兵——至少是暂时——获得了合

① 尼费尔海姆，地名，意为"多雾之地"。

② 此词的原文为方言。

③ 此处原文为方言词Paapen，发音与下一句的前德国总理巴本（Papen，1879～1969）相近，巴本曾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

法身份。笔者拒绝了第三杯烧酒，要了一杯咖啡，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舒适的昏昏欲睡引入梦乡。罗恩格林是否在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在尼费尔海姆这个地方，由于埃尔莎果真问了他那个问题而惊慌失措，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骑上那只正好被后代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咖啡很好，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过来的，笔者只能看到她那双白里透红的丰满的手臂，店主殷勤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必不可少的小奶罐里装的不是牛奶而是奶油。教会和教士，仍然压低的声音中有几分怒气。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为什么不出生在西边三公里的地方呢？要是那样的话，玛格蕾特那一天又会给波利斯偷谁的士兵证呢？

精神差不多恢复之后，笔者先去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名簿，可以当作姓名地址录。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只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这个阿尔弗雷德死亡(二十二岁)年份不是1944年，而是1945年。这真是莫名其妙。难道这儿也像凯佩尔那样，由于施勒默冒名顶替而阵亡过两次，登记过两次死亡么？教堂司事随随便便地叼着烟斗，从圣器室里走出来，以便为某个礼拜仪式做准备——在什么地方铺绿布、紫布还是红布？他知道其中的奥妙。由于笔者完全不会撒谎或瞎编什么(每位读者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他拘泥于事实已经达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窘得要命，含糊不清地嗫嚅着他在战争中曾遇到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教堂司事听了半信半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人的俘虏，在一次矿山事故中死于非命，葬在洛林，目前正由圣阿沃尔德一家花圃照管坟墓；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的金发姑娘，既可爱又聪明”——进了修道院，阿尔弗雷德的父母今天还很伤心，因为

他偏偏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赶上了这种事。是的，他原是人造黄油厂工人，为人正派文静，不愿当兵，笔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教堂司事并不怀疑，不过感到好奇，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笔者，使得笔者匆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别离去。他很不愿意更正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日期，很不愿意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他们每年付费照管的坟墓中埋葬的是一个苏联人的遗骸、骨灰、灰烬，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愿让那堆灰烬、那堆骨灰受到这种照顾——不是的，不过人们很想知道，据信被葬在墓中的那个人确实是埋在墓中，可是这里看来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死亡官僚机构看来完全失灵了。这真叫人莫名其妙。反正对这位教堂司事来说，事情是够莫名其妙的了。

叫出租汽车的困难，还有在克莱费较长时间的逗留，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克桑腾和克费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在此就不必一一叙述了。

当天晚上，笔者就去向玛格蕾特调查。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一头金发，神情忧伤，要求找个教士来，失去了双腿——她在报告他死亡之前赶快跑进已经下班的文书室，用一把私配的钥匙从有卷帘木罩的门柜里偷出了他的士兵证，藏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曾向她谈起过他的未婚妻，一个漂亮文静的金发姑娘，也谈到了他的家乡——就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风尘仆仆地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她承认，有可能在野战医院即将迁移的匆忙中忘了办“正式手续”，她的意思不是指埋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

这里只留下一个问题：德国官僚机构果真失灵了吗？或者说，笔者是否有义务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向他们和盘托出有关他们每年万圣节[1]都为之种上石楠或三色堇的那副遗骨的真相？并问他们是否从没注意到，那墓前有时放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莱尼和她的儿子莱夫前去扫墓时献上的？或者，笔者也许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波利斯填写的那张预先印好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平安无事地被美军俘虏？这些问题只能悬而未决，不可能把一切都搞清楚。笔者坦率承认，他——就像布拉班特的埃尔莎或罗恩格林那样——在下莱茵，在差不多是荷兰的一位教堂司事那好奇怀疑的目光注视下，在距离奈梅亨[2]不太远的地方失去了镇定。

没有想到，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倒搞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亡情况，但至少弄清楚了她的部分历史，虽然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未来所作的打算。笔者后来还是下定决心前往罗马，而且竟例外地不虚此行。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的情况，笔者请诸君阅读有关的旅行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法、英、意、美、德等国的电影以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德文作品，对此他不想作任何补充；他只想说，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他可以研究耶稣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一位最多四十一岁的美貌迷人的修女的接待，她听到笔者对科伦巴努斯、普鲁登齐娅、采齐莉娅和萨平蒂娅等修女的满口奉承话时面露笑容，倒不是屈尊俯就，而是真心实意的亲切友好和通情达理。甚至还提到

---

① 天主教节日，在每年11月1日。

② 奈梅亨，荷兰城市，位于莱茵河支流瓦尔河畔，靠近德荷边界。

了莱尼，原来，那个气派不凡地坐落在罗马西北一个高地上的教团总部是知道莱尼的。想想看：那儿的人们知道莱尼！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下，在大理石和黄铜之间，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莫里斯①式皮沙发上，桌上放着一杯相当不错的茶，对茶碟边上青烟袅袅的香烟并非故意也并非宽厚而是确实视而不见，一位实在迷人的修女——她曾以一篇关于冯塔纳②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将以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贝恩③（!!）的论文取得大学（尽管只是教团所属的一所大学）授课资格，一位身穿朴素修女服（非常合身）的高水平日耳曼文学专家，甚至很熟悉海森比特尔④——她知道莱尼！

想一想：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蝉鸣，电风扇，香茗，杏仁饼干，香烟，大约在傍晚六点钟，一位肉体和精神同样迷人的女子，在提到《O侯爵夫人……》时也毫不流露尴尬的神色。当笔者不假思索地在茶碟（一只仿造得逼真的迈森瓷器赝品）上把第一支烟按灭，点上第二支烟时，她蓦地压低嗓门，语气粗鲁地说："该死的，您也给我一支抽吧，这种弗吉尼亚烟草——我一闻见这味道就非抽不可。"——她吞云吐雾的样子只能用"邪恶"这个词来描述，并继续低声地、这次是带着十足的共谋者口气说："要是索菲娅修女来了，就说是您的。"此人，此地，在世界中心，在天主教界的心脏，她知道莱尼，甚至知道她姓普法伊弗，不仅是姓格鲁伊滕。她，这个像天仙一般的美人，以学者的求实态度，在一只面积为DIN—A4⑤、高约

① 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曾对工艺美术进行革新。
② 冯塔纳（1819～1898），德国小说家。
③ 贝恩（1886～1956），德国诗人。
④ 海森比特尔（1921～ ），当代西德作家。
⑤ DIN，德国工业标准。DIN—A4相当于210×297毫米。

十厘米的绿色纸盒里翻寻着，只是为了帮助记忆才偶尔看一看那些文件资料。她介绍情况："修女拉黑尔·玛丽亚·金茨堡，波罗的海地区人，1891年生于里加附近，1908年在柯尼斯堡高中毕业，在柏林、格廷根、海德堡上大学。1914年在海德堡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犹太籍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者曾多次被捕。1918年提出关于克·贝尔纳① 的内分泌学发端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篇论文涉及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很难断定属于哪一门学科，最后还是由一位内科医师认定为医学论文。在鲁尔工人居住区行医。1922年改信天主教。在参加青年运动的人士中开展报告活动。遇到重重困难后出家，原因与其说是她的假唯物主义学说，倒不如说是她的年龄。1932年她毕竟已有四十一岁，而她以往的生活——说得轻一点——并非是全然柏拉图式的。经一位红衣主教说情，进了修道院，半年后被停止教学活动。嗯，"——这时，美丽的克莱曼蒂娜修女若无其事地拿起笔者的那盒香烟，"抽出一支塞进嘴里"（笔者语）——"后来的情况您已略知一二。我只需要纠正一种可能产生的印象，似乎她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受到过虐待。恰恰相反：他们把她藏起来了。向上报告说她已'逃走'，而格鲁伊滕小姐或普法伊弗太太的乐善好施，很可能也有点同性恋的关系，以及她的关怀，其实对金茨堡修女，对修道院，对格鲁伊滕小姐，都是有致命危险的。花匠绍肯斯放普法伊弗太太进修道院，那也是极其轻率的。好吧，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过来了，即使是痛苦的，即使彼此都有怨恨，而且，由于我认为您起码会有一点辩证的观点，用不着向您解

① 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他的最重要发现是肝脏的产糖功能和血管运动神经。

释，为什么为了不让一个人进集中营，却不得不把她藏在类似集中营的环境之中。这样做是残忍的，可是把她交出去岂不是更残忍吗？她不大讨人喜欢，有过故意刁难、不怀好意的行动，总是你来我往，因为她是一个顽固的人。总之一句话，后来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您是否会相信我，如果我对您说，教团丝毫也不想制造一个亡灵或圣徒，但由于某些——教团很想加以压制的某些现象，它几乎被迫采取了完全不得人心的做法？您会不会相信我？”把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用于动词“相信”，笔者觉得竟出自这样一位杰出的日耳曼语言学家之口——一个“邪恶”地吸着弗吉尼亚香烟的修女，每当照镜子的时候，她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看到她那柳叶黑眉的优美线条、非常合适的修女帽、丰满而肉感的嘴的非常迷人的线条；她也很清楚她那双十分动人的手的吸引力；尽管衣着端庄，仍叫人“猜想”她那修女服里有着完满无缺的胸脯——出自这张嘴，使用动词“相信”的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笔者觉得很不得体！使用简单的将来时疑问句，如“您会同我去散步吗？”“您会向我求婚吗？”在那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一个人是否会**相信**他根本还未听过的事！笔者实在难以点头表示同意，更何况她用锐利的眼光要求他说出口来，轻声说“是的”，就像平常只有在婚礼圣坛前所说的那样。他——笔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到罗马来不虚此行，这一点在这个当口儿已无可怀疑，因为这种逼人家轻声说“是”的做法，使笔者看到了以前采齐莉娅修女只能向他有所暗示的那种极不自然的柏拉图式禁欲情爱的高水平。连克莱曼蒂娜修女也似乎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她大大地收敛了自己眼睛那咄咄逼人的魅力，她那——不得不

说——玫瑰般的嘴巴不高兴地撅起，笔者感觉到她接着说的一些话是有意采用的心理上泼冷水战术。她一面说，睫毛并非一动不动，相反，她那——又短又硬令人吃惊和清醒，几乎像扫帚一般的——睫毛直眨巴，她说："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讨论《O 侯爵夫人……》的问题，女学生们就会无所谓地对我们说：'她应当吃避孕药片嘛，即使她是个寡妇。'——这样一来，就连像克莱斯特这样的一流文豪的作品也被贬低到廉价小报的水平了。但我并不想避不作答。金茨堡事件的糟糕之处，并不像您可能以为的那样，似乎奇迹是有人做了手脚！恰恰相反，那奇迹我们摆脱不了！大冬天在埋葬拉黑尔修女的地方竟长出了玫瑰花，我们无法清除它！我承认，是我们不让您去见采齐莉娅修女和绍肯斯的——顺便提一下，绍肯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您不必为他担心——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操纵了这一奇迹，而是这一奇迹操纵了我们，我们阻止想打听消息的局外人了解此事，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搞宣福礼①，而是因为我们不想搞！现在您是否相信您答应相信的东西了？"

这一回笔者在回答之前沉思地"审视"着她：克莱曼蒂娜修女突然显得那样——找不到其他字眼来形容——憔悴而且心绪不宁，挪了挪她的帽子，露出了——这一点可惜也是真的——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她又伸手抽出一支烟，这一次的样子就像一个连续抽烟的女大学生，在凌晨四时左右大失所望地看到自己要在六小时后宣读的关于卡夫卡的专题报告已彻底失败而感到疲劳的常见姿态。她又斟了一杯茶，完全按照笔者所喜欢的比例加入牛奶和糖，甚至还为他搅拌，把杯子推到他面前，

---

① 宣布死者已升天堂的仪式。

并以——无法用其他字眼来形容——求助的目光注视着他。有必要再次点明当时的情况：天气晴朗的春日傍晚。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清香。渐渐消失的蝉鸣——教堂钟声，大理石，莫里斯式皮沙发，木花盆里刚开始盛开的芍药，一切都洋溢着那种有时会使新教徒心醉神驰的天主教气势；克莱曼蒂娜儿分钟以前还鲜艳夺目的美丽突然间枯萎了；她对O侯爵夫人的冷静评论。她叹息着从墨绿色纸盒里取出一份份用回形针或橡皮筋束在一起的文件，五、六、十、十八——总共二十六份："每年一份报告，内容千篇一律：十二月，玫瑰花突然破土而出。到通常玫瑰开始开花时节才凋谢的玫瑰花！我们无可奈何，采取了可能会使您感到毛骨悚然的办法，我们掘出她的尸体，将她的——哦，残骸——其腐烂程度完全符合她死亡的时间——改葬到修道院的其他墓地中，当那些地方也开出可怕的玫瑰花时，我们又把她挖了出来，将她埋回原处，然后再把她挖出来，将她火化，把骨灰盒放在礼拜堂里，那儿，在她的附近确实没有一丁点儿土壤。玫瑰花！从骨灰盒里冒出来，在礼拜堂里蔓延开来。把她的骨灰再埋到地里去——仍然是：玫瑰花。我敢肯定，如果我们从飞机上丢下骨灰盒，从大洋里、从沙漠里也会长出玫瑰花！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别张扬出去，要保守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此，因此我们不能让您见到采齐莉娅修女，不得不把绍肯斯调到维尔茨堡附近一个农庄去当管理员，因此普法伊弗太太使我们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她会否认这——不妨说——怪事，而是因为她很有可能，根据我对她的全部了解，现在又补充了您提供的有关她的情况——因为她会认为，每年十二月中旬从她的肠卜僧的骨灰中开出玫瑰花，我只是在睡美人的童话故事中才听到过的密密层层的带刺的玫瑰

花，她会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如果发生在意大利——在这里我们连共产党都不必害怕，可是在德国！这就意味着倒退到不知哪一个世纪去。礼拜仪式改革还会有什么结果，从物理学生物学观点对所谓奇迹作出讲得通的说明还会有什么结果！再说，如果事情公诸于世，谁能担保玫瑰花会继续开放呢？如果突然不开花了，我们又如何是好呢？甚至连十分反动的罗马人士也彬彬有礼地劝我们不再谈此事。我们曾请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神学家观看了这一现象，他们都答应绝对保密。您知道，事后声称受到感动，提出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的是谁？是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神学家。再者，请您想一想它的政治含义：一个犹太女人，改信天主教，出家当修女，随后被禁止从事教学活动，后来在——不妨直说吧——很不愉快的情况下死去——她的骨灰从1943年起不断开出玫瑰花！这像是巫术。妖术。神话。而这些案卷又偏偏交给了我，我这个人曾批判过贝恩的生物主义！您知道，昨天有一位高级教士在电话里笑嘻嘻地对我说：'保罗①讲给我们听的奇迹已经够多了，现在请不要再给我们讲什么奇迹了。他就是我们所要的小花②，我们不再需要花了。'您会保持沉默吗？"

这时笔者没有点头，而是使劲摇头，并以说得很清楚的一声"不"来强调这一动作。由于克莱曼蒂娜此刻莞尔而笑，脸色倦怠，同时用空烟盒把她茶碟里的烟蒂扫到笔者的茶碟里，与笔者的烟蒂合在一起，接着，仍然疲惫不堪，又用空烟盒将抽烟的痕迹通通扫进一只蓝色的塑料字纸篓，然后面带笑容地

① 保罗，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后改信耶稣基督，并改名保罗。

② "小花"一词原文为英语。

站着不动，从而发出了离开的信号，因此笔者不知道，这儿是不是表面上否认有奇迹，实际上目的却是在制造奇迹。

克莱曼蒂娜把笔者送到大门口，同时聊起了文学。这一段路比较长，大约有四百米远，越过一大片空地。翠柏、意大利五针松、夹竹桃——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当走到前面马路上，可以看见那座浅黄浅红色的不朽城①的时候，笔者把他那包没有打开过的备用香烟塞给克莱曼蒂娜，她笑眯眯地把它藏在修女服的袖口里，干脆把它揣在衬衣般的衣服里，这件衣服弹性很好，藏几包烟完全绰绰有余。在那儿等候进城开往梵蒂冈方向的公共汽车时，笔者感到这是打破柏拉图禁令的合适时机；他把克莱曼蒂娜拉到两株幼柏中间，毫不拘束地吻她的额头，吻她的右颊，又吻她的嘴。她没有反抗，叹口气说了一声"噢，这个"，笑嘻嘻地沉默片刻，然后也回吻了他的脸颊。当她听见公共汽车驶近的声音时说："下次再来吧——不过请别带玫瑰花。"

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笔者感到不虚此行；他不想推迟动身时间，以免使形形色色的人过早地陷入矛盾的境地，这一点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对他来说并不存在欲速则不达的问题，他决定回程改乘飞机，内心——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如此——矛盾得要命，不知自己这次出差（就费用而论）是否公私不分？如果是的，又严重到何种程度？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涉及到公与私，使笔者感到不安，虽然不是那么厉害：克莱曼蒂娜是否在巧妙地为格尔塞伦的玫瑰奇迹作宣传，或者她以同样巧

① 罗马城的别称。

妙的手法想要防止这一点？如果假定他从如今他已钟情的这个女人的话里猜到她的愿望，他会怎么做呢，是客观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还是主观地迎合自己的倾向和讨好克莱曼蒂娜的愿望呢？

笔者一心想着这四重问题，心神不定，或者应当说心烦意乱地从春光明媚的罗马回到了冰天雪地的祖国：尼费尔海姆在下雪，路滑难行，出租汽车司机心情不佳，老想用煤气毒死、枪毙、干掉或至少痛打什么人，而且——使人大失所望——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大门口受到了冷遇，一个脸色难看的老修女少言寡语、态度粗鲁地把他拒于门外，对他说："我们对记者已经厌烦了！"这使笔者感到莫名其妙。不过，他聊以自慰的是可以绕修道院围墙走一圈（四边总长约五百米），还可以欣赏莱茵河风光，乡村教堂大门紧闭（当年曾对玛格蕾特的皮肤心醉神迷的那些祭坛侍者就是在此地服务的）。莱尼曾在此地生活过，肠卜僧曾被埋葬在这里，被挖出来，重新埋葬，再次被挖出来，被火化——而在修道院的围墙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豁口！他只好来到乡村客店，那儿一点也不像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家乡那样静谧和令人昏昏欲睡。不，这儿人声嘈杂，人们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笔者，在这儿他发觉一些外地人都属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类别：确实是记者。当他在柜台前向客店老板订房间时，他们异口同声地用嘲笑的口吻帮腔。"到格尔塞伦来租房间，而且是今天，"——这时嘲讽的口吻更变本加厉了——"也许甚至是要一间能看得见修道院花园的房间吧——呃？"当他果真天真地点头表示同意时，引起了哄堂大笑。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笑得前仰后合，由于他进一步被虚情假意所蒙蔽，

肯定地回答说自己一定要看看披上银装的修道院花园，他们终于把他纳入了傻瓜的行列，这时就变得比较友好了。正当店主忙于斟酒放酒、放酒斟酒之际，他们向他解释：难道他不知道人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修道院的花园里发现了温泉，它使一丛老玫瑰开了花；修女们行使管辖自己领土的权力，亲自动手垒墙把那个地方围起来；通往教堂塔楼的路被堵死，已派人到邻近的大学城(就是B.H.T当年和肠卜僧幽会的地方！——笔者)去向一家拆房公司借一架二十五米长的伸缩梯，以便“看看修女们在搞什么名堂”。

这时他们全都挤到了笔者周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是不是太天真了，以及他天真到什么程度——有合众国际社、德新社、法新社的人，甚至《消息报》① 的记者也跑来了，他和捷通社一名记者决心“撕下教权法西斯主义的假面具，揭露基民盟的这种竞选宣传伎俩。您知道，”这位在其他方面和蔼可亲的《消息报》记者一面递给笔者一杯啤酒，一面继续说，“在意大利，每当选举的时候，圣母像就会掉眼泪。近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道院的花园里冒出温泉，在埋葬修女们的地方长出了玫瑰花。人们企图欺骗我们，说这些修女在当年东普鲁士被占领时曾遭到强奸。总之，有人说此事同一件共产党人桃色事件有关系，共产党人对修女除强奸外还能干什么呢？”笔者比大多数在场的人更了解内情，五小时之前他还在可以望见罗马的地方吻过一张全然不像羊皮纸皮肤的脸颊，决定打退堂鼓，等着看报纸上的报道。在这儿继续调查真实情况是毫无希望的。难道人们使用歪曲的手法果真把莱尼搅和到这个故事里去

① 苏联政府的机关报。

了？难道肠卜僧转化成热了？他离开酒馆，正要关门时听到在场的一名女记者以讥讽的腔调唱起了这首歌："一朵玫瑰花破土而出……"

就在第二天，他在他已引用过的那家报纸的晨刊上发现了一篇"最后报道"："现已查明，被东方报纸一味讥讽为'格尔塞伦玫瑰温泉奇迹'的那宗怪事系由自然原因造成。这个地名含有日耳曼语'间歇热水喷泉'的意思(格尔塞伦可能曾一度称格席伦海姆①)，它说明格尔塞伦早在公元4世纪就有过温泉，因此8世纪这里曾一度建有一座小行宫，直至温泉重又枯竭为止。正如修道院院长萨平蒂娅在一次本报独家采访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修女们强调指出，她们从未想到什么奇迹，也未传播过这类消息。这个词可能是从前的一名女学生塞进报道中去的，此人对格尔塞伦这所历史悠久的女子中学只能说怀有矛盾的心理，后来她靠拢德共。如今业已由专家们证实，事实上是温泉突然喷出，真的使一些玫瑰开了花。萨平蒂娅修女以一位开明豁达的现代教团人士的冷静态度说，没有丝毫根据猜测是超自然的东西在作祟。"

笔者毫不踌躇地立即将玫瑰温泉奇迹及其背景讲给玛格雷特听(她喜气洋洋，什么都相信，并极力劝他不要怠慢克莱曼蒂娜)，甚至还受到了洛蒂的尖刻嘲讽，她自然把一切都说成是欺骗，并把他列入"修女亲吻者"这个令人难堪的范畴("这是本义，也有象征性"——洛蒂)，而对莱尼，他却犹豫不决，是否

① 格席伦海姆有"温泉之家"的意思。

要把格尔塞伦的怪事告诉她，或者至少暗示一下他在罗马的调查情况。B.H.T——笔者这样认为——也有权知道，无疑备受他尊敬的拉黑尔的骨灰在二十七年之后还被说成有极大的作用。尽管如今已有知名的地质学家在一家大肆利用玫瑰温泉事件作广告的石油公司几名探矿人员的支持下，在不可动摇的鉴定中证实这一事件“纯属自然现象”，但仍有一部分东欧报纸固执己见，认为“格尔塞伦对反动势力的竟选支持”“只是在社会主义力量孜孜不倦的压力下才垮台，如今又搬出完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伪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作掩护。这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科学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

也许笔者在这里失算了；他本该介入，本该在格尔塞伦翻墙而入，有可能得到秃顶B.H.T的支持，并动员莱尼去一趟，至少为她采摘几枝玫瑰花，在她家门口交给她；这有可能给她那幅大型油画《圣玛利亚别名拉黑尔左眼视网膜局部图》锦上添花，恰到好处。可是正巧现在事件纷至沓来，盘根错节，使笔者无暇顾及个人想去罗马的强烈念头。职责在召唤，它通过黑尔韦格·席尔滕施坦这个人发出召唤。他成立了一个“莱尼有难——援助莱尼委员会”，打算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援她，抵御霍伊泽一家日益加剧的压力，甚至可能考虑采取政治措施。

席尔滕施坦在电话中声音激动而又坚定，他那敏感嘶哑的嗓子过去说话时像胶合薄板那样轻轻振动，如今听上去铿锵有力多了。他要所有“关心这位令人惊异的人士”的人的地址，得到了这些地址，准备在当天晚上召开一次会议，因此笔者尚有足够时间，为了客观、公正、真实起见，为了尽量避免单纯

感情用事，也为了新闻报道的义务，如今终于闯进了对方的大本营。霍伊泽祖孙也想阐明他们对这一不幸事件的立场，大概也担心计划采取的某些行动，立即准备"搁下哪怕是非常紧迫的事务"。唯一的困难在于选择什么地点会见。可供选择的地点有：已描写过的那所兼具豪华旅馆和养老院特点的疗养院里老霍伊泽的套间；赛马赌券经营所老板维尔纳·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建筑指导经纪人"(按他自己的定义准确引用的头衔——笔者)库特·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①的会议室，这家公司"统一代表我们不同的利益和投资"(全都是根据库特·霍伊泽在电话中提供的信息引用的)。

笔者并非毫无私心地提议在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会议室会见，它在莱茵河畔一幢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楼上，知情者知道，但笔者还不知道，从那里可以观赏优美的景色，也可以鸟瞰城市风光。笔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驱车前往：真正富丽堂皇的东西总是使他这个小市民感到惶恐不安；由于他出身绝对是小资产阶级，在那里虽然感到舒适，但有陌生的感觉。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跨进了这幢高级公寓楼房的前厅，这里的楼顶房间式住宅很受欢迎。一名并没有穿制服，甚至没有穿号衣，但又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身穿制服和号衣印象的看门人，用一种未必是轻蔑而只是审视的目光打量他，显然让人感到：他的鞋袜经不起这审查。无声电梯：这倒见过。电梯内有一块黄铜牌，上面写着："楼层指南"，匆匆一看——由于电梯无声的速度快得惊人，不可能认真仔细地研究——表明在这幢房子里工作的几

① 公司的组织形式之一，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

乎全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建筑师、编辑部、时装经理处，有一块牌子由于特别宽而格外引人注目："埃尔温·克尔夫，创造性活动者联络处"。

这指的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联络？或者仅仅是不承担义务的社交性接触，甚或是改头换面的应召男士或应召女郎组织？还在思考这些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十三层，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一个使人有好感的人正在恭候，向他简单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库特·霍伊泽。"丝毫没有巴结讨好、纡尊降贵甚或鄙夷的神情，客气而又不过分，令人舒服，完全不排除热诚，毋宁说使人感到热诚。库特·霍伊泽把他领进了会议室。这间会议室使他触景生情，回想起两天前还和克莱曼蒂娜面对面坐着的那个房间：大理石、金属门窗、莫里斯式皮沙发——只是举目远眺，看到的并不是浅黄浅红色的罗马城，而仅仅是莱茵河及沿岸的几个地方，那儿正是这条依然浩浩荡荡的大河流入它最最肮脏的那一段的地方，顺流而下约七十或八十公里，就是德国这条污浊的河流或这条河流中的污浊排泄到无辜的荷兰城市阿纳姆和奈梅亨的地方。

这间除家具外显得格外舒适的房间呈扇形，室内只有几张桌子，还有几张莫里斯式皮沙发同罗马教团总部的沙发是近亲。笔者也许得承认，他的相思病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养料，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他被请到最好的位置就座：从窗口可以望见莱茵河和大约五座桥梁；在线条优美并与拱形窗相得益彰的桌子上，摆着各种酒、果汁、装在保温壶里的茶，还有雪茄和香烟，其数量和品种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完全不像暴发户那样庸俗。这里可以用一个合适的字眼：考究。老霍伊泽，还有他的孙子维尔纳，两人给笔者的印象比他记忆中的印

象要讨人喜欢得多；笔者赶紧按照自己的身份纠正先入之见，毫无成见地把自己首次见面的名声不好的库特·霍伊泽看作一个和蔼可亲、稳重谦虚的人，他的衣着按说颇为考究，但有点瘊塌，这与他那低沉的男中音嗓子倒相称。他极像他母亲洛蒂：从发型轮廓到圆眼睛。难道此人真是当年那个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出生、由于母亲的强烈愿望而未受洗的婴儿，就出生在如今睡着葡萄牙人一家五口的那间屋子里？他真的和看来要严厉得多、如今已三十五岁的维尔纳一起，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用新卷烟纸将佩尔策丢掉的烟蒂卷在一起，再当作正经八百的香烟卖给佩尔策，使他至今仍耿耿于怀吗？

有好长一阵子出现了尴尬场面，因为笔者显然被认为是谈判代表了，于是笔者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自己的来意。是为了了解情况，了解事实真相。不是为了——笔者在简短的说明中说——同情谁，倾向谁，进行讨价还价。他关心的仅仅是事实真相，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谈不上什么谈判代表：他——笔者——没有被授权干任何事情，也不谋求授权；那个“有争议的人”他至今还一次也没有见过面，他只是在街上看到过她两三次，还不曾和她说过一句话。他希望弄清她的身世，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但尽可能不是一鳞半爪，他——笔者——既没有受地上的也没有受天上的什么机构委托，他是相信存在主义的，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只是勉强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听着的霍伊泽祖孙三人此刻才在脸上露出一点感到兴趣的神色，因为他们显然在“存在主义”这个词中闻到了单纯讲究物质的味道，于是他就不得不对存在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说明。之后，库特·霍伊泽问他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断然否认；再问他是不是实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同样断然否认；他不知不觉

地发现自己受到老霍伊泽、库特和维尔纳的轮番盘问，他们问他是不是大学毕业生、天主教徒、新教徒、莱茵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赞成还是反对性浪潮、避孕药片、教皇、巴泽尔、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由于他——这真像是一种摸底式的轮盘赌，老是得把头转来转去，以便面对提问者——自始至终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从一扇迄今看不见的门里突然走出一个女秘书，终于给他倒了一杯茶，把奶酪点心推到他跟前，打开一盒香烟，一按电钮打开一堵原来天衣无缝、严严实实的墙壁，取出三个文件夹，放到库特·霍伊泽面前的桌子上，旁边再放上笔记本、白纸和一个烟斗，然后她——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子，使笔者想起某些电影中妓院接客的那一套常规——这个胸脯丰满适中的金发女子又钻到那扇门里去了。最后，还是老霍伊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用拐杖轻轻地敲了敲那包文件，把拐杖放在文件上，以便时不时敲一下，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这样一来，”他说，声音中显然带着伤感，“这样一来，七十五年来把我和格鲁伊滕家紧密连在一起的联系、关系和历史就结束了。正如您知道的，我十五岁就成为胡贝特·格鲁伊滕的教父——现在我和我的孙子跟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彻底决裂了。”

这里不得不破例压缩一下，因为老霍伊泽扯得太远了——从他六岁那年(1890年左右)在格鲁伊滕家的花园里摘苹果谈起，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强调自己的民主基本立场，叙述了莱尼的种种(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失误和蠢事，以及几乎所有已经介绍过的人物的生平——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使笔者听得相当疲劳，因为大多数内容他已知道，虽然说法不同。莱尼的母亲，莱尼的父亲，曾在周末同莱尼外出

的那位年轻建筑师，她的哥哥，她的表哥，死魂灵，等等，等等——而且笔者觉得，两个孙子也没有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还扯到“某些完全合法的交易”，倒不是赤膊上阵，而是以守为攻，近似那位大人物的风格；库特出生后得到的那块地皮——听到这儿，笔者就竖起耳朵——“是格鲁伊滕太太的祖父于1870年从一个移居国外的农民手里买下来的，每平方米十芬尼，这等于是免费奉送，他出四芬尼也能买下来，但他们家一向故作大方，而且他又是个疯子，还把价钱往上凑成整数，不是付五千马克，而是付两千塔勒①，这样他每平方米就付了十二芬尼。今天每平方米价值三百五十马克，这能怪我们吗？如果考虑到某些我认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趋势——甚至可以说五百，不包括房屋的价值，而房屋的价值您完全可以认为同地皮价值相等。老实说，即使您明天带一个买主来，出价五百万，我——我们也不会脱手，现在您过来看看窗外。”

这时他满不在乎地用他的拐杖作铁爪，钩住笔者（本来就一直在为他那松开的钮扣担心）那件没有扣紧的上衣，二话不说就把他拖到自己跟前，动作不可谓不粗鲁，而且——应当说句公平话——不能不引起他孙子的摇头。这就使笔者也不得不观看一下周围的房屋，那些高高低低耸立在这幢十三层楼房周围的九层、八层、七层的楼房。“您知道，”这一次声音轻得要命，“您知道这个区叫什么吗？”笔者摇摇头，他对地形变化并不都了如指掌。“这个区叫霍伊泽林根——它就建筑在那块被荒废了七十年之久的土地上，一直到人家仁慈地把它送给那边的那位年轻先生，”（拐杖向库特一指，语调现在含有讥嘲味道），

① 塔勒，18世纪通用的银币，一塔勒合三马克。

"作为出生的礼物，是我、我、我使它没有永远躺在他的摇篮里，遵照我们的祖先即已耳熟能详的那句格言：'让土地为你们服务'。"

讲到这里，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开始显得衰老了；虽然自己现在不加掩饰地咄咄逼人，却把笔者想要摆脱他那根拐杖的铁爪当作是进逼，尽管笔者已相当体贴入微，而且由于担心自己的钮扣表现了巨大的克制。老霍伊泽突然之间脸涨得通红，果真把那个钮扣拽了下来，把旧花呢上衣也撕下一大块，并且威胁地朝笔者头顶上挥舞拐杖。尽管笔者随时准备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人打①，但他认为此时理应正当自卫，急忙低头闪避，好不容易才体面地熬过了这一尴尬的场面。这当中，库特和维尔纳出来息事宁人，显然是有人按了一下看不见的电钮，召来了那位胸脯发育适中的金发接客机器，她以难以形容、难以模仿的冷淡方式向老头悄悄地讲了几句话，把他哄出了办公室。这件事使两个孙子异口同声地评论说："特鲁德，您真是我们最好的万金油姑娘。"老头走出大厅(笔者在这里不敢使用"房间"两字，怕引起别人控告侮辱罪)之前还回头嚷道："胡贝特，你的笑会叫你吃大亏的。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

维尔纳和库特·霍伊泽两位看来仅仅从保险角度关注此事。三人就损坏的上衣举行了尴尬的会谈。维尔纳想立即支付一大笔现金来赔偿上衣的念头，可以说被库特扼杀于萌芽状态；维尔纳已经采取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掏钱包的动作，之后却又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们要按新价赔偿，虽然我们没有义务这样做。"又说了些什么"痛苦赔偿

① 这个典故出自圣经故事。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

金”、“压惊钱”等等，并提到几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保单号码，最后召来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特鲁德。她请笔者给她一张名片，当她发现笔者没有名片时就流露出明显厌恶的神情，把他的地址记在她的速记本上，脸部表情就好像有人逼她收拾一堆臭得特别令人恶心的粪便似的。

这里，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想要求原价甚或加倍赔偿上衣，他只想要回自己的旧上衣，即使这话听起来好像差一点就要掉眼泪。他确实很喜欢这件衣服，坚持要求把它补好；当两位霍伊泽说，现在成衣业已经衰落，劝他放弃这个要求时，他提到有一位女织补工曾多次修补过他的上衣，手艺精湛。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人，虽然并没有人禁止或者想禁止他们讲话，他们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讲几句”，或者是“请允许我也说几句”——笔者就处于类似的情况。谈判到了这个阶段，他只能勉强保持客观；他克制自己，没有提这件上衣的年龄、他穿着它所作的多次旅行、放进它的口袋里并又取出的许许多多纸条、衬里内的零钱、面包屑、绒毛，还有，他是否真需要指出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克莱曼蒂娜的脸蛋还短暂地贴在它的右翻领上？难道他要使自己被人怀疑为故作多情，而实际上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被维吉尔①称为像“催人泪下的故事”②那样具体的西方人要求而已？

气氛早就不像先前那样融洽了，如果霍伊泽两兄弟作出一点表示，理解有人喜欢旧东西甚于新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并非一切都能从保险角度来考虑，气氛也许就会融洽一些。“假如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
② 原文为拉丁语。

说，”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有人撞坏了您的旧的大众牌汽车，愿意赔您一辆新的，虽然他只应按旧车价格赔偿，而您却不接受，那我只能说这不正常。”光是这种暗示，说笔者驾驶的是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就是一种侮辱，即使是无意的，也是在影射收入状况和口味，这种影射虽然不是在客观上但是在主观上却带有侮辱人的性质。如果他——笔者——感情用事，用刺耳的话说，谁希罕新的还是旧的大众牌汽车——他只要求修补好那件被一个老色鬼撕破的上衣，那么人家会很生气的。这样的谈话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怎么能向某人说明你十分喜爱一件旧上衣，舍不得把它——为了确定它的实际损坏程度，人家要求这样做——脱下来？因为真见鬼，生活中有时就有这样的事——你的衬衣上有一个洞，确切地说，在罗马的公共汽车上被一个男孩用钓鱼钩撕破了一道口子，还因为衬衣已不很干净，真该死，因为你为调查真实情况不停地走南闯北，不断地用铅笔和圆珠笔作笔记，晚上累得要死，连衬衣也不脱就倒在床上。难道修补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字眼吗？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大兴土木，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地区，当他们看到，显然有一些东西，甚至上衣，对物主来说，是不能用金钱来赔偿的时候，也许会感到一种几乎是形而上的神经过敏。这里面也许有一种甚至是可悲的挑衅——但是，凡是直到此刻差不多相信笔者严格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也一定会相信他那听起来不可信的话：在这场争论中，他确实是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彬彬有礼的，不过也是坚定不移的，而霍伊泽兄弟俩却变得不实事求是起来，他们的声调中带有怒气、激动和怨气，他们的——在这个尴尬场面快要结束时甚至连库特的——双手老是颤抖着伸向大约是他们放钱包的地方——好像能从那里掏

出上衣来似的。已有十二年历史的心爱的上衣，对于一个人来说，比自己的皮肤更宝贵、更不可替代，因为皮肤是可以移植的，一件上衣就不能了；人家喜爱这件上衣，并非感情用事，只是因为他归根结底是个西方人，受过“催人泪下的故事”熏陶的西方人。

被认为是挑衅的还有，笔者跪在地板上滑行，寻找那块同一粒钮扣一起被撕下来的布条，因为他去找那位女织补工时，还会用得着这块布片。他最后放弃了任何赔偿要求，提出自己花钱织补上衣，暗示他也许可以把这算作公务开支报销，因为他毕竟是因公来此的。这一番话也被认为是侮辱；钱根本不成问题，等等。哦，一连串的误解！人家只想要回自己的上衣，除了自己的上衣以外别无他求，难道就不可信吗？难道就非得立即被怀疑为拜物教、感情用事不可吗？难道就没有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来禁止把一件经过精工织补完全还可以穿而且会使穿它的人高兴的上衣干脆扔掉，仅仅因为你有一个厚厚的钱包和不想惹气受？

在这段大大地破坏了最初融洽气氛的令人不快的插曲之后，终于言归正传，转向那三个文件夹，它们显然是莱尼的全套档案。关于“莱尼姑姑的邋遢作风”，莱尼姑姑不切实际的行为，莱尼姑姑的错误教育方式，莱尼姑姑的社交圈子等等所谈的一切，在这里只能加以概括——“您可别以为我们一本正经、落后或不进步，问题并不在于情夫，甚至不在于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问题在于地皮的收入低于正常水平近百分之六十五；如果投资得当，光是卖地皮的收入每年就能生息四万到五万马克，或许还会更多，不过这里我们愿意公道地按

下限计算——那幢房子收入多少呢？扣除修理费、管理费和底层居住的那帮坏分子所造成的后果——莱尼姑姑就住在底层，把比较有钱的房客都吓跑了，因此压低了租金——那幢房子的收入有多少？不到十五马克，撑死才十三四马克。”维尔纳·霍伊泽这样说。

库特·霍伊泽接着说(经过压缩，有笔者的笔记为证)，我们并不反对外籍劳工，并不抱有种族偏见，只是一个人应当言行一致。如果莱尼姑姑愿意接受符合市场行情的租金，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商量将整幢房子向外籍劳工开放，按床出租，按房间出租，聘请莱尼姑姑当管理员，甚至可以向她提供免费住房，并且每月付给她一笔现金津贴；可是她——这确实是发疯，甚至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常识——她收的房租同她自己付的房租一样多；我们将每平方米租金保持在两点五马克，只是为了照顾她，而不是让别人从中渔利；比如，那家葡萄牙人住五十平方米，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外加公用浴室和厨房十三马克；三个土耳其人(“其中一个一直同她睡觉，因此其实只有两人住那间房。”)住三十五平方米，付房租八十七点五马克，赫尔岑夫妇也住五十平方米，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各加十三马克，“而在这方面她竟荒唐透顶，公用浴室和厨房都算自己双份，因为她给莱夫——他目前暂时住在不花钱的地方——留着那间房间”。更不像话的是，她把带家具的房子按空房收租；这可不像搞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试验那样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破坏市场；如果房租公道的话，这幢房子每个房间连同公用浴室和厨房足可以赚三百到四百马克，等等，等等。

库特·霍伊泽在谈到下面这一点时看来有点难于启齿，“但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我不得不谈”：在十张床铺中实际上只有

七张属于莱尼所有，一张还是爷爷的，另一张是属于大受委屈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第三张是他的父母老普法伊弗老两口的，“他们一想到这几张床上可能正在搞什么勾当就会毛骨悚然”。这就是说，莱尼不仅明目张胆地破坏经济规律和使用权，而且也破坏所有权，普法伊弗夫妇由于在此期间无法直接与莱尼交涉，就把他们的床铺所有权委托给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代管，因此需要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有依法托管的权益，这样一来，事情就多了一种尺度，即原则性的东西遭到了危险。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床铺虽然是战争期间“他待命入伍时”莱尼姑姑的母亲送给他的，但送了就是送了，根据法律精神，赠与就是产权的永远转让。而——笔者尽可以说出去——使人无法理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房客和三房客全都是垃圾工和清道夫。这里笔者提出异议，指出赫尔岑夫妇并不是垃圾工，赫尔岑先生是职位中间偏上的市府职员，赫尔岑太太从事的是值得尊敬的美容师职业，葡萄牙女人安娜—马丽亚·平托在一家大商店的自助餐厅柜台工作；他自己曾从她手里取过肉丸、干酪点心和咖啡并同她结帐，清清楚楚，毫无差错。库特·霍伊泽点点头，同意这一更正，但又说，在另一点上莱尼姑姑也没有从经济上考虑，她身体很好，还可以工作十七年左右，但她在她那胡涂儿子的愚蠢怂恿下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照管三个葡萄牙孩子，给他们唱歌，教他们德语，让他们一起画她那种“蹩脚货色”，常常叫他们——这有案可查——逃学，就像她从前也让她儿子那样干一样。要说过失，真是有一大“堆”，一个人违法乱纪，会被周围的人觉得可疑，事情就是这样；清除垃圾和扫大街被看成是最下贱的工作，因而损害了房子在社会上的吸引力，压低了租金，这也是事实。

这一切都是用平静的语气讲出来的，言之成理，明白易懂。上衣的烦恼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笔者的心头还有些愤愤不平，他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心爱的衣服，发现衬里破了一大块，此外还感到衬衣上那个被意大利男孩弄破的口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主人有好茶、干酪点心、香烟招待，拱形窗外的景色美不胜收，而且使人安心的是，维尔纳·霍伊泽不断用有节奏的点头证实他弟弟的话，相当准确地抑扬顿挫地突出每一个句号、逗号、连接号、分号——这样就产生一种幻觉加爵士音乐的效果，显得十分合拍。

这里得恭维一下维尔纳·霍伊泽的敏感，他一定已经感到，笔者怀着保守秘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机，很想提一提一个可说已到嘴边的话题：洛蒂·霍伊泽，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这两位显得自信的年轻先生的母亲啊。

还是他——维尔纳——毫不畏缩地谈起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可惜是全面的疏远”；他说，我们不应当自欺欺人，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事实，作一次哪怕痛苦的心理手术，因为他知道，笔者和他母亲有接触，甚至可能有好感，而他、他弟弟、他祖父同笔者之间的好感由于一件“虽令人遗憾但其实微不足道的事情”失去了“平衡”。他强调说，他完全不能理解，有人宁愿要一件显然“老掉了牙”的、三级服装厂生产的旧花呢上衣，而不要一件一家著名厂家生产的全新上衣，不过他受过要宽容的教育，也愿意对人宽容，只是按照莱茵地区的格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去做罢了；他不能理解有人显而易见地厌恶像大众牌那样备受欢迎、广为流行的小汽车，他自己就给妻子买了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二辆车，等到他现年十二岁的儿子六、七年后高中毕业、开始上大学或服兵役的时候，他

要再买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三辆车。好了，这些都是题外的话，现在谈他的母亲吧。她——这是她的主要错误——倒没有歪曲阵亡了的父亲的形象，但她庸俗地贬低了父亲阵亡的历史背景，把这一切说成是乱弹琴。“我们无疑是聪明伶俐的孩子，但也总有一天会问起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吧。”人们没有拒绝他们的这个要求，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善良敏感的人，虽然在某些方面，至少在事业上一事无成；母亲对父亲威廉的爱也从来不可能产生怀疑，但父亲的形象由于在任何历史场合都不断地说“乱弹琴”这句话而逐渐——尽管也许不是有计划地——受到了损害；更糟糕的是她有情夫。格鲁伊滕嘛，这还行，尽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给他们带来了嘲笑和烦恼，可后来她“甚至”同俄国人睡觉，有时还同“被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甩掉的美国佬”干；第三，她的反宗教和反教会情绪——他很清楚，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她来说，这两种情绪正好“极其不幸地合二为一”了；她硬要他们麻烦地走很远的路，去上一所非教会学校，在“格鲁伊滕爷爷”遇难后变得越来越乖戾忧愤，她所缺少的正是平衡力量；这一点，这种平衡力量——他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至今仍高度评价这一点——在莱尼姑姑身上找到了。莱尼姑姑总是和蔼可亲、慷慨大方，给他们唱歌讲故事，而且从来不损害她那去世的——是啊，也许可以说——丈夫的形象，尽管他是个红军士兵，这一形象从来没有被损害过，莱尼从来不肯把命运说成是乱弹琴或瞎胡闹什么的；有好几年，确实有好几年，她带领他们和莱夫傍晚坐在莱茵河畔，“她的双手被玫瑰花刺刺破得相当厉害”；莱夫是受过洗的，库特没有受过洗，他一直到七岁那一年，“感谢上帝”，多亏奥托爷爷把他们从“这种环境”中解救出来，

才由修女们给他施了洗礼。感谢上帝，因为莱尼姑姑对小孩来说十分了不起，对青年来说却有害无益；她唱歌太多，说话太少，虽然令人感到欣慰和具有令人欣慰作用的是，莱尼姑姑“从来不跟男人们眉来眼去，而我们的母亲却叫人捉摸不透，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就像在开妓院”。维尔纳·霍伊泽还夸奖了马尔娅·范·多尔恩，甚至说波加科夫的好话，“虽然他有时也唱得太多了”。嗯，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正道，走上了基督教的道路，受到要作贡献和承担责任的教育，上了大学，他学的是法律，库特学的是国民经济，“而爷爷所推行的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生财之道，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立即用于自己的企业”。

他只是附带经营赛马赌券经营所，这也许会给人一种不正经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他的爱好，他通过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来满足自己的赌瘾。不过，说到底，莱尼姑姑比他的母亲更危险，他说他母亲“仅仅是个失意的假社会主义者”，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相反，他觉得莱尼姑姑的的确确反动，她本能地、固执地、模糊不清但始终不渝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并非反对，因为反对要明确表态，而是干脆不干。这样做是不人道的，或者用德国人的说法是不近人情的。她起了毁灭和自我毁灭的作用，想必这是格鲁伊滕家的本性，她哥哥也是这样，她父亲就更厉害了。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他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胸怀宽广、思想开明，达到了他所受的教育给他指出的最大限度；他公开赞成避孕药片和性浪潮，但仍把自己看成基督教徒，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他是个“通风迷”，而这正是需要对莱尼姑姑干的事情，她必须通通风。不是他不近人情，而是她，因为健康的利润和财产追求乃是人之天性，这已

由神学加以证明，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越来越肯定这一点。最后，而这也是他最不能原谅她的，莱尼把一个人害苦了，这个人他不仅从前喜爱，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喜爱：他的教子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他是在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情况下被托付给我的，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使命，虽然我曾经一度以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一使命。不过，既然我当了他的教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身份，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宗教身份，它也是一种法律身份，我想要履行它。”他们兄弟俩“虽然为了一些在法律上成问题的愚蠢行为”控告了莱夫，将他判刑关进监狱，人们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仇恨，但其实这是爱护他，是为了使他头脑清醒，打掉他身上的“骄气、狂妄，而这毕竟可说是万恶之源”。他还清楚记得莱夫的父亲为人忠厚、感情细腻、温文尔雅，他确信，莱夫的父亲肯定也不会愿意让儿子几经周折，最后成为一个垃圾车司机。他并不想否认清运垃圾工作十分重要，具有一等社会功能，可莱夫——这是无可争辩的——“注定要干更高尚的事情”。（引号系笔者所加，从维尔纳·霍伊泽的话里听不大清楚，他是在引用或转引别人的话呢，还是仅仅用别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意思；这里是否该用引号，姑且存疑，不妨看作是建议。）

必须考虑到，从四点到七点，这时已快过去三小时了。发生了不少事情，谈了不少话。那位万金油姑娘后来没有再露面，保温壶中的茶变得太酽而涩口；在暖气毕竟过于热了一点的屋子里，干酪点心已失去新鲜，变得干巴巴了，虽然维尔纳·霍伊泽自称通风迷，却不准备给这间被五花八门的烟草（维尔纳·霍伊泽抽烟斗，库特·霍伊泽抽雪茄，笔者抽香烟）弄得乌烟瘴气的屋子输入新鲜空气；笔者试图打开拱形窗中间的那一扇窗

（铜窗框是分开的并有把手，表示可以开启），被库特·霍伊泽笑嘻嘻地带一点暴力地制止了，他提到那套复杂的空调装置，只有等调节整幢房屋室内气温的某一信号亮起时才能“自动单独通风”；由于此刻——库特·霍伊泽用和蔼的声调说——正是各家办事处和编辑部下班的紧张时刻，因此大约得再等一个半钟头，装在窗楣上的电眼亮起时才允许通风；空调设备已经超负荷，不能自动引进足够的新鲜空气。“这幢楼共有四十八——十二乘四——个单元，此刻全都在超负荷运转，口授信函，打重要电话，举行重要会谈。四十八个单元，每个单元按四间屋子，每间屋子平均有两个半人抽烟计算——按统计的平均数，其中有一个连续抽香烟的人、半个抽烟斗的人、大约四分之三个抽雪茄烟的人——此刻这幢楼里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人在抽烟——不过，我打断了我哥哥的话，我觉得我们该结束了，因为您的时间肯定也是有限的。”

是啊，现在维尔纳·霍伊泽又说（这里经过大量压缩），问题并不像只有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他决不是指笔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为了钱。他们愿向莱尼姑姑提供一套坐落在最佳地段的免费住宅，不收房租，他们表示愿意资助即将获释的莱夫上业余高中，然后送他上大学，但这一切都被拒绝了，因为人家在这个垃圾工圈子中感到舒畅，因为人家拒绝作出哪怕是最小的一点调整；任何安逸舒适的条件都不能使人家动心，人家迷恋自己的老式锅台、炉子和生活习惯——在这方面谁反动谁进步，就一清二楚了。这是——他是以按照基督教教义办事的基督教徒和熟谙法治国家原则的宽宏大量的国民经济学家兼法学家这双重身份说这话的——这是进步不进步的问题，“谁进步，谁就得把某些人甩在后面。这时就不能浪漫地讲什么‘我们并肩前

进’了，我们从前听母亲唱这种歌都听腻了。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甚至不能在我们自己的楼房里，想什么时候开窗就什么时候开窗”。当然不可能在霍伊泽家新盖的房子里向莱尼姑姑提供二百一十一平方米——那将意味着少收将近两千马克房租，也不可能允许使用炉子和“随时可打开的”窗子，对她的房客、三房客或情夫，当然也得作某些“微不足道的社交上的”限制。“可是他妈的，”讲到这里，维尔纳·霍伊泽首次变得咄咄逼人，虽然只有一转眼功夫，“我也巴不得像莱尼姑姑那样过得轻松愉快呢。”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尤其是为了更高的利益，现在必须开动看来好像无情的机器了。

这时笔者很想说一句质朴的和解的话，鉴于这些连自己房子里的窗子也不能打开的苦恼的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愿意承认上衣风波比较起来并不那么了不起；说到底，这件事并不像开始时他想的那样重要。是谁不让他说出这句质朴的、谈不上是和解——因为他和两位情况提供人之间并无争吵——但至少是充分谅解的话呢？是库特·霍伊泽。就在笔者拿着大衣和帽子，说了几句简短的告别话之后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库特·霍伊泽一面用一种并非威胁而是请求的姿态挡住通往门口的路，一面发表了一通类似结束语的讲话。

谈到此人，笔者必须纠正许多成见，因为他根据所有了解到的详细情况，曾在心里把他想象成鬣狗和狼的混合物，一个冷酷无情的大老板；但仔细近看，库特·霍伊泽却长着一双完全温柔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外形上但不是在神情上像他母亲；无疑，洛蒂的尖酸刻薄和近乎伤心落泪的悲愤在这双圆圆的温柔的褐色——不妨说——鹿眼里由于一些因素而被冲淡了，这

些因素只有可能来自他父亲威廉，反正只能来自父系，尽管不是来自威廉的父亲即库特的祖父。考虑到许多和莱尼直接有关的人的全部基因都来自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这个三角地带，就得对这片甜菜地赞扬几句，虽然这个地方也附带产生了普法伊弗一家人。毫无疑问：库特·霍伊泽是个敏感的人，尽管时间紧迫，仍应让他有机会表现这一点。他甚至不在乎把双手搭在笔者肩上，这一姿态既非巴结讨好，也非纡尊降贵，只是某种友爱表示，任何人都应受到这种对待。“您看，”他轻声说，“您不能带走这样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就莱尼姑姑而言，正在开始一个残忍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摧毁过时结构的无情过程，我们也得紧跟；当然，如果我们无意识地、不经思考地、完全肆无忌惮地强令她迁出，那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不是肆无忌惮的，至少不是没有扪心自问过。我不否认毗邻的地产主和不动产集团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我们完全顶得住，也就是能争取到放宽期限。我同样不想否认我们的祖父做事感情冲动，这我们也能再次顶住；我们可以继续自己掏腰包来贴补莱尼姑姑的房租帐，就像我们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得到和解。我们终究爱她，要感谢她的地方很多，觉得她的怪脾气可爱而不是可厌。我向您许诺并授权您转达这一许诺的内容：如果明天执行强令迁出，腾出房子，我们，库特①和我，将立即结清帐款，停止一切强制措施，在我们的一幢大楼里已给她准备好一套很漂亮的住宅，当然不是那种她可以容纳十个三房客的房子。不是的。不过面积够她儿子住，可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应为维尔纳。

能也够她情夫住，我们绝对无意将她和她情夫拆开。这是另一码事，我说这是一种教育措施并不觉得难为情，一种关怀备至的管教，可惜不得不采用相当粗暴的方法去执行。现在已没有什么私了的办法了。这就是说，一切将进行得飞快而毫无痛苦，到了中午就完事大吉，如果她不过于激动——遗憾的是她在这一点上令人担心——晚上她就会住在给她准备好的房子里了。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等到关键时刻再赎回或买回她那心爱的旧家具。采取这一行动，更主要是从教育、关怀备至的教育以及从原则上考虑的。也许您会低估像房地产主这样一个集团的社会学观点，不过我可以向您透露：人们早已认识到，正是这种宽敞的老式房子，租金比较便宜，具有某些舒适的设备，是产生那些向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宣战的细胞的地方。外籍劳工的高工资，只有在其中一部分通过房租回笼并且一如既往地以这种方式留在国内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来说才是合理的。那三个土耳其人共计挣两千多一点马克——真叫人难以忍受，他们只拿出大约一百马克付房租，包括公用厨房和浴室在内。这是百分之五，而普通职工都是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赫尔岑夫妇总收入将近两千三百马克，而房租支出约一百四十马克，包括家具在内。葡萄牙人的情况也相似。这就完全歪曲了竞争局面，如果让这种做法蔓延发展，就会像传染病一样破坏、腐蚀、瓦解我们这个追求效率的社会和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这里破坏了机会均等，您明白吗？与这种经济上的逆反过程同步而来的是道德上的逆反过程，而这是最要紧的。像莱尼姑姑家里的那种情况，正在助长群居的——且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幻想，不是作为幻想，而是作为田园诗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所助长的，唔，不一定是乱交——而是乱交主义，它肯

定会渐渐地摧毁羞耻之心和败坏风气，败坏个人主义的名声。我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也许五六个方面来说明。总之：这个措施不是针对莱尼姑姑个人的，不存在什么仇恨，不存在什么报复，相反，存在着同情，老实说，对这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我还有点恋恋不舍，是的，我承认，还有一点嫉妒——但最要紧的是，这种房子——这个认识基于我们联合会的准确分析——是一种——我们不感情用事地说——助长空想田园诗和天堂主义的公社主义温床。感谢您的耐心，如果您遇到什么住房困难解决不了，我们愿为您——并不附带任何条件，仅仅出于同情的宽容——我们愿为您效劳。”

第十章

席尔滕施坦家里的情况，犹如1917年10月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①的几间侧屋内可能发生过的情形。不同的委员会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赫特霍尼太太、洛蒂·霍伊泽和朔尔斯多夫博士三人组成所谓财务委员会，研究莱尼的财政困难程度、抵押字据、收回房子的诉讼等等。在赫尔岑夫妇、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和葡萄牙人平托的合作下，找到了许多信件等；十分恶劣的是，莱尼连封口也不拆就把它们塞到床头柜抽屉里，后来抽屉容纳不下时就塞到床头柜下面一层。佩尔策被指派到这个三人委员会担任类似总参谋长的角色。席尔滕施坦同汉斯·赫尔岑、格龙奇以及被洛蒂用出租汽车接来的波加科夫一起研究“社会行动”问题。马·范·多尔恩担任后勤，负责准备夹心面包、土豆色拉、鸡蛋和茶水。正如同许多对茶炊外行的人一样，她也以为茶是用茶炊煮的。波加科夫向她讲解茶炊的功能，这个大家伙，据席尔滕施坦介绍，是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寄来送给他的，附有一张条子，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感谢您数千次演奏《莉莉·玛莲》。知名不具。”马·范·多尔恩正如所有她这个年纪的家庭妇女一样，没有煮茶经验，几乎是在强制下才把

① 斯莫尔尼宫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革命指挥部所在地。

她所准备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三倍。再者，她表现出色，一俟后勤工作安排妥当，就把笔者的上衣拿去，找了好半天，后来在洛蒂的帮助下，才在席尔滕施坦的五斗柜里找到了针线，开始修补衣服上已知的令人痛心的伤口，里里外外，补得非常高明，而且不用戴眼镜，手法十分熟练，虽然她没有得过什么文凭，但实际上与内行的织补无异。

笔者走进席尔滕施坦的浴室，其面积之大、浴缸之大以及芳香化妆品之多，都使他心醉神迷。由于他没有来得及遮掩，被洛蒂发现了他的衬衣上的口子，他甚至还借了席尔滕施坦一件衬衣，尽管胸围和领口尺寸不太合适，但还是挺舒服的。

席尔滕施坦的住宅完全有资格称得上合乎理想：老式房屋，三间屋子朝院子，其中一间摆着一架大钢琴、他的藏书和一张书桌，第二间几乎可说大极了（面积为七乘六，不过是按脚步而不是用皮尺测定的），里面放着席尔滕施坦的床、衣橱、五斗柜，散乱地放着一本本文件夹，收集了他发表的评论；第三间是厨房，不太大，但也够用了。还有那间浴室，就其面积和设备而言，同任何新式房子的浴室相比都称得上华丽，如果不说是豪华的话。窗户开着，看得见院子里有树，至少有八十年树龄，围墙上长满长春藤，就在笔者延长洗澡时间的时候，隔壁房间里突然肃静下来，原来这是席尔滕施坦使劲地嘘了一声造成的。这时发生的事情暂时岔开了笔者对克莱曼蒂娜的思念，或者不如说大大地、堪称痛苦地加深了这种思念。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个女人在唱歌——这只能是莱尼。凡是对年轻美丽的莉洛费①一无所知的人，也许最好不要读下面这几句歌词；不过，凡是对美丽的莉洛费有一点想象力的人，我们都可以告

① 莉洛费，德国民间故事中的少女，被迫嫁给水怪为妻。

诉他们：只有她才能这样唱。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乐器的演奏。她对着静悄悄的院子，对着敞开的窗口唱什么呢？

我给歌做了一件外套
缀满了锦绣珠宝，
从古老神话中取来
从头到脚一整套；
傻瓜们抓住了它，
披上身在世间招摇，
仿佛是他们所织造。
歌，让他们拿去吧，
赤裸着身子走路
更有劲，更自豪。①

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把这些歌词送进院子的那个声音——也许四十多年前就对院子唱过，但人们没有听到或充耳不闻——竟使笔者好不容易才忍住T，然而由于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忍住，因此最后就让它不受阻拦地夺眶而出了。是啊，他忍不住W了，但感到G，由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文学方面的盘算，他突然对他所了解到的莱尼藏书情况产生了怀疑；人们是否认真仔细地寻找过呢？是否翻箱倒柜了呢？也许漏掉了莱尼母亲的几本藏书吧？也许少说了一个作者，因为担心说错他的名字而感到难为情吧？毫无疑问，在莱尼的藏书中还有珍宝尚待发掘，

① 这是叶芝的诗《一件外套》(1914)。此处借用袁可嘉的译文。

还有被埋没的宝藏，这些她母亲年轻时早在1914年、至迟在1916年就已经熟悉了。

财务委员会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而社会行动委员会却已弄明白，粗暴的措施定于明天早晨七点半左右开始执行，而有可能制止这一行动的部门那时才刚刚开门；要赶在当天夜里争取到停止执行是不可能的——席尔滕施坦为此事打电话找过好几个律师甚至检察官，均无结果。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把强制搬家的时间拖延到九点半钟左右？佩尔策抽空给社会行动委员会出主意，打通关系，打电话给他在“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认识的几个搬运商、执行员，由于他也是——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一个男子歌咏团的团员，“歌咏团里有许多法学家之类的人”，他至少已弄清楚，用合法手段制止这一行动几乎是办不到的。他又去打电话，向一个他称为约普的人提出让汽车抛锚的可能性，并表示他——佩尔策——愿意“破费一笔钱”，可是，那个显然是受托搬运商的约普看来不肯上钩，因此佩尔策痛心地说：“他不信任我，不相信我的动机纯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不过，由于提到了汽车抛锚这个关键字眼，波加科夫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近乎天才的主意。莱夫不是垃圾车司机么？土耳其人卡亚·顿奇和葡萄牙人平托不也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么？难道这些垃圾车司机就不能对他们被监禁的同事及其母亲表示声援什么的吗？怎么——像顿奇一样土里土气的平托（由于财务委员会和社会行动委员会都用不着他，正在厨房削土豆皮，顿奇则照管茶炊，负责供应茶水）说——怎么——现在两人

都说——才能使单纯的声援起作用呢？难道要他们——这时语气变得伤心和轻蔑了——用资产阶级的空话（他们的说法不同："言语，言语，光是中产者的言语"）表示声援，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十个人包括三个孩子被合法地强令迁出么？

这时，波加科夫摇了摇头，吃力而痛苦地摆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并说：当年他在明斯克上学时曾见过人们如何阻止反动派运走被捕的人。在运送前半小时，人们假报火警，当然要设法由可靠的同志驾驶消防车，然后让消防车在关人的学校前面相撞，甚至连人行道也堵塞，制造一起假撞车事故，这样就赢得了时间，把被捕的人——全都是被控开小差和武装哗变、有巨大生命危险的官兵——从后门救走了。由于平托和顿奇，还有席尔滕施坦和匆忙赶来的朔尔斯多夫始终还没听明白，波加科夫就挑明了说。"垃圾车，"他说，"都是相当笨重的家伙，对马路交通本来就不很受用。它们到处引起交通堵塞；如果现在有两辆或最好是三辆垃圾车在这儿的十字路口相撞，这一带市区至少有五小时无法通行，约普那家伙就无法将他的卡车开到离房子五百米的地方；由于他需要两次把车开进单行道才能驶到这栋房子前面，因此，根据我对德国人的了解，在他到达之前，我们早就向当局办好了缓期执行手续。但是，万一他真的买好了票，也就是说为执行一项紧急使命而获准使用单行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让两辆垃圾车在另一个街角上也相撞。"

席尔滕施坦请大家考虑，他们都是外籍司机，制造这种事件少不了要吃苦头，是否考虑最好让德国司机来干。为此给了萨拉查一笔车费，派他去办此事，而波加科夫使用朔尔斯多夫给他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地图，在赫尔岑的指点下

把所有单行道都画了进去。大家得出结论，有两辆垃圾车相撞就足以制造一场大混乱，使得约普的汽车停在离住宅约一公里的地方动弹不得。由于赫尔岑掌握一些交通统计材料，而且身为道路工程局职员也对垃圾车的体积和吨位了如指掌，因此他和波加科夫一起绘制那张战略草图，得出这一结论："只要一辆垃圾车撞在这根路灯柱或那棵树上，就差不多够了。"不过，最好是再有一辆垃圾车从后面撞上它。"这样一来，警察调查以及种种事项就需要四至五小时。"

接着，席尔滕施坦拥抱波加科夫，问是否能为他满足一个愿望。波加科夫答道，他最大的、几乎是最后的愿望——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是再听一次《莉莉·玛莲》。由于他以前不认识席尔滕施坦，因此这说不上是什么恶意，只不过是俄国人的某种天真而已。席尔滕施坦脸色变得苍白，但仍然显示了绅士风度，立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莉莉·玛莲》——很可能是大约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弹得一丝不苟。除了感动得潸然泪下的波加科夫以外，对这支曲子表示喜欢的还有土耳其人顿奇、佩尔策和格龙奇。洛蒂和赫特霍尼太太用手捂住耳朵，马·范·多尔恩龇牙笑着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顿奇又说正经的，表示愿意承担这次假事故，他已有八年安全行车的历史，市车队对他很满意，他可以出一次事故，不过他得改变或更换一条路线，这需要请示一下，虽说有困难，但并非办不到。

此刻财务委员会已理出了眉目。"不过，"赫特霍尼太太说，"实话实说吧，情况不妙。霍伊泽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搜罗去了，把对别人的债务也都买下了，包括煤气和自来水帐在内。总额达——不必惊慌——六千零七十八马克三十芬尼。"顺便说

一句，这笔亏空几乎和莱夫因被捕而少挣的工资完全相等，这证明莱尼完全能做到收支平衡；因此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笔借款，而不是有去无还的补助。她掏出自己的支票簿放在桌上，开了一张支票说："先开一千二百，再多我目前也拿不出来。我在意大利长梗玫瑰上栽了大跟头。佩尔策，你是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佩尔策在掏出支票簿之前忍不住作了一番说教。他说："她要是把房子卖给我，就不会有这些不愉快的事了，不过我出一千五，但愿，"——目光朝洛蒂一扫——"我不只是在别人需要钱的时候才不再成为贱民。"洛蒂没有理睬佩尔策的暗示，说自己已经破产。席尔滕施坦令人信服地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最多只能搞到一百马克；赫尔岑和朔尔斯多夫分别拿出三百和五百，赫尔岑还表示愿意提高房租，帮助还清余下的债务。这时朔尔斯多夫红着脸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其余部分，因为他对普法伊弗太太的经济困境虽说只是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起因完全在他身上。只不过他有一个恶习，一直使他手头不很宽裕：他专门收藏俄罗斯文学珍本，特别是手稿，不久前他刚购进几封他十分珍爱的托尔斯泰书简，不过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有关部门办理必要的手续，快马加鞭，依仗他的关系定能争取到宽限，特别是如果他凭他的薪水借到一笔钱——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去办理——带着全部现金到有关部门去的话。再说，先付一半肯定就够了，其余的他答应在中午以前付清。他毕竟是公务员，以一丝不苟著称，而且战后他在好几次谈话中表示愿向莱尼的父亲作出个人赔偿，但都遭到拒绝，现在他总算有机会弥补他的语言学罪孽了，当初他认识到这种罪孽的政治分量时已经太晚了。看朔尔斯多夫的那副样子，完全是个学者，酷似叔本华——他声音中的T是显而易见的。"可

是，女士们，先生们，我需要至少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不赞成垃圾车行动，我接受它作为最后的办法并将缄口不语，虽然这与我的公务员誓言相抵触。我向你们保证，我也有朋友，有办法，我参加工作将近三十年，这工作不符合我的爱好，但显然并不违背我的才能，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他们会加速下令停止执行。只是，你们得给我时间。”

这时波加科夫已同顿奇一起仔细研究了市区地图，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走弯路，制造一次假故障，必要时在一条清静的支路上堵塞交通。不管怎样，大家答应给朔尔斯多夫他所要求的时间。席尔滕施坦刚要开口讲话，就又使劲地“嘘，嘘”两声打断了自己的话——莱尼又唱起歌来。

像你的身体一样丰满
葡萄熟了金色满山冈
远处的池塘粼粼闪亮
田野上镰刀嚓嚓作响。

起初是一片近乎庄严肃穆的寂静，但是被洛蒂的吃吃冷笑声打破了。后来佩尔策评论道：“果然不错，她确实是同他怀的孕。”似乎想证明，即使是高尚的诗歌也具有大众化的通报价值。

离开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这一群人之前，笔者第一次改变自己的中立态度，向莱尼基金捐助了一小笔款子。

次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笔者就通过朔尔斯多夫获悉，争取推迟执行的行动成功了。再过一天，他在一家地方报纸上读到

了题为《一定是外国人吗？》的如下报道：

昨天早晨不到七点钟，由一葡萄牙人驾驶、当时本应在三公里以西布鲁克纳街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同由一土耳其人驾驶、本应在五公里以东克雷克曼街执行任务的另一辆垃圾车，在奥尔登堡街和比策拉特街交叉路口相撞。此系有意破坏、事出偶然、有争议的垃圾事件的重演还是其他什么？还有一辆由一德国人驾驶的垃圾车无视单行道路标，也驶入比策拉特街，撞在一根路灯柱上，这是怎么搞的？据本市享有盛名、曾为本市作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向本报编辑部提供的消息，此系有计划的行动。因为说来奇怪，那名土耳其司机和葡萄牙司机，都住在一栋经社会福利局和风纪警察部门同意昨日本应搬空的名声不佳的房屋里。传闻操神女生涯之某女士的“施主”以巨额“贷款”阻止搬迁。搬迁由于无法形容的交通混乱（见照片）而受到破坏。这两名外籍司机被本国大使馆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对他们也许应进行认真审查。近来不是经常听说外国人干拉皮条的营生吗？我们再次提出——犹如老生常谈——这个问题：一定老是外国人吗？这一显然骇人听闻的事件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中。据推测，一个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人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此人曾自称是“存在主义者”，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渗入上述经济界人士之中，人们深信不疑地向他提供了某些情况。物质损失初步估计约为六千马克。至于长达数小时的交通混乱可能造成的生产损失，则很难估计。

笔者乘飞机，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思念——不，不是前往罗马，而是飞往法兰克福，再乘火车去维尔茨堡。克莱曼蒂娜已被惩罚性地调到该处，因为人们也怀疑她在拉黑尔·金茨堡问题上向笔者泄密。她——克莱曼蒂娜——现在已不再左思右想，她已拿定主意摘下修女帽，充分显示她那紫铜色的头发。

这里也许还是应当说一句大实话：笔者虽然像某位大夫那样，努力“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在他那曲折的道路上行走，但他只是一个凡人，他从某些文学作品中诚然听到了“与艾菲在波罗的海海滨”①的叹息声，由于他没有一个艾菲跟他一起去波罗的海，便心安理得地干脆和克莱曼蒂娜一起去——且说是——法伊茨赫希海姆②，同她在那里论讨存在主义问题；他不肯把她称作“他的人”，因为她不肯成为“他的人”；她具有一种明显的戴帽变态心理③，因为她已经戴了将近十八年的帽子，不想再戴了；人们称为光明正大的求婚，她却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顺便提一下，她的睫毛比在罗马那一刹那显示的更长更软了；几十年来一向早起的她，现在充分享受睡懒觉的乐趣，在床上用早餐，散步，午睡，滔滔不绝地谈（也不妨称之为反思或独白）自己害怕同笔者一起越过美因河北上的原因。她不谈自己在法伊茨赫希海姆之前的生活。“假定我是个离了婚或死了男人的女人——我也不愿意向你谈我的婚

① 艾菲是作家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女主人公。艾菲经常与情人漫游于波罗的海海滨。

② 巴伐利亚小城镇，位于美因河畔。

③ “戴帽”在德语中还有结婚、出嫁的意思，因过去女子结婚后必须戴帽，不得露出头发。修女、护士等也都戴帽。此处一语双关。

姻情况。”她的实际年龄是四十一岁，真名叫卡罗拉，但她并不反对继续叫她克莱曼蒂娜。仔细观察，经过几次交谈后发现，她是个娇生惯养的人：不愁住，不愁穿，不愁无书看，不愁柴米油盐——因此，她有存在的恐惧，连下午喝一杯咖啡——可能也去施韦青根[①]或宁芬堡[②]喝——的花费也使她害怕，每次掏出钱包都使她心惊胆战。经常打电话同“北美因尼亚”[③]——她这么叫它——的必要联系使她神经紧张，因为她把她所听到的有关莱尼的一切都认为是虚构的。她从教团档案中了解的并不是莱尼本人；她虽然未能弄到和拜读那篇评论《O侯爵夫人……》的有名文章，但从普鲁登齐娅修女那里得到了有关它的形式和内容的书面证明。每次提到拉黑尔·金茨堡就使她神经紧张，笔者要求她和他一起去格尔塞伦采摘玫瑰花，她像猫儿似的左手往后一缩；她“不想知道什么奇迹”。也许这里可以点一下，她——不知不觉地——无视信仰和知识的区别；格尔塞伦肯定有希望成为一处温泉浴场，那里的水温为摄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很理想。此外，正如从电话中获悉的，朔尔斯多夫肯定非常忙碌(据席尔滕施坦所说)，已对上述那家报纸起诉，要求它收回“名声不佳的房屋”和“操神女生涯的女人”等字眼；唯一的困难是说服法院相信“操神女生涯”这个好听的字眼应被看作是侮辱；此外，洛蒂暂时住莱夫的房间，顿奇和基利奇这两个土耳其人大概会接过洛蒂的那套房间(倘若号称“欧亚混血儿的死对头”的房东同意的话)，因为莱尼和梅赫梅特已拿定主意组织家庭，这是暂时的说法，因为梅赫梅特已

① 巴登—符腾堡州小城市。
② 慕尼黑西部一市区。
③ 意为美因河以北的国土。

经结过婚，但他是穆斯林，根据本国而非侨居国的法律可以娶第二个妻子，如果莱尼改信伊斯兰教，这并非毫不可能，因为《古兰经》①也给圣母玛利亚留下了一个位置。

在此期间，采购问题也已获得解决，因为葡萄牙人的大孩子、八岁的曼努埃拉可以买小面包。赫尔岑受到他上司“短暂的温和的压力”（均按席尔滕施坦所说）。莱尼在此期间同“支援莱尼委员会”见了面，“又高兴又羞愧”地脸红起来（这大概是她一生中第四次——笔者），一位妇科医生确诊她已怀孕，现在她三天两头去就医，“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检查到了，因为她想给孩子“准备一个美好的家园”（根据席尔滕施坦引述莱尼的原话）。内科、牙科、矫形科、泌尿科的检查结果都毫无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一些保留，发现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原因完全不明，还有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但认为只要莱夫出狱，这些全都可以治好。到那时她应该——“这一点要当作像医生开的药一样”（席尔滕施坦引述精神病医生的话）——尽量常同梅赫梅特·沙欣和莱夫手挽手公开去散步。令精神病医生以及席尔滕施坦不解的是莱尼所做的噩梦，她在梦中显然梦见了一只耙、一块板、一个制图员和一个军官，尽管她是在梅赫梅特令人安心的怀抱里入睡的。这些——笔者可以证明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和完全不确切——被说成是“寡妇变态心理”，也——同样不确切——归咎于莱尼当年怀莱夫和生莱夫时的环境。正如克莱曼蒂娜也知道的，这种噩梦同墓穴、轰炸、轰炸时的拥抱毫无关系。

笔者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分阶段计划，先后在美因茨、科

① 伊斯兰教的经典。

布伦茨、安德纳赫三地稍作逗留，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终于把克莱曼蒂娜拐带到了“北美因尼亚”。游山玩水以及和人们会见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首先是拜会赫特霍尼太太，由于她的藏书、文明气氛和近似修女般的氛围，有教养的人也希望能够分享。会见是成功的，结束时赫特霍尼太太声音沙哑地悄悄说了一句“恭喜恭喜”（恭喜什么？——笔者）。下一个是B.H.T，他以其绝妙的葱头汤、出色的意大利色拉和烤肉而令人钦佩，迫不及待地听取有关拉黑尔·金茨堡、格尔塞伦等等的详细情况；由于他不爱看报，因此对此时肯定已平息的那件丑闻一无所知，临别时悄悄地说了一句“您真幸福”。对格龙奇、朔尔斯多夫和席尔滕施坦的访问也都很成功：格龙奇是因为他“举止自然”，或许还因为古老陵园富有魅力的凄凉从来不会不起作用；朔尔斯多夫是因为他如今已是个十足的翩翩君子：有谁能不为他倾倒呢？自从找到了为莱尼效劳的现实基础之后，他心情十分舒畅，此外他作为语言学家又是克莱曼蒂娜的同行，他们俩喝着茶，吃着蛋白杏仁小点心，很快就开始热烈地争论俄苏文化史上的一个时期，克称之为形式主义，朔尔斯多夫称之为结构主义。与此相比，席尔滕施坦有点逊色，他过多地抱怨某些冒牌青年作曲家的阴谋诡计和瓦格纳音乐崇拜，还痛苦地朝克看了一眼，更加痛苦地往院子里瞅了一眼，并且坦率地抱怨自己从来不曾迷上过一个女人，也没有一个女人迷上过自己；他诅咒钢琴和音乐，受虐狂突然发作，走到钢琴前，几乎像要自我毁灭地使劲弹奏了一曲《莉莉·玛莲》，然后表示歉意，无泪地抽噎着请求“让他带着他的痛苦一个人待着”。这种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在对佩尔策作少不了的拜访时弄清楚了。佩尔策在此期间——在法伊茨赫希海姆、施韦

青根或宁芬堡逗留的大约五天中——消瘦得很厉害；他太太夏娃也在场，她以懒洋洋但令人喜爱的忧郁神情端上咖啡和蛋糕，说了几句不外是听天由命之类的话，身上穿着她那件沾满油彩的绘画罩衫显得不太真实，进行着悲伤的谈话——谈诸如博伊斯、阿尔特曼[1]、“意味深长的无谓艺术”等话题，同时大量引用一家严肃日报上的话——然后又回到她的画架前去，“失陪了，请原谅”：佩尔策的模样令人担心。他盯着克莱曼蒂娜看，好像在考虑把她当做“手中的麻雀”[2]。当克莱曼蒂娜后来由于紧急和显而易见的原因（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朔尔斯多夫家喝了四杯茶，在席尔滕施坦家喝了三杯茶，在佩尔策家直到此刻已喝了两杯咖啡）出去一会儿的时候，佩尔策低声说：“他们起初以为是糖尿病，可我的血糖含量完全正常，其他方面也——没有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您可以笑我，我是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有一个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有烦恼；我第一次体会到，不是随便哪个女人，而是只有一个女人能治好我的病；我真想把那个土耳其人掐死——她究竟看上了这个乡下佬什么呢？一身膻气和大蒜气味，而且还比她小十岁；他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现在又给她搞了一个——我——帮帮我吧。”

笔者对佩尔策已产生相当大的好感，向他指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由第三者出面说合，根据经验是不会成功的，甚至会适得其反。这种事只能由失恋者单独去解决。“可是，”佩尔策说，“我每天都给圣母烧十二支蜡烛，我——在男人之间开诚布公地说——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寻求安慰，却没有找到这种安慰，我酗酒、赌钱——但我只能说：什么也不行了[3]。请

① 阿尔特曼（1924-－），奥地利作家、语言学家。
② 德国有一句谚语：手中的麻雀胜过屋顶上的鸽子。
③ “什么也不行了”的原文为法语。

便吧。”

如果这里说，佩尔策使人感动，那毫无讽刺的意思，何况他对自己的状况作了确切的说明：“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从来没有，我同卖淫的娘儿们胡搞过，是的，我经常逛窑子，至于我老婆，嗯，我过去很喜欢她，现在也喜欢她，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能叫她痛苦——但我并没有爱过她。至于莱尼，嗯，自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想得到她，可老是有外国人给我插一杠子，从前我并没有爱上她，自从一星期前又见到她，我才爱上她……她父亲的死根本不能赖我，我——我爱她——我还没有对一个女人说过这句话呢。”这时克莱曼蒂娜回来了，催着动身，虽不引人注目，但意思显而易见。她的评论不太客气，但至少是冷淡的和相当客观的：“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佩尔策病或席尔滕施坦病。”

到托尔策姆—吕塞米希去远足可以一举两得：一直标榜自己是铁了心的山里人和巴伐利亚人、只是勉强承认在美因河以北也有讨人喜欢的人的克莱曼蒂娜，得以领略平原地区的美和魅力，这也许使她感到有点过于热情奔放了。她承认还从未见过这样辽阔平坦的地方，这使她想起俄国，“如果我不知道这里方圆只有三四百公里，而俄国有数千公里的话，不过你不能不承认，它使人想起俄国”。她不同意“只有篱笆除外”的说法，也不同意对篱笆、树篱等界标的名称进行推敲，认为这太“书生气”；提到这些词的凯尔特族起源，她又认为“种族气味太浓”而加以拒绝，不过最后还是——尽管又是很勉强地——承认：“它有一种横向吸引力，而我们那里有一种竖向吸引力；在这儿，你总是有一种在水里游泳的感觉，在汽车上，可能在

火车上也是如此，你会担心永远游不到岸，或者这里究竟有没有岸？”指出肉眼能见的山麓小丘和艾费尔山余脉，仅仅博得她轻蔑的一笑。

相反，访问马尔娅·范·多尔恩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带奶油的李子蛋糕（评论：“你们这儿一有机会就吃掼奶油”），马·范·多“理所应当”地现焙现磨的咖啡，令人垂涎欲滴，“好极了，我还是第一次喝真正的咖啡，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咖啡”，等等，等等。还有：“你们也许是会享受的人。”告别时，马·范·多尔恩也有一句赠言：“晚了一点，但不算太晚，上帝赐福于您。”接着又悄悄地，“她会教您的。”（红着脸更正，同样悄悄地，）“我的意思是，生活有点规律什么的。”随后眼泪盈眶，“我已经是个老姑娘了，永远如此了。”

波加科夫在老人院里被说成“已迁走”，奇怪的是“新址不明”。他只留下一张条子：“不要派人找我，暂时谢绝，我会打招呼的。”可是四天过去了，也不见他打招呼。贝伦科认为波加科夫又去“嫖女人”了，而基特金认为他可能是干“赤色间谍”活动去了；和蔼可亲的护士坦率地承认惦念波加科夫，并且坦然自若地声称，这种情况几乎每年春天都要发生。“一到这时他就要离开，只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他需要打针。但愿他得到温暖。”

克莱曼蒂娜虽然从形形色色的反映——有的激烈，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例如B.H.T不过他至少可以证实确有莱尼其人）——知道了莱尼的情况和对她的看法，但仍然一定要“见见本人，要摸得着、闻得到、看得见”。笔者并非毫

无战战兢兢的心情，决定通过汉斯·赫尔岑安排时机早已成熟的同莱尼的直接会晤。这次会晤讲好只让洛蒂、梅赫梅特和“一个会使您吃惊的人”参加，因为莱尼十分“紧张”。

“自从同梅赫梅特作了最初几次散步以后，”汉斯·赫尔岑说，“她就十分激动，在场的人超过五个就受不了。因此，我和我妻子也都不参加。使她特别烦躁的是有人堕入情网，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爱期望或焦急心情，正如佩尔策和席尔滕施坦两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就连朔尔斯多夫也有所表现。”

由于克莱曼蒂娜酸溜溜地解释笔者的焦急不安心情，笔者就向她说明，他对莱尼的情况全都了解，对她——克——则几乎一无所知，根据长期深入的调查甚至掌握了莱尼最秘密的私生活，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叛徒或知情人，而她——克——对他来说很亲近，莱尼虽说讨人喜欢，对他却很陌生。

老实说，笔者庆幸有克莱曼蒂娜陪同，庆幸她有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好奇心，因为如果没有她——他有了她，说到底得归功于莱尼和肠卜僧——他也一定会患上无法医治的席尔滕施坦病或佩尔策病。

幸而他的兴奋和期待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分散了：是谁坐在长沙发上，靠在脸上泛起迷人红晕的洛蒂·霍尔泽身旁，公然抓着她的小手，尴尬得不是微笑而是龇牙咧嘴呢？原来是波加科夫！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逃出来的那座老人院里的那位和蔼可亲的女护士用不着担心，他得到了温暖！如果有人怀疑过洛蒂能给人温暖的话，那么在这里就不能不改变看法了。

在座的还有那个土耳其人，出人意料、几乎使人失望的是，他的样子不像东方人：土里土气，呆板，不感到拘束，穿一套蓝色西服，上过浆的衬衫，（枣红色）领带并不扎眼。他坐在那

里，抓住莱尼的小手，姿态活像是1889年前后坐在人像摄影师刚装上底片的大照相机前，被提醒不要动，等待摄影师捏一下橡皮球曝光似的。莱尼呢，嗯，笔者把目光转向她，在牢牢盯住她之前心里仍七上八下：要知道，笔者在孜孜不倦的调查过程中，只在街上匆匆见过她两次，从侧面欣赏过她那骄傲的步法，从来不曾面对面，可是现在已无法回避了，必须正视现实。这里可以毫不夸大地简而言之：的确名不虚传！亏得有克在场，否则真有可能对梅赫梅特吃起醋来；不管怎样，总还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对她躺在他的怀里而不是笔者的怀里梦见耙、制图员和军官，感到遗憾的轻微痛苦。她剪了头发，染成银灰色，完全可以冒充是三十八岁；一对又亮又黑的眼珠，带着忧伤的神情，虽然她的身高据证实是一米七一，看上去却像有一米八五，尽管她那长腿同时证明，她坐着的时候并不美。她妩媚动人地给大家斟咖啡，洛蒂把蛋糕放到一个个碟子里，梅赫梅特则根据要求"一勺？两勺？三勺？"分必不可少的掼奶油。莱尼——这一点变很更清楚——不仅少言寡语、不爱说话，她简直是守口如瓶，而且脸上总是羞答答地带着"苦笑"。她满心喜欢、亲切友好地注视着克，这使笔者感到骄傲和高兴；当克询问肠卜僧的情况时，她指了指挂在沙发上边墙上的画，这幅画确实很吸引人，不是彩色图，而是着了色的，一米五见方，而且——虽然没有完成——显得气度不凡，温情脉脉，难以形容；她这幅未完成的毕生之作不是几层，而是数得清的八层——六百万锥体细胞大概已画了三万，一亿杆细胞大概已画了八万左右——她没有取横截面，而是取水平位置，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人们越过它向一个尚待形成的地平线前进。莱尼："这就是她，也许是她的视网膜的千分之一，如果完成

的话。”她变得几乎健谈了，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恩师，我的挚友。”在这次历时约五十三分钟的访问中，她没有再说别的话。比较起来，梅赫梅特显得无幽默感，即使在分奶油时，他也用空着的一只手抓住莱尼的手不放；莱尼斟咖啡时，他就紧紧抓住她一只手，叫她用另一只手斟。这种手拉手具有传染性，最后使得克也抓住笔者的手，好像是在给他号脉。显而易见：克深受感动。她那学究式的清高已经荡然无存，显然她听说过莱尼，但不相信确有其人；莱尼曾出现在教团档案中，可是真有这个人而且确实存在，这使她很受感动。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把她加速的脉搏也传染到笔者身上。

不耐烦的读者是否已觉察到，这里出现了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手拉着手，成双成对，旧情——如洛蒂和波加科夫这一对——重叙，而其他人——如佩尔策、席尔滕施坦和朔尔斯多夫——则又饥又渴，毫无进展。一个外表像勒恩山或中艾费尔山农民的土耳其人赢得了这位新娘。此人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根据一夫多妻制的权利——他知道这种权利，但从前一直未能行使——他毫不感到内疚，甚至有可能把事情如实地公开告知某个名叫苏莱卡的女人。同波加科夫和笔者相比，此人简直干净得令人生气，简直是一尘不染：裤子烫得笔挺，系领带；此人是否极其喜欢上浆的衬衫，也许他认为在大喜的日子里理当如此穿着打扮？他一直还坐在那里，就好像那位戴着艺术家帽子和系着艺术家领带的假想摄影师——1889年前后生活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某地的一名失意落魄的画家——手指一直还放在橡皮球上。一个推滚、抬高、倾倒垃圾桶的垃圾工，要同一个死过三个男人，读过卡夫卡的作品，能背

诵荷尔德林的作品，是歌唱家、钢琴家、画家、情人，生过孩子并且又要生孩子，使一个毕生煞费苦心地钻研文学作品中的现实问题的前修女的脉搏越跳越快的女人结成恩爱夫妻！

即使是伶牙俐齿的洛蒂也一声不吭，似乎她也感动、激动、震动了；她断断续续地谈到莱夫即将出狱和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因为她的房东拒绝接受“土耳其垃圾车司机”，赫尔岑夫妇则由于格蕾特·赫尔岑晚上在一间屋子里搞美容挣点“外快”，腾不出一个房间，而且也不能让“五个葡萄牙朋友挤在一间屋子里”，不过她想，她不能不同波加科夫——她毫不扭捏地称他为“我的普约特”——留在莱尼身边，以便同她的儿子和公公“针锋相对”。“这只是延期，不是结束。”她愿同波加科夫去登记结婚，他也愿意同她登记结婚，但他无法证明自己是鳏夫或确已离婚。

莱尼最后还是开了腔，喃喃地说“玛格蕾特，玛格蕾特，可怜的玛格蕾特”，先是眼睛湿润，继而眼泪汪汪，直到最后，梅赫梅特含含糊糊地移动了一下身子，坐得比原来更直了，毫不含混地暗示他认为会见结束了。

告别——“但愿不是永别，”克对莱尼说，后者听了亲切地莞尔一笑——也进行过了，并且像通常一样又拖延了一会儿，对照片、钢琴、房间的整个陈设客气地评论几句，对墙上的那幅画热情地夸奖几句，还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这时莱尼喃喃地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乘世间的车、非世间的马前进。”这究竟是什么典故，就连克也不知道，看来她的学识显然还有缺陷。

最后，在外面十分平凡的比策拉特街上，克又摆出她那少不了的、无可救药的文人姿态，说：“对，说有她，又没有她；

说没有她，又有她。”笔者觉得这种怀疑姿态远远低于克的水平。

不过她又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使所有这些由于她而受苦的男人得到安慰，她会治好他们所有人的病。”

片刻之后她又说：“我不知道，梅赫梅特对西方交际舞是否像莱尼那样喜欢。”

第十一章

笔者如释重负地发现，本报道的其余部分几乎只要再引用几份文件就可以了：一份心理鉴定，一名老护理人员的信，一名警官的记录。至于他是如何搞到这些文件的，他不得不当作职业秘密来加以保守。他承认，他的做法并不都是合法的，也不都是完全合乎保密规定的，但轻微的违法泄密行为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弄清事实。如果说——就那份心理鉴定(顺便提一下，它并不包含任何歧视内容)而言——霍伊泽的一名女职员(不是那位万金油女士！)用复印机把几页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很快地复制出来，那又算得了什么？这使霍伊泽祖孙(请想一想笔者为一颗钮扣所花费的五百万)损失了大约二点五马克，不过有关的管理费用并未计算在内。用一盒价值四点五马克的夹心巧克力不就报答了吗？护士的信是孜孜不倦的马·范·多搞来的，是原件，但很长，笔者在一家大商场自己动手复印，每页付费半马克，共花了约八马克，包括请马·范·多抽的香烟在内。警官的记录是笔者免费得到的。由于这份文件既不含有警方机密，更不含有国家安全机密，仅仅是一种虽然并非自愿但却很成功的社会调查，虽然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产生过一些顾虑，但只用几杯啤酒就把这些顾虑冲洗掉了，

况且连这几杯啤酒，那位年轻警官也都不让别人请客。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受到笔者的尊重，他甚至不想用送这位警官的太太一束鲜花，或者送他那一岁半的儿子(“逗人喜欢，”他看了一眼照片，并不虚伪地说)一件漂亮的玩具来损害这种愿望。(太太的照片没有给他看！不然，他倒是难以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说人家的太太“逗人喜欢”呢。)

那就先说那份企业心理鉴定吧。鉴定人的学历、背景、年龄等都没有透露，仅仅听到那位年轻女士说，鉴定人受到德国工会联合会干部和劳工法庭法官的一致器重。

鉴定人(以下简称G)是在一次建立联系的谈话中认识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以下简称L.B.G)的，那次谈话是在L.B.G被捕前四个月在市环卫局人事处长倡议下举行的。第一次谈话讨论了L.B.G可能被提升到局内管理部门，每天各用半天时间担任为数众多的外籍工人代表和计时员的问题。当时G推荐L.B.G担任这两个职务，但遭到L.B G拒绝。L.B.G的心理发展过程，当时只能根据某些资料作初步了解，后来承蒙监狱当局惠允又进行了四次谈话，每次为一小时，因此了解就深入得多了，尽管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结构的人作出科学的评价仍然不够详尽。无疑，L.B.G值得成为一篇详尽深入的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目前在某高等专科学校任心理学讲师的G，也正在考虑把L.B.G推荐给他的一名学生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因此，这里给L.B.G作一次心理图案试验，尽管能提供基本正确的情况，但就其科学实用性而言，毕竟还是有限的。它只能是对L.B.G的“犯罪”行为动机进行解释的一种试

验，具有上述限制，可能有助于内部掌握情况，以便于进一步和L·B·G打交道。

L·B·G是在极其不利的家庭外环境和极其有利的家庭内环境下长大的。尽管后一种情况使用的“有利”一词需要加以限制，可以适当地称之为“溺爱”，但是——看一看这个今年二十五岁的人，这种“溺爱”正是L·B·G应被视为我们这个社会完全有用的、甚至受人喜爱的成员的一个原因，虽然在他身上还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碍。

对L·B·G极其不利的是这一事实：由于他是私生子，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不具备对于心理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孤儿甚或战争孤儿的基础。对于私生子来说，已故的父亲并不能证明其孤儿身份。此外，由于他在街上和学校里被人叫做“俄国崽子”，他母亲有时被骂为“俄国人的姘头”，因此，他并非由于强奸而是自愿献身所生这一事实被认为特别下流丢脸，就经常——即使不十分明显，却是不自觉地——使他感受到。他是在有可能使他的父亲和母亲受到严惩——如果不是死刑的话——的情况下出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囚犯的孩子”。所有其他的孩子，甚至私生子，都可以作为“阵亡将士子女”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高L·B·G一等。对于他，用通俗的话来说，更糟糕的是：他越来越成为那个叫做教会学校的成问题的机构（G在许多出版物上也公开这样说）的受害者。尽管他受过洗礼，甚至是按天主教徒那样做的，这次洗礼也为一个后来当过他师傅的名叫佩尔策的人以及其他人所证实，教会当局仍然坚持要求再重新举行这一“紧急洗礼”，作为正式洗礼。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深入细致、过分认真的调查，给L·B·G增添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别名。此外，他还

是一个“坟场孩子”，一个“墓穴孩子”，他是在“死人堆里投生出世”的。总之，他母亲拒绝让他再受洗一次，因为她珍惜对那次洗礼的回忆，L.B.G的父亲参加了那次洗礼；她不愿让自己对那次洗礼的回忆被“随便什么东西”所抹杀，另一方面又不想把儿子送到当时约有十五公里远的“自由学校”①去上学，更不愿意送他到“新教徒”那里去念书(不清楚他们是否也会坚持要求重新受洗)，这样一来，L.B.G又蒙受了最后最后的一个污点：他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是不是“天主教徒”？

鉴于这一背景，“溺爱”一词具有相对性，几乎可以自相抵消。这样，L.B.G也就有很多“阿姨”：玛格蕾特阿姨、洛蒂阿姨、莉安妮阿姨、马尔娅阿姨，首先有自己的母亲，“溺爱”他的全是女人；此外，他还有“大爷大伯”和“表兄弟”，有代替父兄之人，有奥托爷爷和普约特大伯，有表兄维尔纳和库特，他还记得“曾有好几年之久同他一起坐在莱茵河畔”的外公。他母亲尽量不让他去上学，虽然有时用的借口站不住脚，这在事后看来可以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本能反应。尽管L.B.G表明他具有惊人的精神力量，自愿离开“溺爱的领域”，跑到街上去玩，不怕挨打，也不怕打人，但他是否能忍受学校的日常压力，还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一点作为假设——L.B.G有一点畸形或病态，他就不可能经受得住周围环境这种巨大的多方面的压力，活过十四岁：结果是自杀、不可医治的抑郁症或挑衅性刑事犯罪活动。L.B.G确实忍受了许多事情，对许多事情也想得开，但使他忍受不了和想不开的是这一事

① 即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学校。

实：一向很和气的奥托“爷爷”最后竟剥夺了他跟两位“表兄”维尔纳和库特的交往，他们分别比他大五岁和十岁，是他用不着凭空想象的、实实在在可以信赖的庇护人。从此产生了他和两位表兄之间的社会鸿沟、报复和对抗心理，显然这也是他不高明地伪造两张汇票的“犯罪行为”的起因。G经过总共五次访谈始终也没有弄清楚，采取不高明手法伪造汇票是否应当理解为对奥托爷爷和表兄的有意或无意挑衅。由于这种伪造行为一再重复（总共四次），前三次被蒙混过关，第四次才被告发，而四次伪造都有同样的错误（大写栏填错），使人推测这是有意挑衅，必须与这时他已知晓的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家经济状况在战时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看。

那么，L·B·G在青少年时代又是怎样平衡他那受伤害的心理的呢？这里，以“宠爱”二字统称的家庭内平衡是不够的，L·B·G还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尤其是在两位“表兄”搬走以后，他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母亲和为数众多的阿姨了，这些他凭直觉一定是明白的；可是，到头来他非成为“一家之主”不可，鉴于他母亲无依无靠和所受的伤害，想必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这里有必要引进“抗拒发挥效率”（以下简称“抗效”）这个概念，起初在学校里抗效，有一段时间他面临被降到辅助学校或特种学校①去的可能。与他无可怀疑的才能和智力相反，他的表现就像是社会在自动期待一个充满反社会特征的男孩那样。他的学习成绩比他应做到的差很多，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假装低能儿。只是当重读有进辅助学校的危险时，他才不让自

① 为残疾儿童开设的专门学校。

己留级，而他之所以不让自己降到辅助学校去，也只是因为他母亲嫌上学路途太远。他向G承认，他“乐意上辅助学校”，但在那个时候辅助学校在远郊区，由于他母亲有工作，L.B.G很早就承担家务，光是这遥远的往返路程就会大大妨碍“家里的事情”。

与在学校里抗效同时出现的是出于逆反心理的“提高效率”（以下简称“提效”），这对他的学业毫无“裨益”。由于他母亲和外祖父的一位熟人十分友好的帮助，每周给他上课三次，他十三岁时就能流利地读写俄文。请注意：这是他父亲的语言！他能引用从普希金到勃洛克①的俄国诗歌，而与此同时他的德语语法始终停留在被降到辅助学校去的水平，这——这里不妨说——使他的老师们感到意外，但鉴于当时初级学校一般教师的基本心理状况，却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使他的老师们恼火。而且不仅仅使人恼火，肯定会使人感到简直是一种挑衅的是，他——十三岁上五年级！——还跟老师大谈特谈——并没有人问他！——卡夫卡、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布莱希特，还有一个至今不知是何人、用英语写作、可能祖籍是爱尔兰的诗人的诗。

例子已经足够了。G得出结论：与社会极端对立，在效率有可能“带来”好处的地方即学校里搞抗效，同时在效率不能“带来”好处的地方即校外却搞提效。

这种极端的对立，对于L.B.G的生活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他年龄越来越大，出于正常的反应正在摆脱种种“宠爱”，这种对立就成为他从中得到抗力和生存力量的张力。这

---

① 勃洛克（1880～1921），苏联俄罗斯诗人。

种生活经历的模式一直到十四岁无显著变化。十四岁那一年，在小学毕业前不久，L.B.G首次“犯罪”，可惜G只能介绍情况，无法进行精确分析，因为他没有从内部和外部接触过所引用的履历材料，而精确的分析是以大量宗教心理学和历史研究为前提的。因此这里只摘录其履历资料：

L.B.G只是偶尔去上宗教课，而且经常是在对他和教士都不愉快的情况下，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被拒绝参加忏悔和圣餐等圣礼，当时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所受的洗礼不完备，而是因为人家觉得我固执、骄傲、狂妄，反正是不够驯服，而且我又对宗教文学作过一些研究，当然很外行，但刻苦，而且确实求知心切。这一点触犯了老师，我指的是教宗教课的教士，因为‘分食圣饼’取决于你是否对他‘驯服’。”可是L.B.G——据他自己承认——此时出于原则性和神秘的考虑，坚持要求分食圣饼，最后通过“一次渎圣行为，通过盗窃，确切地说是亵渎圣坛”，弄到圣饼吃了。这事引起了轰动。要不是有一位思想开通、熟悉心理学的教士为他讲情，L.B.G当时就会被关进青少年管教所。“从那时起，”L.B.G是这样对G说的，“我只同母亲一起在吃早饭时领圣餐。”

另一种提效到十四岁时变得明显了：一种已近似于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怪症，酷爱整洁，迫切要求搞扫除，这无疑同正在萌发的青春期有关。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口的街道、前院、住宅，甚至在散步时也做清理工作，捡树叶；从八岁到十三岁，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各种各样的扫帚，尽管在主要是女人的环境中，人们把这说成是“女人气”或“女孩子气”。对于这种现象，还可以从心理学上补充说明：面对一个一直唾骂玷污他的周围世界，他在有意显示和实行——又是作为对立手段——纯洁。

L·*B*·*G*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带着他那张评语不太友好的成绩单，没有机会找到正常的学徒位置。他在一个名叫佩尔策的人的花圃里当小工——又主要是跟扫帚打交道！后来在一个名叫格龙奇的人手下干同样的活，之后被陵园管理处录用，后来又从那儿调到市环卫局当垃圾工。市环卫局出钱让他学会开车，弄到了驾驶执照，他在那里工作至今已有六年，撇开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延长周末和休假不谈，撇开由于明目张胆的抗效所引起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恼怒不谈，他现在的雇主对他还是十分满意的。*L*·*B*·*G*的提效六年来完全是为了母亲，他劝她辞掉工作，尽管她年纪还不太大，还有工作能力。他给她招来外籍工人及其家小做房客。其中一名工人最后成了她的情夫，这并未引起被公认为极其恋母的*L*·*B*·*G*多大内心冲突，此事令人怀疑。甚至当他听说母亲从这个东方籍外国人那里受孕已被确诊的时候，他仍坦然地——*G*想说坦然得令人怀疑——说："感谢上帝，我还能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喽！"不过在这句话中还是能清楚地听出某种别扭的话音，尽管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听得出来。

如果把这种别扭情绪的根源说成是恋母之情，那就错了。某种可以理解的担心——*L*·*B*·*G*肯定担心将要出世的孩子会重又面临周围人们的刁难，他对此有切身体会——不用说也是其原因之一。

这里虽然不能排除怀疑他怀有嫉妒，这种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向*L*·*B*·*G*的同龄人和同事们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不仅受到女人和姑娘们的喜爱，而且也不回避这种喜爱的后果。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垃圾搬运工人有时也满足为生活垃圾

所苦的居民的特殊要求，因而会产生一些事先未曾安排的接触。鉴于待运垃圾的紧张状况，当局容忍这种“违法行为”——满足居民搬运额外垃圾的特殊要求，一般都是收小费的。

尽管上面介绍的L.B.G.的形象看来比较和谐，但还是一清二楚地存在着社会障碍，这些障碍固然可以用出于正当自卫的极化强制来解释，但它们终究是社会障碍。

即使不懂心理学的人也能在L.B.G身上明显地看到：

一，休戚相关情结，它可以从不断被迫与自己父母认同中得到解释，成年后却固定在外国人身上，现在坐牢三个月后对囚友也表现出来了。假定囚犯属于“社会异己分子”，那么从休戚相关情结中就会产生出与此近似的二，亲外性，它也表现为三，亲外国语言，想学外国人的语言。（L.B.G参加土耳其语学习班已有数月。）像L.B.G这样的人（G在这里与其说不愿意，倒不如说是倾向说“人物”，尽管存在着某些顾虑），他的高度发展的敏感性和智力使他别无其他选择，要么适应环境，从而“背叛”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要么永远不适应环境，认可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因此永远处于社会上可达到的成就和才能的矛盾之中。于是这个人（人物？）总是需要新的抗力，后来则是人为的抗力，以便向自己和周围的人表明认可。如果抽掉这个词通常理应具备的前提，即他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如延长住院时间、捞取补助金或不拿工资的休假等）——那么，L.B.G就是四，弄虚作假者，他之所以——说得夸张一些——弄虚作假，不是为了捞到好处，而是为了吃亏，为了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伪造汇票也可以理解为“弄虚作假”，而不是“真正的犯罪”。可是，某些弄虚作假行为终究会给他带来好处（如外籍工人对他表示

的信任近乎崇敬)，这属于这样一种生存试验的辩证法，这种试验“宣告”一种社会模式——或者按马克思主义同事们的说法，一条社会原则——的诞生。

还要说明一下*L*.*B*.*G*为什么会表现出抗效。那时他已升任车队队长(“我不想再高升了!”)，表现了惊人的组织才能。一旦熟悉他所负责的路段的垃圾清运和道路交通情况，他就能这样安排垃圾装运，使他的车队不慌不忙地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有时提前三个小时完成定额。后来人们发现他和他的车队休息时间长得惊人，但丝毫没有影响出活。要求他把他的组织经验提供给规划处，他不干，于是又按规定和经验出勤，因为居民们对他们休息时间太长——何况又是外籍工人——意见很大，甚至还反映到报纸上。这种表现导致*G*和*L*.*B*.*G*两人的第一次会见，因为当时人们正考虑向劳工法庭上告，但在*G*的劝阻下没有这样做。(*G*在这里提一下市政府职员H.M一案；他在该案中也充当*G*，并首次使用了“抗效”这个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进入劳工法文献。H.M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八小时的工作量，后来当他——这一点与*L*.*B*.*G*正好相反——为同事们制订样板时，却由于同事们的百般刁难而失败，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而病倒，恢复工作能力后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消磨六个半小时，他提出讼诉，要求“归还每天六个半小时损失的时间”，让他自由支配。当这一起诉被驳回后，他就病得更重了，由于他的案子引起一些轰动，一家工业公司雇佣了他。现在他已完全痊愈，为该企业的提效作出巨大的贡献。在H.M一案中——*G*也参与其事——对抗效的指责仅仅涉及拒绝白白地泡掉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提效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还会给讲求效率的社

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至于L.B.G，他的抗效表现是：他虽然能完成所要求的工作量,但没有把自己天生的才智、组织才能——甚至大大提高工资也不干——完全贡献给他的雇主。效率社会虽然可以用计算机算出它的最低值、最高值或平均值，但清运垃圾工作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以及两者发生的可能性均因地而异，难以估计)，只有像L.B.G这样富有经验、具有抽象能力的工作人员才能掌握。此外还要考虑到，如果掌握这些特点，那就不仅是局部地区，而且是整个地区和全国的垃圾问题,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决,那么，L.B.G给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几乎是难以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抗效。

由于G也想检查了解L.B.G的全部身体功能，就让狱医测量了他的身高体重，检查了所有器官的功能。结果：全部正常。L.B.G的烟酒消费也是正常的,反正不存在麻醉剂损伤。除了右眼视力为0.5之外，没有检查出L.B.G有什么病症。但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和可证明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这些障碍也一定会在L.B.G的内分泌系统中得到证明，G认为这种正常状态可以用于对他身上创造平衡的那种经常性的极端对立情绪加以解释。不过，如果失去这种复杂的、在内心高度紧张状态下不断实现的平衡，L.B.G短期内就会得严重糖尿病、严重肝炎，可能还会得肾绞痛。因此建议不要提前释放他出狱，因为他在狱中感受到这种对立，还能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性。甚至很有可能——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曾谋求坐牢这种极端情况，以维持可能正在松弛的社会压力。由于据G获悉,在此期间发生了周围

人们大力声援$L.B.G$的母亲的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认为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已减少，因此目前只有让$L.B.G$服刑期满才能对他有所帮助，尤其是这样能使已经在进行的、他在同事们中间的英雄化过程不致中断。

G无法下决心采用洪克斯教授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将它用于$L.B.G$身上。那是至今一直有争议的“伪装正常”这个概念，洪克斯教授认为已在试验人身上发现这种现象，他们基于一种“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洪克斯语），在极端异性活动下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潜在的同性恋禀性。通过对旧的宗教法庭报告进行新的精确的科学分析，洪克斯把女巫的“美”、她们的“形体魅力和吸引力”、她们的“恋爱术”（这同无疑先于她们时代的内分泌知识有关），都归因于那种隐藏她们“真正本性”的“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

G无法得出$L.B.G$“伪装正常”的看法，倒不如说他在正常禀性下抗拒正常。清运垃圾工作是他的职业志愿和目标，这一事实证明他本能地寻求适合于他的对立：一种旨在清洁但又被认为肮脏的职业。

第 十 二 章

年约五十五岁的护士B．E给莱尼的信：

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

您给克恩利希教授先生的信偶然落到我的手里，当时我正受托收拾他的书桌，整理他通常用来对我口授几份鉴定所需要的笔记。

我给您回信，已经是失信于人了，如果您对克恩利希教授、我的同事们以及在这里担任护理和看管工作的教团修女们不严守秘密，我会大吃苦头的。我衷心地请求您保密。我认为您是会这样做的。这次泄密，违犯了在皮肤病医院工作十二年之后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的保守职业秘密的习惯，我只是勉为其难。不仅是您那十分悲痛的来信，不仅是想到我在施勒默太太葬礼上看到的您那悲痛欲绝的神情；不，我给您写信，是在履行死者的一种委托或遗言。她在生前最后两周因禁止探视而深感痛苦，而鉴于她的状况——这一点必须强调——也确有必要禁止探视。您一定记得起我；在还允许探视期间，我曾有机会两次，也许三次领您去看望死者。但由于我一年多来几乎全部在教授先生的办公室工作，帮他整理鉴定、病情报告等所需要的材料。

您可能已记不得我这个护士了。不过，也许您还记得在安葬施勒默太太时，那个身穿一件深褐色雨衣站在一旁、不合适地号啕大哭的秃顶胖老先生吧，当时您可能会猜想他是您不认识的她的情人之一。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再补充一句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不是出自内心的话“可惜不是”，请您别把这看作是对您如此珍爱的死者的侮辱或巴结。事实上我始终未能找到一位终身伴侣，有几次我真心诚意订了婚约，这些婚约——我愿对您以诚相待——不仅由于对方的恶劣表现，而且也由于我的职业（它使我必然经常接触性病患者），以及我多次自愿值夜班而告吹。

教授先生不会给您回信，因为您并非死者亲属，即使您是，他也没有义务像您所要求的那样把施勒默太太死亡的“详情”告诉您。医生的保密义务禁止这样做，护士的保密义务也禁止这样做，我不想违背这一义务。现在我把您故友去世前一周的一些情况告诉您，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泄了密，即使不是全部泄密。正因为如此，我恳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我的信。官方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为心力衰竭、循环完全衰竭，这是对的，但是在施勒默太太的急性病正在痊愈的情况下最后怎么竟会这样，我想对您说明这一点。

首先，使您的女友严重感染因而住进我院的人，经查明是一位外国政治家。您可能比我更清楚，您的女友两年前就已放弃了她无疑曾长期迷恋的放荡生活，她在继承了父母的遗产之后下乡居住，想在农村怀着平静和悲伤的心情体面地度过余生。按她的本性，她绝对不是——这一点您肯定比我更了解——一个妓女，甚至不是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而是一个陷于某些男性要求之中而不能脱身的女人。只要她感到能给别人欢

乐，她就难以拒绝别人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有理由这样说，因为施勒默太太在她去世前的头天夜里把她的一生经历几乎都告诉了我，透露了她“堕落”的种种情况，虽然我无意——在大学皮肤病医院工作了十二年，并经历了下面还要讲到的那些事情之后尤其不会——把妓女这种职业理想化甚或浪漫化，但我知道，这些女人大多数都是在悲惨、患病、肮脏和嘴里骂着最不堪入耳的亵渎神明的脏话情况下死去的，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以至于没有一家走红的色情刊物会在封面上刊登她们的照片。您再也想象不出还有死得比这更惨的了：孤苦伶仃，腐烂发臭，悲愁贫困——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女人的葬礼我通常都去参加，因为给她们送葬的通常只有一名救济机构的女职员和一名例行公事的教士。

现在我该怎样不再拐弯抹角地来谈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呢？即使您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现代化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已婚，对仍要提到的某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也不好谈。我也是个“医科大学生”，尽管从来没有当上医生；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原因，我——不仅由于这些原因，老实说也由于害怕预科考试①——我一直担任卫生员工作，在德国和俄国的野战医院里积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因此1950年我三十五岁时从俄国战俘营获释后，无所顾忌地冒充医生挂牌开业，倒也一帆风顺，不过后来在1955年被指控为骗子，坐了几年牢，一直到克恩利希教授——1937年我还在上大学时曾同他合作过——出面讲情，我才提前获释。他收留了我，让我在他手下工作，这是1958年的事。由此可见，我熟悉一个有污点的人的生

① 医学院第四学期结束后举行的考试。

活。顺便说一句，我在总计五年的“医生”业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差错。现在您知道给您写信的是什么人了——这一点至少讲清楚了。

现在，另外一点我怎么说呢？我想鼓起勇气试试看！您的女友玛格蕾特当时已康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估计再过六至八周她就可以出院了。每次探视都使她感到疲劳，包括那位捉摸不透但却予人好感的先生的探视，此人前些时候常来看她(!!!——笔者)，我们起先以为他是她从前的情夫，后来以为是个皮条客，再以后又以为是个礼宾官员，也就是那个极其不幸地把她和那位外国政治家撮合在一起的人。据她自己说，她是在其他女士未能使此君“按照合同提起兴致”之后才不得不勉为其难，使他产生了这种兴致的。

可是就在她即将出院前夕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不合情理的事。尽管我学过医并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与“骑士城堡”①的俏皮行话打交道总共已近三十五年，早已习已为常了，但我仍然感到难以用书面告诉像您这样一位女士，用口头就更难于启齿了。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这里谈的是那条在物理、生物化学和心理上产生如此复杂反应和功能的肌肉，即通常所说的男性生殖器。您不会感到意外吧(啊，这个词说出了口，我简直如释重负)，通常住我们这个病房的女人并没有给这个词语起过优美的名字。今天、过去以及始终受欢迎的是某些男人的名字。有些非常粗俗的修饰语听起来很不好听，可是却适合周围环境，保持着一种几乎如实的、近乎医院的性质，使这些词并不显得粗俗，而是显得似乎“高雅”了。

① 即花柳病治疗中心。

正是在您女友开始康复的那几周，我们病房里以男人名字作为上述定语的外号变得流行起来了，简直无聊得很。您要知道，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这些病房出现无聊的浪潮，也许只有女子寄宿学校才会有，而且它还会蔓延到护理和管理人员身上。据我在三年监禁期间所了解到的，囚犯和看守人员之间也存在这种“辩证转换关系”。修女和护士们本来就有时爱干些无聊的事情，她们正是在我们皮肤科病房很乐意参加这些无聊的做法；这不能说是不道德，而是一种自卫。护士们对您的女友非常照顾，对探访、送东西、烟酒等常常熟视无睹，但是，由于她们有的人三四十年来跟患性病的妇女打交道，某些人——为了自卫！——也学会了患者的行话，甚至往往还加以扩充。

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它要么会使您感到意外，但更有可能会证实您的印象：施勒默太太十分怕羞。起先人们戏弄她，在上面提到过的场合说“古斯塔夫·阿道夫”或“埃贡”、“弗里德里希”等等，由于施勒默太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十分开心。有几天几夜，修女们都参与其事，大开这个玩笑。这个残酷的游戏起初只限于十足新教徒的名字：“古斯塔夫·阿道夫探望您的次数太多啦”或“你太爱埃贡了”等等。后来，这些暗示变得十分露骨，“为的是打掉她那讨厌的清白”（以拉皮条为业的六十多岁女病人K．G语）。施勒默太太明白了其中究竟时，只要一提到任何男人的名字，她的脸就会涨得通红。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这又被说成是假正经和虚伪，从而使这种残酷的游戏变本加厉，升级成最粗暴的性虐狂。最后，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女人的名字也增加进来。人们喜欢把十足新教徒的名字和十足天主教徒的名字挂钩，说成是“异教通婚”，例如阿洛伊斯和路易丝等等。最后，

用句粗俗的话来说，施勒默太太完全摆脱不掉脸红了，甚至当有人毫无恶意地在过道里喊某个探视者或修女或护理人员的名字时，她也会脸红。人们既然走上了这条残酷的道路，从心底对一种敏感——人们不愿承认施勒默太太有这种敏感——感到气愤，最后就把这种折磨上升到亵渎神明的程度，开口必谈那位一度曾是贞洁女守护神的圣阿洛伊斯、圣阿加莎等等，而且一提到“海因里希”或“圣海因里希”，施勒默太太不再需要心理上的过敏，就会不仅脸红，甚至会因精神上痛苦而喊叫起来。

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脸红在医学上也可以弄清其来龙去脉。所谓脸红，通常是在兴奋或窘迫（施勒默太太就是如此）的情况下，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引起脸部皮肤血管和毛细管突然增加供血而发生的。造成脸红的其他原因，如劳累过度等等，这里就不必提了。这时，施勒默太太的毛细管渗透力反正已增强了。不久就形成所谓血肿（俗称“紫斑”）和紫癜，一般称为红斑。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您的女友就死于此病。最后——后来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她全身充满血肿和紫癜，植物性神经系统负荷过重，循环阻滞，心力衰竭。由于施勒默太太的脸红已成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在去世前那个晚上，听到修女们在小礼拜堂唱万圣节连祷曲时甚至也脸红。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对我的理论或论断提出科学的论证，但我认为必须告诉您：您的女友玛格蕾特·施勒默死于脸红。

在她虚弱到不能连贯地说话的时候，她还一个劲儿地低声念叨：“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莱尼，拉黑尔，莱尼，海因里希。”虽然本该为她举行终傅①，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会

① 天主教“圣事”之一。教徒病危时由神父用“圣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诵念一段祈祷经文。

使她太受折磨，因为人们变本加厉地亵渎神明，最后竟在上述场合也用上"仁慈的救世主"、"亲爱的襁褓中的耶稣"和圣母、圣玛利亚、万福童贞女等一切修饰语，甚至从《罗累托连祷曲》中搬用的神秘的玫瑰等。在她弥留之际念一篇礼拜祈祷文，对施勒默太太来说肯定是一种折磨，而不是安慰。

我认为我有义务补充一句：施勒默太太除了提到海因里希、莱尼、拉黑尔等名字外，还友好地、几乎亲切地谈到"有时来看望她的那个男人"。也许她说的就是那个并不神秘但来历不明的探视者。

当我在信的结尾写上"致以诚挚的敬礼"时，请您别把这看作是陈言套语。由于我不能冒昧地使用"亲切的"一词，唯恐它有可能表示某种强求的意思，因此请允许我再一次致以

友好的问候！

伯恩哈德·埃尔魏因

第　十　三　章

如今积极参与调查的克(莱曼蒂娜)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对警官的报告还是改用间接引语，不直接引用原文为好。这样一来，文体当然大为不同，有些精彩的细节就丢掉了(如那位头上带着卷发夹的女士，与一位身穿汗衫、胸口上的毛多得“像毛皮”的先生一起出现；还有一只“嗷嗷悲鸣的狗”，一个分期付款收款员——他们都成了一种偶像破坏的牺牲品，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他们是他的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至于他是抗效还是单纯拒抗(拒绝抵抗)，可以暂且不论。克大笔一挥，删去了她认为多余的一切，毫无顾忌地使用她如此熟悉的红铅笔，剩下来的只是“要点”(克语)。

一、几天前，警长迪特尔·维尔芬驾驶巡逻车停在城南陵园门前的时候，一个名叫克特·茨维费勒的妇女向他打招呼，请他派人破门进入努格海默街五号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的住宅。问她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茨太太说，她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准确地说：二十五年！)——她承认，这二十五年当然并非光是进行调查——打听到克雷默尔太太的地址，抽空前去登门拜访，并带给她一个重要消息。

茨太太由她儿子、二十五岁的海因里希·茨维费勒陪同，

他和母亲一样务农。他们前来是想要告诉克太太，她的1944年底死去的儿子埃里希，生前曾在科默沙伊特和齐默拉特之间的一个村庄里企图投奔美国人，当时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朝他开枪，他跑到茨维费勒家的农舍里寻求并找到了藏身之处，在那里待了好多天；她（克特·茨维费勒）和埃里希·克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他十七岁，她十九岁；他们“订了婚”，“海誓山盟”，决定不离开房子，哪怕战斗十分激烈，甚至有生命危险；这幢房子位于“两条战线之间”。当美国人逼近时，埃里希·克企图将一块虽然有红色条纹但主要还是白色的擦碗布作为投降标记挂在门上，在这当口儿被德国国防军一名狙击手“一枪射中心脏”死了。她（茨太太）甚至看到了这名狙击手，他就“坐在战线中间”的一个高台上，枪口不是对准美国人，而是对准村子；这件事发生后，村里再也没有人（“当时村里大约还有五个居民”）敢挂白旗了。茨太太说，她把死去的克拖进屋里，放在谷仓里，为他痛哭了一场，等到后来美国人占领了村庄，就亲手将他埋入“圣地”。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如期”在1945年9月20日生下一个儿子，给他取名海因里希；她的父母——1944年年底她一个人住在家里——自从疏散后再也没有回来，她也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据称他们失踪了，可能在“半路上”被炸弹炸死了。

作为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单独住在小农庄上，使农庄又恢复了原来面貌，真不容易，但“时间治好了创伤”，她把儿子拉扯大了，他上了学，学习不错，毕业后务农。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他胜过许多男孩：父亲的坟墓就在近处。她（茨太太）1948年就“已”（！！）设法寻找克太太，后来1952年又“已”（！！）试过第二次，后来就死了这条心。1960年（！！）又找可

一次，也没有结果。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埃里希·克也是私生子，她也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和职业。直到大约半年前，承蒙一位肥料推销员帮忙热心打听，她才终于了解到克太太的住址，但仍在犹豫，因为不知道“她会怎样对待此事”。最后在儿子的催促下，他们驱车进城，找到了克太太的住宅，可是反复多次长时间的敲门后还是没有人开门。向邻居打听（那位带着卷发夹的女士就是在这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那只哀鸣的狗等等——这些全都成了一种类似礼拜仪式改革的傲慢的偶像破坏的牺牲品！！），据说克太太不可能是出门去了，她也从来没有出过门。总之，她（茨太太）“感到情况不妙”。

二、维尔芬拿不定主意。这是否属于“危险临头”的情况？这是对克太太的住宅破门而入的唯一合法可能。他和茨太太母子一道来到努格海默街五号，终于了解到克太太有一个星期不曾露面了。一个邻居（不是那位胸部长毛的先生，而是一个被大家叫做酒鬼的莱茵籍退休者，他提到克太太时总说“这个伊尔泽”——这些全被删掉！）说他“听到她的鸟悲惨地叫了”三天。维尔芬决定叫人把门打开，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可以采用“危险临头”这条规定，仅仅是出于同情。幸亏邻居中有一个年轻人（这里竟用如此苍白无力的字眼，把一个有趣的人物一笔带过！此人有行凶伤人、拉皮条、溜门撬锁等前科，附近的居民都叫他“克吕克家的海因”，连警长迪特尔·维尔芬也说他“长着一头乱蓬蓬、油腻腻的褐色长发，众所周知”），他以可疑的熟练手法打开了门，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一回我可是给警察干呀！”

三、克太太被发现衣着整齐地死在她的厨房的长凳上。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尸体尚未腐烂。她仅仅（！！——笔者）——

显然用手指蘸着剩余的西红柿酱——在洗碗池上方的一面旧镜子上写了动词"想"的不同形式。"我不想再干了。我过去就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显而易见，写到这里西红柿酱用完了。那只死鸟——一只虎皮鹦鹉——在隔壁卧室的五斗柜下面找到了。

四、迪特尔·维尔芬承认，警方对克太太的情况是掌握的。据K14(政治部)记载，她是共产党员，但从1932年起就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尽管——这也是警方掌握的情况——曾有多次，特别是德共被取缔后，有人登门要求她参加活动。(这里克莱曼蒂娜本来记下了"弗里茨"的全名，这一次被笔者大笔一挥勾掉了。)

五、茨太太母子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迪特尔·维将一只有十五点八马克的钱包和一个有六十七点五马克的存折当场点清封存。唯一看得出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几乎全新的黑白电视机，上面有克太太贴的一张纸条："分期付款已全部付清"，也封存起来了。厨房长凳上挂着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茨太太认出照片上是她孩子的父亲埃里希·克。另一张照片"大概是埃里希的父亲。因为长得太像了"。在一只画着花卉、带有一家著名咖啡公司牌号的铁皮匣子里找到："一块几乎不值钱但完好无损的男式手表。一只镶有一粒假红宝石的旧金戒指，几乎同样不值钱。一张1944年发行的十马克纸币。一枚"红色战线战士同盟"盟徽，签署人无法确定其价值。一张1936年的当票，当品为一只金戒指，当二点五旧马克；另一张当票是1937年的，当的是一条海狸皮领，当两个旧马克。一本帐面清楚的房租收据簿。"没有发现值钱的食品储存；半瓶醋、一听几乎满满的油(小听)、干硬的营养黑面包(五片)、一罐已开罐的牛奶、一个铁盒里的

可可(约有六十五至八十克)。半杯咖啡粉、盐、糖、大米、少量土豆，以及一袋未启封的鸟食。此外还有两本卷烟纸和一包已打开的“土耳其风味牌”细烟斗丝。一个名叫埃米尔·左拉的人写的六本小说，袖珍本，已经破旧，不脏。大概值不了多少钱。一本《工人运动歌曲集》。全部家具被挤进来看热闹而被告诫不得乱动的邻居们鄙夷地称为“全是破烂”。在等待法医到来之后，按照规定对房子加封。茨太太的继承遗产要求，已指点她向司法机关提出。

六、建议茨太太同(“弗里茨”)先生取得联系，也许此人能向她提供死者生平以及已故埃里希·克的父亲的有趣细节。她予以拒绝。她说，她不想同共产党人发生任何关系。

第 十 四 章

只要克不挥舞她那支红铅笔，她几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儿。她那无可争辩的德国语言文学造诣——只有当她野心勃勃舞文弄墨或作编辑工作时，这种造诣才不起作用——她那对宗教事务的多年实践经验，用于世俗生活并非毫无用处；正因为她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解放，她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厨房炊事工作，使笔者感到欣慰；她洗碗刷碟简直有瘾，皱起眉头记下肉价、房租，另一方面却喜欢乘坐出租汽车，有时看到露骨的色情广告会脸红；在舞文弄墨方面，她可以说已经独立了，这就是说，她已不再挥舞红铅笔去干预别人的文章了，只还用来对付自己的文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对伊尔泽·克雷默尔之死感到“震惊”，流过眼泪(现在还在流)，她想给这个女人写一篇小传，这个女人“当了五十年工人，身后之物只有一台刚刚付清货款的电视机、半瓶醋、几张卷烟纸——和一本房租收据簿。我想不通，简直想不通”。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认识和意图。

此外，克倒不是在打听消息方面，而是在观察事物方面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笔者一直还没有达到渴望达到的完全抗效状态，而她却正在接近这个目标：只做使自己开心的事情。

访问席尔滕施坦和朔尔斯多夫，看到他们神情轻松愉快，这使她开心；后来她发现了他们轻松愉快的原因：席尔滕施坦“和莱尼脸贴着脸、手拉着手，坐在布吕歇尔公园里的长凳上”。至于朔尔斯多夫，她曾两次在施佩茨咖啡馆里看到手按手的场面；有一次，她在莱尼家碰到一个人，根据她所说的模样不可能是别人，而是库特·霍伊泽。由于她差不多确信，莱尼在目前的情况下跟梅赫梅特也不肯发生亲密关系，因此她觉得莱尼对佩尔策过于亲热了，她“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在黑暗中坐在汽车里吻他”。她怕去访问佩尔策，因为她相信，他“其实是个不体贴别人的人，完全有可能要求我作出具体的变相色情动作”。

对于莱夫·格鲁伊滕，她丝毫也不担心。“他很快就会出来。”她表现积极，甚至参加了垃圾工人在刑事法庭前举行的一次示威，起草了“团结有罪吗?”“忠诚犯法吗?”等标语。还有更加咄咄逼人的:“我们的伙伴如受惩治，全市将在垃圾中窒息而死。”这使她上了一家地方小报的头条大标题：“前红发修女充当垃圾工的雅各宾党人①!”在其他方面，她也做了许多好事：她在莱尼家里给葡萄牙孩子上德语课，同波加科夫谈论苏联目前的情况，让格蕾特·赫尔岑为自己“舒服整容”，帮助种种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填写申请退还工资税表。她打电话给检察官(为正在审理中的垃圾车司机案子)，向主管人员（也是用电话）打招呼，如果垃圾工人罢工，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况，等等，等等。有时她为《O侯爵夫人……》流下一滴眼泪，为《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流下好几滴眼泪，这当然不在话

① 雅各宾党人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用来指激进分子。

下，可是，尽管流了眼泪，她还是不明白“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这个典故的意思。她坚决地、也许是过于激进地与一切非尘世的东西一刀两断。并非她急于想去格尔塞伦，是莱尼听说该地果真要开设一个温泉浴场时硬要她上那儿去的。是否要提一下，谁被指定当“疗养地主任”和“公关经理”？不是别人，正是绍肯斯。他在那里拿着设计图纸忙得团团转，在电话中向工匠和建筑师发号施令，并且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必要时用暴力”遏制“玫瑰花祸害”。在这“独一无二的泉水”周围五十米以内，他搞了一条类似有毒的排水道，不断地排送一种有剧毒的农药，果然煞住了玫瑰花。曾经名叫拉黑尔·金茨堡的那一抔黄土，对此当然是无可奈何了。不管怎样，波加科夫已经高兴地体会到泉水对他那“该死的关节炎”的“受用”。自从他成功地促使洛蒂抗效后，他们俩经常在那里的疗养地公园里散步。

在迄今提到过的所有人当中(包括梅赫梅特在内)，克具有前修女和非修女共有的本领，固执不化、不屈不挠。她一连好几个小时不声不响地看莱尼画画，帮这位女艺术家煮咖啡、洗画笔，满口奉承——当然，她也是作为唯一的人得以在电视中见到圣母。她的评论平淡无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那就是她自己，是她，由于尚未搞清楚的反射，她所看到的是她自己。”那么，“尚未搞清楚的反射”一直还存在着，幕后一直还阴云密布，预示着风暴将要到来：梅赫梅特的妒忌和他近来所表示的对交际舞的反感。

短篇小说

岸　上

高年生译

从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可当时，几天前，我有了体会。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灰溜溜的、黯然失色，我对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喉咙里憋得难受，心想全完了，毫无出路，无可挽救。因为我把我们全家的票证都给丢了，而局里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给我补发的；到黑市上去买我们已无能为力，偷呢，我真不愿去偷，而且，给这么多人去偷也不可能。妈妈、爸爸、两个大孩子卡尔和格莱特、我，还有那个还在吃奶的小不点儿。母亲配给卡和爸爸的重劳动配给卡都给丢了，全丢了，整整一包，我在电车上突然发觉东西丢了，根本没有去找，也没有去问人。反正也是白费气力，我想，谁会把捡到的票证交出来呢？而且是那么多，有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

这时，我明白什么叫绝望了。我提前好儿站下了车，马上向莱茵河走去，我想去投河。可是，当我来到光秃秃、冷清清的大道上，看到平静的灰色的河水，我就想，投河自尽并不简单，不过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这一定要好久好久才能死去，而我却愿意迅速突然地死亡。反正我是有家回不去了。妈妈会

简直毫无办法，爸爸会狠狠揍我一顿，并且会说，真丢人，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快十七岁了，什么都不会干，连黑市交易也不会，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叫他去排队买猪油，竟把全部票证都丢了。猪油也没有买到。我排了三个小时，猪油都卖完了。不过，爸爸妈妈那里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没有人会给我们什么东西。经济局的人会嘲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丢失过几张配给卡，我们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而去偷呢，给那么多人去偷是不行的……

不，我必须跳河，因为要扑到美国佬又大又重的汽车下去，我可没有这个勇气。有许许多多汽车沿着莱茵河行驶，可林荫大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街上光秃秃、冷清清的，从水流湍急的河上吹来一股阴冷的寒风。我一直向前走去，之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很快就已走到林荫大道的尽头。树木在我身旁一闪而过，像一根根短棍一样倒下消失了，我不想回头一看。我就这样很快地跑到林荫大道的尽头，那儿莱茵河河面变得开阔一些，有一个停靠游船的码头，再过去一些就是那座已被炸毁的桥梁。那儿也没有一个人，只是在那前边的游船码头上，有个美国兵坐在那里看着河水。他蹲在那里，样子很滑稽。他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坐在石头上大概太冷了，于是他就这样蹲着，把价钱很贵的香烟头往水里扔。我心里想，每个烟头都相当于半个面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抽烟，可是美国兵全都是香烟抽到四分之一，就把余下的一截扔掉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家伙真不赖，我心想，他肚皮不饿，没有丢掉配给卡，每扔一个烟头就等于把三马克七十五芬尼扔进了阴冷的灰蒙蒙的莱茵河。我要是他的话，我想，我就坐在火炉旁喝咖啡，不会蹲在寒冷的莱茵河畔瞅着污浊的河水……

我继续跑；是的，我相信我是在跑。关于那个美国兵的想法在脑海中匆匆闪过，我非常羡慕他，我对他羡慕得要死。后来我又往前走或往前跑，我记不清了，一直到那座炸毁的桥边，我心想，从上面跳下去就万事大吉，很快就会完事。我曾经读到过，慢慢地走到水里去淹死自己是不容易的。必须从高处跳下去，这才是上策。于是我就向断桥奔去。那儿没有工人。也许他们罢工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寒冷，没法在室外的桥上干活。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美国兵，我根本就没有回头看。

不，我想，毫无办法，毫无希望了，没有一个人会把那些票证补发给我们，那也太多了，爸爸妈妈、两个大孩、小不点儿和我，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不能再犹豫了，快跳河吧，这样他们至少就少了一个吃饭的人。天气很冷，在莱茵河边的林荫大道上，寒风呼啸，光秃的树枝从夏天长得那么漂亮的树上掉落下来。

爬上断桥很吃力，他们把桥面的沥青残余敲掉了，只剩下空架子，上面架设了一条小铁路，大概是用来运走瓦砾的。

我小心翼翼地向桥上攀登。我冷得要命，并且害怕摔下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想，你既然想要投河自尽，却又害怕掉下去，这可真是荒唐可笑。要是从这儿摔到马路上或废墟堆上，你也是死，这不很好吗，你不是想死吗？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我说不出来。我就是想跳河，不想摔得粉身碎骨，我想，那样会非常痛苦，或许一下子还死不了，而我不愿有痛苦。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爬上光秃秃的桥，一直到前面、最前面铁轨伸到头的地方。我站在那里看着汩汩地流淌的混浊的河水，我站在最前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感到绝望，我突然明白绝望是件好事，绝望很甜蜜，没有什么，它什么也不

是，一个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莱茵河水挺高，混浊阴冷，我朝着水面看了好久，看到那个美国兵一直还蹲在那儿，而且确实把一个昂贵的烟头扔进水里。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离我这么近，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我再次扫了整条光秃秃的林荫大道一眼，然后又突然向莱茵河看去，昏沉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之后我就摔下去了！我只还记得，最后片刻我想到妈妈，也许我一死比丢掉票证更糟糕，全部票证……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大孩的，小不点儿的，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还有……是的……是的，还有我的配给卡，而我却是个只会白吃饭的窝囊废，连黑市交易也不会……

我蹲在污浊的莱茵河边盯着河水出神，肯定已有一个小时了。我老是想到那个金发婆娘格特鲁德，她已把我弄得神魂颠倒。该死的，我一边想一边把我的香烟吐到莱茵河里，跳下去，跳进污泥浊水，让河水把你冲走……冲到荷兰，是的，然后再……嗯，冲进运河，直到留在海底深处。周围没有一个人，河水把我弄得神魂不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河水，心里老是在想那个漂亮女人，她不想要我。对，她不要我，我完全清楚，同她决成不了事。河水使我摆脱不开，叫我心烦。该死的，我想，跳下去，你就永远摆脱了这些该死的娘儿们，跳下去，跳下去……

这时，我听到有人像发疯似的沿着林荫大道奔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这样奔跑。他是在奔向毁灭，我一边想一边又朝水面上望去，可是岸上那阒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的脚步声又叫我举目向上看去，我看见那个男孩奔上断桥，心想准是有人在追捕他，但愿他能逃脱，不管他是偷了东西还是干了什么事。

一个瘦高个男孩，跑路的神态像是神志不清似的。我又向水面上望去，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该死的，你还等什么，快跳下去，耳边响起悄悄的声音……你永远不会得到她，永远不会，跳下去，让污泥浊水把你送往荷兰，该死的，我把第三支烟吐进水里。

天哪，我想，你在这个国家里干啥，这个国家简直疯了，人人都只是想弄到香烟。这个可怕的疯狂的国家已没有桥梁，没有色彩，根本没有色彩，该死的，只有灰色。人人都忙忙碌碌，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婆娘，这个长腿的疯女人，你永远也得不到，即使用一百万支香烟也得不到她，该死的。

可就在此时，我听到那个神志错乱的男孩爬到上面桥上去了。铁架在他那钉有钉子的靴子下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个疯孩子一直爬到最前头，站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也盯着灰不溜丢的浊浪看，我突然明白了，并没有人在追捕他，而是他……该死的，我想，他想投河！我大吃一惊，眼睛只是看着这个疯男孩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地站在上面断桥上，心里以为他有些动摇……

我把第四支烟自动地吐进莱茵河，眼睛一直不离开上面那个人，我的心凉了半截，吓得要死。这个男孩，这个半大小子，他究竟会有什么苦恼？我想。失恋的苦恼，我想，我至少以为自己笑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这个半大小子会有失恋的苦恼么？我想。河水沉默不语，一片沉寂，我相信自己听得见上面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他一直还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断桥上。该死的，我想，不能这样，我想喊，可接着我想，你会使他受惊的，准会使他坠落。周围显得格外静谧，我们两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对着灰不溜丢的污浊的河水。

后来，天哪，他盯着我，确实盯着我，我一直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扑通，那个疯子果真掉进水里啦！

这时，我真的清醒了，该死的，我立刻甩掉上衣和帽子，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游起来，非常困难，幸好水流把他向我冲过来。接着，他突然又消失了，沉到水下，该死的，我的鞋子灌满了水，像铅一样吊在我的脚上，我的衬衣也像铅一样沉重，河水很凉，冰凉，那个男孩已无影无踪了……该死的，我便游起来，接着踩了一会儿水，大声喊叫，是的，我大声喊叫……该死的，这时那个男孩浮上来了，他已经顺流而下漂了一段路，我未曾想到水会流得那么湍急。现在，当我看到这团无生命的东西在灰色污水中漂流，吓得我身上发热，该死的，我追赶他，离他不到两步远，那头黄得耀眼的头发已看得分明，这时他又不见了，干脆消失了，该死的……可是，我只是频频点头，老天爷，我抓到他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抓到他时我浑身顿时感到多么轻松自在。就在莱茵河中间，只有冰凉灰色的脏水，我像铅一样沉重冰冷，可我却感到轻松起来。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已经过去了……我侧身拽住他，慢慢横渡过河向岸边游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岸离得多近啊……

该死的，我已顾不上感到寒冷和唉声叹气，尽管我难受得要死。我喝了不少水，脏水叫我恶心得要吐，但我好好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抓起他的双臂来回摇动，摇呀，摇呀；始终合乎规范，而我身上变得十分热起来……岸上连个鬼影子都不见，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桩事情。后来，男孩张开眼睛，该死的，一双像儿童一样的天蓝色眼睛，天呀，他吐出水来，吐个不停……该死的，我想，这孩子肚子里难道除了水就没有别的东西？可

除了水确实没有其他东西，他觉得还应当笑一笑，这孩子竟向我微笑……

这时我觉得冷得要命，因为身上还穿着湿衣服，我想，你会生病的，而他也浑身哆嗦，好像一只猫在呕吐。

于是，我把他拽起来，说："走，孩子……跑……"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爬上斜坡，他在我怀里像个木偶似的软绵绵地摇晃，后来他又一次站住，又一次吐出脏水，全是污浊的灰色莱茵河水，在这之后，他就能跑得好一些了……

该死的，我想，他得暖暖身子，你也得暖暖身子。最后我们拔腿飞奔，一直跑到上面林荫道上，过了林荫大道又跑了一段路。我感到全身都暖和起来，可那个孩子仍像猫一样浑身颤抖。该死的，我想，他得到屋里去，然后躺上床，可那儿没有房屋，只有几堆瓦砾和铁轨，而且这时天也黑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开来了一辆汽车，是我们部队的车子，一辆小汽车，于是我赶紧奔上马路，挥动手臂。汽车起先继续向前行驶，车里是一个黑人，但我大声喊道："哈啰，小伙子……"我身上没有穿外套，头上也没有戴帽子，他一定是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也是美国来的。于是他停下了，我把男孩拖过来，黑人摇了摇头，说："可怜的孩子，掉到水里啦？"

"是的，"我说，"开车吧，快开！"说完就把我的宿营地告诉他。

男孩坐在我身旁，又发出苦笑，我觉得非常可笑，我给他摸了摸脉搏，完全正常……

"再快一点！"我向黑人喊道。他转过头来，咧嘴笑了一笑，确实把车子开得更快了，在这当口儿我不断地说："向左，向右，再向右"等等，一直到我们真的在我的宿营地停下……

帕特和弗烈迪正站在过道里，他们看见我进来，就笑起来：“老弟，难道这就是你的心上人格特鲁德？”可我对他们嚷道：“别笑啦，哥儿们，帮我一把，这孩子是我从莱茵河里救上来的。”他们帮我把他抬到我们——帕特和我——的房间，我对弗烈迪说：“去给我们煮杯咖啡。”然后我把他扔到床上，把他的湿衣服扒下来，用我的浴巾替他搓了很长时间。该死的，这小子真瘦，瘦极了……像……像……该死的，看上去像是一根长长的白面条……

“帕特，”我说，因为帕特正站在旁边，“你来继续搓，我得把衣服脱了。”该死的，我也湿得像只猫，心里非常害怕会得病。帕特把浴巾给我，因为床上那个瘦高男孩身上现在已通红，活像刚出世的婴儿，而且他又笑了……帕特给他号脉，说：“不错，乔尼，没有什么，我相信……”

伙计们都好极了，弗烈迪给我们送来咖啡，帕特把自己的内衣送给男孩。男孩躺在床上，喝咖啡，微笑。我和帕特坐在椅子上。弗烈迪走了，我相信他又是找女人去了……

啊，我想，刚才这一阵子是多么紧张呀，可是结果万事大吉，谢天谢地！

帕特把一支香烟塞进男孩口中，他使劲地抽着。这帮德国人，我想，全都像疯子一样抽烟，他们叼着烟卷，好像是自己的命根子，脸上的模样完全变了。是的，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外套还在那下边河岸上，外套里有那张照片，还有我的帽子。去他的，我想，我还要那种照片干啥……

屋子里十分宁静，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帕特又给了他一个面包和一听牛肉，并且一再地给他斟咖啡……

“帕特，”在这之后我说，并且也给自己点燃一支烟，

"帕特，你看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投河……"

"好，"帕特说，接着问了他。

那孩子样子十分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对我说了什么。我看看帕特，帕特耸了耸肩。"他说什么食品，可是有一个词我不明白，不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词？"我问。

"票证，"帕特说。

"票证？"我问男孩。

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词。帕特说："他把那东西丢了……这玩意儿，这票证……"

"票证，帕特，这是什么？"我问。

但帕特也不知道。

"票证，"我用德语对男孩说，"这是什么？"这句话我会用德语讲得很好，我也会讲失恋的苦闷，别的就不会了，这都是那个混帐婆娘教给我的……

男孩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然后用他的细指头在床头柜桌面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四方形，并说："纸。"

我也听懂了纸这个词，我想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噢，"我说，"护照，你把护照丢了。"

"不，"他说，"票证。"

"该死的，帕特，"我说，"这个票证把我完全搞糊涂了。一定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他为此而不得不跳河。"

帕特又给每个人斟满了一杯，可是这该死的票证却使我不得安宁。天哪，我可亲眼得见这个半大小子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上面的断桥口，扑通！真该死。

"帕特，"我说，"你去查一查，你不是有一本词典吗？"

“对，”帕特说罢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词典。

在那当口儿，我向男孩点点头，又给了他一支烟，真该死，他把那一听牛肉全吃了，还有所有的面包，咖啡对他确实管用。这些小伙子抽烟的样子真叫人吃惊，像发疯似的，而我们只有在战时遇到紧急情况时才会那样抽烟。他们始终还是像战争时期那样抽烟，这帮德国人……

“哈哈，”帕特喊道，“有了。”他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一封信，把邮票指给男孩看，但他只是摇头，甚至还笑一笑……

“不，”他说，又把那个古怪的词讲了一遍，为此他竟跳了河，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等一等，”帕特说，“有了，有个词叫‘食品配给卡’。”他热忱地翻阅他的词典。

“你还饿吗？”我向男孩打手势说。但他使劲摇了摇头，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活见鬼，他们真能喝咖啡，整桶地喝，我想……

“他妈的，”帕特喊道，“这帮编词典的人，这帮编词典的混帐，这帮编词典的混帐王八蛋，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这跳了河，而词典上却连这个词都没有。”

“孩子，”我对男孩说，当然是用美国话，“平心静气地说这是什么，我们都是人，彼此会了解的。你告诉他，告诉帕特，”我指了指帕特，“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帕特笑了，但他一声不响地认真听男孩平心静气地对他讲，完全平心静气，起初这可怜的孩子十分尴尬；他慢条斯理地对帕特讲了老半天，我听懂了一部分，帕特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真该死，”帕特说，“我们真傻。他们凭证购买食品，

明白吗？他们有食品配给卡，明白吗，真见鬼，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他把食品配给卡丢了，因此他就跳了莱茵河。”

“该死的，”我嘟哝地说，“这个小伙子跳了河，而我们还不知是为什么，想象不出……”

至少应当能想象，我想，这是最起码的，即使没有亲身体会，起码应当能想象……

“帕特，”我说，“要是他把它丢了，该死的，他们就应当发给他新的。这反正是纸片，他们可以去印嘛，他们应当补发给他，这又不是钱。丢掉这东西是有可能的，这种印刷的东西反正有的是……”

“胡扯，”帕特说，“他们才不干呢。因为有些人瞎说他们把卡丢了，把它卖掉或者吃双份，局里的人认为这样做太不像话了。该死的，就像打仗时，你把枪丢了，突然有人站在你面前，而你却无法开枪，你无法开枪，因为你没有枪。他们同他们的纸片进行的是一场该诅咒的战争，事情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我想，这么一说是很可怕，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简直一无所有，啥也没有，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他像发疯似的飞跑，纵身跳进了莱茵河……

“是的，”帕特说，好像想要回答我脑子里的想法，“他全给丢了，所有的配给卡……嗯，我想是六个人的，还有别的，别的配给卡，我简直不懂他的意思……一个月的……”

该死的，我想，事情既然如此，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男孩站在那儿，把配给卡丢了，我心想，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去跳河的。可我却无法想象……不，我相信，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两包香烟给那孩子，他望着我的

样子把我吓了一跳。该死的，他样子十分可笑地看着我，我想，他会叫我们发疯的，一定会叫我们发疯的，这孩子的脸上露出那样一种神色……

“帕特，”我叫起来，是的，我相信我叫起来，“劳驾把这孩子送走，把他送走，”我叫道，“我受不了，不能看他的脸，这张感激万分的脸，为了两包香烟，我简直受不了，不，好像是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他了，帕特，”我叫道，“把他送走，把东西包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上，给他包上……”

该死的，当帕特把那孩子带走的时候，我心中感到高兴。帕特是会给他把东西包上的，我想；你坐在那儿灰溜溜的污浊河水旁，为了这样一张瘦削的女人脸，同河水聊了一会儿天，心里想：跳下去，跳下去，让河水把你冲走，直至……嘿，荷兰，该死的，可这孩子跳下去了，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为了那几张也许连一美元都不值的破纸片。

一件绿绸衬衣

我完全按照人家告诉我的那样行事，没有敲门就推门走进屋去。可是，当我突然见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时，我吃了一惊。她那脸上有着一种难得见到的东西：美妙的色泽，健康，非常健康，健康、安详、自信。

她的眼睛的神色是冷漠的。她站在桌子旁摘菜，身边放着一个还有吃剩的蛋糕的盘子，一只大胖猫正在蛋糕上闻来闻去。屋子又矮又窄，空气混浊，还有一股油腥味。我的畏缩目光在蛋糕、猫和女人健康的脸之间来回转个不停；喉咙里有一种呛人的苦涩味，噎得我很难受。

“什么事？”她问，眼睛抬也不抬。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手提包拉锁，这时脑袋碰到了低矮的门框，最后取出了我的东西：一件衬衣。

“一件衬衣，”我沙哑地说，“我想……也许……一件衬衣。”

“我丈夫的衬衣足够穿十年的！”她说完这话像是出于偶然地抬起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件窸窸窣窣的柔软的绿衬衣，我看到她眼睛里突然闪现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心想这事已十拿九稳了。她连手也不擦一擦，就抓起衬衣，提溜着衬衣的肩部，翻来覆去观察每一道接缝，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

我不耐烦地内心不安地看着她又去继续把洋白菜弄干净，走到灶旁掀起一口嗞嗞作响的锅的盖子。一股香喷喷的热油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此时那只猫已在蛋糕上嗅了老半天，显然觉得它还不够新鲜好吃，便懒洋洋地一跳，以优美的姿态跳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跳到地上，一溜烟地从我身边窜出门去。

油在沸腾，我相信听到了猪油块在盖着盖儿的锅里劈劈啪啪的蹦跳声，因为这时一段遥远往事的回忆告诉我，那是猪油，这个锅里正在炼猪油。女人继续在削洋白菜。有个地方，一头母牛在哞哞低叫，一辆手推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一直还站在门口，我的衬衣在肮脏的椅子靠背上晃悠，我那心爱的柔软的绿绸衬衣，对它的柔软我曾向往了七年之久……

我觉得犹如站在烧得通红的炉箅子上，而沉默使我憋得透不过气来，难受得要命。蛋糕上此时已满是黑压压一片懒洋洋的苍蝇；饥饿和恶心，极其难受的恶心，合成一种呛人的苦涩味，把我的喉咙噎住了。我开始冒汗。

我终于犹豫不决地伸手去拿衬衣。“您，”我说，声音比方才更嘶哑了，“您……不想要？”

“您要换什么？”她连眼睛也不抬地冷冷地问。她那灵巧的手指已把洋白菜摘干净，把菜叶收进一个漏勺，用水冲洗，然后又掀起那个正在炼油的锅的盖子，把菜叶倒了进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嗞嗞声使我又想起往事，好像已过去一千年的往事，而我才只有二十八岁……

“喂，您要换什么？”现在她更加不耐烦地问。

可我不是商人，不，虽然我光顾过从格里内角① 到克拉斯

① 法国北海岸一个地方。

诺达尔[1]的所有黑市。

我张口结舌："猪油……面包……也许面粉，我想……"

这时她第一次抬起她那冷漠的蓝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在这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完了……今后我将永远不会再知道猪油的味道了，猪油对我将永远只是一阵令人痛苦的气味回忆……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她的目光击中了我，洞穿了我，现在我内心空空……

她哑然失笑。"衬衣，"她以讥笑的口吻喊道，"我能用几张面包票去换衬衣。"

我从椅子上夺过衬衣，把它系在这个大喊大叫的女人的脖子上，把她像一只淹死的猫一样吊在那黑沉沉的巨大的耶稣受难像下面的钉子上，这像就挂在她头顶上的黄粉墙上……不过，我只是在想象中这样做。实际上，我抓起我的衬衣团成一团，又把它塞进手提包，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只猫正蹲在过道里津津有味地舔食一盘牛奶，当我走过它身旁时，它抬起头点了点，似乎要跟我打招呼，并且安慰我，在它那双模模糊糊的绿眼睛里流露出一点人性，一点无法形容的人性……可是，人家告诉过我，我要有耐心，因此我觉得应当再试一试。先是为了回避那明朗得令人感到压抑的天空，我跑到一处不知什么地方，在奇形怪状的苹果树下越过臭水坑和啄食的鸡群，来到不远的一座古老椴树浓荫砸地的较大的农家院落。一定是喉咙里的苦涩味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看到一个身材粗壮的农村小伙子坐在房前长凳上，向两匹正在吃食的马说着亲热的言语。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笑

① 苏联北高加索一城市。

着从一扇打开的窗子向屋里喊道:“妈，第十八号来了。”说罢他非常开心地拍拍自己的大腿，往烟斗里装起烟丝来；屋里回答他笑声的是一声响亮的咕咕声，一个脸膛棕红、精神饱满的女人在窗框里闪现了一秒钟，她的面孔像一块油亮亮的煎饼。我马上转过身去，经过水坑、鸡群和嘎嘎喊叫的鹅群向后奔去。我像疯了似的跑得飞快，手提包紧紧地夹在臂下。当我又到达村中道路时，这才放慢脚步，从半小时前登上的山上又走下去。

当我重又见到我脚下那条两边长着可爱树木的亲切的灰色蛇形公路时，松了一口气。我的脉搏跳得更平稳了，当我坐在那条多石、荒芜、霉味弥漫的村中道路通向阳关大道的岔道口时，苦涩味减轻了。

我大汗淋漓。

蓦地，我莞尔一笑，点燃我的烟斗，从身上扯下又脏又旧、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迅速穿上凉爽柔软的绸衣；一股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流过我的全身，于是一切苦涩味全都化为乌有，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在公路上重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憧憬，渴望见到城市贫困丑陋的面貌，因为在这张变得难看的面孔后面，我还常常看到困难中的人性。

拉 客 的·雅 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

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

① 德国作家卡尔·迈埃(1842～1912)写印第安人的冒险小说《维奈托》的主人公。

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缩成一团，用大衣蒙着脑袋，点着烟斗。

“你也想抽吗？”

“不。”他已会很好地悄悄低语，这使我感到惊奇。

“来吧，”我说，“那就喝一口。”

“不，”他又说，可是我抓住他的脑袋，把瓶口凑到他嘴边。他像一个初次喝酒的少女一样，容忍着喝了几口，然后作出一个猛烈的表示厌恶的动作，于是我就把酒瓶拿开。

“不好喝吗？”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喝呛了。”

“那你就自己喝吧。”

他从我手中取过瓶子喝了一大口。

“谢谢，”他含糊不清地说。我也喝起酒来。

“你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

“不怎么害怕了吧？”

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害怕，”我说，“心里老是怕，于是我就喝酒壮胆……”

我感觉到他猛地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弯下腰去，凑近他，想看清他的脸庞。可我见到的只是一双闪烁发亮、使我感到害怕的眼睛和阴暗而又模糊的面部轮廓，但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那是军需保管室的气味，汗水、军需保管室和剩汤的气味，还有一点烧酒味。万籁俱寂，他们好像已在我们背后分好了饭菜。他又转身面对敌人。

“你这是第一次出来吧？”

我感到，他又难为情了，但他接着说："是的。"

"你入伍多久了？"

"八个星期。"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圣阿沃德。"

"什么地方？"

"圣阿沃德。洛林，你知道……"

"路上走了很久吧？"

"十四天。"

我们沉默了，我试图用目光洞穿我们面前难以穿透的黑暗。啊，要是白天就好了，我想，起码能看到点什么，至少能看到朦胧的光线，至少能看到雾霭，至少能看到点什么，熹微的光线……可是一到白天，我又盼天黑。要是天已经蒙蒙亮，或者大雾突然降临就好啦。天总是老样子……

前面没有什么动静。远处响起一阵轻微的发动机嗡嗡声。俄国人也开饭了。接着，我们听到有一个喊喊喳喳的俄国人的声音突然被压制下去，好似嘴巴被捂住了。没有什么动静……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我问他。嘿，我现在不再是单身一人了，这有多美呀。能听到一个人的呼吸，感觉到他身上隐隐约约的气味，这有多好呀。我知道，这个人在下一秒钟并不想杀掉一个人。

"知道，"他说，"监听哨。"我再次惊讶不已，他悄悄话说得多好，都快赶上我了。看来他毫不费劲，而我总是很吃力，我宁可大声嚷嚷，大喊大叫，让黑夜像黑色泡沫一样破灭，这种小声讲话叫我太吃力了。

"好，"我说。"监听哨。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俄国

人什么时候发动进攻。那我们就发射红色信号弹，再用步枪打几枪，拔腿就跑，向后跑，明白吗？不过，要是只来几个人，一个侦察队，我们就闭上嘴让他们过去，一人回去报告，向少尉报告，你去过他的掩体吗？”

“去过，”他说，声音抖抖索索。

“好。要是侦察队向我们俩进攻，我们就得把他们干掉，彻底消灭，明白吗？我们不能见到一个侦察队就溜之大吉。明白吗？是吗？”

“是的，”他说，声音一直还在颤抖，接着我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响：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给你，”我把瓶子递给他，说。

我也再喝……

“万一……万一……”他张口结舌，“万一我们看不见他们来……”

“那我们就完了。不过别担心，我们肯定会看见他们或是听到他们声音的。情况可疑时我们可以发射照明火箭，那就什么都能看见啦。”他又沉默下来，真可怕，他从不主动开口。

“不过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唠唠叨叨地说道，“夜里是不会来的，最多是清晨，拂晓前两分钟……”

“拂晓前两分钟？”他打断了我的话。

“他们在拂晓前两分钟出发，到这里天就亮了……”

“那可就太晚了。”

“那时就得赶紧放红色信号弹，再跑……别怕，那时我们可以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事先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你究竟叫什么？”我想和他谈话，每次都得把手从暖和的口袋里伸出来捅他腰部一下，再放回去，再等手暖和……真叫人讨厌。

“我，”他说，“我叫雅克……”

“是英语吧？”

“不，”他说，“是雅克布的……雅克……克……，不是杰克，雅克，就叫雅克。”

“雅克，”我继续问，“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我吗？最后是当拉客的。”

“什么？”

“拉客的。”

“你拉什么？”

他霍地向我转过脸来，我感觉得到他十分诧异。

“我拉什么……我拉什么……喏，我就是拉客呗……”

“什么？”我问，“拉什么？”

他沉默片刻，又向前望，然后在黑暗中又向我转过头来。

“是的，”他说，“……我拉什么，”他长叹一声，“我站在火车站前面，至少最后总是……等有人来，经过那儿，在许多人当中，有什么人我想合适，大多是当兵的，也就是有人来时，我就轻轻地小声问他：‘先生，您想要幸福吗？’我这样问道……”他的声音又颤抖起来，大概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回首往事而激动。

我紧张得忘了喝一口。“那，”我声音嘶哑地问，“他要是想要幸福呢？”

“那么，”他吃力地说，看来又沉浸在回忆中，“那我就把他带到正好有空的姑娘那里去。”

“进妓院，是吗……？”

“不，”他实打实地说，“我不是给妓院干，我有几个暗的，你知道，几个单干户，她们一起雇我。三个没有执照的。

克特、莉莉、戈特利泽……”

“什么？”我打断了他……

“是的，她叫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她总是对我说，她父亲本想要个儿子，准备取名为戈特利布，因此就给她起名为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他真的笑了一笑。

我们俩已忘记我们为什么蹲在这个龌龊的掩体里了。如今我已用不着像挤牙膏那样使劲挤他了，他几乎自动地唠叨起来。

“戈特利泽最可爱，”他继续说，“她总是落落大方，神情忧伤，其实也是她最漂亮……”

“这么说来，”我打断他的话，“你是领班了，是吗？”

“不，”他以略带教训人的口吻说，“不，嗨，”他又叹了一口气，“领班都是老爷、暴君，他们大把大把挣钱，还和姑娘们睡觉……”

“你呢？”

“不，我只是拉客。我得钓鱼，他们煎鱼吃，而我呢，只分到一些鱼刺……”

“鱼刺？”

“不错。”他又淡淡一笑，“就是一笔小费，你明白吗？打父亲阵亡，母亲出走后，我就靠此为生。我有肺病，不能劳动。不，我帮拉客的那几位姑娘都没有领班，谢天谢地！不然，我就得老挨揍了。不，她们都是独自单干，暗中操此生涯，你知道吗，执照什么等等都是没有的，她们不能像别人一样上街……那样做就太危险了。因此我替她们拉客。”他又叹了一口气。“你再把瓶子给我好吗？”当我伸手到下面去把酒瓶取上来时，他问：“你叫什么来着？”

“胡伯特，”我说，并把瓶子递给他。

“真不错，”他说，可我无法回答，因为瓶子还挂在我的脖子上。现在瓶子空了，我把它轻轻地滚到边上去。

“胡伯特，”他说，声音现在颤得厉害，“看！”他把我拉到前面，趴在胸墙上。“看！”要是定睛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像是地平线，一条漆黑的线，黑线上面，颜色略浅一些，在这浅黑中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灌木在窸窸窣窣地活动。这也可能是悄悄走来的人，数不清的人悄然无声地移动过来……

“放白色信号！”他用越来越弱的声音低声说。

“老弟，”我说，并把手搁在他肩上，“雅克，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的恐惧在活动，这是地狱，这是战争，这全都是乱弹琴，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那……那不是真的。”

“可我看见了，肯定是……真的……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又听到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是的，”我说，“别嚷嚷。那是真的。那都是向日葵秆，明天早晨你看到就会发笑的，等到天完全亮了，你就会看到笑起来，那是向日葵秆，也许有一公里远，看上去好像在世界尽头，是吗？我熟悉它们……干枯、灰黑、肮脏、部分被子弹打烂的向日葵秆，花盘都给俄国人吃了，由于我们害怕，感觉它们好像在移动。”

“嗨……快放白色信号……放白色信号……我可看见了！”

“我认出它们啦，雅克。”

“快放白色信号。一发子弹……”

“啊，雅克，”我小声地回答道，“若真是他们来了，我

们会听见的。你听一听？”我们屏息静听。大地上变得十分宁静，除了那可怕的悄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

“不，”他低声说，从他声音中听得出，他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不，我听见他们……他们来了……他们在潜行……他们在地上匍匐行进……有一些轻微的叮当声……他们悄悄地来了，等他们靠近可就晚了……”

“雅克，”我说，“我不能放白色信号。我只有两发子弹，明白吗？明天清晨，一大早，俯冲轰炸机会来，我需要一发子弹，让它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别把我们炸成肉酱。另一发要等情况确实危急时才使用。明天早晨你会笑的……”

“明天早晨，”他冷冷地说，“明天早晨我就死了。”现在我猛然向他转过身去，我是那么吃惊。他的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

“雅克，”我说，“你疯了。”

他一声不吭，我们又把身子往后靠去。我真想看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就在眼前。从前我总是仅仅听到他们低声细语，在欧洲所有城市的角落里和火车站前，每次我总是心里突然产生剧烈恐惧而离去。

“雅克……”我刚想说。

“快放白色信号，”他只是悄悄地说，像个疯子。

“雅克，”我说，“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你以后会骂我的。我们还有四小时，知道吗？会有情况的，这我知道。今天是二十一日，他们那边有酒喝，现在他们在开饭，已领到酒了，明白吗，半小时后他们就会大吵大嚷，乱唱乱放枪；也许真会有什么情况；明天早晨俯冲轰炸机来时，你会吓出一身汗，他们炸弹投得很近，我就得放白色信号，否则我们就会被炸得

稀巴烂。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以后你会骂我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情况；相信我吧，最好再给我谈点什么。你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拉客？”

他长叹一声。“科隆，”他说。

“总站的前面，是吗？”

“不是，”他困倦地说下去，“不总是。有时在南站。是的，那里要方便一些，因为姑娘们住的地方离那儿近。莉莉住在歌剧院附近，克特和戈特利泽住在巴巴罗萨广场旁边。你知道，”他的声音现在含糊不清，好像他快要睡着一样，“有时我在总站前抓到一个，半路上又跑了，这种事真叫人恼火；有时他们在半路上害怕起来，或者由于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于是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跑掉了。总站离得也太远，因此最后我经常在南站前面等，因为有许多当兵的在那儿下车，他们以为那儿就是科隆——我的意思是总站。从南站起只有一小段路，不会有人轻易跑掉。开始，”他又向我弯下腰来，“开始我总是找戈特利泽，她住的楼里有一家咖啡馆，后来那幢房子烧毁了。戈特利泽，你知道，她最可爱。她给我最多，不过我并非因为这点而首先去找她的，真的不是，你要相信我，确实不是。啊，你不信，可我确实不是因为她给得最多才找她的，你信吗？”他的语气现在如此急切，使我不得不点头称是。

“不过戈特利泽常常没有空，真可笑，是吗？她经常没有空。她有不少老主顾，有时等不及了，她也自己上街去。每逢戈特利泽没有空，我就很伤心，于是我就先到莉莉那儿去。莉莉也不坏，不过她爱喝酒，而贪杯的女人是可怕的，难以捉摸，有时粗暴，有时和气，不过莉莉比起克特来总还好一些。克特这人冷漠无情，我告诉你。她只给百分之十就完事。百分之十！

我在寒冷的夜晚常常跑半个小时，在车站前站几个小时，或者要一杯蹩脚啤酒，蹲在小酒馆里，冒着被警察抓走的危险，却只分到百分之十！真够呛，我告诉你！因此，总是最后才轮到克特。第二天，当我送去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她就把钱给我。有时只有五十芬尼，有一次甚至只有一个十芬尼硬币，明白吗，十芬尼！”

“十芬尼？”我吃惊地问。

“是的，”他说，“她也只得到一个马克。这家伙身上就是这么点钱！”

“是军人吗？”

“不是，是个平民，是个老头子。为此她把我臭骂了一顿。啊，戈特利泽就不这样。她总是给我很多。总是起码两个马克。即使她分文未得。再说……”

“雅克，”我问，“有时她分文未得？”

“是的，她有时分文未得。相反，我相信，她为此还向那些当兵的送了香烟、黄油面包或是别的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

“是的。就是为了这个。她很慷慨。一个非常忧伤的姑娘，我告诉你。她也有点关心我。我住得怎么样啦，有没有烟抽啦，等等，你知道。她很漂亮，实在是最漂亮的。”

我想问问她的长相，可这时有个俄国人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嚷起来。像是一声嚎叫直升向云霄，把其他的声音都凝聚在一起了，这时也响起了第一枪。我刚好还来得及抓住雅克的大衣衣边，他差一点跳出去，撞上俄国人。像这样跑的人全都会落到俄国人手中。我把这个浑身颤抖的人拉回来紧挨着我。“别紧张，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只是有点喝醉了，于是就大叫大嚷。

朝工事上空胡乱开枪。你得弯下腰来，正是这些流弹有时会伤人……”

现在我们听到一阵娘儿们腔的声音。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在叫骂一些非常下流的话。他们的刺耳笑声把黑夜撕成了碎片。

“镇静，”我对这个坐立不安、长吁短叹的年轻人说，“时间不会长的，几分钟，政委一发现就会掴他们耳刮子。他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凡是他们不允许做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制止，跟我们完全一样……”

可是，喊叫声和杂乱无章的枪声还在继续，偏偏这时我们后面也有人开枪了。我使劲拉住想推开我逃跑的年轻人。我听到前面的喊声，然后是吼叫声……又是喊声……枪声，又是那个喝醉酒的女人的可怕声音。之后，万籁俱寂，静得可怕……

“你看，”我说。

“现在……现在他们来了……”

“不……仔细听！”

我们又仔细听，只有叫人不寒而栗的寂静，什么也听不见。

“要冷静些，”我继续说，因为我想至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看到枪口喷出的火焰没有？离这儿最少有二百米，要是他们来了，你会听见的，你一定会听见的，我告诉你。”

现在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他一言不发地怔怔地蹲在我旁边。

“她长得怎么样，那个戈特利泽？”我问。

他不太乐意地回答了我。“漂亮，”他简短地说，“黑头发，眼睛又大又亮，个子不高，很矮，你知道。”他突然又变得

健谈起来：“……有点儿疯疯癫癫。正是这样。她每天换一个名字。英格、西蒙妮、卡塔莱妮，简直没完没了，几乎每天换一个……或是苏塞玛丽。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经常分文不取。”

我使劲抓住他的手臂。“雅克，”我说，“现在我要放白色信号了。我相信我听到了什么。”

他的呼吸停住了。“对，”他低声说，“放白色信号，我听到他们了，不然我就要疯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抓起已装上子弹的照明枪，高高举在头上按动扳机；一声呼啸，如同预告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光线犹如一种柔和的银白色液体扩散开来，好像闪闪发光的圣诞夜雨，这时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他的脸了，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发白色信号，只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原先发出那种嚎叫、一个喝醉了的女人的尖叫声的地方，如今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悄然无声的人影，他们在亮光中迅速趴到地上，接着猛地向前冲来，口中高呼“乌拉”。我也来不及放红色信号了；在我们周围，战神肆虐，大地迸裂，把我们埋没……我不得不把雅克从洞里拽出来。当我费劲地把他拉上来以后，我吓得惊叫一声，向他低下身去，以便至少在临终时还能看一看他的脸，而他只是轻轻地低声细语：“您想要幸福吗，先生……”这时，一只粗野的手突然粗暴地把我从他身上推开了。

但我眼睛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血，比夜还黑，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妓女的脸，这个妓女对客人分文不取，而且还倒贴……

关　系

我妻子认识了一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的母亲。是脚趾甲。我们家现在沸沸扬扬，乱成一团：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今我们可有了关系，了不起的关系。我妻子向这个姑娘的母亲赠送鲜花和糖果。她尽管冷淡，但却是感谢地接受了鲜花和糖果。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后，我们冥思苦想，等到我们认识这个姑娘本人时应当为我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她；她很少待在家里，当然只同政府官员交往。她在波恩有一套漂亮的住宅：两间住房，外带厨房、浴室、阳台。但不管怎么说，据说不久就能见到她。我的心情迫不及待，急于同她见面，当然要恰如其分地低声下气，同时也要表现出坚忍性。我相信，政府界人士是很赞赏低声下气的坚忍性的，据说只有深信自己能力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我竭力深信自己的能力，并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耐心等待！

我们和政府界人士有关系一事传开以后，一时我们的身价便提高了。前不久，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对另一个女人说："B先生来了，他同A有关系。"她的声音很轻，但却故意让我能听见；我走过这两位太太身边时，她们发出甜蜜的微笑。我以屈尊的态度点点头。过去我们的杂货铺老板只是勉强同意赊

帐，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情，看着人造黄油、大众面包和烟叶消失在我妻子的购物袋里。如今我们一去，他就满面春风，向我们推荐我们早已不知其味的美味食品：黄油、奶酪和咖啡。他会说：“啊，您不来点这种上等柴郡干酪？”要是我的妻子拿不定主意，他就会说：“您就尽管要吧。”——说罢垂下眼帘偷偷一笑。于是我妻子就要了。可是，昨天我妻子听到他对另一个女人耳语：“B家同A是亲戚。”事情传得真叫离奇。不管怎样，我们吃上面包抹黄油加干酪——不再是大众面包——喝上优质咖啡了。与此同时，我们有点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出现。是脚趾甲。姑娘还未露面，妻子心神不定，虽然姑娘的母亲安慰她说：“别着急。”看来她现在已对我妻子产生好感。可我们急不可待，因为我们对近来所默许的赊欠已充分加以利用了。

由这位年轻小姐负责修剪脚趾甲的女儿是部长的掌上明珠。她正在攻读艺术史，据说天资聪颖。我相信。我什么都相信，可我仍提心吊胆，因为波恩的这位年轻修脚工一直还未露面。我们查阅百科词典和手头所有的生物教科书，了解脚趾甲的自然生长情况，发现它长得很慢，由此看来，不可能仅仅是这位部长女儿；很有可能，年轻的修脚工把波恩上流社会的脚趾一个接着一个捏在她可爱的手中，消除坏死细胞可能损害尼龙丝袜和部长短袜的麻烦。

但愿她别剪坏了。我十分担心她有可能把部长千金弄痛。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极其敏感的(我曾追求过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女人，我向她跪下，胳膊肘不小心顶在她的脚趾上，对其敏感程度一无所知；一切就全完了，从此我就知道了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是多么敏感)。听说这位年轻小姐很谨慎，

部长女儿对部长的影响和修脚工对这位千金(人们怀疑她在社会公益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影响非常之大——修脚工的母亲拐弯抹角地(一切都是拐弯抹角地)说，她的女儿曾给她认识的一个年轻男人搞到一个位置，给某一位政府部门的科长当文书。科长这个词提示了我。这挺合适。

在此期间，年轻小姐的母亲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接受鲜花和糖果。我们心甘情愿，把这些礼品敬献给社会名流，同时又提心吊胆，因为我们欠的帐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A的私生子。

我们已从黄油和奶酪转向酥皮馅饼和鹅肝肠；我们不再自己动手卷香烟，只抽买来的烟。这时，我们接到通知：波恩的年轻小姐来了！她真的来了！她是乘一位国务秘书的汽车来的，据说她曾给这位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

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1]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

① 洛可可是欧洲18世纪盛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以浮华纤巧华丽为特色。

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有一会儿工夫，我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示意我出去的手势，直到妻子推了我一下，并悄悄地对我说："笨蛋——快去！"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去。在充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我同年轻小姐交谈业务。她在客厅里接见我，叹了叹气，看了一看手表，于是我也就明白，那八分钟已早就开始了——大概已过去一半。为了小心起见，我以"对不起"开始，讲得有点语无伦次，尽管如此，她仍面露笑容，接过我的三磅纸币①，最后说："请不要过高估计我的影响——我只是试试看，因为我深信您的能力。大约三个月后给您回音。"她看了一看手表，这表示我得走了。我脑际闪过要吻她一下手的想法，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极其恭顺地轻声表达了感激之情，就踉踉跄跄走出来。三个月。还有，她长得很漂亮。

我回到咖啡间，看见那三个对我的糖果盒儿乎不屑一顾的年轻混蛋的脸上流露出妒忌的神色。一会儿，屋外响起急促的嘟嘟声，年轻小姐的母亲向我们宣告，波恩来电话召她女儿去为部长除掉老茧。他的高尔夫球赛在九点开始，现在已是五点

① 当时正值货币贬值时间，钞票以重量约数。

钟，而带着老茧是打不好球的。我们向街上瞥了一眼，想看看部长的汽车：车子很牢固，但并不过分华丽。年轻小姐拎着一个漂亮的小箱子和一个公文包离开了屋子。咖啡聚会散了。

回到家里，仔细观察了全过程的妻子告诉我，我是唯一同“她”单独在一起的人。至于“她”这个人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讨人喜欢，亲爱的，真讨人喜欢。”

我没有告诉妻子要等待三个月时间，并同她商量如何继续对“她”献殷勤。我想送给“她”三个月的工资，妻子认为这太俗气了，表示反对。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寄给她一辆轻便摩托车，却不写寄件人的姓名，但要让她知道是谁寄的。她本人如能摩托化，带着她那漂亮的小盒，从一家骑到另一家去，这对她是很实惠的。她要是能治好部长的脚病（此人似乎有严重的扁平足），我那难熬的三个月等待时间也许就会缩短了。我可等不了三个月，我们不可能赊欠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我将用期票去购买的轻便摩托车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一个月后我就能坐上红皮沙发。目前我们俩——我妻子和我——完全垮了，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没有十八芬尼的香烟，现在这对我们的神经倒很合适……

卖 笑 人

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

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子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附　　录·

伯尔谈写作

我们的幻想也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实际才能，我们具备这种才能，就能从事实中辨认出真实来。幻想并非胡思乱想，并非幻象——幻想，这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自己想象的能力，例如，把隔壁那幢被炸毁的房子里受风吹雨淋已有九年之久的浴缸，同我们在翻阅地图册时漫不经心地触摸到的显得很荒凉的绿色平面结合起来。

真实永远不会送到我们手中，真实需要我们主动而非被动的注意。我们得到的是密码、数字，是一种暗码——没有什么通向真实的万能钥匙，书本、事实永远只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真实的一部分或通向真实的钥匙，它们打开真实，犹如人们打开建筑物的门，让来人进去环视一番。人们得走进尚不熟悉的屋子去环视一番。真实的东西总是比现实的东西远一些：你要射中一只飞鸟，就得向它的前方射击，因此就得了解飞鸟的速度，了解枪弹的速度，此外还有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风和气压，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如果计算有误，鸟儿就会飞走，飞到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真实也在运动……

从现实的东西中认出真实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开动我们

的想象力，这是一种使我们能制造形象的力量。现实是通向真实的钥匙。

那些把现实当作真实的人，常常很难认出真实。一个远离现实的人，任何一个近视和心不在焉的人，都可以成为漫画中的教授——他可能比那个伸出舌头紧追现实并把它当作真实的人离真实更近。谁想要射中飞鸟，就得冷静地瞄准，他必须沉着地坐在那个把过去和未来分开的秒针上，勇敢地向真实的空间开枪，使鸟儿飞进弹道，真实落到他手中……

当代人好比一名旅客，他从家乡的车站登上一列火车，在茫茫黑夜中驶向目的地，不知道距离多远；这位旅客在黑暗中常常从半睡半醒状态中惊醒，从一个陌生车站的扩音器中听到播音员的声音告诉他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他听到的名字是他所不熟悉的，他觉得是不真实的，这些名字来自一个仿佛并不存在的陌生世界。这是一个幻想的过程，但绝对真实。真实是幻想的，但是人们必须知道，我们人类的幻想总是在真实之中运动的。

——《当代人与真实》(1953)

在我看来，作家完全可以比作一名抢劫银行的强盗，他辛辛苦苦地策划一次破门盗窃，夜里在极其孤独的情况下砸开保险柜，不知道自己将会找到多少钱财、多少珠宝；他冒坐牢二十年、被流放的危险，而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收获。作家和诗人，我这样认为，每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就会拿自己从前所创作的一切去冒险；也就是冒这种风险：发现保险柜空空如也，被抓住，失去从前所有的盗窃所得。当然作者是一个人，有自己的风格，有使他不同于所有其他人的水印：他的印章。但是，

一旦别人，他的读者、他的评论者给了他这一印记，真正的考验就开始了，因为这时候写作就不再意味着“别无选择”，而是可能成为纯粹的例行公事，当然是带有个人印记的例行公事。正如对于有水平的银行劫匪、有成就的拳击手来说，任何一次新的盗窃、任何一次新的比赛都会比前面的那一次更艰苦更危险一样——因为清白已经失去，而代之以蓄意——对作家来说一定也是如此，而且我可以肯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如此，尽管盖有同业公会印章的满师考试合格证书挂在他们的书房里。对一名艺术家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只是不存在这一种可能性：歇工。他不知“下班”这个词——这是一个伟大而富有人情味的词，值得令人欣羡；除非他已“江郎才尽”，永远或是有一段时间，并决心接受这一事实；这时他就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了。当然，我是无法这样想象的；我曾在一篇书评——可惜我说不出作者的名字，因为我把它忘了——中看到这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有一点怀孕。而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有一点是艺术家，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

别无选择，这是一句漂亮话，不过我对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对从事艺术和接受艺术的人来说，艺术是享有生活和维持生活的少数可能性之一。正如生老病死这一切不可能成为例行公事一样，艺术也不能是例行公事。当然有人像例行公事一样生活，只不过他们已不再活着了。有些艺术家，有些能工巧匠成了纯粹例行公事的老手，但他们——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承认这一点——已不是艺术家了。一个人不再是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创作了什么拙劣的作品，而是在他开始害怕一切风险的那一刹那。

——《写作的风险》(1956)

作家如果屈从权势，甚至趋炎附势，那就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的行为比盗窃和杀人更恶劣。对于盗窃和杀人都有明文规定，法律向一个已判刑的罪犯表示愿意和解：帐已算清，尽管算得不像做算术题那样正好轧平。可是，如果一个作家背叛，就是背叛所有说他的语言的人，而且还不犯法，因为他仅仅服从不成文法；至于他的艺术和他的良心，这些法律都是不成文法；他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拿出他此刻所能拿出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给，也就是保持沉默。

——《语言是自由的堡垒》(1958)

幽默——这使它可能在那些不具有幽默的人眼里变得十分可疑——需要一定的最低的乐观主义，同时也需要悲哀：由于humores这个词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液汁的意思，包括各种体液即胆汁、泪液、唾液，还有尿，因此它和物质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同时使这具有人的品质。哭和笑都是现代人的特征。在我看来，幽默只有一种人道的可能性：指出被社会宣布为废物，被当作废物的人的伟大……迷迷糊糊的、在美学和道德上颠三倒四的社会，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受到愚弄，而是使我们成为傻瓜，我说它缺少伟大，因此作者只有选取被社会宣布为废物或当作废物的人作幽默的重大对象……这种人不属于这个伟大的社会。不合群是高尚的，一个人要有幽默感才会觉得它高尚。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们的社会有许多废物。人也是如此；从社会以及法律的意义上来讲都是废物。其原因在于他们

不遵循时尚所规定的陈规俗套。一个人如果不老是赶时髦，在家具、衣着、生活习惯等所有方面，那末他很快就会成为废物。这样，我们的——但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自然不断地制造无价值的生存，人们把他们视为废物，我认为他们是文学和整个艺术最重要的对象。因为现在从反面来说，不是废物的人就是不再活着的人。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每当有人问我是怎么或为什么写这个或那个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狼狈。我不仅愿给提问者，而且也愿给我自己一个详尽的说明，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做不到。我无法重新弄清其来龙去脉，却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以便至少使我自己搞的文学成为一件比造桥和烤小面包更不神秘的事情。由于文学确实在其总体体现中，在被传播和被塑造的东西中可以有一种解放的作用，因此如能说明这种体现如何产生，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事，那是非常有益的。我虽然可以证明，但却不能加以说明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我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亲手写在纸上，多次进行修改、加工，部分改换重点，但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大却对我变得陌生，就像已经过去或消逝的、离我越来越远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作为已定型的报告却可能变得重要起来。从理论上讲，完全重现事情的过程应当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平行记录，是在工作过程中完成的，如果它包罗万象，或许就会像工作本身一样增加好几倍篇幅。这不仅要符合智力和精神的尺度，而且也要符合感性和物质的尺度，营养、情绪、新陈代谢、心情也要交代清楚，周围环境的功能不仅在其体现中作为周围环境，而且也作为背景。例如我有时几乎完全漫不经心地瞧着伴

育报道，为的是在这种漫不经心的情况下练习思考，我承认这是一种相当神秘的练习，但所有这些报道也都必须记录下来，不加删节，因为踢一脚球或一次跳跃有可能在我的漫不经心的沉思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许是一个手势、一次微笑、记者的一句话、一个广告。每一个电话、天气、通信、每一支香烟也都要记录下来，一辆驶过的汽车，一个气锤、一只公鸡的啼鸣，这都会妨害连贯。

——《试论诗艺的理性》(1973)

艺术所需要的仅仅是材料——它并不需要自由，它就是自由；一个人可以剥夺艺术表现自己的自由，但没有人能给予它自由；任何国家、城市、社会都不能自以为给予或已给予它生而就有的自由。给予的自由对它来说不是自由，只有它所具有或自己取得的自由才是自由。如果它越雷池一步——不管是谁这样看——如果走得太远，它就会发现：人们会向它开火。不过事先谁也没有告诉它，它可以走多远；这就是说，它必须走得太远，才能弄清它可以走多远，留给它的自由余地有多大……

文学在困难地下定决心的情况下步履维艰地一直在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做的事情就是：冲破禁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懂得爱”，而是因为它在寻求爱，一再徒劳地寻求爱。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或教会懂得爱。国家和教会只能容忍两种可能性：婚姻或卖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范围之外的爱都被它们看成是可疑的（顺便提一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爱情中有一些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东西：它是自由的、井然有序的、无法得到安慰的，也就是诗——而诗就是摧毁这个世

界所有秩序的炸药)……

这个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文学从来就不会安静下来，因为它从来不承认有功能甚或功能化的自由是一种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所谓性自由都是如此；文学总要越过界线，它不知安静，也不会安静下来。本着这一精神，我只能祝愿伍珀塔尔市在这座舞台上将会走得更远。

——《艺术的自由》(1966)

作者不是接受现实，他面对现实，创造现实。即使是一部相对说来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其复杂的魔力也在于，不管小说中有什么真实的东西，不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被加工、合成、变化，这都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所创造的现实在小说中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在起作用。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我不相信现实能表现自己。简而言之，这大概也是现在艺术的危机。这种把现实放进画面的做法，如同流行画家之类，我认为是一种十分正当的尝试，让现实自己表现自己：既直截了当，又简洁明了。当然有许多交接转化，在戏剧、电影中……但我不相信能长此以往，我完全肯定在文学中行不通。我相信“被创造的现实”。别人也许觉得是现实的东西，我认为是“被创造的现实”，当然由我遇到的现实的各种成分组成。这不是经过选择的现实，不是我作过调查研究或速写的；这我从来不干，我认为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倒不如说，这像是一条鲸鱼，必须通过它的大嘴过滤好多水才能得到它那一点点浮游生物。转化的现实，不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现实主义者，

毫无保留。

——《与科尔贝格的谈话》(1969)

尽管是作为个人在写作，只配备一沓纸、一盒削尖的铅笔、一架打字机，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而是受约束的人。受时代和同时代人的约束，受一代人所经历、遭遇和耳闻目睹的东西的约束，这些在自传中很少能大体上足够鲜明地用语言表达；受一代人动荡不安、无家可归的约束，这一代人突然觉得自己已被推到当祖父的年纪，一直还没有——怎么说呢——成熟起来。对这种祖父怎么办呢——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还是火葬场？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眼里看到了谋杀：你最好死掉或被杀死。在这个国度里，有太多的杀人犯逍遥法外，恬不知耻地跑来跑去，有许多人，你永远也无法证明他们杀过人。罪责、悔恨、赎罪、明智没有成为社会范畴，更没有成为政治范畴。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如今——经过二十年之后有了一定的距离——可以称为德国战后文学的东西。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这样一位诗人——这里应理解为作案人——又能干什么呢？他甚至不会把石头扔进商店橱窗或教堂窗户，而往往只会扔进水中，因为石头引起的波纹引起他的兴趣，他惊奇地看到，这样一块石头不仅造成波纹，而且违背一切物理学定律，还会激起波浪——整个平静的池塘突然骚乱起来：鸭子醒了，鱼儿甚至企图叫喊。诗人和作案人，他当然不知道，池塘只有——不过这可以在报警牌上看到，但他却忽视了——一点五米深，而且有七十五厘米即一半都是腐臭的淤泥。因此他是无辜的，

提出了缪斯曾授意他创造诗的瞬间；他并不想把池水搅浑，只不过池水是混浊的。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文学所引起的一切轰动都是极其夸大的。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有权对“命令”这个词作出判决的法庭上。作者，肇事者，也就是诗人——他不仅喜欢生活(生活是一个动词)，而且也愿使他用来写作的语言适宜于生活。一个人独处不好，他不能用他身上还留下的肋骨为自己制造家乡和邻里、友谊和信任。他也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生出他自己的民族；他必须到自己的民族中去，同他们融为一体。他不仅需要朋友、读者、公众，他需要盟友，公开的盟友，他们不仅会发怒生气或欢呼鼓舞，他们要有认识。虚荣、嫉妒、伤心、得意、生气应当是私事。应当认识更重要的事情：在一个可以生活的国度里寻求一种可以生活的语言。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道德和美学是完全一致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不管作者是多么倔强或冷静，多么温和或愤怒，以何种风格、何种视角去描写或单纯叙述人道的东西，被摧毁的邻里关系、被污染的场地使得他不可能树立信任或给予安慰；我的同龄人所能提供的唯一安慰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安慰。在把我们引向负责年龄的那个时代，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说了太多的空话，做了太少的事情。候车室、火车站、宿营地，又是火车站、候车室、宿营地、医院、排队领面包香烟和出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根据出生证很快就必须承认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感到负有责

任，他永远不会认真对待这种责任。蹒跚的、沉重的脚步。我们将在何处停留，我们之中会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所属的那个年龄段在统计上完全微不足道，它也没有真正的连贯，而是处于非常富有诗意的境地，由于这种境地不是人为选择的，而是历史赋予的，因此就更增添了它的魅力。

——《法兰克福讲演集》(1966)

我事先从来不知道情节：我是从人物和情景出发的。人物和情景都是有发展的，要么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要么是不合乎逻辑的发展，反正都是有发展的，或者不是。有些后来也就搁浅了，停止了，然后变成单纯的速写，又死了。

——《与帕埃滕的谈话》(1969)

素材并不十分重要，对我来说不十分重要。我现在不是指内容，而是指我所需要的这点材料；这有可能是很少一点点，一部长篇小说所需的材料有时少于一篇短篇小说；因为这种材料要通过塑造才显露出来，而塑造至少同素材一样使我感兴趣。我头脑中有许多素材，我开始写，后来又丢弃，部分甚至已写完，作为素材来说，它们也许至少像我已处理发表过的素材同样重要、良好、有趣、拙劣。但根据我的感觉，缺少气息，就说是生气吧，我指的不是激情，而是材料，也就是造型艺术所说的有生气的材料。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认为，表面上权威万能的叙述者其实走的是更诚实的道路，因为他写虚构的文学作品，说它是虚构的，在写作过程中

产生了新的现实，它比直接跳到纸上的东西更真实。这其实是“虚构”这个概念的危机。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也没有弄懂“虚构”和“纪实”的区别。正是纪实作品——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传统精神来看就是如此——在我看来总是非常虚构的，而我把古典文学所指的虚构看作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诚实的并且也是艺术上的现实。

——《与帕埃滕的谈话》(1969)

即使我不再写作，我也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续写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多写速记、做笔记，但这些全都夭折了，后来就会产生新东西、新念头。我相信，在这之后写作、真正的写作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说的是写作过程，而不是写作内容；然后就考虑可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停笔，这种想法我从来就不曾有过。

——《三月里的三天》(1966)

有许多东西始终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连作者本人也并不总是了解内部和外部续写的关系。只要在这一天或那一天找到表达方式，那末，决定它的有几乎数不清的事物：认识，一次谈话，一个梦，天气，马路上的喧嚣声，心情，确有把握或无把握，所看到的一张画、一部电影，街上的人，一次电话，电话铃声，咖啡，茶，读报，一件叫人高兴的事，一件叫人生气的事，等等——一个不眠之夜或不眠的小时内的想法，等等，等等。尤其是可能已写好但没有发表的东西，有时也比已发表的东西更加重要——作为创作道路、创作过程……对于作者，人们总是过多地联系最后一部作品去解释他的下一部作品。错

了。有时是一件小事，可以说是一只蝴蝶或一只蚊子。也许明天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看到一个手势，它就会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起因。

——《与鲁道夫的谈话》(1971)

我还从来没能写出过一页散文，把它打出后就完事大吉。有些日子我一天可以写三十至四十页，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和体会，我每天超不过一页。我承认也有那种情况，我不想再修改了，那是由于懒惰，确实是因为我简直已毫无兴趣可言，比较不负责任地把没有完全完成的东西交出去。并非我对第一稿或第二稿还能增补——再说我也不会口授，因此我一行也加不进去——而是必须再三重写，而且从整体上重新来；因为写作，这种写作过程，不管我用手写还是用打字机打，这个过程也属于表达，这对我来说是统一的。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从来不从心理学角度去接近我的人物，我让他们自由，我试图对他们不抱成见，而心理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始终也是一种成见。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在写作时，作品的开头往往要写四次、五次。有的作品我脑子里早就有了开头，大多是比较短的叙事作品，但我不把它叫做“开头”，而是“进入”；真正的开头有可能到了十页或二十页之后才出现，或者到了五页之后就出现，情况完全不同。

——《三月里的三天》(1975)

只是为试验而试验，随便闹着玩(这甚至有可能使我感到开心)——我觉得这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我进行一项试验，我至少必须知道，我追求什么，而且我确实在我着手的每项工作中都进行这一试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将会找到什么。好吧，这是对试验的另一种观念，但我认为它就是一种试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完美的概念，也永远不会接受这一概念，更不会同意把写作降低为单纯的手工劳动的能工巧匠概念。在手工业中一个人可以是能工巧匠，但只是在手工业中，而写作却不止于此，正因为写作是这种“不知往何处去”。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认为，作者一步也不能去迎合读者。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就一分钟也不能考虑，他的作品如何、何时、何地会受欢迎。同公众讨论他们期望从电视或广播里或从作家那里得到什么，这种事我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过程不能民主化，而且因为我更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公众——不管是有文化或无文化、好像有文化、文化程度不高——哪怕只是能大概地知道他们究竟期望什么。这对我来说带有一种半瓶醋的味道，我不能接受。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根本不关注读者。他们也丝毫不能影响我，可这是很晚才认识到的，人们——不是对长篇小说和叙事作品，而是对讲话、随笔、政论——假设得太多。要建立内在和外在的联系，我认为是办不到的。影响一个人的因素有千百种；那是智力活动；有可能是一种情绪，有可能是一个失眠之夜，你在沉思，

或者我朝街上望去，某一种手势：要重建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到表现——不仅是我列举的这些东西，也可能是一千个其他的东西：体力上的舒适、不适，同心理上的舒适、不适搀杂在一起，等等；这些表现并不总是带有恶意，但有时带有讽刺性或易被误解，充满生活乐趣，而对讽刺、嘲笑和偶然的恶意的感受能力，在德国是发育不良的，不仅在联邦德国，可以说在德国，因为文学传统还有文学论战是人们很不熟悉的。于是我就称之为：前提太多。但人们在这样做，受到这种误解——误解可能在于赞同或反对——的同时，可能就创造了对这些东西的感受能力。德国文学中讽刺挖苦太少，而这一点显然被误解了。

——**《与阿诺尔德的谈话》**(1971)

我很喜欢写作，创作给我乐趣。主题、内容、具体表达来自我这一代人的禀性，也就是我这一代人的经历，它们都是白送的，内容总是白送的，这并不等于说它是多余的——一件礼物的确是好事。但读者必须自己去赢得这件礼物——我说得有点慷慨激昂——他迫使自己，他被迫看破形式或接受形式，接受形式和内容的强求。写作首先是想要创作什么的愿望。

——**《与哈普雷希特的谈话》**(1967)

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诱惑者。他必须诱惑读者。而且也有这种意思：他想把他的素材尽可能巧妙地分散或隐藏地推销出去。这是我的想法。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一篇中篇小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隐藏处。我希望读者能找到被隐藏的东西。仅此而已。

——**《与施图布斯的谈话》**(1968)

大多数解释，还有通常的学校和大学教学，总是把作者和主要人物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有时主要人物仅仅是作者虚构或找到的，为的是让自己置身于主要人物身边的什么地方。他有可能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送一杯啤酒来的服务员，这可能就是作者。他也有可能同主人公近似。我相信，作者也在整个作品中存在，应当自始至终从整个作品着眼，着眼于它的整体发展，也着眼于他的矛盾。我不是小丑，也许我是小丑的父亲。这种首先从主人公身上去寻求作者的肤浅做法是十分愚蠢的、迟钝的，在语言上是错误的，在才智上是错误的。当然，写小说，创造一群围绕一个主要人物的人物，写冲突、情景，这一过程是不能完全有意识地进行的。剩下的直觉或自发或偶然性或幻想是无法控制的。

因此，作者提供的有关他们小说的情况，包括我在这里提供的情况，永远只是大体上正确。提供可靠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应当怎样驳斥主人公就是作者这种意见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来自资产阶级的某种文学传统和对文学的解释，因为人们假定，作者首先总是在探讨自己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作者作全面自我剖析，然后再谈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很成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并非作者、并非艺术家的人，因为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细腻感情——可能超过一位艺术家——是怎么表现的，通过何种姿态，通过何种亲爱的行为，通过什么关系得到表现的。

——《与温岑的谈话》(1975)

作者包含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可是要找到他是非常困难的。关于传记成分、自传成分，我想打一个比方：你在刮胡子

时割破了皮肤，假定你是湿刮，脸盆里放满了热水或冷水，于是有三、四滴血掉进脸盆，整盆水都变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里面带有自传成分。现在你对比一下水和血的物理量，你可以看到，血的成分是非常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会多很多。

——《与哈普雷希特的谈话》(1967)

对有些文学作品来说，无疑作者的生平是入门的钥匙，只不过我不相信人们真能把这把钥匙搞到手。对更多的文学作品来说，作者的生平是无关紧要的。作者生平中可能重要的东西——恋爱、饥饿、战争、战斗、冒险和宗教——是作者同千百万人所共有的，重要的仅仅是他们如何去写。有许许多多作者——如卡夫卡——的外部生活平平凡凡，但卡夫卡没有写出平凡的作品。因此，把作者同他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作者隐藏在他的作品中，隐藏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形象中，隐藏的方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作者个人感兴趣，其根子就在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这和文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德国广播电台的讲话》(1963)

我对设身处地的问题感到兴趣。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于同年同日生在俄国，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完全是一种假设。或者，现在我随便从什么地方，从巴伐利亚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找一个人来：这个人我只是用来作为例子，现在我说，必须脱掉他的外衣，也就是去掉他的生活环境、宗教教育、政治偏见，您明白吗？我认为一个人诞生的那个时代是

非常重要的，我也把它看作是一种地理。例如1925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时代地理概念，现在做这种设身处地的游戏，我对这很感兴趣。在这里通常会成为教士的人，在南意大利也许会成为一个恐怖主义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诸如此类。这说得十分肤浅，不过也许能说明我的意思。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设身处地的活动，才能表现和理解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时代的东西，作为试验和开端。

——《三月里的三天》(1975)

我相信，所谓干预生活，这大概和我的经历有关。当法西斯主义在这儿——据我认为，并非偶然——滚滚而来的时候，我十五岁，由于我在比较民主的传统中受到教育，无论是我的家庭，还是我出生的城市，都是比较民主的，请注意，因此我把整个纳粹时期当作是持续不断的灾祸。假如没有法西斯，我大概会成为象牙塔的居民。

——《与马太和哈姆的谈话》(1974)

文学创作不等于不真实。传说和神话不等于谎言。文学创作也不是史学的反义词，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它们从距离很远的立足点向着同一个目标接近。

——《痛苦地回顾过去》(1973)

1945年后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早期习作，有人称之为废墟文学而不屑一顾。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它名副其实：事实上，我们所写的人生活在废墟中，他们经历了战争，男人和女人都同样受到伤害，儿童也是如此。他们目光敏锐，他们在

看。他们决非生活在完全的和平之中，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状况、他们自身和周围的一切都毫无田园诗般的宁静安逸。作为写作者，我们感到同他们如此亲近，犹如一人。他们回来了，同黑市商人和黑市商人的受害者一道，同难民和所有以其他方式变得无家可归的人一道，首先当然是同一大部分处在值得注意、值得纪念的境况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道回来了。这是从一场战争中返回家园，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相信这场战争会结束。

因此，我们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和回乡时的发现：废墟。这就产生了给这种年轻的文学所起的三个流行语：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

这种名称是有道理的：打了六年仗，我们从这场战争中返回家乡，我们看到的是废墟，我们写废墟。只是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那非难的、近乎气愤的语调令人奇怪，几乎令人怀疑：虽然人们看来并不要我们对发生战争、一切成为废墟负责，但他们显而易见责怪我们曾经并且还在看到这一切。但是，我们的眼睛并没有被蒙住，我们看到这一切：好眼睛是作家的工具……

谁有眼睛能看，就请看吧！在我们的优美的母语中，“看”这个字具有超乎视觉范畴的含义：谁有眼睛能看，事物对他就变成可以透视——他理应能够洞察它们，可以设法借助语言去洞察它们，看穿它们。作家的眼睛应当是有人性的、公正不阿的：人们用不着玩捉迷藏的游戏，有玫瑰色眼镜、蓝色眼镜、黑色眼镜——它们可以把现实染上人们当时所需要的颜色。玫瑰色会得到好的报酬，它往往很讨人喜欢——受贿的可能性多的是——但黑色有时也讨人喜欢，如果恰好赶上它讨人喜欢的时候，黑色也会得到好的报酬。但我们要看到事物的本来面貌，

用有人性的眼睛，这眼睛平常既不全干也不全湿，而是湿润的——我们想提醒读者，“湿润”这个词的拉丁文叫Humor——同时没有忘记，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干或变湿，有些事情是没有理由幽默的。我们的眼睛每天看见许多东西，看见为我们烤面包的面包师，看见工厂里的少女——我们的眼睛记得公墓；我们的眼睛看见废墟：城市被摧毁，城市就是公墓，在它们的周围，我们的眼睛看见建筑物正在从平地而起，这些使我们想起舞台布景，建筑物里面无人居住，只有人被管理，作为被保险人，作为一国国民、一市市民，作为付款人或借款人而被管理——有数不清的理由可以把一个人管起来。

我们的任务是提醒人们：人生天地间，不仅仅是为了受人管束——我们这个世界所遭受的破坏，不仅仅是外表上的，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因此不能奢望在短短几年之内将它治愈。

——《关于废墟文学的表白》(1952)

我很早就写作，十七八岁就开始写。我想对“受损害”这个概念再作一些说明。我觉得这个概念并不含有贬义。常有人说，以责备的口气说：我和我这一代人(我不把格拉斯①算在内，他已是另外一代人！)所写的东西是“受损害者的文学”。甚至还以嘲笑的口吻说“受损害者文学”这个词；而我觉得这种责怪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受损害、受伤害也具有“圣徒受难”的意思。我相信，人们不仅可以按照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也可以按照非常世俗的意义谈受难。这只是用来说明“受损害”这个概念……不，我并不是由于这种受损害而拿起笔的。我写

① 格拉斯(1927～)，西德作家，著有《铁皮鼓》、《狗年月》、《猫与鼠》等。

得很多，十七岁、十八岁就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后来发生了战争，我就没有时间写作了；我当了兵，1945年以后立即又开始写作，不过已完全不同以往。战前我是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象牙塔”的居民，我想我已从那里面走出来了。

——《与科尔贝格的谈话》(1969)

从1945年到1949年，我相信，我曾在十家不同的报纸上发表过作品。我开始写作时抱着解放的感觉。我们必须重新从零开始。我们的文学终于同一直被看作是德国本质的内向性分手了。

这种演变是必要的。希特勒是一场劫难，这样说也有他是命中注定的意思。我所说的劫难、命运、痛苦，我把它们称之为向内转。我在战争时期通过考虑，通过沉思，通过醒悟，摆脱了它。

——《与朗比雷的谈话》(1973)

战后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6年，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发表，后来我也没有再拿去出版。我是在一次有奖竞赛的推动下写这部小说的，我还记得搞一份原稿和四份打字副本的打字纸和复写纸的困难。这四份副本迫使我坐到打字机前。这是我父亲的一台旧打字机，奇怪的是它比战争更经久。这部小说的篇幅相当长，约有四、五百页稿纸，我相信我没有打草稿，至今我虽然经常打字，但从来就没有学过打字，因此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改错；必须在原稿和四份副本上改正每一个打字错误，把每一处修辞改正誊写到每一张纸上，最后再把整个四、

五百页互相比较，有许多要删除，作一些补充并检查页码。我们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纸，床上、五斗柜和椅子上、书架上，哪儿都放着纸，按照第一份、第二份等副本严格分开……小说被有奖竞赛评奖委员会不加评论地退回来了，我把它放进抽屉，把它忘了。我已记不清它的人物、它的主题、它的结构、它的开头和结尾。它共有——评奖委员会除外，我希望他们确实读过它——四名女读者：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嫂子和她的女友。后两位女士后来曾告诉我，她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它，小说如此引人入胜。我对此不能说什么，因为我再也没有看过它。当时我写得很多，大多数都没有发表……

我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并且也发表了其中几篇以后，在1946—1947年冬天写了我的第三部书稿，一部中篇小说……篇名暂定为《在伦贝格与切尔诺夫策之间》，后来出版时书名改为《列车正点》。1946—1947年的冬天天气严寒，我相信这年冬天一直延续到了1947年4月或5月。我记不得写作上有什么困难，只记得在一个遭受破坏的大城市里度过这样一个冬天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对所有居民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一年，我白天不太紧张地修缮房屋——要使屋顶不漏水并永远不漏水，是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难题——同时又毫不紧张地在科隆大学上学；我几乎从来就没有去听过课，但不得不有时去露一露面，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为的是弄到大学听课证明，我的身份证上的职业名称以及食品配给证都取决于这些证明。我的妻子是中学教师。这个冬天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搞到食品和燃料……我妻子每月的收入折合成黑市上的实际价值，约合十五公斤面包或十至十五——视室外温度而异——公担煤砖。在黑市上搞到煤或

煤砖很困难，因为除此之外还要组织搬运和支付搬运费用。随着温度下降，煤价自然上涨。温度计是最可靠的交易所行情表。有三种办法可以搞到家用燃料：一是直接即亲手去偷，到运煤列车经过科隆或在科隆附近驶过的铁路线上去偷。我的道德顾虑远远低于零下二十度；我觉得这种办法——我只采用过一次——太费劲，身体也吃不消。第二种办法是向小偷买，最后第三种办法就是到科隆西边的煤矿区去向褐煤矿工购买他们的补助煤。我们——父亲、哥哥和我，即所谓家庭主持人——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需要麻烦的出行、谈判、协议。我只举这一个例子——搞煤——来勉强说明，要维持人们爱说的最低生命是多么困难。

不管怎样，我的小说到夏末才完成。我把它送到一家出版社去，我有时在这家出版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稿子立即被接受了，但出版日期推迟到1948年春天。我把这部稿子丢在脑后，又写起短篇小说来。到了1948年4月或5月，那家出版社写信给我说，它遗憾地不能保证出版。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在1948年6月前几周收到了几篇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的稿费。幸亏我们把这笔钱——当然主要是在黑市上——很快就花掉了，因为1948年6月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使尚在流通的钱——德国旧马克——变得一文不值，这时我才明白几家出版社和编辑部为什么乐意预付稿费了；它们已取得发表权，又不必用现在的硬通货来付给我稿酬。

我的书稿这时在萨尔茨堡一家新创办的出版社那里。这家出版社后来又消失了，但在这之前至少把稿子退给了我。货币改革几个月后，奥普拉登的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威出版社的

编辑保罗·夏夫写信给我，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作品，问我有没有稿子给他。我把这时已被翻得破旧不堪的那部稿子寄给他，几周以后我签订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合同，我在1946—1947年冬写的第一本书后来在1949年冬天出版了。

——《开端》(1973)

第二部长篇小说《一声不吭》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不过同今天的畅销书销售情况相比，那是一次很小的成功。我相信，我的出版商简直感到惊奇，几乎被搞糊涂了，因为在一年之内就再版了；这显然是引起轰动的。

——《与阿诺尔德的谈话》(1971)

一个国家有人居住和可以居住，如果有人能对它产生怀念的话。世界上不知什么地方有许多人有怀乡之情，但总是怀念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德国。有人也可能怀念一个城市，柏林或纽伦堡、汉堡、科隆、慕尼黑。但是，这不是在怀念一个已失去或已消逝的柏林或科隆么？怀念联邦共和国吗？也许有。这个国家是否会成为一个能使人怀念的国家？在叙事文学中，在诗歌和书报文章中，联邦共和国的形象表现得不使新闻专员和经济专员感到愉快，这既非偶然现象，也不是起破坏作用的知识分子的恶意，不管他们是不是无神论者、虚无主义者或天主教税纳税人——政治家不应悲伤，更不应抱怨。他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战后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把联邦共和国描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欢乐的国家。“积极的东西在哪里？”这个著名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愚蠢的问题——不仅提得不对，而且是看错了对象：究竟为什么没有人写有关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的

欢乐的小说？没有人被阻止去写。显然存在着障碍，其原因比肤浅的政治上受伤害所估计的要深刻得多。一个悲惨的国家，但是没有悲哀；它把自己的悲哀打发走了，推到边界东边去了，而且一直还不明白．政治性只是表面，是许许多多层次中最上面、最单薄而且也是最脆弱的一层。

伯尔谈《女士及众生相》

我早就产生了写这部作品的念头，很可能在我过去写大多数长篇和中篇小说时就已有此想法了。我试图描写或撰写一个承受了从1922年至1970年这一段历史的全部重负的年近半百的德国妇女的命运。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手段、表达方式、结构以及某种经验的扩展，就此而言，这本书如同我所写的一切——其中也有较小的东西、文章、评论等——一样也是一次续写。写作过程就是持续不断的续写。而续写的暂时结果就是以这个女人为主或为次或为中心的这部小说。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我相信，让一个女人当主角也是把男主人公从文学中稍微排挤掉的尝试，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男主人公如今都——我认为——已成为俗套了。我曾创造过许多反面的男主人公，也对此作过贡献，我试图在这个女人身上——她应当既不是正

面的也不是反面的主人公——取消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这也是一次尝试，因此您先前讲到的这一点，即身披斗篷的圣母、年高望重的妇女就可能起了作用。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我不想创造一个理想形象，而是想创造一个符合反对圣像崇拜的解决办法这一精神的完全没有图像的女主人公。我的女主人公不应当有图像——圣像和图像是同一个词——她只应当是她自己。她不是一个理想人物，而是静止的，一切都走向她，越过她，通过她。

《与科尔茨的谈话》(1971)

我试图使这个人物完全非图像化和非圣像化。我讨厌“图像”。莱尼完全没有象征意义。她是一次物质化而不是观念化的尝试。我自然理解人们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观察一个“日耳曼妇女”。莱尼可能——尽管这也会是一种“图像”——是一个反日耳曼妇女。我的意图是塑造一个五十岁的德国妇女，她在一生中承受了德国历史的重担。她应当是德国人，但不符合任何对于“德意志”的想象。

——《与克索希特的讲话》(1971)

这个女人(莱尼)很天真，我相信也是无辜的，不是从法律上或道义上，而是几乎从形而上学的意思来看是无辜的。塑造一个——应理解为打上引号——“无辜”的人，此人——我不知道是否完全出于本能，我相信在她身上有很多东西掺杂在一起，奇怪的教育形式，还有自我教育的奇怪形式——其实，她

作为年轻人开始自己的生活时，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几乎立即陷入了与社会对立的状态，而没有一种与社会对立的意识，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使我很感兴趣。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废物和社会制造废物，这对我来说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我有这种印象，人们其实把许多居民群体说成是废物，而莱尼作为无家可归者属于其中的一个群体。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这是一次尝试，在这个人物身上对"官能享受"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想法和联想作出新的解释。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官能享受同某种形式的感受能力，亦即肉体的感受能力、社会的感受能力、情爱的感受能力有关，因此她的感性生活变得十分复杂，无论是表面的感官享受如饮食衣着，还是情爱生活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角色身上给这以新的表现，这简直使我入迷。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那是某种物质主义、具体主义，但也具有精神成分，这样就使得她的官能享受、感受能力完全不落窠臼。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如同大多数情况一样，其实我也只想写一个爱情故事。我认为，如果把男女爱情或女男爱情置于一种尽可能艰难棘手的境况，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外表上亦即由于战争的外在影响而变得艰难的境况，那就会更紧张、更真实、更确切，也更符合

现实。因此，我选择了一名苏联战俘，按照纳粹的意识形态他是倒数第二等人。倒数第一等是犹太人，但我怕这又变成老一套，因为这在文学上已经多次得到表现。因此我就用劣等人苏联士兵作为莱尼的情人。

——《**与韦勒斯霍夫的谈话**》(1971)

我选择陵园花圃作为莱尼·格鲁伊滕生活和劳动的世界完全是有意识的。这个花圃起初是个宁静优美的生产场所。但是在这个田园诗一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如此奇妙地和花草打交道和扎花圈——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法西斯主义的渗入和影响。在花圈和工作场所的情绪等这种可笑的东西上可以细致入微地表现法西斯主义的可笑。当然我也对生意经、靠战争和战争死人做买卖感兴趣。陵园总被认为是宁静太平的地方，在战争中可不是这样：它们遭到轰炸。

——《**与奥托谈把〈女士及众生相〉搬上银幕**》(1976)

我相信，这本书在最广义上说具有政治性，就像任何出版物一样。从这个妇女如何生活，同谁共居，这如何形成一种公社等产生了这一点，顺便提一下，这也是一种圣像学的观念。

——《**与科尔茨的谈话**》(1971)

我这部小说需要很多人物。你从描写境况开始，突然发现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就需要这些人，而这些人物形象就是根据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事先无法计划的一种逻辑出现的；我根本无法事先计划好。等到后来完成

了，就说是一稿吧，它比现在这一稿长，于是你就可以考虑：这真是太多了，必须去掉。但在写作时这些人物会干脆出现，就像来访者走进来一样。这听起来十分浪漫，其实却是一件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

——《与阿诺尔德的谈话》(1971)

这不是对纪实文学的有意识的反动，但它是一种补充的尝试，是一种狂妄的想法，即文学性的东西在传统的意义上也是文献式的，也就是用文学可以给什么提供证据。

——《与齐默尔的谈话》(1971)

伯尔印象记

高年生

在距离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不远的莱茵河大桥东侧，耸立着一尊高大的青铜骑士像，那是德国霍亨索伦王朝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纪念像。每当我途经该地，就会想起大作家伯尔孩提时他父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在那上边，他总骑着那匹青铜劣马向西奔去，可是他早就在多恩①劈柴了。"

是的，科隆不仅拥有雄伟壮观的哥特式大教堂，而且也因为有伯尔这样蜚声国际文坛的作家而引以自豪。今天，只要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文学，就必然会提到伯尔的名字。有人称他为"国际文坛巨擘"、"当代德国文学最重要的主角"，也有人说他是"战后西德文坛上的一颗巨星……三十多年来一直在闪闪发光"。这些也许都是过誉，但伯尔对德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他在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海因里希·伯尔1917年生于科隆，上中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自从1947年首次发表作品以来，迄今已创作了大量具有深刻思想内容、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成为联邦德国最著名的作

① 荷兰一地名。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后定居该地。

家。他的作品不仅在西德广泛流传，而且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他是战后德国唯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如《女士及众生相》、《小丑之见》、《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保护网下》等已译成中文出版，他的名字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

到西德后，我自然很想跟他见面，但听说他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几年来无重要的新作问世，平时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因此未敢冒昧求见。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西德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其中也谈到伯尔作品的翻译问题。会后，与会的一位德国友人把我的报告送给了伯尔，并向他转达了我想同他见面的愿望。时隔不久，伯尔便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我的报告，他很少读过"如此精细微妙而又敏感的有关翻译问题的论述"，表示愿在来年春天或夏天接待我。

光阴荏苒，春去夏来。在此期间，我曾收到伯尔寄来的一本书。这是一个信息，表明他并未忘记他的诺言。过了数月，果然收到他的秘书的来信，邀请我和波鸿的鲁尔大学东亚系马汉茂教授于6月22日下午去他的乡间住宅见面。

6月，虽说已是夏天，但德国的天气变化无常，经常阴雨连绵，难得见到太阳。到了22日那一天，天空豁然开朗，阳光灿烂。我和马汉茂夫妇一起从波鸿出发，向科隆驶去。伯尔在科隆有一幢住宅，另外在杜伦还有一幢房子，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住在杜伦。我们在科隆略事休息，用了午餐再向杜伦进发。从科隆出发，汽车又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按照伯尔秘书寄来的草图，终于在一条僻静的马路旁找到了伯尔的住宅。这是一幢普普通通的老式农村建筑，同当地的农民住宅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按了一下门铃，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伯尔的夫人。伯尔夫人的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自幼父母双亡，在科隆的亲戚家长大，经常到伯尔家去参加青年聚会，讨论国家大事。1942年她同伯尔结婚后，四十多年来患难与共、志同道合，对伯尔的帮助很大。《女士及众生相》这部书的题名就是她同出版社一个编辑一起构思的。她还是一位有不少成果的翻译工作者，译过许多英语文学作品。

我们刚进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厅里，迎面向我们走来。我感到兴奋，也有点紧张。这一天，伯尔衣着很随便，穿一件普通衬衫和一条灯芯绒长裤、一件浅灰色毛背心，没有打领带。高高的个子，头顶有点秃，两道浓眉下面闪烁着一双深沉、明亮的大眼睛，脸上泛出和蔼热忱的微笑，不同于我们在报上和电视里见到的那种略带严峻的神态。他虽然年已六十有七，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看上去气色不错，不像有病在身的样子。

一番寒暄之后，我们被带到客厅。客厅是从房子的砖砌部分延伸出去的，两面都用木墙同院子相隔，从墙上的许多大玻璃窗可以直接看到绿茵茵的草地，几头牛正在悠然自得地吃草。客厅内几乎没有什么华丽的饰物，跟伯尔的整个风格一样，毫不讲究，一切都很随便。他到这儿来居住，一是消夏，二是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便于集中精力从事创作。

我们围着一张小圆桌坐定，殷勤的女主人马上端来了香喷喷的咖啡。伯尔夫妇的热忱直率，清除了我内心的紧张心情，使谈话一开始就显得很融洽，无拘无束。

我给伯尔夫妇带去一套国内出版的《红楼梦》英译本。谈话便从这里开始。我说，我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合作，将这部伟大

的作品译成德文介绍给德国人民。“我不懂中文，”伯尔不无遗憾地说，“从其他文字转译，会使原作精神受到不少损失。”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他说：“最近还不错。三年前格拉斯①去中国访问时，我也受到邀请，但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没有能去中国。我的饮食很严格、很复杂，不能作长途旅行。我恐怕不能到中国去了，这使我感到伤心。但我的夫人可以去。”他得过肝炎，又有糖尿病，有几年之久中断写作。他希望，到他七十岁的时候，身体情况稳定下来，也许可以到中国访问。

接着他详细询问了到中国去乘飞机要多长时间，经过什么地方。他说他到苏联去过十次，很想去中国，但担心在飞机上时间太久身体吃不消。“可我对中医是信得过的，”他微笑着说。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对我国怀着真诚的友好感情。

我说：“你到爱尔兰去了一趟，回来后写了一本《爱尔兰日记》，很受读者欢迎。中国对你来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你访问中国后也可以写出一本《中国日记》来。”

当马汉茂教授谈到中国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实行对西方开放的政策时，伯尔插言道：“我们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那是1948年，但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嘛。”谈到中国大陆也出版台湾作家的作品时，他频频点头：“这很好嘛。”

我们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翻译他的作品，台湾的译本往往从商业效果考虑，不太注重译文质量。对此，伯尔强调说：“考虑商业效果是很成问题的。苏联文学有的作品不错，并非只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才算优秀作品。二十多年前，我把索尔仁尼琴的手稿带出苏联，推荐给德国出版社。现在每当

① 西德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铁皮鼓》、《狗年月》、《鲽鱼》等。

我有什么稿子，人们总问是不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然的话，尽管是很好的作品，也不肯出版。这种现象简直太糟了。”“有一位南美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出版社只肯出七百本，完全从商业角度考虑。看来有些小出版社倒要比大出版社好一些……”

在谈话过程中，伯尔表示关心他的作品能否被中国读者理解。不久前他曾同一些青年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纳粹时期，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起来反抗法西斯统治？他认为，应当了解当时的情况。他说：“你们想想看，当时，不要说什么扔炸弹，你只要送给苏联战俘一支香烟，就有可能丢脑袋。当然，我们也收到过一些反抗传单。”这一番话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女士及众生相》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莱尼给苏联战俘波利斯送咖啡这一情节。

在科隆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家庭中的讨论，父母和师长的影响，使伯尔对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起就持反对态度。他是全校没有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寥寥无几的学生之一。他的早期作品，通过战争和士兵生活的描写，揭露和批判了法西斯的罪行。从50年代起，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把批判的锋芒转向政治权势集团和教会，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沉疴恶疾，为普通劳动人民大声疾呼。他的小说、政论和讲话，无不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锋芒，常常在政界和文坛掀起轩然大波。由于他秉公直言、指陈时弊，痛下针砭，有人说他是“道德主义者”，也有人攻击他是“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暴力的鼓吹者”。1972年6月，就在我们对他进行访问的地方，竟然发生了警方出动大批人马包围和搜查伯尔住宅的惊人事件。《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出版后，不少人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同情恐怖分子。连他的家属也受到株连，一个儿子被指名攻击为恐怖分子，

一个儿子的住宅被警察搜查。攻击他的人当中包括当时的总统卡斯滕斯、现任州长福格尔等政界显要。

1979年，伯尔发表了长篇小说《保护网下》。《保护网下》在主题上是同《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一脉相承的。西德一度曾是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的国家。人们谈虎色变，草木皆兵。伯尔的作品所批判的正是导致暴力产生的这样一个压抑人性的社会，但这个主题很容易受到误解。因此，他关切地问，像《保护网下》这一类作品在中国是否会被理解。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颔首微笑："我想这个主题中国不会不理解。《卡塔琳娜·勃鲁姆》也是如此。但世界上最不能理解这些作品的地方却是俄国。"

这时，马汉茂夫人说："小说倒是会被理解，但背景不易理解。"

"会不会被误解为刑事盗窃？在我们这里，抢劫银行可以理解，但如果抢银行是为了搞革命，那人们就会觉得太过分了，"伯尔说。

伯尔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明朗而坚决。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和事关重大，他就会毫不含糊地攻击这个国家。他曾发表过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演说，当时没有一家报纸予以刊登。如此明朗的政治态度，如此猛烈的抨击，如此单刀直入的论战，是他的任何作品中未曾有过的。这一点同他的家庭教育、特别是母亲对他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他所塑造的一系列杰出的女性形象身上，如莱尼、卡塔琳娜，都有他母亲的影子。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伯尔笔下的妇女形象要比男主人公生动感人。我问起这一点，他也承认。我接着问，他最喜爱哪一个妇女形象？例如，

《列车正点》中的奥琳娜、《亚当，你当时在哪里？》中的伊洛娜、《一声不吭》中的凯特、《九点半钟的台球》中的埃迪特、《小丑之见》中的玛丽、《女士及众生相》中的莱尼、《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中的卡塔琳娜，他答道：“都喜欢。”

我问：“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否以真人作模特儿？”他作了否定的回答。问到作品的主人公是否就是作家本人或者是否与作家本人近似的问题时，他也同样加以否定。我记得他在一次谈话中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作品主人公并不一定代表作家本人的看法。他写了《小丑之见》，但他并不是小丑，代表他见解的也许是小丑的父亲，也许只是一名侍者。

在伯尔的作品里，情节的描述同富有哲理性的议论紧密交织着。一些人物的大段议论，有时会使情节进展的节奏显得多少有点缓慢，但它们是故事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们充满冷峻的哲理与悲愤的讥刺，是理解作品主旨的钥匙。这在《小丑之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伯尔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本人也是天主教徒，但他强烈反对已经堕落为统治阶级驯服工具与帮凶的教会。1976年初，他同妻子一起公开宣布退出天主教教会；在这以前，他就一直拒付宗教税。对此，财务局冻结了他的全部存款，给他带来巨大的困难。今天，他同教会已不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声称他仍是天主教徒。这一点也在伯尔的创作中得到反映。近年来，他的作品的宗教色彩逐渐淡薄，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对社会的批评更加尖锐。《保护网下》的主人公托尔姆一夜之间由大资产阶级的一员成了叛逆者，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当然，伯尔不是马列主义者，并不信仰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作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对光明未来的执著追求，通过他的传神

之笔，鼓舞了千百万读者，从而使他成为最孚国际声望的当代西德作家。

当我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伯尔不假思索地说："我要继续写作。"他谈到目前正在写一篇有关自己在战争结束时的经历的文章，这是一家出版社约的稿子，有许多国家的作家参加这个活动，准备共同出一个集子。他原来打算写一个短篇，动笔后突然感到有许多细节要写，现在已经写了三十多页，当然还需要删减。

至于有什么较大的计划，他直率地说："这一点连我妻子还不知道呢。"作家们在构思新作品时一般都是不愿把自己的计划过早地透露出去的，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我还不死心，接着又问："你对哪些题材感兴趣呢？"

"我感兴趣的是联邦共和国突然爆发的腐败现象，但这恐怕不是写长篇小说的材料。"他答道。

最后我们谈到明年夏天将有十五名中国作家应邀访问联邦德国的问题。马汉茂教授是此项工作的主持人。他希望伯尔也能参加部分接待工作，伯尔欣然允诺。

时光飞逝，已是日暮时分。我看了看手表，谈话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这大大超过了我们原先的估计。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请伯尔为中国读者题词留念，他欣然命笔，在我带去的《小丑之见》中译本扉页上写道：

从联邦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读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海因里希·伯尔

1984年6月22日

伯尔夫妇把我们一直送到门外，在栅栏门前又同我们谈了一会儿，并一起摄影留念。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同殷勤热忱的主人道别。汽车离开杜伦，穿过风景宜人的绿色原野，但我已无心欣赏窗外的优美景色了。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通过三个小时的交谈，伯尔的淳朴、浑厚、热忱、亲切和友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韶光流逝，又是几个月过去了。今年12月21日是伯尔的六十八岁寿辰。遥祝他健康长寿，早日实现访华的愿望！祝愿他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做出新的贡献！

1984年10月1日于北京

授奖词

瑞典学院
常务秘书 **卡尔·拉格纳·吉罗**

国王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谁若想为海因里希·伯尔的丰富多样的作品找出一个共同的公式，结果就会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二十三年前即已开始文学的事业，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中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顶峰。他的作品包含了一个不断重现的双重主题，可以说明这样一个综合的概念，即，无家可归者和人道美学。但伯尔的无家可归者并非悲惨的个人命运，并非游离于社会的安全避风港之外的个人破船。他讲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社会，一个脱出常轨、误入歧途的时代，它在所有街角上都伸出手来乞求布施，乞求那种意味着休戚相关和人类群聚的布施。这种情况就是伯尔的“人道美学”的基础。

他描写每个人的需求，描写大大小小的事情，它们同属于一个具有人类尊严的人：“居住、邻居与家乡，金钱与爱情，宗教与饮食”，为他自己的列举服务。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美学，充满了讽刺、尽情的滑稽模仿乃至深沉的痛苦，这也就是他的文学纲领。谁想描绘生活的疾苦，就得留在人世间。

可是，他有一次却表示：“我需要的现实不多。”别人都把他看成现实主义作家，他自己或许也这么认为，有谁想到这句值得重视的话竟出自他的笔下？其实，他所需不多的现实是19世纪古典小说的现实，是那种按照过分精细的细节描摹、忠实反映的现实。伯尔运用这一方法极为熟练，但他每次使用时却跟讽刺有关。多余的细节是数不胜数的，诙谐会成为一种比耐性的较量，有时对那些不怎么有耐性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正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的记录技巧表现的诙谐说明，伯尔需要这样的现实确实甚少。他的能力，用寥寥几笔、有时只是大致的轮廓就能生动地勾勒出他的环境及其形象的能力，正是他的匠心独具之处。

然而，另有一种现实却是伯尔的创作始终需要的：那种衬托他的一生的背景，他这一代人必须呼吸的空气，他们必须接受的遗产。这种现实是他的全部创作的不断重现的、细致观察的素材，从一开始直到刚才提及的杰作《女士及众生相》，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迄今全部作品的顶峰。在1953、1954和1955年，伯尔接连出版了三部小说，即《一声不吭》、《无主之家》和《早年的面包》，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尽管作者很可能并无此意，我们却可以用这三个书名勾画出当时的现实，那种他一直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地描绘的现实。其背景——是德国的饥馑岁月，是早年的面包，从来不够吃的常常缺少的面包，要想活下去就不得不设法讨来或偷来的面包——以及这样一种食物留在了记忆之中。他和他的同龄人不得不接管的财产是一幢无人照管的房屋，是一种在废墟中消磨光阴、前途渺茫的生活。他与同辈人被迫在脖子上箍着暴政的铁爪呼吸生活的空气，谁也不吭一声，因为这种卡脖子的铁爪窒息了任何声音。

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之后，新一代诗人、思想家、学者如此迅速地挺身而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肩起他们自身的重要使命，肩起他们的国家的任务，这绝不是什么德国的奇迹。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为德国文学的复兴提供了明证，他本人以卓越的表现亲身参加了这场革新，而这决不是什么形式上的实验：快要被淹死的人决不会去表演花样游泳。这是为避免灭顶之灾而进行的革新，为了重新唤醒的生活，为了一颗精神种子，一颗遭寒霜侵袭，已被宣判死亡，却又重新发芽、生长和结果，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的精神种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年认为，他的奖金正是应该用来奖励这种精神的。

（裕康　译）

受奖演说

海因里希·伯尔

国王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瑞典国王陛下在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曾博学地回顾了我们生于斯、住于斯的那块土地转瞬即逝的各个方面。这块土地并非处女地，更不是清白无辜的，它从来就没有安宁过。这个为充满渴望的人们所居住、令人梦寐以求的莱茵河畔的国度有过许多统治者，见过同样多的战争：殖民战争，民族战争，区域战争，地方战争，宗教战争，世界大战。它见过大屠杀，见过驱逐，总是有被驱逐者从其他地方来到此地，也有人被驱逐到其他地方。这里的人说德语，乃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对内或对外显示。这样做的是其他的人，他们不满足于软绵绵的d，他们渴望一个硬邦邦的t。特意志人①。

从以往转瞬即逝的各个方面进入转瞬即逝的现代的道路上有暴力、破坏、痛苦和误解。碎片、碎石和瓦砾，向东和向西的位移，都没有产生经过这么多的、太多太多的历史之后所应期待的东西：镇静；也许是因为别人从来没有让我们这样过；有的人认为我们过于西化，有的人认为我们不够西化；有的人认

① “德意志”在古代称“特意志”。

为我们过于世俗化，有的人认为我们不够世俗化。在那些显示自己的特意志人中一直还存在着怀凝，好像西与德意志这一组合①只是这个已成为不神圣的民族的一种假象。但是，有一点应当是肯定无疑的：如果这个国家曾经有过像一颗心脏那样的东西的话，它就在莱茵河流过的地方。通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小时候我在学校里也听到过“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体育格言；同时我也在学校和教堂里听到，爱好和平的人、温和的人，亦即不使用暴力的人，将会占有希望之乡②。一个人大概至死也摆脱不了这一巨大矛盾：有些人被许诺在天上和地上得到幸福，另外一些人只被许诺在天上得到幸福，而这是在一块就连教会也渴望权力、取得权力并行使权为直至今日的地方。

对我来说，通向这里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如同千百万人一样，我从战场上归来，除了插在口袋中的双手以外没有多少其他东西，区别于其他人的只是有一股渴望写作的激情。写作把我带到这里来。请允许我不把我站在这里的事实完全信以为真，如果我回顾那个经过长期驱逐和漂泊后回到一个被驱逐的家乡的年轻人；不仅摆脱死神，而且也摆脱死的渴望；得到了解放，活了下来；和平——我生于1917年——只是一个词，既非回忆对象，也不是一种状况；共和国不是外来语，只是被粉碎的回忆。我在这里要感谢很多人，感谢外国作家，他们成为解放者，把令人感到奇怪的和陌生的东西从封闭中解放出来，这些东西由于其本身的物质性而回到自己的特性中去。在回到材料中去，回到这种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难以把握和理解的材料

① 指“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② 《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

中去的情况下，剩下的事情就是征服语言。我也感谢德国朋友和德国批评家的许多鼓励，感谢许多使人丧失勇气的企图，因为有些事情在发生时没有战争，但是在我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反抗的。

这二十七年是一次长征，不仅对作者，而且也是对公民来说的，穿过一座来自想当然的复杂情况的食指密林①。在想当然的情况下，打败了的战争变成其实是打赢了的战争。甚至有些食指的火药味很浓，一触即发。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想起先于我站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在这种该死的想当然情况下据说不再是德国人了。奈丽·萨克斯②为塞尔玛·拉格洛夫③所救，死里逃生。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海塞从这种想当然中移居国外，当他在这里受到尊敬的时候早就不具有德国国籍了。在我出生前五年，即六十年前，德国的最后一位文学奖获得者曾站在这里，他死于德国：盖尔哈特·豪普特曼。他生前最后几年是在德国度过的，尽管存在着一些被误解的地方，但他与那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我既不是想当然者，也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是一个德国人，我的唯一有效的证明——不用任何人签发或延长——就是我用以写作的语言。作为这样一个人，作为德国人，我对这个巨大的荣誉感到高兴。我感谢瑞典学院和瑞典国授予的这一荣誉，它不仅是给我的，也是给我用以表达自己意思的那种语言和我身为其公民的那个国家的。

1972年12月10日于斯德哥尔摩

① “食指”指教训。“食指密林”指数不尽的教训。

② 奈丽·萨克斯(1891～1970)，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原籍德国，1940年逃往瑞典，后加入瑞典国籍。

③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瑞典女作家，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平年表

1917年	12月21日生于科隆。
1924—1928年	就读于科隆拉德塔尔国民学校。
1928—1937年	就读于科隆威廉皇帝完全中学。
1937—1938年	高中毕业后在一家书店当学徒，开始写作。
1938—1939年	参加青年义务劳役。
1939年	进入科隆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和古德语文学。不久应征入伍。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军到过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曾多次负伤。
1943年	与安妮玛丽·捷希结婚，她后来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1944年	母亲死于空袭。
1945年	4月被俘。10月获释。12月返回科隆。
1946年	名义上继续上大学，为的是领取食品配给卡；当临时工；从事写作。
1947年	首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1949年	《列车正点》出版。
1950年	短篇小说集《浪游者，你来斯巴……》出版。

1950—1951年　在科隆市统计局当临时工。

1951年　从夏天起成为自由作家。应邀首次参加《四七社》活动，短篇小说《败家子》获《四七社》奖。长篇小说《亚当，你在哪里？》出版。

1952年　获雷纳·席克勒奖。

1953年　长篇小说《一声不吭》出版。获文学评论家奖和南德广播电台小说家奖。

1954年　长篇小说《无主之家》出版。获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文学奖。首次访问爱尔兰。

1955年　中篇小说《早年的面包》出版。获法国出版家最佳外国长篇小说奖。

1957年　散文集《爱尔兰日记》和中篇小说《马蹄声震峡谷》出版。

1958年　《莫尔克博士收集沉默及其他讽刺小说》出版。获伍珀塔尔市爱德华·封·德·海德奖。

1959年　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出版。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艺术大奖。

1960年　获查尔斯·韦隆奖。父亲去世。

1961年　《短篇小说、广播剧及论文集》出版。获科隆市文学奖。

1962年　首次访问苏联。剧本《一撮土》出版。

1963年　长篇小说《小丑之见》出版。

1964年　中篇小说《离队》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任客座教师。

1965年　获意大利厄尔巴岛文学奖。

1966年　《法兰克福讲演集》和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结

束》出版。获意大利卡拉布里亚文学奖。

1967年　《论文、评论、讲演集》出版。获毕希纳奖、阿勒科国际幽默小品竞赛一等奖。

1968年　多次发表讲话反对紧急状态法。在布拉格访问期间适逢苏军入侵。

1969年　当选为西德笔会主席。剧本《麻风病》出版。

1970年　10月7日，《麻风病》在亚琛市立剧院首演。

1970--1972年　任西德笔会主席。

1971年　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出版。

1971—1974年　任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　在《明镜》周刊发表《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想要宽宥，还是想要人身自由与安全？》一文，引起轩然大波。秋天，支持社会民主党参加联邦议院选举。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1973年　《新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出版。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和厄克斯布里奇布鲁内大学名誉博士衔。

1974年　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出版。获卡尔·封·奥西茨基奖章。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名誉院士。

1975年　讽刺作品集《关于民族思想情况的报告》出版。

1976年　与妻子一同退出天主教会。

1977年　散文集《欢迎干涉。时代的评论》出版。《1947—1977年长中短篇小说》(十卷集前五卷)出版。

1978年　《广播剧、剧本、论文、评论、演说、谈话录》

	（十卷集后五卷）出版。
1979年	长篇小说《保护网下》和短篇小说集《你去海德堡次数太多》出版。
1981年	发表童年回忆录《这个男孩将会如何？》
1982年	散文集《布雷区》和中篇小说《遗嘱》（写于1948年）出版。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授衔。
1983年	《创伤及其他早期小说》出版。成为科隆市荣誉公民。
1984年	获法国文化勋章。
1985年	7月16日在朗根布洛伊希去世。葬于博恩海姆—麦尔滕。8月，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出版。

主要著作目录

《列车正点》 (Der Zug war pünktlich, 1949)

《亚当，你在哪里？》 (Wo warst du, Adam? 1951)

《一声不吭》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1953)

《无主之家》 (Haus ohne Hüter, 1954)

《早年的面包》 (Das Brot der frühen Jahre, 1955)

《爱尔兰日记》 (Irisches Tagebuch, 1957)

《莫尔克博士收集沉默及其他讽刺小说》 (Dr. Murkes gesammeltes Schweigen und andere Satiren, 1958)

《九点半钟的台球》 (Billard um halbzehn, 1959)

《小丑之见》 (Ansichten eines Clowns, 1963)

《离队》 (Entfernung von der Treppe, 1964)

《一次出差的终结》 (Ende einer Dienstfahrt, 1966)

《女士及众生相》 (Gruppenbild mit Dame, 1971)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1974)

《保护网下》 (Fürsorgliche Belagerung, 1979)

《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 (Frauen vor der Flußlandschaft, 1985)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女士及众生相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高年生译
页数＝５０５
ＳＳ号＝１０９６３７１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６月第１版